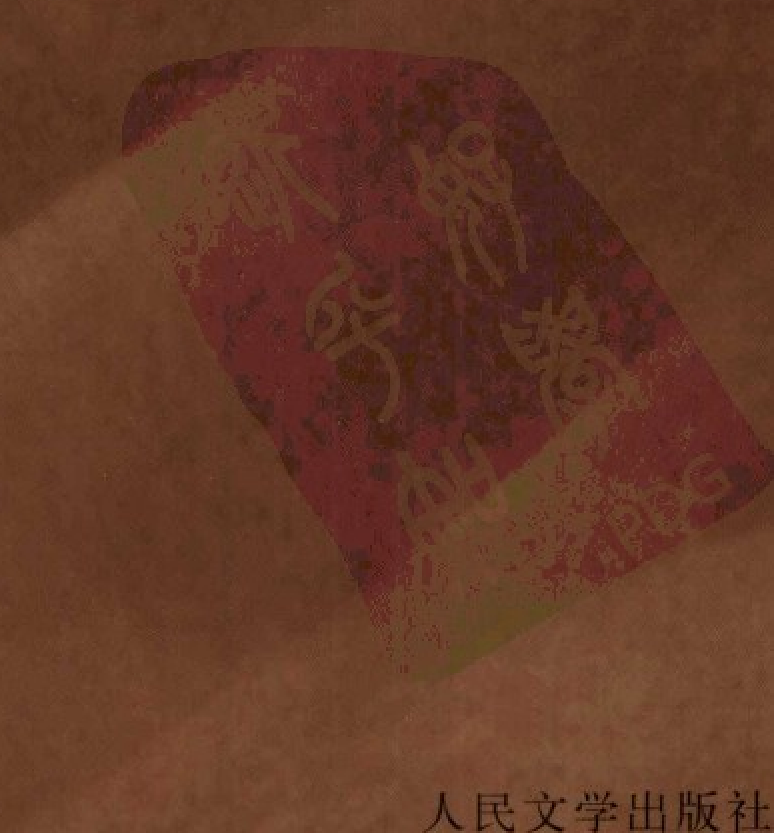
RYSZARD KAPUŚCIŃSKI

#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波兰〕卡普钦斯基　著

乌　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卡普钦斯基抵得上一千个唯唯诺诺、耽于幻想的平庸作家。由于他成功地把新闻和艺术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他常说的那种难以言传的真实战争画面。

英国著名记者萨·鲁史迪文

卡普钦斯基是一个迷人的向导。他集无限的耐力，孩童般的好奇和真正智者的文化修养于一身，是闪烁着寓言和新光泽的作家。

《纽约时报》

卡普钦斯基在为时代撰写历史。

《时代》周刊

当我们孩子的孩子想去了解 20 世纪晚期的残酷时，他们就应该去阅读和研究卡普钦斯基。

《华尔街日报》

卡普钦斯基的文笔精练适度，丝毫不见愤世嫉俗，体现了文学的力量和视野。

《波士顿环球周报》

他是一个用眼睛感觉和用心思考的作家。徘徊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诗人带给我们的超现实的萦绕不去的景象。因为一些奇怪的、不适宜的命运纠缠，这个诗人最终成了记者。

美国《金融时报》

卡普钦斯基的去世，是波兰文学、波兰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他是人类痛苦的见证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见证人。

波兰总统卡欣斯基


ISBN 978-7-02-006985-9
9 787020 069859 >
定价：19.00元

RYSZARD KAPUŚCIŃSKI

#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波兰〕卡普钦斯基 著

乌 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2844

Ryszard kapuściński

**Podróże z Herodotem**

据 Wydawnictwo Znak Kraków 2007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波)卡普钦斯基著;乌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85－9

Ⅰ.与…　Ⅱ.①卡…②乌…　Ⅲ.散文－作品集－波兰－现代　Ⅳ.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233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波〕卡普钦斯基　著
乌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985－9
定价 19.00 元

# 波兰驻华大使致辞

我十分高兴，能把《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向读者推介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更希望大家关注此书的作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先生。非常遗憾，我自己没有机缘认识作家本人，但我年轻时的一位同窗好友，现在我们都在外交部工作，他曾经是卡普钦斯基的生前好友。我常听他给我讲起这位作家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我对这位非凡的作家及其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起初，这位作家最吸引我的是，他那令人钦佩而又震撼的经历。他不知疲倦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采访，他所到之处，总能发回常人没有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各种事件的报道；他所涉足的地区，大都是令人生畏、望而却步的地方。后来我逐渐明白，他的旅行和采访不是为了寻求某种刺激和冒险。他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深深地打动着我，他说："那些令你着迷的国家会激起你对生活的激情，那些刚刚崛起的新大陆，尽管那里还存在着贫困和饥饿，但这一切都与对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随。"

卡普钦斯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声名鹊起，成长为一位广受好评的著名记者、评论家、作家、诗人和思想家，并跻身于世界著名文学家之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多次再版发行，有的作品甚至再版过二十次之多，有的再版过三十次之多。当有年轻记者问他，他是如何取得这样辉煌成绩的，他回答："要想在自己的文章中书写好每一页，就得认真阅读一百页别人就此问题发表的相关论述。"

在他的职业记者生涯中，1956 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作为波兰《青年旗帜报》记者被派到中国来工作。卡普钦斯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原因是当时波兰政治局势紧张，他被提前调回国。尽管如此，他还是显示出了对亚洲问题的兴趣，其中包括中国。他曾这样描述亚洲："中国和印度人口的总和已经超过了二十亿，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或是印度人。从此可以看出亚洲问题的分量。"尽管在他的后半生，他更集中于关注非洲事务和拉丁美洲事务，但他对亚洲的兴趣从未减弱，他后来撰写的一本名为《帝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喜欢《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中译本，并有欲望再去寻找和阅读更多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同时我相信，在中国市场上会有更多的卡普钦斯基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以飨读者。我深信，乌兰博士将会把更多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从波兰文译成中文。她精通波兰语，更重要的是她能领悟什么是"波兰精神"，同时她也理解现实的波兰，就是伟大的作家、波兰传奇式人物、世界著名记者卡普钦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我热切期待并希望，乌兰博士将一如既往地从事自己热爱

的译书工作，旨在使更多的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和阅读卡普钦斯基的其他作品。

感谢你乌兰，请继续努力！

波兰驻华大使

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

2008年12月4日　于北京

# 不能克隆的丰碑

（代　序）

著名的战地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诗人、摄影家，波兰当代最成功的小说家之一——这样的称谓每一个都值得而且需要用终生的心力去追求，但如果有人将这所有的称谓集于一身，那么，这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记者中的诗人"、"闪烁着寓言和新闻光泽的作家"、"20世纪最优秀的世界作家之一"、"人类痛苦的见证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见证人"、"为时代写史"。这样的美誉，每一种都值得为之终生骄傲、自豪，但如果有人能将这些甚至更多的赞誉集于一身，那么，这个人又需要有怎样的付出？

在硝烟弥漫、炮火连天中生长，一生留下二十余部书，足迹遍及亚、非、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感染登革热和其他传染病而大难不死，亲身见证二十七场革命，被关押四十余次，四度被判死刑，其中一次只因执行枪决的士兵酩酊大醉，无法掏枪射击才幸免于难。这样的人生恐怕并不多见，经历如此的不平凡，该拥有怎样的内心世界？如果有一部书来作一次总结式描述，那么，这部书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启迪？

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就是这个人，而他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就是这部书。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是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出生在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市——平斯克附近。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我之所以想提及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出生地，不仅因为这座小城是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人生的始发站，而且我相信，他正是在这座小城那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奠定了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站在如茵的草地上，看着冰冷的炮弹犹如今日节日焰火一般从头顶呼啸而过，巨大的轰鸣声，好像是要天塌地陷；靠抽吸用报纸卷上切碎的烟草根茎来减轻饥饿的痛苦；从居所的窗口，亲眼目睹纳粹德军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脚穿用树皮做的鞋，在没有窗户、没有地板、没有书本的学校上学；父亲失踪，跟着妈妈和姐姐逃难，这就是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少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比他所取得的成就，不由得我不信：苦难有时真的是最好的导师。也许，真是苦难造就了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一切：他毕生的选择，他卓越的才华，还有贯穿他所有作品中的庄严、深刻和不可替代的责任感。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在我眼里，他根本还是个杰出的记者，他的阅历，他的敏锐观察力，他的入木三分的思考方式，他洗炼精辟的文字，他的坚毅、他的勇敢、智慧乃至于他的才情都是对记者这个行当最恰当的解释，他注定要成为我们艳羡的对象。他用自己一生的每一个足迹为记者作了详尽的注脚。人们常说，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站在最高处的瞭望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以他的高度和对作为瞭望者所需的登船资格，所需的品格意志，所需的才能技巧提供了国际标准。

对于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来说，选择做一名记者似乎有太多的偶然。如果《青年旗帜报》文化版总编没有相中他；如果 1951 年华

沙大学的哲学系已经恢复；如果大学毕业后，他不坚持回到《青年旗帜报》见习；如果他因为不懂英文而放弃了去印度；如果他不来中国，不去加纳、不去刚果、不去安哥拉、不去索马里、不去埃塞俄比亚、不去坦桑尼亚、不去阿尔及利亚、不去了解和思考对世界来说像谜一样的非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他不写《足球战争》；如果他去了拉美，而那次行刑的士兵没有喝醉……那么，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一生一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当我们仔细研读便不难发现，其实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源于必然。所有看似偶然的决定都源于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内心的选择。他永远都不欺骗自己，就像他去世后，所有媒体给他的不约而同的评价：坚守良知，忠于真实。做了二十年的记者，我明白这八个字的分量，懂得这八个字的珍贵。

当然，我并不否定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在其他领域中的杰出贡献，比如文学。但我对"记者中的诗人"这样的评价难以释怀，记者需要理性，诗人则需要浪漫，那么，在本相抵触的概念中，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如何转换制式、如何矛盾统一？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笔耕不辍，他用自己的笔描绘出感受独特、动人至深的文字，他涉猎多种文学体裁，如回忆录、旅行随笔、散文、话剧等等，他生动地把新闻和艺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军事、国际关系与文化等等。"我必须亲身经历这一切"，这大概是他与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他甚至愤愤不平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大家都期待作家写书，那些写书的人呢，就坐在家里写……"而作为记者的作家，旅行采访本身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足迹遍布六十多个国家，纵横六十余载，他生前说，作为记者，首先要具备五种特质：亲临、观察、聆听、参与、思考，然后才是写作，再严格的作家恐怕也做不到这样，既然做不到，当然不可能创造

出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样的作品；其次，记者的责任感和敏感、洞察力和表达力也恐怕是他的独门秘笈。他用写作的手法把新闻报道变得生动有趣，他又用新闻报道的手法把文学的语言和故事变得真实深刻。常常，他从表面迹象入手，将本质提炼出来。“他描写鲸鱼是从鲸鱼的肚皮里边写起的。”“他是一个用眼睛感觉和用心思考的作家。徘徊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诗人，带给我们的是超现实的萦绕不去的景象。因为一些奇怪的、不适宜的命运纠缠，这个诗人最终成为了记者。”换句话说，他总在用记者的目光，探索许多学说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背后的历史渊源。与众不同的描述和思考令他在同行中独一无二，孩童般的好奇和真正智者的文化修养让他集权威与魅力于一身，这就是我理解的雷氏文学。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源于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被派去遥远的、一无所知的印度工作时总编送他的一件礼物。那是一本厚厚的黄色缎面精装书《历史》，它的作者是希罗多德，希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这本书陪伴他走遍天涯海角，成为他的人生指南。在这本书中，他依据自己的亲历和希罗多德的指引，讲述了两个相互交错的旅行，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超越虚实的对话。此书正式出版于 2004 年，这一年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七十二岁。三年之后，2007 年 1 月 23 日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没能走下手术台，在他七十五周岁生日还有不到三个月时，告别了多姿多彩的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让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品味枪林弹雨的文学味道和回味无穷的哲学思考。说实话，是对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本人的尊敬和好奇引导我翻开《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但也正是同样的尊敬和好奇引导我读完最后一页。

王　志

2009 年 2 月 14 日　于丽江

# 目　录

波兰驻华大使致辞　(1)
不能克隆的丰碑(代序)　王志　(1)

跨越国境　(1)
被迫滞留印度　(15)
火车站与宫殿　(28)
拉比诵读《奥义书》　(43)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55)
中国式思维　(67)
世界之路上的记忆　(77)
克洛伊索斯的幸运与不幸　(87)
战役的结束　(97)
诸神的由来　(106)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　(117)
阿姆斯特朗音乐会　(129)
佐披洛司的脸庞　(139)

野兔　(149)
在已死亡和被遗忘的国王之间　(161)
希司提埃伊奥斯的荣誉　(172)
兰克医生的诊所　(183)
希腊人的技巧　(194)
在他被狗和鸟撕得粉碎之前　(205)
克谢尔克谢斯　(219)
雅典的誓言　(230)
时间的消逝　(240)
沙漠与海洋　(249)
铁锚　(258)
黑是美丽的　(268)
热烈和审慎的现场　(278)
希罗多德的发现　(288)
我们站在四周闪光的暗处　(298)

译者后记　(309)

# 跨越国境

希罗多德出发远行，踏上陡峭的山石路，扬帆在海上航行，骑马行进在亚细亚的莽原上；他要走向那无人知晓的斯奇提亚，去发现巴比伦的奇迹、探索神秘的尼罗河；他途经数百个地域，亲历了成千上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而在此前，他曾在有关古希腊的历史课上短暂出现过。这是比耶茹安斯卡·玛沃维斯特教授在给华沙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开的课，她的课每周两次。

希罗多德出现了，忽而又消失了。

他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

多年后，当我再翻开当时的课堂笔记时，我没能找到希罗多德的名字。在我的课堂笔记中，我记下了埃斯库罗斯、伯里克利、萨福、苏格拉底、赫拉克利乌斯、柏拉图等人的名字，就是没有找到希罗多德的名字。可我分明记得，我当时非常认真地做了课堂笔记，因为课堂笔记是我们当时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五年，城市还尚未从战后废墟中修复，图书馆在战火中被烧毁，我们没有教科书，各类书籍十分

短缺。

我们这位女教授讲课时声音温和、轻柔悦耳，无抑扬顿挫。她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用她那深沉的目光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她坐在高高的讲台后面，对着数百名年轻的学生。这些学生中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梭伦是何许人也。面对我们这些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她不知道，从何谈起安提戈涅，为什么安提戈涅会那么绝望，也不知从何解释，地米斯托克利用什么妙法指挥了萨拉米海战，战胜了波斯舰队。

说真的，那时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希腊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希腊这个国家，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过去，值得我们在大学期间下功夫去学习关于它的历史。我们都是一群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在二战期间，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关闭，尽管在某些大城市还曾开办过一些地下学校。可现在，在这个课堂里坐着的学生，大多数都来自偏远的农村和小城镇，读过的书不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那是在 1951 年，上大学并不需要什么考试，那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家庭出身，如果是工农子弟则更容易被优先录取。

我们课堂的椅子都是长板凳，可以容下几个人。大家都挤坐在一起，因为位子不够。坐在我左边的同学 Z，他来自拉多姆农村，他整天满面愁容、沉默寡言。他告诉我说，在他的老家，如果谁家的孩子病了，他们就会把一小块风干的香肠当做药，放在小孩儿的嘴里让他嘬，说这样可以治病。

“你真的会相信？这能管用？”我半信半疑地问。

“当然相信！”他非常肯定地回答了我的问话，然后又陷入了沉默，一声不吭。

坐在我右边的同学 W，他十分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满脸麻坑。每当气候变化的时候，他就会难受得呻吟。他告诉我说，他的腿在参加一次森林战役中受过伤，现在，在膝盖骨里还有一颗子弹，可他不想说谁跟谁作战，也很避讳说是什么人打伤了他。

我们同学中也有几位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他们衣着整洁，光鲜漂亮。女孩子还穿着高跟鞋。当然他们这几个学生在同学们中间很显眼，很惹人眼目。因为那时大多数同学都很穷，生活清贫，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旧军装，打着补丁的毛衣和家纺的粗布衣裳。

课上，教授还给我们看了各类希腊艺术照片，包括古代雕塑和嵌有人像的铜铸花瓶。花瓶上的希腊人像都是那么线条流畅，体态俊美，高贵典雅，瘦长的脸庞透出优雅的风度。他们属于那无人知晓的神秘世界。那是一个充满阳光和白银的世界，是一个温暖明媚和光芒四射的社会，在那里曾经居住过帅气英俊的男子和飘飘欲仙、翩翩起舞的美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欣赏这些照片。看着这些照片，Z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W歪斜着身体，弯腰搓揉着他那疼痛的膝盖。其他人看似专心又似乎漫不经心地盯着那些照片看，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出，那些离人类久远的时代中虚幻的现实。其实未来的预言家们在预言这一文明的碰撞之前，冲突早已发生过。就发生在这个一周两次的历史课堂上。也就在这里，我得知了曾经有过一个希腊人，他的名字叫希罗多德。

当时我还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知道他还曾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本珍贵的书。这本名为《历史》的书早已翻译完稿，但尚未付梓出版，所以我们无法读到。塞维仁·哈迈尔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完成了《历史》一书的翻译，他把译稿交给了读

者出版社，具体细节我不得而知，因为这本书的译稿全文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出版社说，在1951年秋，出版社就把译稿交给了印刷厂排版。如果其间没发生任何问题的话，这本书早应在1952年即可问世，无疑我们这些学生也就可以及时看到这本书，因为那时我们正好处于学习古代历史的阶段。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印刷厂突然停止印刷，如今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人下达了停止印刷的命令。是书报检察机关吗？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我也没有十分把握这样说。不管怎么说，三年之后，即在1954年年底，这本《历史》终于问世了，并且在1955年，人们已经可以在书店买到这本书了。

可以想象，《历史》一书从出版社把译稿交给印刷厂到书店发行，为什么会间隔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为在这一时期，正好经历了斯大林去世，而在他逝世之后，这本书就很快付梓出版了。出版社把译稿交给印刷厂时，正值当时的西方媒体沸沸扬扬地传出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尽管人们不知详情，但还是害怕再次掀起白色恐怖浪潮，人人自危，所以为了谨慎起见，也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免遭落人口实，采取了等等再说的稳妥办法。那时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形势十分紧张，书报检察官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

为何希罗多德的书会遭此厄运？他的书不是写于两千五百年以前吗？——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就是这样。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赶上了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似乎每一个单词都影射着什么，每个单词都暗含着双重意思，每个单词背后都隐藏着万丈深渊，都是一种虚伪的说法，字里行间都深藏着密码和诡诈的阴谋。那个时候发生的那种现象实在令人费

解，坦白地，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做的每件事儿、每个手势、说的每句话好像都隐喻着什么，甚至连眨眼睛都会被认为是给对方一个不可告人的暗示。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写文章的人就更不可能把自己真实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审稿过程中，很可能就被书报检察官枪毙。也正是这些原因，每篇文章送达读者的手中，每位读者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甚至有时作者意图表达得很清楚，但在读者意识中却存在很多疑问：——这位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些人过分地被这种意识困扰着，因而带着这种情感阅读了希罗多德的书，以至于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发现，里面竟有如此多的暗示和隐喻。

《历史》一书共由九卷组成，而每卷中都隐含着暗示和隐喻。甚至你只是偶然翻到该书的第五卷，你读着读着就会觉得，科林斯的暴君库普赛洛斯，在他血腥统治了三十年之后，终于驾崩了。他死后，他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后来人们发现，他比他的父亲更加残忍、更加嗜杀成性。这位暴君佩利安多洛斯从登基第一天起，就显示了他的暴君特性，他为了能牢牢地掌握权力，专门派自己的特使去拜见米利都的统治者特拉叙布洛斯。他让自己的这位特使去取经，怎样才能更好地奴役臣民，怎样才能让他们更惧怕政权而俯首帖耳。希罗多德写道：

“特拉叙布洛斯把从佩利安多洛斯派来的这位特使领到城外的一块谷地，而当他们经过这块谷地的时候，他便一再询问来人从科林斯前来要问什么事情，同时却不停地把长得较高的穗子揪下来抛掉。他这样走过整块田地，把谷物中所有最好的颗粒最饱满的毁掉了。这之后，他一言不发，便把使者打发走了。当使者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佩利安多洛斯急于想知道他所带回

来的忠告，但是这个使者却说，特拉叙布洛斯并没有给他任何忠告，这个使者还说，他很吃惊佩利安多洛斯会派他去找那样一个人，他认为特拉叙布洛斯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而且是一个毁掉自己财产的疯子。于是他把他看到特拉叙布洛斯所做的事情叙说了一遍。但是佩利安多洛斯明白了他所做的并意识到，特拉叙布洛斯是劝告他杀死他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从那以后，他就以非常残暴的手段对待自己的臣民，用诛杀或是流放的办法。如果说库普赛洛斯还留有未竟的诛杀或是流放等迫害事业，佩利安多洛斯都给完成了。"①

那么，阴郁、狂躁、多疑的刚比西斯又如何呢？在这位嗜杀成性、狂躁多疑的暴君背后又深藏着多少暗示和隐喻？有多少可以类比？又可以找到多少相似之处？刚比西斯是当时古波斯帝国的国王。他统治的时期是公元前 529 至公元前 522 年。

对我来说，事情很清楚，他是一个缺乏理智，及至疯狂的人……首先他竟然下令杀了他的亲兄弟司美尔迪斯……正像人们所说的，这是他犯下所有罪行中的第一桩罪恶。第二，他把亲姊妹带到了埃及，并且和她结为夫妻……他还命令十二个波斯高官头朝下像羊一样地刨地，然后活埋了他们，只露出他们的头。尽管他们只犯了微不足道的错误……这仅是他对波斯人和盟友所犯下的疯狂罪行中的几个例证。他做的另一件疯狂事是，在他统治孟菲斯的时候，他甚至打开了一些古墓，检验里面的尸体……

刚比西斯在没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因为自己十分震

① 本书出自《历史》的引文，根据波兰文本译出，并参考了英、中译本。后面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同此，不再一一赘述。

怒和疯狂，就率领所有的地面部队开始对埃塞俄比亚人进行征讨，他既没有下令准备任何粮食，又没有考虑他的远征军在向大地的边缘进发……由于他缺乏冷静思考而处于疯狂的状态……但在他的军队还没走完全程的五分之一时，他们已经把所带的全部粮食消耗殆尽，之后，他们就开始吃马匹，吃到精光。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如果能立即改变自己的初衷，率领军队返回，他还是可以因采取明智举动而补救他犯下的错误。可他丝毫不去考虑眼前的形势，一味地继续猛进，哪怕只有草可食，他的大军就能生存。可是他们此时已经到达了沙漠地带，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每十个人一组抽签，抽中的人让大家分吃。当刚比西斯听到这样的事之后，担心他们会变成食人族，才放弃了对埃塞俄比亚人的征讨，率部返回。

我前面提到过，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在 1955 年问世的，即在斯大林逝世两年后出版发行的。那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人们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出版发行的还有爱伦堡的作品。他的《解冻》书名正迎合了刚刚开始的文学新世纪。那时文学可以指导一切，人们需要从文学中找到生活的力量、生活的启示和对生活的重新评价。

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一家报社工作，那家报纸叫《青年旗帜报》，我在报社当一名见习记者，根据人们给编辑部的来信，我到各地去采访。那些给编辑部写信的人，常常抱怨社会不公平、生活贫困，抱怨政府没收了他们仅有的奶牛，或者在他们所住的村中至今未通上电等等。那时书报检查也相对宽松些，我们可以报道一些社会的消极面，比如说，在一个叫霍杜夫的村子里，尽管有商店，可里面的货架却是空空如也，什么也买不到。在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报道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斯大林在世时，是不能

报道这类新闻的。那时我们的报道只能写商店供应充足，商品琳琅满目。我就这样常常乘着运草的马车或者摇摇晃晃的好像快要散了架的破旧公共汽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采访。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私家小汽车，甚至想买一辆自行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候，我得到靠近边境的村子去采访。当然这种机会并不多。最远也只到过接近边境的地方，那时路上很少看到人。愈接近边境，大地就愈荒芜，人烟就愈稀少。这种荒凉让我觉得这些地方很神秘，这激起了我的猎奇心。我惊异于国界线地区如此宁静。这种神秘和宁静诱惑着我，使我愈发好奇。越是如此，我就越发想去那边看看，看看那边究竟有什么？我还揣测，跨越边境时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会有怎样的感觉？会想些什么？经历什么？会有怎样的感想？那肯定是一个令人心跳、情感激荡、焦虑紧张的时刻。边界那边是什么样子？肯定会跟这边不同。但“不同”又意味着什么？看上去会是什么样？那边的风景如何？有哪些相似之处？也许与我所知道的毫无相似之处。真是不可思议，因此就使得我愈发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神秘，无法想象，这搅得我心神不安，撩拨得我一刻不得安宁。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在一瞬间体验一下越过边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感受一下越境这一刻的心情，体会一下这一简单的经过。我只是想到国境那边去看看，然后立刻返回，满足我的好奇心，解解心头之渴，足矣。因为这会让我那种无法释怀的冲动的心理饥渴得到满足。

可是怎么才能完成我的心愿呢？无论是我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中好像没听说谁去过外国，即便他们与外国有联系，也不会大肆宣扬。我开始恨自己，为什么产生这种稀奇古怪的念头。

可这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的走廊里遇到了我们的女主编伊莱娜·塔尔沃夫斯卡。她是一位身材高挑、很漂亮的女性。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发线斜分着。她顺便问了问我有关最近发稿的事儿，然后又问了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她，我还有一些去外地的采访计划，有些事情还等我去写采访报道。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大胆地对她说，我将来很想出国工作。

出国工作？她感到很诧异，还带有一点担心地问。因为那时出国工作可不是一件平常事儿。

“你想去哪儿？干嘛要出国工作？”她问我。

我说，我想去捷克斯洛伐克工作。

说实在的，我没有要求去巴黎或者伦敦什么的，我连想也不敢想去那些地方工作，当然我对那些地方也没有兴趣。在哪儿工作对我来说都一样。对我来说，出国工作不是我的目的、目标，也不是我最终想要的结果。我也不是非要出国不可，其实就是想实践一下自己那个近似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古怪行动——跨越一下国境。

那次谈话一年后的一天，我们编辑部的电话铃声响了。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

“你知道吗？”我刚在她的办公桌前站定，她就说，“我要决定派你去印度。”

我的第一反应是吃惊。然后就觉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我对印度可是一无所知啊！我迅速地在脑海中搜寻与印度有关的联想、印象和有关地名、人名。但一无所获。印度这个国度，在我的大脑中简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得知，派我去印度这一想法的产生，是因为几个月前，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波兰，他是

当时第一位访问波兰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同时这也是波兰和印度之间的第一次交往，派我去的目的是希望我报道一些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拉近与这个遥远国度的距离）。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我知晓我确确实实要走向世界了。此时，塔尔沃夫斯卡打开抽屉，递给我一本书，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书，路上看吧！”

这是一本厚厚的黄色缎面精装硬皮书，上面烫着几个大大的金字：希罗多德著《历史》。

这是一架有两个引擎的 DC－3 飞机，一架前线淘汰下来的老掉牙的破旧短途飞机，两边的机翼被机油熏得黑黢黢的，机身还有补丁。不过这架飞机还是正常起飞了。飞机上的人不多，只有几位去罗马的乘客。我的座位靠着机窗，我目不转睛地往外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高空鸟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连山都没爬上过，更别提坐飞机上天了。五彩斑斓，棋盘似的大地拼缀成五颜六色的图案，像灰绿色的地毯在我们下面缓慢地移动着，不断延伸着。一切好像都是这样伸展着，阳光普照着大地，好像要把它晒干。天色很快就黯淡下来了，然后立刻变得一片黢黑。

“夜晚到了。”我的邻座用带着外国人腔调的波兰文对我说。

他是意大利驻波兰记者，现在回国工作。我只能隐约记得他叫马利奥。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是印度，并告诉他我去那儿的目的，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我还告诉他，我对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他听后笑了，然后好像对我说了一句：

“别担心。”

他还说，他会尽力帮助我。听了他的话，我暗自窃喜，因为这使我心中多了几许安慰，也更加自信了一些。我确实需要他

的帮助，因为我正飞往西方。在来西方以前，我们脑袋中被灌输的思想是，西方是一团可怕的鬼火。

我们的飞机还在黑暗中飞行，甚至机舱内的灯光都变得十分暗淡。飞机发动机一直在全速转动，就好像它的所有零件都十分紧张痛苦地轰鸣着。当发动机的轰鸣声突然开始渐渐变得松弛些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次旅行快要结束了。马利奥忽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着窗外对我说：

“你看！”

我往下望去，顿时惊呆了。

我脚下这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此刻已灯光闪耀、明亮夺目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刺眼。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一条又长又宽的跑道上。跑道上，灯光四射，闪烁不定。我好像感觉到，在我们的下边似乎是一条流动的岩熔，正在熔化的火山岩浆，也在一点点地冷却，表面上是搏动着的火星，带着跳跃的光点，一会儿徐徐上升，一会儿又缓缓下降，渐渐地膨胀又慢慢地收缩着。因为这一闪烁着耀眼灯光的画面给人一种生机勃勃、富有动感、激越震荡、能量充沛的感觉。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灯火通明的城市。我以前曾去过的几个大城市，在我的记忆中，都是那样的黑暗冷清、忧郁沉闷。商店的橱窗没有灯光，街头也看不到任何彩色广告和街灯。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瓦数极低的灯泡在暗中摇曳。有谁需要这些亮光？夜晚的街道空寂无人，当然也很少见马路上行驶汽车。

飞机飞得越来越低，离地面越来越近，此时灯光闪烁的画面不但离我更近，而且在不断地扩大。飞机重重地落在水泥铺就的跑道上，发出嘎吱嘎吱刺耳的声响。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罗马机场。这个硕大的飞机场，四方形，有着大大的宽敞明亮的落地窗。里面的人熙熙攘攘。这里的晚上很暖和。我们穿过车水马龙、拥挤的大街小巷来到市区。街上可以听到各种方言，大街上热闹非凡，霓虹灯闪闪发光，到处是嘈杂的人群，一切就好像注入了麻醉剂一样。我在一瞬间似乎失去了知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看上去一定像一个原始森林里来的怪物，昏头昏脑、懵懵懂懂。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想把一切都尽收眼底，然后再去识破它、分辨它、看穿它。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声音。我听出来这是马利奥的声音。后来我得知，马利奥和他妻子在讨论为我买什么衣服，怎么打扮我。因为，当时我穿的是 1956 年在华沙流行的休闲装，显得很土。那时，我上身穿的是一件刺眼的灰蓝色粗纺厚呢子的双排扣西装上衣，双肩上衬有厚厚的垫肩，肩膀显得宽宽的，上衣还有点长，不太合身。下身穿的是带卷角的肥肥大大的宽松裤子。衬衫是浅黄色的尼龙布衬衣，配的是绿色带格子的领带。脚上蹬的是一双厚实的平跟船形硬底皮鞋。

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军事领域，同时在其他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都十分明显。如果说，西方人喜欢穿轻巧些的衣服，那么，东方人就会与其完全相反，穿得要厚重些。如果西方人喜欢穿合体的衣服，那么东方人亦会穿得与之截然相反，长度恨不得长出一里。西方的一切都会被拒于大门之外。不用查看护照，从远处就能辨别清楚，——他们来自铁幕两旁哪一个阵营的人。

后来，马利奥的夫人陪我去购物。这让我大开眼界。有三件事令我感慨颇深。首先是，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成排的货架上的货物多得摆不下，甚至挤占了行人道、马路

和广场。街道像一条彩色的川流不息的小溪。第二,那里的售货员小姐,她们不是坐着而是站着看从商店门口进来的顾客。更让我颇有感慨的是,这些售货员小姐都是默默地站在那儿,而不是坐在那里扎堆儿闲聊。对我来说,女性们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她们都能找到闲聊的话题。比如说,聊聊与丈夫的矛盾、教育孩子的问题等等。怎么穿着打扮,怎样保养身体,昨天做饭的时候是不是把饭烧焦了等等。可这里的售货员小姐给我的印象是,她们好像彼此互不相识,也无意闲谈似的。第三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她们不仅热情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还能在完整地解答之后,礼貌地加上一句——谢谢!

马利奥的夫人问了一些什么,售货员小姐专心致志地在那儿听,她们都礼貌地躬身站着,就好像马上要参加什么竞赛似的。他们听完顾客的话后,还要跟顾客确认一下,然后再次礼貌地重复那神圣的一句——谢谢!

晚上,我大胆地一个人上街转了转。我猜,我们大概是住在市中心,因为这儿离戴耳米努斯体育场很近。从那儿我走到了加富尔广场,一直步行到了威尼斯广场;我穿过大街小巷,又回到戴耳米努斯体育场。我没有去注意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雕塑和纪念碑。让我着迷的却是,这座城市里,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儿和酒吧。行人便道上到处都摆放着小桌子,人们坐在小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甚至有的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静观着街道和过往行人。吧台服务员在又高又长的吧台后面,倒出各种各样的饮料,调制着鸡尾酒,冲煮着咖啡。酒吧服务员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客人之间,灵巧地给客人们送去各种高脚酒杯、水杯、咖啡杯等。这种情景我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在俄罗斯马戏表演中看过。魔术师变戏法地从空中拿出木盘子、高

脚玻璃酒杯、瘦瘦的尖叫着的雄鸡等。

有一天，在众多的咖啡馆中，我搜寻到了一张小桌，旁边没有人。于是我就坐了过去，要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人们好像都在注意我，尽管我已经换上了新买的西装，里面是雪白的意大利衬衫，还戴着当时最时髦的有圆点图案的领带。很显然，我的外表和做派，我的一举一动上都泄漏出我来自异国，来自与他们不相同的世界。我能明显地觉察出来，他们把我当成了另类。尽管我置身在罗马神奇的天空下，我原本应很开心，但我还是开始觉得有些不快。虽然我换上了崭新的衣服，但我显然还是无法掩饰一些我与他们在外形和特征方面固有的不同。正是这些，塑造并标志着我是来自一个迥异于他们这个世界的外来分子。

# 被迫滞留印度

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四引擎飞机舷舱门前，站着一位身穿浅色印度民族服装——莎丽服——的空姐，她微笑着迎接每一位乘客。服装柔和的颜色显示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空姐双手好像祈祷似的在胸前合十站在机舱门口，这是印度人表示问候的一种手势。我看见她的前额正中用口红点了一个很明显的圆圆的红点。当我进入飞机客舱后，我闻到了一种迎面扑来的非常强烈而陌生的气味。这大概就是用印度的草药、水果和谷物合成的一种东方的薰香吧。

我们是在夜间航行，所以从舷窗只能看见飞机机翼尾部闪烁的一盏绿灯。那时人口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膨胀。坐飞机旅行还算舒服，因此飞机上乘客很少。这次也一样。人们可以占用邻座的位子，舒服地躺着睡觉。

我觉得毫无睡意，于是就从随身的提包中掏出塔尔沃夫斯卡送给我让我在路上消遣的那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冗长厚重的书足有数百页。我发现它颇具诱惑力，像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

我逐字逐句地从序言开始读起，序言是本书的译者塞维仁·哈迈尔教授撰写的。他介绍了希罗多德一生的经历，并给我们阐释了这本巨著的意义。塞维仁·哈迈尔教授写道：希罗多德生于公元前485年，出生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移居到雅典，几年后又移居到当时位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叫图里伊的地方，那时这个地方属于希腊殖民地。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25年辞世。他一生爱好旅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本书——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撰写的唯一一本书，这本巨著题为《历史》。

哈迈尔想尽量重现这位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物，实际上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希罗多德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今，他身后留下的这部手稿大概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接触到，这些专家除通晓希腊语言之外，还必须掌握破解阅读这本书的特殊密码。希罗多德的文本，可能就是一个冗长的、无休止符号的、密密麻麻地写在数十卷草莎纸上的一句话。哈迈尔还写道："希罗多德文稿中的词句之间没有特别的断句，就好像没有章节、不分卷册、一个结实的文字织物"。希罗多德用一种特殊的密封方式，把这块织物保存起来，他把自己隐蔽在这个词语织物之后，就像把自己隐蔽在屏风之后一样，连他同时代的人都无法解读。即便是当今的专家们，都无法完全破译它，更何况能力更为薄弱的我们。

黑夜过去了，新的一天又来了。透过机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凝视着我们这个星球，它如此浩瀚广阔。这种景象能把人的思绪引入无边无际的遐想，令人浮想联翩。迄今我所认知的世界，方圆也不过五百公里长、四百公里宽。而我们现在的飞行似

乎没有尽头，在我们的下面，远远望去，大地在不停地变换着它的颜色，忽而变成火红色，忽而变成棕色，忽而又变成绿色。这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地又呈现出灰蓝色。

午夜时分，我们的飞机抵达了新德里。一股潮湿的热浪向我袭来。我顿时大汗淋漓，无助地呆立在这个令我震惊而又陌生的地方。跟我同飞机来的人，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被这多姿多彩和熙熙攘攘及前来接机的亲朋好友们吞没了。

我一个人呆站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飞机场的候机楼又小又暗。此时飞机场已是人去楼空。与罗马机场截然不同，此时飞机场空空荡荡，突兀地伫立在暗夜之中。而我孤独无助地面对眼前漆黑的世界，茫然无知。我呆呆地站在黑暗中，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跟前。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宽宽大大、长到脚面的大长袍，头发花白，留着稀疏的胡子，头上还裹着一块橘黄色的包头巾。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我猜想，他可能问我，你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空空荡荡的机场不走，可是我不知该怎样作答。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继续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我身上既没有任何人的联系地址，也没有任何联系人的姓名，加之我当时的英语很差。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实现了我期盼已久的——跨越国境的愿望。然而陷入此种境地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我：我唯一的欲望只是想实现一下我曾认为无法实现的愿望——跨越国境。此外，我别无他求。可这一愿望的表达，却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最终将我发送到遥远的这里、世界的另一端。

那位老者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给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跟他走。在候机楼门口的一边，停着一辆油漆斑驳的破旧公共

汽车。我跟他上了车,这位老者立即发动了汽车。就这样我们上路了。汽车走没几百米,司机就开始减速,然后不停地猛按喇叭。我注意到,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本该是马路的地方,却成了一条洪流滚滚的宽阔人河,这条人河的尽头消失在闷热难熬、潮湿无尽的黑夜之中。一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穷人就这样在马路上开辟了一条人流,其中一小部分躺在木板条拼成的床或者垫子、毯子上,而绝大多数人则直接躺在沥青马路上,或者躺在马路两边由沙土铺就的软肩上。

我以为,司机不断地在他们头顶上狠狠地按喇叭,他们会被激怒,起来报复,殴打我们,甚至对我们动刀子。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似的。我们的汽车往前缓缓地移挪,这些人慢慢儿爬起来,拉上他们的孩子,推推步履蹒跚的老妇人挪到旁边。在他们这种逆来顺受的行为中,好像隐含着一种恐惧,一种深深的歉意,好像他们睡在沥青马路上是触犯了什么戒律,他们得尽快抹去他们身上那些罪恶的痕迹。我们的汽车就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在去往城里的路上缓缓地挪动着。汽车喇叭声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这些露宿街头的人们还是照样重复着一样的动作,缓缓爬起身,慢慢挪动一下地方,一拨又一拨,给我们让路。等我们进到城里,我才发现,这里的马路更难通行,这个地方,似乎就是这群穿着白色长袍的人们在梦游中的巨大宿营地。

就这样举步维艰,我们终于来到一幢楼前,楼顶上红色霓虹灯闪耀着“饭店”两个大字。司机把我带到饭店的前台,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饭店前台的服务生,身穿一件蓝色长袍,戴着蓝色包头巾,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小屋,那间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还有一个小洗脸池。

这位服务员把我领进屋，二话没说就从床上扯下床单，床上的各种爬虫吓得四处乱钻，他用力抖了抖床单，掉在地上的虫子在地板上到处乱跑。那服务员好像对我说了声晚安，就离开了我的房间。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木讷地坐在床沿上，认真思考着目前自己的处境。往坏里想吧，我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往后该怎么办；往好里想吧，我现在暂时居有定所，不至于流落街头，我可以把这个机构（饭店）作为我的临时避难所。但我感到安全吗？——是的！感到心神不安吗？——没有！有奇怪的感觉吗？——是的！这奇怪的感觉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激动不已。这种奇怪的感觉就更加强烈。清早，一个赤着脚的人悄悄走进了我的房间，给我送来一壶茶和几块饼干。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新鲜事。一个人悄悄走进你的房间，一声不吭，也不跟你要钱，把一个放着茶壶和饼干的托盘轻手轻脚地放在你的桌子上，然后给你深鞠一躬，竟然什么话也不说，又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他举止礼貌，一切做得如此得体自然，又如此体贴，不失尊严。有一种东西好像深深地触动了我，打动了我的心，让我对他立刻肃然起敬，由衷赞赏。此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对他的钦佩和敬重之情。

一个小时以后，当我走出饭店的大门，这里发生的一切，就更加使我困窘茫然，不知所措。在马路的对面，有一个拥挤的小广场。这里，一大清早就聚集了很多佝偻着背、骨瘦如柴、一脸皱纹、满目沧桑、两腿细得像根硬硬的铁棍、青筋暴起的人力车夫。这些人消息很灵通，得知昨天晚上这里来了一位老爷，既然是位老爷，那一定很有钱，所以，他们在饭店外耐心地等候，准备

为他服务。可是我心里想的却与他们截然不同。我已下定决心,坚决不坐他们的车。如果我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他们的车上,让这些饿着肚皮、瘦得弱不禁风,而且看上去一条腿已经迈进坟墓的饿汉拉着我,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我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应该羞愧难当。我无论如何不能做剥削者,不能当吸血鬼,不能去压迫穷人。我坚决不能这样做!我所接受过的教育决不容许我这样做!无论他们有多么穷,我都应该视他们为我的同胞兄弟,视他们为亲朋骨肉。所以当这些人力车夫扑向我时,无论他们怎么苦苦哀求,无论说什么好话,甚至为了能让我坐上他们的车,他们自己厮打了起来,但我对这一切始终无动于衷,我用力推开他们,向他们表示抗议。我的举止让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搞不懂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曾经真心地期盼,我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靠自己辛苦劳动赚钱的机会,我是他们能够挣到一碗饭钱养家糊口的唯一希望。可是我却坚定了信念,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往前走,我面无表情,毅然决然。我为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到沾沾自喜,因为自己抵挡住了干扰而没变成榨取别人血汗的吸血鬼,没有充当可恨的寄生虫,为此我感到自豪。

老德里,狭窄的街道,漫天尘土飞扬,阵阵热浪扑面袭来,空气中蒸腾着浓浓的热带气候特有的发酵气味。人们默默地在这样的街道上来来往往,行色匆匆。这里的人们皮肤黝黑,脸上流淌着汗珠,表情呆滞麻木。孩子们都很安静,听不到他们大喊大叫的哭声。大街上,有一位男子呆呆地望着自己那辆已经七零八落的自行车上的剩余物品,因为他的东西洒落在马路中间,遍地都是。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兜售着一种用绿叶子包裹着的东西,这是什么?叶子里包的究竟是什么?有一个乞丐在街头表

演，他能把自己的肚皮贴到脊背上，这可能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在这个地方行走要万分小心，因为小商小贩的货物都摊摆在地上、行人便道上和马路边。那边还有一位男子，他在自己面前摊开的报纸上摆了两排真人的牙齿和老式医用老虎钳，他以这种方法推销自己的牙医服务。他的邻居是一个干瘪如柴的男人，他在卖旧书籍。我在他布满尘土的乱书堆里翻看着，最后选了两本书，一本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作为学习英语之用），另一本是阿贝·迪布瓦的书——《印度教的礼仪、习俗与仪式》。迪布瓦神甫于1792年作为传教士来到印度，在印度住了三十一年。我买的那本书正是他对印度习俗研究的结晶，1816年由东印度公司赞助，在英国出版。

然后我又回到了我住的饭店。翻开刚买回来的那本海明威的书，从头读起。

"他躺在棕色的铺满松针的林地上，下巴放在交叠的双臂上，微风从高处松树的枝头吹过"，念了半天，我一句话也没看懂。我当时衣兜里还揣着一本英波袖珍词典，这是我出来前在华沙能找到的唯一一本词典。我成功地在词典中查到"棕色"这个词，其他字都没查到。然后我继续往下念，下一句话是"山势缓坡而下……"，还是一个词也没看懂，"山坡旁边有一条小溪……"我越是急于弄懂所念的内容，就越发灰心丧气，甚至绝望。我觉得自己好像陷入困境，走投无路。这就是语言的束缚。此时，语言这东西让我觉得，它是一种有形的东西，是物质的存在，是挡在我前进路上的一堵无形的墙，牢牢地堵住了我的去路，把我拒之于这个世界大门之外，让我觉得无法逾越。这让人觉得气馁而羞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感觉解释为，为什么一个人在初次见到外国人或第一次接触外国的某种事物时，会产

生一种陌生感、距离感，会感到恐惧，继而产生不信任、警觉心或者某种疑惑？所以人们就会对自己发问，这种接触能带给我什么？结局如何？最好还是别出去冒险，呆在自己熟悉的茧子里！不要把鼻子伸到自家篱笆外面去。

若不是我手中有一张早已买好的从孟买到格但斯克定期往返的“巴托雷”号客船的回程票，那我很可能就会在刚踏上印度土地之后，凭着第一次冲动，不顾一切地逃离这里迅速回到自己的家园。遗憾的是这条船没能抵达印度。因为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战争爆发了，运河被封锁，因此“巴托雷”号客船被困在地中海的某一地方。所以我与家的联系被切断，无法回国，被迫滞留在印度。

此时此刻，我犹如掉进了汪洋大海，可我自己还不甘心就这样白白淹死。我认识到，只有语言能拯救我。我开始琢磨，希罗多德是怎样周游世界的？他在周游世界时是怎样克服语言障碍的？哈迈尔写道：“除了希腊文以外，希罗多德不懂任何其他语言。但是当时，希腊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到处建立殖民地、港口和工厂，所以，《历史》的作者可以求助于那些他在各地相识的希腊人，请他们做翻译和向导。此外，希腊语言当时使用的是一种法兰克语言，这是当时的一种通用交际语言①。那时很多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都会说这种语言。当然，这种语言后来被拉丁语，之后又被法语和英语取代了。”

我既然无路可退，就不能无所事事，既来之则安之吧。于

① 这是当时地中海东部地区贸易者使用的掺有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一种通用交际语。

是，从那时起，我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苦读英语、背生词。我把毛巾用凉水弄湿，敷在太阳穴上，让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海明威。我先跳过他小说中我弄不明白的描述部分，因为我语言水平有限，弄不明白就暂时放过。我从有对话的段落开始读，因为对话容易读懂。

“你们有多少人？”罗伯特·佐丹问。

“我们一共七个人，其中两个妇女。”

“两位妇女？”

“对！”

这些我都看懂了！我又接着往下读：

“奥古斯丁是个好男人。”安塞尔默说。

“你跟他熟吗？”

“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了！”

这些我也明白。从此我就振奋精神，走上街去，抄下广告牌上的用词，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公共汽车站听到的词语，在电影院里我摸黑记下屏幕上的字，还记下街上示威游行者举着的横幅上的标语口号，我就采取这种方法学习。我接近印度，不是通过画面、音响，也不是通过它那特有的气味，而是通过词语，但不是通过印地语，而是通过被强加给印度的外来语言。这一媒介语言——一种非印度语系——英语在那时已经被印度人接受并根深蒂固。这种语言对我了解这个国家不可或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些独特的令外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想要破解它，只有一条路，就是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永远是莫测高深、不可知晓，尽管我们可能一生都会居住在那里。我还特别

注意到，名称和存在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每当我回到饭店，就会觉得，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只注意了我知道名字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记住了“洋槐树”这个词，但我并不知道它旁边那棵树的名字。总之一句话，我终于明白了，我所能记住的单词越多、词汇量越大，运用越准确，眼前呈现的可以抓住的世界就越丰富、越完整、越绚丽多彩，就越觉得世界大门是敞开着的。

在德里的这些天，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一想到我作为记者被派到这里，不但没做任何工作，而且也没能积累任何今后可用于写报道的素材，心中就难以平静。我深知，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报社派来的记者，我是一个使者，应该清楚，我肩负着向国内提供消息报道、传递信息、写文章等使命，可我至今什么也没能写出来，同时也觉得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亦不知从何着手。当然，我也可以这么为自己开脱，来印度并不是我主动请缨的，毕竟我对印度一无所知。我当时提出出国工作的想法，也只不过是想跨越一下国境。想法非常单纯，仅此而已，也没考虑那么多。可如今，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使我有家不能回，只好硬着头皮呆在这儿了。没有退路那就只能往前走。于是我决定，我要去旅行。

饭店前台的服务员建议我先去贝纳勒斯。“那是一座神圣的城市”，他们告诉我。（我早就注意到，在印度，很多事物都可被称为是神圣的，比如说，可以说神圣的城市，神圣的河，有数百万神圣的牛。这里的生活处处充满神话，神秘主义比比皆是，令人震惊。这里有那么多的庙宇、寺院，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祭坛、神龛，到处是烟雾缭绕的香火，几乎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有因磕头留下的印迹。到处都是人，他们可以一动不动地端坐在一个地方，凝神冥想，注视着能让人和神灵交汇的那一点。）

我听了饭店服务员的建议，乘公共汽车去了贝纳勒斯。去那儿要经过雅姆纳和恒河盆地，那里真是一马平川，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农田尽收眼底，放眼望去，田地里是穿着白色衣服的密密麻麻的人影，他们是在稻田里劳动的农民，有人弯着腰，背朝天，有人头顶大包、篮子或者大布袋。车窗外的这种景象也变幻不定，常被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水所代替。此时，这里正值秋天洪水泛滥的季节。河水漫延成白茫茫一望无际的大湖，岸边到处是赤脚逃荒的人群，他们必须赶在水涨之前逃离这个地方，但仍要保持着与这片土地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只逃到能够维持生命的地方。一旦水位下降他们就会迅速回来。在这种酷热难耐的天气里，水汽升腾蒸发，眼前弥漫着一片片凝滞在空气中的白茫茫的雾色。

我们很晚才到达贝纳勒斯，差不多已是半夜。这座城市好像没有城郊，因为城郊会让人逐渐感受到车慢慢接近城市。可我们好像突然从黑暗、宁静、空寂的夜晚一下子被抛到了灯火通明、拥挤不堪、嘈杂喧闹的市中心。人们为什么喜欢成群地蜂拥到这个地方，在大城市中推来搡去，而就在城市的周边有那么多空旷的地方，难道那儿挤不下他们吗？下了公共汽车，我独自在街头漫步。我走到了贝纳勒斯城市的外围，那里一边是大片无人开垦的荒地和黑黢黢的安静的空地，另一边则是高楼凸起的城市建筑，人口稠密，到处人声鼎沸，灯光耀眼，音乐声震耳欲聋。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这种拥挤不堪的生活，人们为什么要这样你拥我挤，擦肩接踵，而紧邻的大片空地却无人光顾。

当地的人告诫我，夜里最好不要睡觉，免得耽误了一大清早到恒河岸边看日出。要趁天还没亮就得赶到那里，站在河边的

石阶上等待天亮。“看日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他们这样说。从他们的声音里似乎回荡着某种真正宏伟壮丽的期许。

实际上，当人们开始往河边移动时，天还是灰蒙蒙的。有的人喜欢独自走，有的人喜欢成群结队；有的携全家老小一起，像是朝圣的队伍。跛腿的拄着棍子，年老体弱的由年轻人背着。其他人懒懒散散、歪歪扭扭地在凹凸不平的沥青路上缓慢地行进，无精打采。人群中还夹杂着成群的牛羊，还有一些骨瘦如柴、患了疟疾的野狗。最终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这个令人费解的神秘队伍。

但是能够走到河岸边有石阶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通向河边的道路十分狭窄，空气污浊、肮脏不堪，一路上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乞丐，他们令人厌恶地挤进朝圣的队伍，在人群中推来拉去，同时他们也肆无忌惮地大声哭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我们这群人终于穿过了拥挤的狭窄街道和拱门，来到一个细长的走廊，到了最高处的石阶上。这些石阶一级级延伸向恒河深处。此时天边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但这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虔诚的等待日出的人。有些人相当活跃，不知因何满处乱跑，而另一些人则盘腿莲花式端坐在一个地方，双手合拢，朝向天空伸展着。占据最下面台阶的那些人，正在做着涤罪礼仪式，他们缓缓走向河的深处，时不时地把全身潜入河水中。我看见有这么一家人，他们让一位身体肥胖、臃肿的老母亲浸入水中。老人家不会游泳，她一潜入水中就好像马上要沉到水底。于是，全家人就立即扑进水里，手忙脚乱地把她捞出水面。老人家的头一旦探出水面，就拼命大口吸气，可当她的家人一放手，她马上又沉入水中。我可以看到她凸出的眼睛和充满惊恐的表情。当她再次沉入水里时，全家人又急忙扑入混浊的水中，在黑

暗中搜寻，把半死过去的她打捞出水面。整个仪式看上去就像是在受酷刑，可是她毫无怨言地忍受，没有任何反抗，也许甚至还很狂喜。

在恒河的对岸，有一片宽阔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那里延伸着的是一排排的柴火，在燃烧着的柴火上是成百上千人的尸体。如果有人对此感到好奇，可花上几个卢比，乘小舟到恒河对面那个巨大的露天火葬场去看看。在那里，半裸着上身的男人们，还有年轻的小伙子们，个个被烟火熏得黑黢黢的，显得十分忙碌。他们用长棍调整着柴火，好让火烧得旺一些，为的是使尸体燃烧得更快。等待火葬的尸体一眼望不到头，尽管火葬的速度很快，但等待还是显得漫长。掘墓的人从还在燃烧的火堆中耙出骨灰，然后把骨灰推到河水中，灰白色的骨灰开始漂浮在浪花顶上，很快就被卷入水中，不一会儿就下沉到水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 火车站与宫殿

如果说，到贝纳勒斯好像找到了一点希望（可以在圣河水中净身，因为净身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有希望更接近永恒），那么在加尔各答希尔达合火车站的短暂逗留，却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番震颤。我是从贝纳勒斯乘火车抵达加尔各答的，在那儿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似乎在一夜间从所谓的天堂，一下子掉进了纯粹的炼狱。

在贝纳勒斯火车站，有位列车员走到我身边，瞥了我一眼，然后问我：

"你的床呢？"

我听懂了他的问话，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弄懂他问话的真实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他再次用生硬的语气重复了一遍他刚才的问话：

"你的床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印度只要你属于一般中等富裕的人，更别说是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了，他们乘火车旅行的时候，都要带上自己的床。

这类乘客抵达火车站时，都带着自己的仆人，仆人头上顶着卷起来的床垫子、毛毯、床单、枕头和其他行李物品。等他们进入车厢后（车厢中没有座椅），仆人立即得给老爷铺好床垫子，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开，似乎突然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我这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人皆兄弟，众生平等。如果一个人两手空空，悠闲自在，而却让另一个人跟在你身后，为你扛床垫、行李箱子、饭篮子，这简直就是一种无耻行为，我应该提出抗议并坚决阻止。

可当我踏入车厢后，我很快就把刚才那种想法抛到脑后了，并迅速把自己的处境重新评估了一番。因为，我听到人们从不同方向传来惊讶的疑问声：

"你的床呢？"

我突然感到十分尴尬，我除了随身携带的一个旅行包外，别无他物。我怎么知道，乘坐火车，除了要有一张有效车票外，还得带什么垫子？即便我知道要这样做，也买了垫子，我也不能自己去扛，还得雇一个仆人。可那以后我该怎么打发这个仆人？怎么处理床垫？

后来我发现，在印度做每件不同的差事都要指派专人来做，每个人都非常谨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种社会的平衡好像就依赖这种分工。这就是为什么早上有人为你端茶倒水，有人专门为你擦皮鞋，有人专门负责缝扣子。而另一些人则负责打扫房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上帝呀！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来为我熨衣服，缝扣子。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上面我也提到过，应该懂得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扣子掉了要自己缝。可是，我当时却犯了一个特别可怕的错误，那就是我没能意识到，这些人为别人缝扣子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

可我却剥夺了他们赚钱的机会。

这个社会是很科学的，就像纹理精密的一块布，上面编织着各种角色、任务、详细的分类和目标。要洞察和破译它的全部微妙的构造，需要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直觉。

我在火车上一夜未合眼，因为那列破旧的、殖民地时代的老式车厢颤抖得很厉害，晃得人东倒西歪，火车还发出隆隆的噪声。甚至还得淋着从窗外溅进来的雨水，因为窗户根本无法关上。当我们的列车驶离希尔达合火车站时，天还阴霾密布，乌云低沉。在这个巨大的火车站长长的站台上，在铁轨的尽头，在附近松软的田埂边，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横倒竖卧、脸色憔悴的人们，在蒙蒙细雨中，他们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在泥泞湿漉的地上。此时，正是印度的雨季，倾盆大雨一刻不停地倾泻着，滂沱的雨水无情地浇打在成千上万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上。令我感到震撼无比的是，这里的人们一贫如洗，而这个数目又如此庞大。更令我震撼的是，这里的人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湿透，却任凭雨水浇打，一动不动。看上去，他们就是这一阴郁景象中最无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惨景中，唯一活跃的元素就是从天急剧而降的瓢泼大雨。只有一件事令人确信无疑，这些不幸的人们，如此绝望、被动，却是有一定逻辑和理由的：他们之所以在瓢泼大雨中没有东躲西藏，那是因为无处可藏，这已经是他们人生道路的终点，他们没做任何努力为自己寻找遮蔽自己身体的东西，那是因为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可以遮蔽身体的东西。这就是令人绝望的现实。

这些人都是落荒而逃的难民，他们都是在印度教和穆斯林教的内战中，逃难出走的贫民。两个教派的内战持续了几年，刚刚于几年前结束。教派冲突的结果是，诞生独立的印度和巴基

斯坦，他们都有了自己独立的共和国。可是，在两个教派的冲突中，不仅导致了数十万或者说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还使数百万人沦为难民。这些残存的最后一批难民，早已失去了家园，流离失所，找不到任何救助，只能听天由命，勉强在希尔达合火车站周围苟延残喘，最终饿死、病死。不仅如此，除了这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这批战后的流浪者在路上还遭遇了那些被湍急的洪水赶出家园、村庄和小镇，数量超过百万的洪灾受害者。就这样，这些数字高达数百万以上的无家可归的精神倦怠的人们，无处安身，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漂泊在通往全国各地的大路上，有的人因为绝望、筋疲力尽而倒在颠沛流离的路上，也许永远不会再站立起来。还有一些人拼命往城市艰难跋涉，希冀在那儿能找到一点儿水，或者寻觅到一点儿充饥的食物。

殊不知，从车厢里挤出来也要费很大气力，在火车站站台上，我几乎无处立足。一般来说，与当地人肤色不同的人很容易引起注意，而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事可以吸引他们的眼球。这些人好像根本就不是来自这个星球。我看见，我旁边的一位老大娘，从裹在她身上的莎丽服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点点大米，战战兢兢地倒进一个小碗，然后东张张西望望，大概是想找点儿水，或者火，想把大米煮煮。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帮孩子围站在她的周围，眼睛紧盯着她碗中的一点米粒。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碗里的米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孩子们并没有扑向老太太，因为这些米粒是老太太的财产。难道在这些孩子身上还蕴藏着比忍受饥饿更强的东西吗？

就在此时，有一位年轻人挤过蜷缩着身子或躺或站的人群，

故意碰了一下老太太，眨眼间，她手中的碗掉在了地上，米粒洒落在站台上的泥泞和垃圾中。也就在这一瞬间，孩子们奋不顾身地扑向米粒，在人们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仔细地寻找、努力地捡拾每一粒米。老太太两手空空，呆呆地站在那儿，又有人推搡着挤过来碰了她一下。此时，这位老太太和孩子们，还有在这个火车站上的所有人和东西，再次被热带雨季的倾盆大雨冲刷着，我也被浇得浑身湿透，站在雨中，不敢挪动自己的脚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去何方。

从加尔各答，我去了印度南部的哈伊达拉巴德。印度南部与印度北方的艰苦截然不同。南部给人的感觉祥和、平静，甚至有点懒洋洋和乡土气息。当地拉甲① 的仆人，把我错当成了什么人物，在火车站热诚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径自把我送到了一个宫殿。一位老者礼貌地接待了我，让我坐到了一个宽大的皮椅上，他大概期盼着能与我有一番长时间的深谈，可是我那几句初学的英语，还不足以与他自由地交谈。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顿时觉得脸红发烫，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这位老人慈祥地看着我，诚恳地对我微笑。于是，我鼓起勇气又说了点儿什么。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梦幻中一般。真可谓超现实主义！后来仆人把我带到宫殿侧翼中的一个房间里，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成了这位拉甲的客人，我又有了安身之处。我想尽快离开这里，可又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意思，也无法给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一场误会。可我又猜想，也许由于我是欧洲人，所以我的光临使这座宫殿蓬荜生辉？也未可知！

我每天更加顽强地、填鸭似的记英语单词。

---

① 印度的酋长。

“天上是什么东西在发光？——太阳！”

“什么东西落在地上？——雨水！”

“是什么让大树婆娑摇晃？——是风！”等等。

我就这样每天记二十至四十个单词。我读海明威的书，我读迪布瓦神甫的书。我尤其努力想弄明白他书中描写的关于印度种姓等级制度和地位的那一章节。开始还没觉得太难，书中写道：印度共有四个种姓等级制度，第一级是最高级——婆罗门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僧侣、神职人员和思想者。他们负责给人指明道路；第二级，等级略低一些——刹帝利贵族，他们是武士，有权而又务实的人；还有就是斗士和从事政治的人；第三级又低一级，他们是吠舍人——这些人是航人、手工业者、农人；第四级是首陀罗——即体力劳动者，仆人、被征服的奴隶和被雇用的工人。读着读着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印度每一个种姓等级制度中，又分数百个下一级等级制度，尔后又在这些下一级种姓等级制度中，又会分出数百个再下一级、下下级等，以至无穷。印度本身在很多方面就是一个无穷级数的国家，这里有无穷无尽的神、无穷无尽的神话、无穷无尽的信仰和语言、无穷无尽的民族和文化。无论你到何处，无论你看到什么，无论你怎么想，这种无穷无尽都会让你感到眼花缭乱、思维混乱。

与此同时，我又本能地感到，我目前所看到的一切，仅仅只是印度庞大的、形形色色社会中非常表面的一种影像和象征。其实对在这个世界深处蕴含着的那些深邃的思想，应该说我还真的是一无所知。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造成我无法理解这个国度？是因为缺少理论学习还是所读的有关书籍太少？还是另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是不是我头脑中充满了太多的理性和唯物主义？以至于我不能认同和理解印度教中的精神

和深奥莫测的文化？在这种困惑之中，我又被法国传教士书中描述的丰富细节弄得无所适从。于是我放下手中的这本书，独自进城去了。

拉甲的宫殿是一个玻璃游廊，里面也许还套着数百个同样的玻璃游廊，只有当它的窗户打开之后，才能有一股清风吹进每一个房间。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被草木茂盛、精心修剪过的花园环绕着，园林里的工匠们整天在花园里不停地忙碌着，不停地变换着身姿，精心地修剪花木，耙耕松土；而在远处，在那高墙背后，则是一个集市的开端，那里到处是狭窄的街道和拥挤不堪的人群。我走过那里的大街小巷，穿过无数个五光十色的商店，那里的柜台和摊位上都摆满了食品、衣物、鞋和洗涤用品。尽管没有下雨，但是，这里的街道总是泥泞不堪，所有的人都会往街中心泼水，因为街道、马路不属于任何人。

这里到处是高音喇叭，传出刺耳、响亮和不间断的歌声。这种声音来自附近的寺庙。这里的寺庙都是些矮小的房子，差不多有平房或者一两层楼那么高。这种房子在这里比比皆是，从外表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白色的墙体，上面有用花环和闪着亮光的刺人眼目的金属片装饰，颜色既鲜亮又明快，就像新娘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参加婚礼一般美丽。这些寺庙里的气氛也很清静祥和。

寺庙里人头攒动，人们或交头接耳，或虔诚地敬香，或环顾四周、东张西望，然后把自己的两手伸向前方。有一群男子（寺庙司事？祭台助手？）在那儿向人们分发圣餐，或者是一块小甜点，或者是一块杏仁糕，或者是糖块。如果谁的手能多伸一会儿，那这个人就可能多得两块甚至三块圣饼。人们拿到圣饼后要么吃掉，要么放回供台。在这里进寺庙都是免费的，不收门

票。没有人会问你，你是谁、你信奉的是什么宗教。每个人都自己去拜佛，这里没有任何集体礼拜的宗教仪式。这让每个人感到轻松、自由，甚至有点儿杂乱。

这里有太多的拜佛的地方。因为在印度教中神灵数量之多，是无人能数清楚的。而且在神灵之间没有竞争，他们和谐相处。你可以信仰一个神或者同时信仰几个神，甚至根据你的居住地、时间、情绪和需求的变化，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去信仰别的神。这些神就是某一尊佛或菩萨，世俗追求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就是供养所信仰的佛，并为此修建寺庙。可以想象出，这种世俗的追求，结局会如何，当然我们比较清楚，其实这种自由的多神信仰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在数千年的岁月中，这里增建或扩建过多少寺院、庙宇、佛堂、神位、神龛。与此同时，又有多少寺院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如洪水、火灾、台风或与穆斯林的战争中毁于一旦。如果这些神庙如今还存在的话，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数千年以来修建的庙宇能覆盖我们半个地球。

我在印度各地旅游时，曾去过卡莉(印度教女菩萨所在地)，它是毁灭之神。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以拜，因为时间毕竟是留不住的。卡莉雕像又高又黑，舌头伸着，脖颈上带着雕有骷髅头形的项链，两只手伸展开站立着。尽管她是位女性，但最好还是不要投入她的怀抱。

进寺庙的路两边是兜售各种与佛教信仰和崇拜有关物品的摊位。那里有卖辛辣扑鼻的薰香、彩色香粉、各种各样的佛教画、项链、手镯、各种挂件和各种粗糙的手工艺制品和各种小玩意儿，商品应有尽有。前来寺庙的人个个大汗淋漓，心情激动，人群顺着拥挤的人流往有佛像的地方挪动着脚步。在寺院中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薰香味儿，烟雾缭绕，热气蒸腾，昏昏暗暗。

在敬拜佛像之前，还要进行一种象征性的交换，拜佛人的先得把一个早已请好的玉石交给和尚，和尚还给拜佛人的是另一块玉石。我猜想，前来拜佛的人奉上的可能是没开过光的，拿回来的一定是开了光的。是否真是这样，我没问，这仅仅是我的猜想。

在拉甲的宫殿中能见到的最多的就是那些忙忙碌碌的仆人，除了仆人你似乎看不到别的什么人，就好像整个宫殿的财产都交与这些人来管理。这里有无数的男管家、男仆、侍者、女佣和贴身仆人。有煮茶师、蛋糕师、熨衣匠和信使、专门驱赶蚊子和蜘蛛的仆人。最多的还是我说不清楚他们具体职业的那些人，只看见，这些人不停地在房间和大厅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穿过走廊又上楼梯，不停地掸着家具上的尘土和清扫地毯、拍打枕头、挪动和摆放椅子、修剪和浇灌花草等。

所有的人都是默默地、迅速地、小心谨慎地，甚至让人能觉察出他们一边干手中的活儿，一边还心存某种恐惧，担心着什么，但在表面上又看不出他们面部紧张，看不到他们各处奔跑，也看不到他们打什么手势。他们不慌不忙地做着自己的事儿，就好像有一只孟加拉虎在附近徘徊，能幸存下来的唯一机会，就是不做出任何突然的举动。甚至在白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之下，这些人都好像是无声的影子，默默地悄无声息地走动着，他们这样小心谨慎地走在边缘，小心谨慎地避开别人的视线，更别说会挡住别人的路了。

人们根据不同的职责和级别，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僧侣们头上裹着嵌有贵重宝石的金黄色的包头巾；而底层等级的人只能在腰间缠着单色的缠腰布。有一些人穿着华丽的丝绸衣服，绣花腰带上系着耀眼的闪亮发光的饰物；还有一些人穿着普通衬衣和白色长袍。他们这些人中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每个

人都赤脚走路。无论他们衣物上绣着何等华丽的饰物，或者挂着流苏，无论他们身穿绸缎衣服还是饰有凸样花纹的开司米羊绒衫，都是赤着两脚走路。

这些细节都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回想起我的个人经历。因为在我的皮鞋上还有一种淡淡的紫色。那还是二战期间，即波兰被德国占领期间，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 1942 年冬季到来之前，我没有鞋穿。我脚上的那双旧鞋的底子早已断裂、磨破，可妈妈又没有钱给我买鞋。在那个年代，波兰人要买一双鞋需要四百兹罗提[1]，但那种鞋不是皮鞋，鞋面是用劳动布做的，然后在鞋面的劳动布上涂一层黑色的防水胶，鞋底是用椴木做的。要想弄到四百兹罗提谈何容易！

那时我们家住在华沙的克罗赫马尔纳大街，邻近犹太人居住区大门附近。我们家的房东叫斯库皮耶夫斯基。他有一个做香皂的小作坊，做出来的香皂只有一种颜色——绿色。

“我赊给你香皂，”他说，“如果你能卖够四百兹罗提，你就去给自己买双鞋穿，战争结束后你再把钱还给我。”

那时人们还依然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给我出主意说，最好去从华沙到奥特沃茨克的短途火车上去卖香皂，因为，常有旅行和度假的人乘坐那趟火车，这些人可能会比较注重穿着打扮，所以他们肯定会买香皂。那时我只有十岁，我照他说的去做了。我为此差点流干了半生的眼泪。因为卖出一块香皂十分艰难。我整天在火车上奔来跑去，但一天下来有时连一块香皂都卖不出去。有一次，突然有个人一下子买了三块香皂，我兴奋无比，回到家时，还激动得脸色通红。

---

① 波兰货币名称。

每当火车轰隆隆开动，我就虔诚地祷告，上帝保佑我吧！让人们买我的香皂吧！哪怕让他们买一块也行啊！我简直就像一个乞丐，乞怜人们发善心，可怜可怜我。我有时还会去敲别人家的门，上门去卖，祈求前来开门的人：

"请小姐买一块香皂吧！"

那时每块香皂只售一个兹罗提，冬天就快到了，我还没有鞋穿。有时候运气好，一天可以卖出去几块香皂，有的时候一天连一块香皂也卖不出去。因为，在居民楼的周围，还聚集着别的孩子，这些孩子会趁别人不注意偷东西！或者跟我争生意，欺诈行骗、倒腾别的东西！

那年的秋天冷得很早，寒冷的秋风刺痛了我的双脚，疼得钻心，甚至不能走路出去卖东西。那时，我手头已经攒了三百兹罗提。斯库皮耶夫斯基先生得知后，又给我添了一百兹罗提，于是我就和妈妈去了商店，买回来一双单鞋。为了抵御严寒，我得用绒布裹上脚，外加上一层报纸，这样勉强度过了冬天。

现在，每当我看到印度有成千上万的人赤脚走路，会顿时引起我对他们的同情，与此同时更平添了几分我对他们的那份兄弟情谊。我常常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

后来，我又回到了德里，近几天我的回国机票可能随时给我寄到。我又回到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饭店，巧合的是，连房间也是上次住过的。我基本熟悉了这座城市，我努力了解这座城市，参观了很多博物馆，我试着阅读《印度时报》，并继续研读希罗多德的书。我不敢肯定，希罗多德到过印度，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怎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交通困难可能会阻止他来到印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希罗多德到过印度的可能。因为他似乎很了解这个距希腊十分遥远的国家。在他的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波斯帝国，还描述了它二十个省的太守。而当时的印度正是这个强大帝国——波斯帝国的一个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

然后希罗多德又描写了印度，描写了它的地理位置、社会传统和习俗。

“印度人居住在亚细亚的最东边——比今人确切知道的那些人和其他民族都更往东——因为印度以东的地区全部是沙砾地带。[1] 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荒漠，人烟稀少。印度有许多部落和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尽相同。他们中一部分是游牧民族，一部分不是；还有一部分住在河边[2] 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他们乘坐一种藤条做的船去捕鱼。这些印度人从河里把灯心草割取下来，然后把他们像编织篮子一样编成衣服，像胸甲一样披挂在身上。

另一部分印度人，是以食生肉为生的游牧民族；被称为帕达依欧伊人。据说他们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当他们部落中哪个男人或女人生病时，假设是一个男人生病，这个男子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便会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的肉就会腐烂变质。虽然生病的人极力否认生病，但他们也不会理会他，而是一定要把他杀死吃掉。当一个女人生病的时候，她和男人一样，也会被她最亲近的女人杀死。注意，如果是一个年迈之

① 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地区，今之所谓五河地区。这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对印度一无所知。——《历史》中译本注。

② 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恒河是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才知道的。——《历史》中译本注。

人，他们就会把他当做祭品奉献，并用他的肉来举行庆宴；不过，能活到老的人为数极少，因为在他年老体迈之前，只要生过病，就已经被杀死吃掉了。

还有一部分印度人，他们有着不同于上述印度人的习惯，他们并不杀生，也不播种谷物，居无定所。他们以草和菜为食，在他们那里长有一种带荚的野生谷物，大小和小米差不多，他们把这种谷物连荚收割下来煮着吃。他们中如果有谁得了病，这个人就自己主动到某高原的沙漠地带，躺在那里，无人再去关心他的生死。

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印度人，都是像牲畜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交媾的。他们和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都是黑色皮肤。他们的精子也和其他人的精子不一样，并不是白色的而是同皮肤一样黑。埃塞俄比亚人的精子和他们一样，也是黑色的……”

后来，我还去了马德拉斯，从马德拉斯邦到孟买和昌迪加尔。这次旅行使我更加确信无疑，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因为我感到很郁闷、沮丧、绝望，我觉得我无法深入了解和理解这个我所在的国度。印度太大了！纵然我想写点什么，都会让我觉得，这个国家是那么浩瀚无垠，完全没有边界和尽头，我穷尽一生也无法书写完关于它的故事，所以我怎么可能完整描述这个国家呢？

我收到了国内寄来的回程机票，机票是从德里途径喀布尔、莫斯科飞往华沙的。我乘飞机到了喀布尔，那时太阳已经落山。天际一片霞红，最后一道霞光映照着深蓝色的峡谷。一天又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彻底沉寂于宁静和安谧之中。这是景色、大地、世界的宁静和安谧，毛驴脖颈挂的各种铃铛的声音以及为驱赶跑过机场围栏的羊群不时发出的一种类似鞭打的声音，都无

法打破这种宁静。

在飞机场，我被机场警察扣留，因我没有签证。他们不能遣送我回印度，因我乘的那架飞机，已经进入回程的跑道，准备返航了；而在空旷的飞机场上，除了这架飞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飞机了。他们商量怎样处置我，最终他们也进城回家去了，只剩下我和一位机场边防检查战士。这位战士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小伙子。他留着浓密的黑胡子，有一双祥和的大眼睛，面带含蓄和腼腆的微笑。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军大衣，身上挎着一支军用毛瑟枪。

忽然，天完全黑了下来，顿时寒气逼人。我不停地打寒战，我刚从热带来，身上只穿了件衬衫。于是，边防检查战士弄来了一些木块，在混凝土地上架起木块儿烧起火来，他把他的大衣披在我身上，自己裹了一块黑色的驼绒毛毯，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们两个人默默地坐在地上，周围悄无声息。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蟋蟀叫声，后来，从远方渐渐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们又都回来上班了，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看上去像个做生意的人。他是来喀布尔为波兰罗兹的纺织厂采购棉布的波兰人，叫比耶拉兹。这位先生说，他保证能为我办好签证，还告诉我，他来这里做生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结识了一些人。后来，他不仅帮我办好了签证，还把我请到他住的别墅，跟我聊天，他说他很高兴有我跟他做伴。

喀布尔这个城市，尘土漫天飞扬，它地处盆地，一刮风，四周沙漠的黄沙就进了城市，处处黄沙一片，空中悬浮着淡黄色的沙尘微粒。当风稍停，满天的黄沙才渐渐沉降下来，空气变得透明清澈。

每天晚上，这里的街道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自发和无意识地

组织起来的宗教表演舞台。在一片漆黑之中，只有煤油灯和火炬的光在街区的货摊上闪烁。那微弱的煤油灯光和不停晃动、跳跃着的火苗照着那些堆放在便道上、家门口的廉价而粗糙的货物堆上，在摇曳的火光中，人们默不作声地走来走去，寒冷和大风驱赶着人们在原地不停地小跑。

当莫斯科飞往华沙的飞机开始徐徐降落时，我的邻座不停地浑身打战，他的双手紧紧抓着飞机座椅的扶手，双眼紧闭，面色发灰，憔悴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穿的那件散发着霉味儿的廉价上衣，架在他骨瘦如柴的身上。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只见他脸上挂满了大滴大滴的晶莹泪珠，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到他明显的啜泣声。

"对不起！"他对我说。

"对不起，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回来。"

这是 1956 年 12 月。人们纷纷从古拉格[①] 回国。

① 苏联内务部劳改局。

# 拉比诵读《奥义书》

印度之行是我与不同于我所认知世界的第一次邂逅，使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一次邂逅即非同寻常，又使我尝试到了一次有伤自尊的痛苦经历。这种经历教人懂得廉耻。这次旅行后回到国内，我深为自己的浅薄、孤陋寡闻、愚昧无知感到无地自容。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对我来说，不应仅仅成为我认知中飘忽不定的谜团；要真正了解不同的文化，需要长期、系统、认真的学习。

我总结了这一痛苦经历，我觉得，首先，我要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回到了自己人和亲朋好友中间，回到了自己熟知的语言环境，回到了自己不需下太大功夫学习就能懂的符号和标志的环境之中。我要竭力忘掉印度，因为那代表着我人生的失败。印度幅员辽阔，各种差异明显；贫富差距悬殊，神秘莫测，不可思议，这一切曾经让我着迷，令我震颤，但最终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重又回到先前的工作，像以往一样，很愉快地到全国各地去采访，写新闻报道、文章，听取人们的意见。在这里，我与其他

人没有语言障碍,很容易沟通,大家的生活经历也大致相同。

当然,我也一直无法忘却印度。每当这里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时,我就会十分思念卡拉拉邦的酷暑炎热;这里天黑得越早,我就更加怀念克什米尔那东方耀眼眩目、阳光灿烂的风景。事实上,世界不仅仅只有严寒和暴风雪,世界是多样的,是色彩斑斓的,寒冷和酷暑并存,白雪皑皑与郁郁葱葱、鲜花盛开共生。

每当我能有一点时间(因为编辑部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当我能攒上一点钱(很遗憾,这种情况十分少见),我就到处去寻觅与印度有关的书籍。但通常都是在我逛遍了大小书店和旧书店之后,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让我一无所获。因为那时书店里的书十分短缺。有一次,我在旧书店里翻到了一本书,是 1941 年出版的,书名《印度哲学简史》,作者是保罗·多森。多森教授是德国著名印度学学者,也是尼采的好朋友,他是这样给我们描述印度哲学的:“世界就是马雅——即幻觉”。他写道:“一切都是虚幻,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自我,即个人的灵魂和自我。人活着,他什么都能感觉得到,也不需要祈求什么,因为人拥有一切,还需要什么呢?既然人能感知一切,那他就不应该去损害别人或者损害别人的东西,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想去损害自己。”

多森教授批评欧洲人:“欧洲人无所事事”,他为此感到痛心,“欧洲人回避学习印度哲学”,印度在自己四千年不间断的哲学存在和发展中,印度哲学逐步发展成一种无边无际的和无限的哲学体系,令那些想接近它和想了解它的鲁莽、狂热的追逐者望而却步、失去勇气。此外,在印度教中,其令人觉得莫测高深、不可名状的领域恰恰正代表着无限,而这种无限又是基于最令人震撼的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两种形态纵横交错、相互交织,而同时又形成了彼此间巨大的反差。

这一切都是以十分自然的方式转换到与其相反方面的，在物质需求和神秘主义现象之间的分水岭是不固定的，也是转瞬即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可以说，其中某一种性质总是保持一成不变；而另一种性质却可以转化成一种虚无，这种虚无又蜕变和彻底转化为宇宙，转换成天国的无所不在，转换成神之路，消失在无底的无限虚无之中。

在印度教中，有着数不清的神、神话和信仰。有数百个形形色色的理论派别、学派和宗教流派，有数十种皈依方式、道德规范、净化方式和禁欲规定。

印度教的世界如此庞大，它给一切能接纳它的人和事，各种各样的可彼此接纳的信仰、宽容与和谐及统一提供了场所。印度教的经书谁也无法数得清，仅其中的《摩诃婆罗多》就有二十二万行十六字句的长诗，这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巨著总和的八倍。

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时间。总之有一次，我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 1922 年出版、被老鼠啃过的一本破旧书——那是一本关于瑜伽的书。作者是拉玛查拉卡（Ramacharaka），题为《瑜伽气功》，书中阐述了瑜伽健身理论和通过练习瑜伽锻炼呼吸的艺术。作者在书中写道："呼吸是人体重要的元素，因为，人是通过呼吸与世界沟通的。如果一旦我们停止了呼吸，我们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我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我们的呼吸是否通畅。通过呼吸，可以看出我们是否健康，是否精力充盈，是否充满智慧。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在西方，"拉玛查拉卡说，"他们呼吸不畅，所以就会出现那么多的疾病、各种功能低下、体弱多病和抑郁消沉的现象。"

最让我感兴趣的练习是一种提高自己想象力的练习，因为

我自己就缺乏这种能量。这种练习的方法是：平躺在地上或者床上，——瑜伽功建议我们，全身肌肉放松、两手自然轻轻交叉放在腹部，均匀地呼吸。当你的呼吸很均匀时，你就会产生联想，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当你每呼一口气时，你就会获得一种能量，也就是说，你能从宇宙的能量中获取充满生机的能量，你就能把这种能量补充到你的神经系统里去，能把聚集在身体中的能量储藏在瑜伽太阳气功之中。通过每一次呼吸人们就想着要把这种能量，即生命的力量，传导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我刚读完这本《瑜伽气功》，就又找到一本 1923 年出版的泰戈尔的书《回忆录》。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作家、诗人、作曲家和画家。他与歌德、卢梭齐名。1913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童年时代，家里人都叫他的小名拉比。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这个人很有特点，在自己的书中回忆道，在家里他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他学习成绩优异，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还回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叫醒，让我背诵梵语词汇，"他这样写道："当天渐渐亮了以后，太阳慢慢爬出来，他的父亲念完经，就跟他一起喝牛奶，吃早饭，然后站在他的身旁，再次转身向神灵所在的方向，诵读《奥义书》。"

我尽量想象着这样的场景，早上，黎明，父亲和儿子，睡眼惺忪的小拉比，朝着太阳初升的方向站着，念诵着《奥义书》。

《奥义书》源于三千多年以前，是一部印度哲学韵文，一直流传到今天。它一直是印度人精神生活的代表。当我了解了这些后，一个小男孩儿，念诵着《奥义书》韵文的诗句，向着晨光中的星星问好的情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我是否真的能理解这样一个国家，就连小孩子们都能大清早起床，

念诵哲学韵文。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是加尔各答人的儿子。在这个谁也不知道它的边际在哪里的巨大城市中，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坐在饭店的房间里，读着希罗多德的书。突然，从窗外传来了警笛的尖啸声。我立即冲上街头，看见一辆救护车在马路上疾驰而过。人们纷乱地跑到楼房的门洞里，后面有大群警察把人们赶到街角，警察手里拿着长棍不停地追赶着还在街上四处乱跑的人群。一股刺鼻的煤气味儿和烧焦的气味呛人眼鼻。我到处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块大石头，一边跑，一边回答我说：

“语言战争！”然后就跑走了。

语言战争！我虽不知道这次事件的始末细节，但对这个词我早有所闻。在这个国度，因为语言的冲突，可以招致激烈的流血冲突、游行示威、街头暴力、谋杀甚至自焚行为。

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到了印度以后我才认识到，我不懂英语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只有少数精英通晓英语。这些人只占社会人口的2%，其他人也只会说他们本国十多种语言中的一种。也不知什么原因，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却让我觉得我很容易亲近他们，我似乎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同胞兄弟，他们就像是我们城市里的普通人和乡村中的普通农民一样，换句话说，我和五亿印度人一样，都能同舟共济，尽管我们都不懂英文。

每每想到这一点，我还会暗自庆幸，沾沾自喜。我算够不错的了，在印度还有五亿人跟我一样不懂英文。当然这种想法也常常搞得我忐忑不安，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因为自己不懂英语而感到羞愧呢？可我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懂印度语而感到羞愧，

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我既不懂印度语，也不懂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属印度南部通行的达罗毗茶语系)、乌尔都语(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泰米尔语(属达罗毗茶语)、旁遮普语以及众多的在这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印度，英语的学习跟印度语、孟加拉语的学习一样都不十分普及。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头脑中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在作祟。难道我真的认为，学习欧洲语言比学习我所在的国家的语言更重要吗？此外，英语至上的思想是否会触犯印度人的尊严？对印度人来说，他们与母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能为保护自己的语言而献身，甚至会跳入点燃的柴堆自焚。所以，这些有倾向性的和世袭的东西都是通过他们各自所说的语言，来代表他们的身份。因此可以这样说，孟加拉人，他们的母语就是孟加拉语。语言就是他们的身份，是他们的脸面和精神。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并不是社会、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语言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冲突。

我在寻觅有关印度书籍的同时，也在打听是否能找到有关希腊的书籍。我对希腊的兴趣与日俱增，我对希腊的好感日益强烈。我十分感激希罗多德，当我在印度感到失意、失落、沮丧、情绪低沉时，是他的书一直陪伴着我。从希罗多德的写作技巧来看，我敢肯定，他是一个为人诚恳、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他总是不断地提出疑问，而且时刻准备着出门远足，以给自己找到答案。

当我埋头寻找各种资料时，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对希罗多德的生活情况知之极少，我们获得的关于他的那点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相反，我们对泰戈尔或者对他同时代的人，比如说，普

鲁斯特，我们对他们的童年生活都能了解得十分详尽。而我们对希罗多德及他同时代的不分伯仲的伟大人物，如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的童年情况却几乎一无所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是那个时代没有记录作家生活的习惯吗？难道他们认为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吗？希罗多德关于自己只提及了一点点，他说，他出生于哈利卡尔那索斯，一个风平浪静、酷似露天剧院的港湾。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这里是亚细亚西部与地中海连接的地方。这个国家终年阳光普照，温暖如春。在哈利卡尔那索斯到处是橄榄树，是盛产葡萄的地方。我本能地想，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人，一定天生心地善良、头脑开放、身体健康、意志坚强。

传记作家们都认为，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 490 至公元前 480 之间，我认为，他很可能出生于公元前 485 年。这个年代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因为，公元前 480 年左右，佛教诞生了。而后是鲁国的孔子去世了。他比柏拉图晚出生五十年。那个年代，亚洲是世界的中心。如果论及希腊的话，属于极富创造力的社会成员之一——伊奥尼亚人，他们就是当时居住在亚洲部分的人。那时还没有欧洲，欧罗巴只是作为一个美女的名字为人们所知，她是腓尼基人国王的女儿阿盖诺尔，但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在神话传说中，阿盖诺尔是一个宙斯神，从金牛变来，她被劫持到克里地之后，留在那儿生活。

希罗多德的父母是哪里人？他是否有兄弟姐妹？他的家在哪里？这一切都让人陷入了一个令人不能确定的虚幻境界。哈利卡尔那索斯这个地方，曾经是希腊人在波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在这块地方有一个民族不属于希腊人，他们被称为克里亚人。希罗多德的父亲叫吕克瑟斯，这不是希腊人

姓氏，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克里亚人。他的母亲叫德律欧，她很有可能是希腊人。希罗多德很可能就是希腊的克里亚人和希腊少数民族结合的混血儿。这样的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他们身上交融着不同民族的血液，他们的世界观是由多种不同元素组成的，他们被边缘化，与人有距离感、有差异，但同时又兼有多样性。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到各类明显不同、差异极大的人。他们中间有极度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也有被动、对事物无动于衷的乡下人。有头脑开放，善于接受不同文化并从世界各地漂移到此的人，当然这取决于他们的混血程度，但可以说明，他们的精神可以落户于此。

希罗多德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他是一个爱笑的孩子吗？他认生吗？他是生性胆怯、常常躲在妈妈衣裙后的孩子吗？他是一个常大哭大叫、整天缠着妈妈，令妈妈叹息无奈的孩子吗？还是一个让妈妈整天觉得，上帝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孩子？或者他是一个活泼开朗，整天给别人带来欢笑的孩子？

他是一个听话礼貌的孩子还是一个整天不停地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孩子？

他会问——太阳是从哪儿出来的？为什么太阳离我们那么远，让我们摸不着够不着它？有时候太阳为什么会藏在大海里？难道太阳就不怕淹死吗？

希罗多德上过学吗？与谁同桌？同学们是否惩罚过他，让他跟生性调皮的孩子坐在一起？他是否很快就学会了在泥制的黑板上写字？他上学时，是否常常迟到或者在课堂上不认真听讲？

他在课堂上是否能踊跃发言？他喜欢搬弄是非，打小报

告吗？

他玩儿过什么样的玩具？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儿童都玩儿过什么？他们是否也玩儿压悠悠板？是否也在海边的沙滩上用沙子堆小房子？他们也喜欢爬到树上去玩儿吗？他们也玩儿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见到的用泥捏成的小鸟、小鱼和小马吗？

他长大以后，还记得自己童年的生活吗？对小拉比来说，最让他高兴的是，清早被父亲叫醒做祷告，而对普鲁斯特来说，是每天睡觉前，妈妈会走进他昏暗的房间，拥抱他，并对他说：晚安！对小希罗多德来说，最让他企盼的幸福生活又是什么呢？

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哈利卡尔那索斯是一个位于亚洲、近东和希腊之间的商贸路上的港口城市。在那里活跃着与来自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腓尼基商船队，也有来自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和阿尔戈斯、利比亚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商船队。希罗多德的父亲是不是商人？是他为自己的儿子点燃了周游世界的欲望之火吗？他是否常常一周或者一个月也不回家？儿子是否会常常追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或者能说出一些地名或者只能说他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今后也许就不再回来，上帝保佑他回来吧之类的话。是否这就是促使小希罗多德产生要去认知世界的念头？是外来的诱惑还是他自己发自内心要去周游世界？

在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获悉，小希罗多德曾经有位叔父，是诗人，叫帕纳亚西斯。他曾写过许多诗和古代史诗。他的叔父是否曾带他出去旅行过？是否教过他念诗？是否给他讲述过诗词的审美和修辞学的神秘故事或者教授过他如何讲故事的艺术？因为，《历史》是一部天才巨著，也是书写艺术的典范，他的撰写技巧至今令人望尘莫及。

在我们今天看来，希罗多德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卷入了他父亲和叔父所参加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他的父亲和叔父参加过反对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僭主吕格达米斯专制制度的起义，但这次起义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反叛者们”躲藏到覆盖着茂密森林的萨摩斯岛上，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划船到了该岛的西北部。希罗多德在该岛栖居了两年，很有可能他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周游世界。如果说他后来曾回过哈利卡尔那索斯的话，那他也可能仅仅在那儿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为什么？是去探望父母吗？对这一切我们今天无从知晓。但可以这样推测，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哈利卡尔那索斯。

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到了雅典。他的船在雅典的比雷埃斯港靠岸。这儿距雅典卫城只有八公里之遥，那时人们常常骑马或者步行到那儿去。当时，雅典是世界上很知名的中心城市，是那时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城市。希罗多德不是雅典人，对当时的雅典人来说他只是个乡巴佬，那时的外来人在雅典的待遇只比奴隶好一点，无法与雅典人相提并论。雅典人对其他种族的人非常敏感，自认为优于其他种族，他们有极强的排外性，甚至在别的种族面前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对外来人不屑一顾。

但我觉得，希罗多德能很快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他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很年轻，应该是一位头脑开放、能与人友好相处，而且很随和的人。他给别人授课，积极参加各种会议，与各类作家见面。也许他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他在那儿与很多的知名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和伯里克利等。对他来说，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实际上雅典并不大，当时有十万人口，但雅典是一个拥挤不堪、杂乱无章、毫无规划的一座城市。只有在两个地方能让人感到明显的不同，那就是

在宗教信仰中心——卫城；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常常在那儿举行见面会、各种贸易的政治和交际活动中心——阿哥拉。在阿哥拉人们一大清早就举行聚会，聊天。阿哥拉中心广场总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热闹非凡。我敢肯定，在这些人里面，我们一定能找到希罗多德忙碌的身影。但是他在这里不会久留，因为，当时雅典政府曾经有过一个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出生在阿蒂卡的人，即雅典城和雅典城附近的这些人，才有资格享有政治权利。当时希罗多德不可能获得该城的居民资格。于是他离开了雅典，继续旅行。最终他定居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图里伊。

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人们至今意见相左。有的人认为，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图里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曾回到过希腊，有人在雅典见到过他。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去过马其顿，当然无人能证实这一点。希罗多德大约在六十岁时去世。他死于何处？是在什么条件和环境下去世的？是否他是坐在图里伊的家，坐在梧桐树的树荫下，在继续撰写他的《历史》一书时溘然去世的？也许那时他自己已经老眼昏花，只能靠口述让别人执笔记录？他是否曾经写过自己的旅行日记，还是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和回忆写书？我们知道，那时人们的记忆力超常。也许他记得克罗伊斯和巴比伦的历史。他还记得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波斯人、铁尔摩批莱和萨拉米斯人的历史。还有许许多多他在《历史》中叙述过的人和事。

也许希罗多德死于去地中海的航行中？或许他在旅途中，由于精疲力竭倒在岩石上，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希罗多德就这样消失了。他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前辞别了我们，消失在一个我们既不确切知晓的年代，也不确切知晓的地方。

我的工作仍然是去编辑部。

出差去外地。

参加各种会议、见面会、采访。

一旦我有一点空闲，就借助词典(英文大词典终于问世了)，阅读各类有关印度的书(终于有一些我感兴趣的书出版了，其中有一本《印度的发现》，作者是尼赫鲁；还有一本书是甘地的自传和一本装帧非常漂亮的书，题为《趣味》，或者翻译成《印度的五种智慧》等书)。每每阅读完一本新书，我就会觉得似乎自己又去印度旅行了一遭，这让我回想起我曾经去过的、自认为已经熟知的地方，但看完这些书后，我才对那些自认为已经熟知的、去过的地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了更新的感触。我发现，这种阅读式的旅行显得比我实地旅行更丰富。同时我还发现，通过阅读，查阅地图、看各种图片和照片能大大加深我对实地考察的记忆，丰富并补充了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让我深切地体会到，阅读的经历通常可能更优于实地旅行，因为你可以长久地停留在一个点上，静心地观察并反复观看以前的画面，而在实地旅行期间，时间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正当我更加专心致志地关注印度的与众不同以及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时，正当我在反复琢磨，怎样才能使这些问题变为更能吸引我的祖国关注的话题时，1957 年金秋的一天，我们编辑部消息灵通的秘书克雷霞·科尔塔把我叫出办公室，神秘地悄声对我说：

“要派你到中国去!”

#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我是步行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先是乘飞机途经阿姆斯特丹，转机到东京抵达香港。到香港后，我乘当地的火车到达了一个小站，那儿是一片开阔地。我被告知，从那儿我可以过边防去中国。实际上，当我刚刚踏上站台，列车员和警察就指着远方，对我说：

“中国！”

这位警察是个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中国人，他带着我走过一段沥青路，然后说祝我一路平安，转身朝车站的方向原路返回了。我一只手提着行李箱，另一只手提着重重的装着各种书籍的提包，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那天烈日当头，热浪袭人，还有大群苍蝇令人讨厌地围在身边嗡嗡叫。

我前边有座小桥，又短又窄，两边用倾斜的金属隔板挡着，桥下是一条半干涸的小河。远处有一道用花装饰的高高的大门。上面写着中国字，最上面是中国国徽，还有红底上有四颗金色的小星、一颗大星的中国国旗。在大门旁站着一队边防战士。他们认真地查看了我的护照，在一个大本子上记下了我的护照

号等有关个人资料，然后告诉我，让我一直往前走。从老远我就看到了一列火车等在那边，我觉得至少得有半公里路远。我艰难地行走在这酷暑难耐的路上，浑身是汗，还得不停地驱赶周围的苍蝇。

火车很空。车厢跟香港的车厢一样，里面有一排排的座椅，没有隔间。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的这列火车行驶在阳光普照、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上。透过车窗往外看，能觉出外面空气炎热、潮湿，还带有一种热带地区的特殊气味。我不禁想起了印度，想起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和本地治理(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经历过印度次大陆气候的我，现在基本能适应这种天气了。我似乎又见到了印度那种令我愉悦的风景。火车停车的次数开始多起来，在一些小站上来了很多乘客。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男的穿的都是深蓝色的中山装，女的穿的都是样式雷同、带小碎花的裙子。所有的人都面朝前方笔直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沉默不语。火车上坐满了人。在另一个小站上，又上来三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一位女性和她的两位男性助手。这位女子，用坚定的口吻大声对乘客们说了很长一段话，然后其中一位男性给我们大家分发了搪瓷缸子，另一位男性则给每位乘客的缸子里倒茶水。茶水很烫，旅客们用嘴吹着，好让茶水凉些，然后小口小口地咂出声地喝着茶。车厢内还是一片寂静，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想尽量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什么，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然我也不能目不转睛死盯着人们看，一来我觉得这样不好，二来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当然也没有人瞥我一眼，尽管我在这些身穿制服和花布衣裙的人中比较显眼、引人注目，因为我的穿着也很奇怪，是一年前在罗马买的那套笔挺的西装。

三天后我抵达了北京。北京很冷,刮着干燥寒冷的北风。风刮得这座城市尘土飞扬。在灯光黯淡的火车站上,有两位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同行前来接我。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其中一位笔直地站在那儿,用十分坚定的口吻说:"非常欢迎你能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政策的结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与别人合作,互相交流经验,所以我们报社与你们互换常驻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来北京长驻,我们也将在适当的时候派记者去华沙长驻。"

我一边听他致欢迎词,一边打着冷战,因为我既没有穿厚外套,也没有穿大衣,我东张西望,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躲躲。后来我们上了一辆苏式胜利牌小轿车。到了一个饭店,已经有一位《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在那里迎候我,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位同事姓李,是给我派来的专职翻译。我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句,这是我在中国工作期间仅可以用来交流的语言。

我想,他们可能会给我安排一间在北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房,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架,一台打字机和一部电话。我会常常光顾《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些同行那里了解一些新闻,然后阅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去外地采访,搜集资料,撰写报道,发表文章,顺便好好学习中文。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去图书馆,游览名胜古迹,采访专家教授、作家,到农村和城市去,到商店和学校去,采访许多有意思的人。我还想,我能去大学采访、去看市场、参观工厂、佛教寺庙,去党中央机关采访等等。总之,我希望能参观和采访许多许多地方。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这样对自己说,并且兴奋地计划着一切。我还想,除了做记者工作、写报道以外,我还会积累很多工作经验,待我回国时,我将会带着新的工作阅历、

新发现和新知识回到国内。

我满脑子憧憬着，想着未来的计划，随着李同事来到了饭店一楼的一个房间。李同事住在我对面。我想要关上门，可我发现，门上没有拉手，也没有锁，只有一个链子，每扇门都是朝外开着的。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李同事房间的门也是朝走廊方向开的，从他的房间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我只好装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希罗多德的书，然后又拿出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庄子的《南华真经》(1953 年出版)和一本我在香港买的《中国哪儿错了》，作者乔柏[①] (Rodneya Gilberta, 1926 年出版)；《中国现代史》，作者赖托瑞[②] (K. S. Latourette'a, 1954 年出版)；《孔子哲学简史》，作者刘无忌(1955 年出版)；《亚洲的反叛》(1927 年出版)；《东亚人的思维方式》(1952 年出版)，作者亚白格(Lily Abegg)，以及一些学习中文的教科书和词典等。我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从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开始学习中文。

第二天早上，李同事把我带到《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北京城。北京城街道两旁都是围墙，围墙后面是低矮的平房。平房的灰色瓦顶高出墙面露了出来。在远处的树上停着很多拍打着翅膀呱呱叫的乌鸦。

在中国青年报社我受到了热情接待。总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他说：他很高兴我能到北京来，我们可以共同落实毛主席"百花齐放"的方针。我回答说：我也十分高兴能到北京来，我知道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我还补充说，我随身带来了三

---

① 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驻中国记者。

② 清代天主教神职人员。

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我想抽空认真拜读。他们听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也十分赞赏我的态度。整个拜会期间，我们喝着绿茶，大家彬彬有礼，平静地交谈，其间我们还赞扬了毛泽东以及他“百花齐放”的方针。

过了一会儿，接待我的主人突然沉默不语了，好像是在下逐客令，李同事瞥了我一眼，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拜访可能就此结束了。他们热情地微笑着紧紧握着我的手，与我告辞。

这是一次特意安排的礼节性拜访，我们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问题，就连一件小事也没谈及。他们也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们问题，诸如，我今后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等有关非常具体的细节。

我给自己解释说，这或许就是这里的习惯？可能马上切入主题不太好？我曾在很多书中看到过，东方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每件事都需要时间，应该学会耐心，学会等待，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安宁。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因为一切匆忙的举动和盛怒以及狂热都会激发出人性中的恶，这会显得教养不足，修养不够。

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我仅仅是其中的一粒微尘，我个人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与《中国青年报》社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伟大任务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得耐心等待。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目前，我在饭店住，不愁吃穿，还有李同事陪伴，他从不离开我一步，我在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就坐在他房间的门口，看着我做什么。

我在房间里，开始读《毛泽东选集》。根据上面的指示，这里随处可见在大街小巷悬挂着的横幅标语：要努力学习战无不胜

的毛泽东思想！利用这段时间，我先读完了毛泽东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是一次有中国共产党核心人物参加的重要会议。毛泽东谈到了长征。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第一次。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由于这次长征，毛泽东的部队"爬过了终年积雪的山脉，踏过沼泽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人类的足迹就从来未到过这里。"这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这之后蒋介石进行了大举反攻。

有时，看毛泽东的书看累了，我就拿出庄子的书看看。庄子崇尚道家，蔑视一切物欲，他谈及了他与道教贤哲惠施辩论的是是非非。并论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尧，他说，有人建议尧去统治天下，尧听了这话后，冲洗了自己的耳朵，因为他认为这种想法会玷污他的耳朵，之后就躲到凄凉的祈山去隐居了。在这里庄子表达了他权不足惜的思想观点。

对庄子来说，他的思想与《圣经·旧约》中的《传道书》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界万物的外在表现只是空幻虚无，毫无价值："人们跟外界环境或相互对立，或相互顺应，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人们说这种人不会死亡，这又有什么益处？人的形骸逐渐衰竭，人的精神和感情也逐渐衰竭，这能不算是最大的悲哀吗？"

对庄子来说，世界万物都是变幻无穷的、都是相对的："说话辩论并不是像是吹风。善辩的人辩论纷纭，他们所说的话也不

曾有过定论。果真说了些什么吗？还是不曾说过什么？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言谈不同于雏鸟的鸣叫，真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

有一次我想去问李同事，中国人怎样解释庄周蝴蝶梦中一段话，因为我担心，目前在学习毛泽东“百花齐放”方针的运动中，庄子的这段话会引起争议，因此我选出了这段话：“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我请李同事给我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他笑笑说，我都记下来了，然后又说，我得请示一下，以后再给你答复。但是后来他从未再提及过此事。

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始读第二卷。他写到了30年代末，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一直向纵深挺进。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手开始进行国共合作，以便共同反抗日本侵略。战争还在持续，侵略者十分残暴，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按照毛泽东的看法，面对强大的敌人，最好的策略就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间断地与敌人周旋。他坚持这一主张，并不停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正当我读到毛泽东1938年春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时，他讲到要与日本人打持久战，李同事此时也讲完电话，他放下听筒，从他的屋子走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明天我们去游览长城。啊，长城！人们为了能一睹长城的风采，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因为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长城是无与伦比的，几乎是神话般、深不可测的一个创举。中国人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时续时断地修筑长城。他们开始建造长城的时候，佛祖和希罗多德都还在世，他们在建筑长城的进程中，在欧洲出现了达·芬奇、提香（意大利画家）和巴赫。

关于长城的长度说法一直不大统一，一说是三千公里，一说是一万公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那是因为长城不是一条长城，而是几条。长城在不同的朝代建于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但它们的共同点却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什么人掌管了统治大权，他们都会立刻着手继续修建长城。因此修建长城的思想从未中断过。如果说，在某一朝代曾中止过修建长城，那也仅仅是因为财力不济，一旦财力允许，修建长城的工程就会继续。

中国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侵扰。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军队强大、民族强悍，他们可以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以及戈壁沙漠向中国人进攻。这一部落的民族威胁着他们国家的安全，屠杀和奴役他们的人民。

但是长城仅仅是一种象征和标志，是中国的纹章和盾牌，因为这个国家千余年来就是一个四处都建有围墙的国家。长城是中国皇帝统治北方的分界线。同时，长城也是矗立在各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势的一道防线。它的作用是要保卫城市和乡村、隘口和桥梁，保卫宫殿、政府建筑、庙宇和市场，保护军营、警察和监狱。在中国私宅周围也修建围墙，围墙可以把邻里隔离开来，可以把家庭分隔开来。我们可以这样推算，千百年以来，中国人从不间断地坚持修筑城墙，我们可以核算一下，在这个贫穷的国家，与其花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修建城墙，把这种献身精神，这种坚持不懈的劳作奉献给修筑城墙，不如把这一切用在发展教育、科学和获取知识，用于开垦荒地和发展壮大畜牧业上。

世界的能量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这是何等不合情理又何等浪费呀！

长城——只是一个建在数千公里荒无人烟的山脉和荒原之

上的一个防御堡垒，它是精神的防护城墙，正如我所说，他是世界奇迹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是人类畸形发展的佐证，是一个可怕的历史错误。这只能证明，生活在我们这块星球上的人类不能相互谅解，不会坐到一个圆桌旁共商怎样合理利用人类巨大的资源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类共存荣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本能的妄想，因为人们在遇到巨大潜在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修筑围墙。把同类封闭起来，隔离开来。如果这一切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把它称之为威胁，是一种厄运的预兆，是一种恶的前兆，也许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邪恶。

但是，城墙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首先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控内部发生问题。在每一处城墙上都设有道路的关卡，有城门，也有护卫兵。当然在控制人们出入的同时，可以向过往的人提问题，检查他们的有效证件，记录下过往人的名字，观察他们的表情，并可以随时惩处他们，然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所以，可以说城墙是防御所，也是陷阱，是幌子，也是鸟兽之笼。

城墙最糟糕的方面是，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培养着一种城墙卫士的态度，从中滋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那道分割世界的城墙一线贯之：大凡处在城墙之外的一切都是邪恶和卑劣的；而处在城墙之内的则都是美好和高贵的。而且这个卫士完全无须亲自贴近城墙，他可能离城墙很远，但只要在心中揣有城墙的画面并敬奉这种城墙逻辑所强加的规则，就足以使它与外部的世界隔离。

我们穿过城区，一路驱车往北走了大约一小时的路。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们都朝前倾着身子，与狂

风搏斗。到处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个人都在红灯亮时停在十字路口，就好像大坝的水突然被截流，绿灯亮时又像开了闸，奔涌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只有凶猛的风才有可能打乱这种单调而又生硬的节奏。风还在猛烈地刮着，这自行车的海洋开始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奔腾旋转，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在与狂风的搏斗失败之后，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前行，他们在骑自行车的大队人马中引起一片混乱。当风力稍稍变小一点儿时，所有的人又跨上自行车，不辞辛苦地继续骑行。

市中心的便道上有很多人。能看到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整齐地行走着。孩子们排成双行，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带队的孩子手中，有的举着一面小红旗，有的举着毛泽东叔叔的画像。孩子们排着队，步调一致地高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或者大声叫喊着。“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李同事。“他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回答说。

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先给学生队伍放行。

这座城市色彩的基调是黄和深蓝色。黄色是沿街修筑的围墙颜色。深蓝色是人们服装的颜色。“这些衣服都是革命成功的结果，”李同事对我说，“解放前，人们常常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冻死。”男人都剃士兵的发型，妇女们，无论是姑娘还是年纪大些的都是齐耳短发，前额还留着刘海。只有仔细盯着看看他们时，我才能分辨出他们长得有所不同，当然死盯着看人家也令人十分尴尬难为情，而且也显得很不礼貌。

人们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个地方，而后他们怎么能从这数以千计同样的帽子和同样的包中找出属于

自己的呢？但是他们每个人却都能清楚地分辨哪个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从很小的细枝末节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许仅仅是扣子上的差异而已。

我们从一条小路登上了长城，这条小路已因年久被风蚀了。长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枪用的垛子，还有角楼和烽火台。长城很宽，足够十个人并肩齐行。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长城，但看不到它的尽头，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绵延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长城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大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有何意义？用意何在？我抚摸着这些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墙上堆砌起来的砖石时，心里这么想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长城是一种伟大的隐喻。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我不能与他们交谈，世界在我周围，可我无能为力去抚摸它。身处这种环境，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我又能写些什么呢？报纸都是中文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开始还请李同事帮我翻译，可他给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无从知晓。李同事是我唯一能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每当我提出要跟谁谁见面，要出去采访、出差等要求时，他都说先要请示上级，然后就再不见下文。我从未自己上过街，因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与我形影不离。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找谁？我根本不熟悉这座城市，不认识任何人，而且也没有电话（只有李同事房间有电话）。

更何况我语言不通。事实上，我一来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了。我试着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种

学习办法，但都令我觉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为每个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翻译成英文的《道德经》就有八十多种文本，而且每一种版本都令人信服、无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没找出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真让我感到，我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眼前跃动着的每一个汉字，都好像在忽闪忽闪、微微跳动着，变换着姿势和位置，变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的联系，变换着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形状；它们一会儿排列成纵行，互相倒换着位置，比如说：拼写的“ao”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了念汉字时发音却是“ou”；还有突然我会混淆“eng”和“ong”的发音，学习中文，如果发音不准会犯很可怕的错误。

# 中国式思维

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和口号，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当然更看不懂政府部门入口处的汉字，一句话，就是什么也看不懂。我无法找到一个字母或者一个词，可以让我轻松自然地照猫画虎地临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是糊里糊涂不可知，像在印度时一样！在那儿我也看不懂

当地密密麻麻的印度字母。如果我再往前走，是否还会碰到类似的障碍呢？这种语言字母像是天书，是谁发明的？是怎么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在语言形成的最初阶段，是由某一种字衍生的吧！而这种字又是谁发明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记住呢？也许是通过口口相传，也许是把这种拼写方式记录在某种物体上，也许是书写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东西，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书写出来呢？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人、山脉或者树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差异却如此之大？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初始的字，比如说“花”，在有的地方，是竖着写出来的，有的则是用画圆圈来表达，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用两笔或者用球形表示？这是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集体做出的决定？他们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是在篝火边讨论的还是在家庭会议上讨论的？是在部落会议上确认的还是由年长的人最后拍板敲定的？是由江湖上的人还是占卜者确认的？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退路可走，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内驱力吧。

于是，我就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我练习写汉字，先向左画一撇，再向右画一捺，这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同，结果是，我越是想写好，越是弄巧成拙，越弄越复杂，因为，字母进化这一残酷的逻辑，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也就愈加令人费解，甚至常常使人难以领悟。

尽管印度语和中文的书写方式对我来说都同样难，可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却明显不同。印度人显得很放松，中国人表现得很拘谨，警觉心很强。印度人即使在拥挤不堪时也

不会成群结队，他们的人群显得很松散，杂乱无章，缓缓地流动着；而在中国，人多拥挤时，人群也是成形的，显得纪律性极强，看上去是列队行走的。给我的印象是，在中国，即使人多时，人们的头脑中也总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领导他们、指挥他们；而当印度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则会像在古希腊法院那样，有一群数不清的松散的神陪伴他们左右。如果说，在印度人中发生了什么令人好奇的事儿，人们就会蜂拥而至，驻足在那个地方，围观，议论纷纷。而在中国人群中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人们会目不斜视，继续前行，显得很恭顺，犹如视而不见。印度人表现得十分墨守成规、神秘而又虔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令人十分容易感知他们这种精神世界的表征。虔诚的信徒们匆匆行走在每条大街小巷之中，朝圣的队伍纷纷涌进大大小小的寺院和庙宇——在这神的所在地，成群结队的人们集结在神山脚下，在神河中沐浴净身，在神火燃烧的柴堆上举行天葬。然而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却是，朴实谨慎、不露声色。他们没有闲暇进寺院寺庙，因为他们得诚恳地去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他们要用严格恪守各种规定的行为代替拜神，要用在生产队辛勤劳动代替朝圣。

中印两国人的面部扮相也都各异。

印度人的脸部，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令人好奇的感觉，比如说，他们每个人的额头正中点着一个红点儿，脸颊上涂抹各种彩色图案，微笑时会露出棕黑色的牙齿。而中国人的容貌看上去没有什么令人好奇的地方，他们的面部表情平淡而无变化，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触动他们，这种脸孔后隐含着什么？我们无从了解，当然也就无从知道。

有一次，李同事带我去了上海。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差距如

此之大令我惊讶。这座城市之巨大及其多样性和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同街道上的或法国式、或意大利式或美国式的建筑——都令我感到震惊。

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数公里长的林荫大道、宽阔的马路、外滩、长廊柱式的商场。随处都可以感觉到大都市的气息，到处是车水马龙，随处可见奔跑的人力车、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人流，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商店林立，甚至还可以看到酒吧。天气也比北京暖和多了，气候宜人，能令人感觉到潮湿的海洋气息。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条日本街区，我看到了一座用厚重的柱子支撑的佛教寺庙。

“这座寺庙开门吗？”我问李同事。

“在这儿，在上海肯定是开门的！”李同事带着一种揶揄和轻蔑的语气回答说，听那口气，就好像上海似乎还是旧中国，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的中国一样。

其实，佛教只是在公元一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佛教传入中国五百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已经存在着两种精神流派、两种学说——孔教及道教。孔圣人诞生在耶稣之前，他生活于公元前560至公元前480年之间。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似乎年轻一些，对于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意见也不太一致。甚至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只不过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抄袭和编撰了一些警句箴言的手抄本而流传下来的一本书。

如果我们假设，老子确实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他可能比孔子年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应该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比老子年轻的孔子，就可能曾经拜访过老子这样的圣人并得到过他的教诲：“不要自负，不要渴望情欲，”

这位长者说，"不要阿谀奉承，也不要有野心，这一切都会损害人，我忠告你。"

假设孔子比老子年长的话，那么他就会传授给自己年轻的弟子三种思想：第一："既然不知道怎样为众生服务，怎么能知道如何敬佛呢？"第二："如果以怨报德，怎会懂得积德行善呢？"第三："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呢？"

孔子和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的话)的思想都产生于周朝和春秋战国交汇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诸侯分割、互相血腥残杀的战乱时期，人们尽管可以暂时躲过被屠杀的厄运，但也无法躲过来自匈奴的威胁，更无法避免他们对前途的忧虑。他们曾问自己：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中国式的思维，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思维可能就是世界普遍认同的那种非常实用的哲学思想。印度式思维与中国式思维恰恰相反，印度式思维很少是那种超然存在式的思维，印度式思维试图努力让平民百姓了解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在遇到各种情况时，要学会忍受，不能有独立的思想或者独到的见解，因为，人类降生到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就是要忍受苦难。

孔子和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曾有过分歧，当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人应该怎样生存？"但是他们俩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却是迥然不同的。孔子说："人既然降生在这个社会，那么他们对这个社会就应该承担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从长官的意志，孝顺父母。换言之，就是要尊敬长辈和恪守传统。要墨守成规，严格遵守一切道德规范以及现有的一切秩序，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一切。"所谓孔子之道，即为人忠厚，效忠长官。如果你能效忠长官，服从命令——孔圣人说，那你就能够安身立命。

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却告诫众生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位道教创始人告诫世人,对待一切事物都不要太执著,一切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大师说。所以有与无相并而生,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会消失,虚无恬淡,远离功名利禄,不要争强好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弱点和无助,你的智慧就是你的幼稚和无知。如果你想安身立命,就得清心寡欲。要远离众生,去做一个真正的遁世者。活在当下,享受我们已有的维持我们生命的食物和水。最重要的是合乎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这个很难解释清楚,因为“道”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定义和用言语难以表述清楚的。“如果我们可以给‘道’下个定义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大师这样说。“道”就是一种道路,守道,就是沿着这个道路一直前行。

孔夫子的思想,就是服从长官意志,做官,遵守行为规范、规矩;而道教的哲学却是一切拒绝投机取巧的行为就是大智慧,一切顺乎自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教与道教的伦理道德标准是相同的,只是生存方式上有不同罢了。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对普通民众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是一致的,即要俯首称臣,服从恭顺。有趣的是,在大约同一个历史时期,包括在亚洲,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两种哲学思想——即佛教哲学和爱奥尼亚哲学,这两种哲学思想与儒教和道教如出一辙,都教诲民众要学会谦恭服从。

在画匠们绘出的儒教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们能看到,一位皇帝,在一帮官宦大臣的簇拥下安坐在皇太椅上,簇拥在皇帝身边的这些人当中有礼部尚书大臣、有高傲自大的武部大臣和卑躬屈膝的侍者们。而在画匠们描绘的道教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色彩斑斓的田园景象，画面的深处是淡淡地勾画出的云山雾罩的景象，山上长满了深紫色的桑树。而在画面最突出的位置，勾画出的则是松竹叶子在和煦的微风中轻盈地摇曳。

当我和李同事漫步在上海的街头时，每当有中国人从我面前匆匆走过，我就暗暗问自己，他是信奉孔教还是信奉道教的人呢？还是佛教徒呢？用纯中文表达的话，应该是——儒教、道教或者佛教。提出这种问题似乎毫无疑义，而且会令人觉得太猎奇，只追究这样的解释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一些问题。因为中国式思维的最伟大、最具说服力之处，就是它的灵活多样性和统一融合，即把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观点和立场融为一体，在整个融合的过程中，不会让不同的思维体系——在构成统一体的核心及其基础的过程中发生动摇或者被摧毁。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各种哲学思想（很难用欧洲人理解的那样称这种思想为宗教，因为他们没有上帝一说），但大多数都消亡了，只有儒教或者道教和佛教交替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紧张和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可能是这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有时可能是那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甚至还会发生互相倾轧和争斗，乃至冲突和战争，但最终的结局却都是以达成一致意见，或以互相妥协和求同存异的方式使各种冲突得以解决。在这一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各派之间屡屡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终都能化解，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个体也能体现出这种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当然这要视当时的地点、情况和环境而定。常常是儒家思想

或者道家思想的元素在一个人身上交替体现，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定，人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为了生存人们可以忍辱负重，也就是说，外在表现得十分温良恭俭让，但在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孤傲的个性、不屈不挠的独立性。

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饭店。我又开始埋头于我的阅读之中。我开始学习有关中国唐朝伟大诗人韩愈的历史知识。韩愈是儒教的支持者，他抵制和反对来自外域的印度宗教——佛教思想，他撰写了大量的批判佛教的文章和激扬的诗篇并编成书籍。这位癫狂的伟大诗人之举激怒了当时支持佛教的皇帝，皇帝先判处韩愈死刑，在众多大臣的请命之下，他作出改判的决定，把韩愈流放到今属中国的广东地区，当时那一带鳄鱼遍布。

当我津津有味地继续阅读有关的历史时，突然，《中国青年报》社编辑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还带来了一位中国外贸部的先生，他转交给我一封来自华沙的信。这是一封我所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因为我们编辑部反对政府取消《既然》这个栏目，党中央决定撤销我们整个编辑部，派三位政府官员接管我们报社的工作。因此，一部分记者被解雇，还有一部分人在犹豫观望。"在信中我的同事们问我，我有什么想法？

中央外贸部的先生走后，我没顾上多想，就对李同事说，我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让我急速回国。我现在得立即打道回府。我看到李同事的脸抽搐了几下。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到楼下的餐厅吃了晚饭。

离开中国时的心情与离开印度时一样，为此我感到很遗憾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

有意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原因是，迄今为止，这个国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世界。但它正试图拉我进入它的轨道，并要完全吞噬我，它使我着迷，使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我心中似乎燃起了一把火，我渴望了解它，渴望把自己完全熔化和溶解在这个对我来说仍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世界之中，并成为它的一员。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就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人，我的生活就在这儿。我十分渴望立即学会中国的语言，能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它的一切书籍，了解对我来说这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这似乎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弱点，因为在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是如此深邃、厚重、丰富、复杂而又呈多样性，即使我能弄懂一点皮毛，即使我可以做到一知半解，也需要耗费我毕生的精力。因为，这里的文化就像这里的建筑一样，有数不尽的房间、游廊、平台、屋瓴，进入它就像进入迂回曲折的迷宫一样，令人迷失其中。如果你走进其中的一间，你就会无法走出来，无法折回，没有回头路可走。要想成为一名印度学学者、中国学学者、阿拉伯学学者或者希伯来学学者，必须是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对我来说，我已没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了。这个世界更能吸引我的是，让我去接触更多的新人新事，探寻新的道路，发现新的蓝天。其实最能诱惑我的还是跨越一下国境，探究一下国界的那边究竟能看到什么，这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要做的事。

我回到了华沙。我又开始懊悔我对中国的一无所知，我在中国期间的无所作为和我的孤独空虚。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派我去中国，是因为解冻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 1956 年发生的“十月事件”，第二件是毛主席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我到

北京之后，在华沙和北京发生的事却又恰恰相反，哥穆尔卡发起了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而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令人发指的政治运动——“大跃进。”

实际上，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就应该回国，之所以我的报社没有招我回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惧怕这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所以暂时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许他们是为了我好，认为我在中国可以逃避这一运动。因此我想，《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也许早已收到了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通报，告知他们，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是由该报正式派遣的记者，现在只是暂时挂在那儿，因为这家报纸正面临着撤销的问题，前途未卜，这只是时间问题，早晚会有下文。或许是中国人好客的传统，或许是中国人给人留面子的习惯，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更何况这里的人们天生讲究礼数，所以没有轰我走。其实他们可能早就希望，同时也给我提供条件和时间让我猜测，过去我们谈好的合作方式早已无效，让我主动提出来回国的要求。

# 世界之路上的记忆

我刚一回国就被调到波兰通讯社工作。当时我刚从中国回来，头儿认为，我熟悉远东问题，决定让我分管远东事务，即印度以东的亚洲地区国家事务，但不包括太平洋地区。

那时，我们对世界上很多事情都知之甚少，其实我对我自己分管的那些国家也一无所知。为尽快熟悉我所主管的那些国家的事务，我只能挤时间去学习。比如说：缅甸和马来西亚沙漠中的游击战问题；菲律宾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岛的暴乱问题以及菲律宾莫洛地区各部落群之间的冲突问题等等。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又一次给我展现了数不清的令我难以深入把握的问题。令我感到心理压力颇大的是，时间紧，任务急，工作量大，深恐失误。因为，每天白天我要做大量的编辑工作，把从全世界各国传来的消息，一一认真阅读，然后翻译出来，再缩编成消息，发给国内各大报纸和广播电台。

就这样，我每天都能收到从仰光、新加坡、河内、马尼拉、孟加拉等国发来的各种消息，犹如一刻不停地游走在这些国家一样，从印度到阿富汗，然后再从日本到中国。在我的办公桌玻璃

板下面压着一张二战前的亚洲地图，我常常用手指在地图上寻找着金边在哪儿，苏门答腊或所罗门群岛在哪儿。甚至有时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找到那个叫老沃[①]的地名，因为那儿发生了一件刺杀某重要人物未遂的事件，又在某个橡胶园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每时每刻我都得充分调动每一根脑神经，努力想象那些地方发生的事件。

每到晚上，当编辑部静下来以后，走廊里静悄悄的，我也得以暂时从那些白天工人罢工和武装斗争、政变和爆炸等事件的报道中解脱出来，尽管在那些我并不熟悉的国家所发生的每件事都令我感到十分震撼。每当我想让自己的脑子休息片刻的时候，我就会从抽屉中拿出希罗多德的《历史》阅读。

希罗多德在自己《历史》一书扉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给我们解释了他写这本书的缘由，他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旨在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由于日久年长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所获得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至于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人们在那里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这正是他写这本书的关键。

首先，希罗多德在这段话中告诉我们，他进行过研究（其实我更想用“调查”一词来表达）。今天我们都知道，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对那时的人来说他比较长寿——撰写了这本书。他为何要做这件事？有人鼓励他这样做吗？还是有人逼迫他做这件事？或许希罗多德当时想取悦于某位达官贵人？或是长老

---

① 属菲律宾。

会？有权势的君主？是谁需要他这样做？目的何在？

也许他做这一切都是出于自愿，或是出于追求知识的热望，或者他患了强迫症，不这样做不行？或许由于他天生聪颖，智力超人，所以他被自己脑海中产生的问题搅得食不安、寝不眠？如果真的仅仅是完全出于他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这样去做的话，那他是如何挤出时间，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做下去的？

希罗多德承认，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人的记忆力是有缺陷的、脆弱的、短暂的——甚至有时可能是虚假的。因此，记忆力能容纳和储存的东西也有可能丢失和消失，甚至无影无踪。无论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所有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都与他一样，有此种担心。没有记忆等于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物种的最明显标志，也是人的精神所在。但这一切又是如此玄妙、深奥莫测而且变幻不定。因此这也说明，人是如此的不自信。为此人们常常因不确定而会说，哎，……不是说……哎呀，你怎么不记得啦，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不就是那个……哎呀，你再想想，他不就是那个……谁来着？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意识到，等我们自己说完“我不知道”以后，就陷入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盲区，换句话说，这种愚昧无知就成了——某种不存在。

当今社会的人并不十分注重自己记忆力的培养，因为记忆随处都可储存。因为，我们可以完全依赖伸手可及的——各类百科全书、课本、辞典、手册等等。此外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旧书店和档案馆、录音带、录像带、互联网等等。当今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储存词汇、声音、画面的无限空间，这包括房屋、仓库、地下室和顶层阁楼等。如果你还是小孩子，那老师会在学校教授你知识，如果你是大学生——就能从教授那里获得你想

知道的东西。

可是在希罗多德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我们上述提到的图书馆、博物馆，旧书店和档案馆、仪器设备和现代化技术统统都不存在。当时人们能知道的也就是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内的一切，能记住的也就是那些储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一切。尽管那时已有少数有权势的人开始在莎草纸上和在泥制的黑板上学习写字。其余的那些人呢？其实文化历来就属于贵族势力范围，如果文化不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那么它早就消亡了。

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人才是唯一的实实在在的记忆宝库。若想拥有这一记忆宝库，就得想方设法找到这样的人，如果他住得很遥远，那么就得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去寻找他们，一旦找到和见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要跟他坐在一起，认真聆听他给我们讲述的一切，听完后，一定要把他所讲的内容尽快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地报道（报告文学），这种实地报道的雏形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出于这种需求，希罗多德出门远足，周游世界，去广泛接触人们并聆听他们的讲述。人们会告诉他，他们是谁，给他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人们会说是不同的人告诉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当然主要是从自己的先辈那儿听来的。换句话说，是他们的先辈首先把知识传授给了他们，就像现代人一样，我们也会把自己学来的知识一代一代传授下去。当然知识传授的形式是不拘一格、多种多样的。在那个离我们遥远的时代，人们传授知识的主要方法是，人围坐在篝火旁讲述各自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渐渐地被后人们称为民间传说和神话。再以后，无论是故事的讲述者还是聆听者，都慢慢地相信了人们所讲的一切是绝对真实的。

篝火还在燃烧，有人添加了更多的柴火，那升腾着的火苗所输送给人们的融融暖意，激发了人们的大脑，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

试想，如果人们周围没有燃烧着的火光，如果没有油灯和蜡烛把黑暗的陋室照亮，那就很难想象，人们是否还有可能继续讲述和聆听。火光诱惑着人们，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火焰是团结的象征，它代表着历史，火焰也是记忆的象征，这就是薪火传承。比希罗多德年长的海拉克利戴斯认为，火是一切物质的开端，是最本质的实体，他说，一切都像火一样无止境地运动着，而一切又在破灭后重新燃烧，发光发热。万物历来都是运动着的，同时万物在涌动中又不停地经历着转化和发展。

记忆亦是如此，一个画面消失了，新的记忆又同样在画面中出现。这种新的记忆只不过与前种记忆有所不同罢了。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人们不可能跳入同一条河水中，换句话说，就是新画面与旧画面不可能完全相同。

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希罗多德非常了解这条规律，正因如此，他把自己放在了这个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对立面，旨在使人类历史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从记忆中抹去。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为此，他需要有何等的勇气，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要完成自己这个神圣使命，证明人类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忘却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但是，他又从何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可能存在所谓的人类历史呢？这一切都得益于自己的前辈——荷马。荷马曾十分详尽地描写了一部战争史——特洛伊战争。后来他又描写了奥德赛孤独漂泊流浪的经历。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些称为人类历史呢？应该说，是因为在希罗多德头脑中产生了新的想法、新的概

念、新的见解。一句话，希罗多德把他自己展示给了我们，尽管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乡村文书，是一个热爱自己城市的小人物，是来自希腊城邦小城中众多普通市民的一员。事实并非如此！《历史》的作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个具有全球思想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作为第一位全球主义者亮相在世界舞台上的人。

当然，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或者说，他想象中的世界版图跟我们现代人眼中的世界版图是不同的——他眼中的世界版图要比我们今天的小很多。他眼中的世界中心是沿爱琴海周围的山脉和森林分布的大地。位于爱琴海西岸的地方——是希腊，而位于爱琴海东部的地方——则是波斯湾。这才是我们要说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希罗多德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从他记事之日起，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割据的世界，世界被分割成了东西两大块，而在这被分裂的东西两大地域中，各种争斗、冲突和战争连绵不断。

重要的是，与所有善于思考的人一样，希罗多德也早已洞察出问题所在，于是他便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为何是这个样子？"这也正如希罗多德在自己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中第一句话所提到的那样：

"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为了把人们在那里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数千年来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使人类一直感到惶恐不安的问题，自从有了人类历史，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惑着人们。人类为何总要互相残杀？想达到什么目的？想做什么？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这历来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正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希罗多德穷

尽毕生精力,不知疲倦地奋斗了一生。在所有这些笼统而又抽象的问题中,希罗多德首先从一些最具体的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下手,因为这些最具体的事件就发生在当下,或者说,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还比较鲜活,尽管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有一点褪色,但这种记忆还始终保持着,总之一句话,就是他能把这种记忆集中到一点并加以总结,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希腊(这里指欧洲)要和波斯(这里指亚洲)交战?为什么这两个世界——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要互相敌对,而且形成了一种不可融合的你死我活的对抗?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吗?

这一切都深深地困惑着他,迫使他全力以赴地、执著地、持之以恒地投身于解决这些困惑的努力之中。让我们来想想看,这些问题是怎样困扰着他,使他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永远不会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我们总能看到他不知疲倦地到处旅行的身影;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那里的气氛都会变得令人心情激荡,甚至还有些躁动不安。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走出家门,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十分满足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生活,不管在哪里,这样的人都占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总喜欢把希罗多德这样的人与那些行为怪异、狂热甚至愚妄的人相提并论。

当然,在我们现代人中也不乏其人,会以上述那种眼光看待希罗多德这样的人。但是希罗多德从来未提及过这类事。他是否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他,评价他?事实是,他奔波于采访和旅行,根本无暇顾及这一切。每次旅行回来,他需要把自己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立即记录下来,并且分类整理成资料。他的旅途并不是仅仅从出发的那天开始算起,也不是以我们看

到的以他再次踏入家门而结束。在现实生活中，旅行早已经开始，而事实上从来也不会结束，因为记忆的映像会一直延续下去，映在我们的头脑中，尽管我们实际上早已停下了我们旅行的脚步。事实上，旅行就犹如患了一种传染病，这种疾病本来就没有任何药方可以治愈。

今天，我们仍然无从知道，希罗多德是以什么身份出行远征的，是不是以商人的身份？（众所周知，这是米利都的黎凡特人[①] 最喜好的职业。）事实可能与我们的猜想相反，希罗多德对诸如价格、商品、市场这类事可能从无兴趣。那他是作为外交家出行的吗？显然也不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没产生这种职业。那他是以间谍身份出行的吗？以这种身份出行是为哪个国家效劳呢？或者他是作为旅游者出行的？显然也不是，因为旅游者出行纯粹是为了好好休息，而希罗多德却在旅行途中，不辞辛苦地劳作。应该说他的出行，是以一位记者、一位编年史家、一位人类学学者、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罗多德是一位典型的旅行者——后来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类人被称为漫游者或者流浪人。但是，希罗多德的这种漫游不是流浪汉似的游荡，也不是漫无目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逛。希罗多德的出行是有目的的旅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世界及其民众。了解这一切，是为了今后能书写他们，记录他们。首要目的是：

“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至于失去光彩……”

---

① 黎凡特至地中海诸国及岛屿，既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应该说这还只是他最初的打算。因为，在他出行考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他不断有新的发现；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不断膨胀、扩大和发展。他发现，在埃及的后面，还有利比亚；利比亚之后又有埃塞俄比亚，换句话说就是非洲；而在东方，再绕过波斯帝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至少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则是伟大的、令人兴叹的巴比伦；在这之后，人们还无从得知哪里是印度人祖国的边际。因为地中海西边甚至更远的地方，还有阿贝巴和海拉克列斯石柱，再往远去，人们又说，甚至还有别的大洋，在北部还有海洋和大片的草原，还有人们传说中的、居住在森林里的为数不多的锡西厄人。

比希罗多德年长些的米利都人阿那克西曼德[①] 曾绘制过第一张世界地图。按照他的说法，地球是圆的，在地球的表面上居住着人类。天体悬浮在空气中，环绕着地球。地球与每一个天体都保持着相等的距离，在那个时代，曾经有过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那时最常见的地图是，大地是平坦的，是被欧凯阿诺斯大河的水环绕着的椭圆形盾牌似的东西。欧凯阿诺斯河不仅是大地的边界，同时也是世界上所有河流的源头。

爱琴海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它的周围被陆地和岛屿围绕着。希罗多德走得越远，离所谓的天涯海角越近，就越能发现新的事物。首先，他认为，人类应该接纳每一种文化，因为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为了了解不同的文化，首先得了解文化本身。了解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首先应该是习俗的不同。让我们来看看，人们怎么着装，怎么为人处

---

①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约 610—前 547 年)，古希腊哲学家，第一部希腊文哲学著作《论自然》的作者。

世，有什么风俗习惯，信仰哪种上帝。那我们就会说出你是谁。人类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也应当在不同的文化中共存，在每个不同的人身上每天都会显示出不同文化的背景，说白了，人其实就是文化。

希罗多德，尽管他知道世界上的诸多事，但他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比如说，他从来没听说过中国或者日本，也从未听说过澳大利亚和太平洋，他也不曾知道伟大美洲的崛起和存在。总的来说，他也不曾知道欧洲西部和北部。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就是地中海——远东一带，对他来说，这片地区是一个拥有大海和湖泊、高山和绿地的春光明媚的世界。这个世界拥有数不清的橄榄树和葡萄酒、咩咩待哺的羔羊和鲜美的羔羊肉。而在阳光灿烂的阿尔卡地区——每隔几年就会血流成河。

# 克洛伊索斯的幸运与不幸

在寻找东西方之间为何会发生冲突以至东西方之间为何互相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希罗多德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从未说过，我知道或我了解个中缘由！恰恰相反，他却躲在暗处，向世人展示了出自别人之口的答案。他说，这些人都是波斯问题专家。这些波斯问题的专家们说，希罗多德只是谨慎地引用了别人的话说，造成东西方两大世界相互仇视的人，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波斯人，而是第三种人，即那些游走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人——腓尼基人。这些腓尼基人大肆劫夺妇女，从此引发了全球混乱的开端。

引发这一切争端的缘由是，腓尼基人在希腊的阿尔哥斯港口城市，假冒伊奥尼亚人，劫夺了希腊国王的女儿，并把她运到了埃及。继这一事件发生后，有几个希腊人跑到腓尼基港口城市推罗，劫走了欧罗巴国王的女儿。后来，又有另一些希腊人劫掠了科尔启斯国王的女儿——梅地亚。再后来就是推罗的亚历山大劫走了海伦，她是希腊国王美涅拉欧司的夫人。于是希腊人为了报仇雪恨，出兵特洛伊，引发了战争，后来荷马以史诗的

形式详尽地描写了这场战争的残酷。

希罗多德引用了波斯圣贤的一段话：

“根据波斯人的说法，抢掠妇女，那是坏人干的勾当，可是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自己心甘情愿的话，她们是决不会被劫走的，否则事情就发生得太蹊跷了，但凡明白事理的人都丝毫不会在意这类妇女的。”

关于希腊王国的伊奥尼亚问题，腓尼基人则否认在带希腊国王的女儿到埃及去的时候曾使用过任何强暴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在阿尔哥斯港口停泊时，与在那里的一个船主的女人有了来往，而在她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羞于向自己的父母启齿，因为害怕被父母发觉，所以在腓尼基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随着他们一同乘船走了。

希罗多德为何在自己的杰作中首先要从描写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的诱拐绑架（波斯的圣贤们也用这一词）妇女事件下手？因为他考虑到了在媒体市场上的新闻卖点这一规则。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故事的描写首先得能抓住人的心理，引人入胜，并且再适当地加些调味料，引起轰动效应，同时又能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目的。而描写诱拐绑架妇女这类事件也恰恰符合上述条件。

希罗多德出生于两个世纪之交的年代，当时传统的口述历史还占主导地位，书写历史的时期刚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希罗多德的生活和工作日程：他背着行囊出门远行，旅途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在返家的路途中，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希腊城市，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组织与作家见面的晚会等各种类似活动，并且在各种见面会上讲述自己在旅途中的见闻、印象以及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观察和思考。也许正因为他很看重举行这类见

面会等活动，因此，他一次次出门旅行采访，为组织下次类似的见面会做准备。他一定十分渴望能拥有更多的听众，吸引大批人来听他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讲故事，并且努力使自己讲述的故事引起轰动效应，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好奇，令人们回味无穷。在他的整部著作中，他对各种事件的描写越详细、越触目惊心，就越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如果缺少刺激和猎奇，听众们很快就会感到乏味和厌倦，离他而去，留下的只有空空如也的场地。

但是，他描写劫持妇女事件绝不仅仅是为了廉价的煽情，而是因为，在这些情节中自始至终都会贯穿着双重含义和令人愤恨不已的故事主线。在书的一开始，希罗多德就埋下了两处伏笔，首先他试图系统完整地表达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初步构想。希罗多德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旅途中，大量搜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流传下来的各种史料，然后将这些史料加以总结归纳，并且用自己的方法把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杂乱无章的事件分类整理清楚。

希罗多德是否找到可实际操作的方法把各类事件整理清楚？希罗多德给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是谁闯的祸？是谁最先惹下的祸端？当我们有了这些问题作答案之后，我们就很容易揭开这错综复杂的、纷乱而又纠缠不清的历史之谜，然后再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促使发生这些事件的依据是什么？其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根源来自哪里，并且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在希罗多德的世界中(即使在当今的各种社会中)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做法就是：复仇！这个常规做法的具体表现就是报仇雪恨、以牙还牙，不是你

死就是我活！复仇不仅仅变成了人的一种权利，甚至变成了一种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和责任。如果有谁胆敢不履行这种实施报复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就会遭到来自家庭、氏族部落和社会的一致谴责。实施这种报复的义务和责任不仅仅是较强的一方要做，而且受到屈辱的一方还要变本加厉地去做。人们不仅把实施报复这种手段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甚至还把这种职责变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的、自然的和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约束的，主宰永恒的宿命论。

报复这种行为，究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本应是，让人类在实施报复行为面前，产生一种令人战栗的恐惧感，在实施报复之时，让人立即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卑鄙的耻辱感。因为只有产生了这种情感，才能促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伤害别人之前心中升起一种负罪感。人类应该把复仇行为变成某种遏制报复行为的制动器，让复仇行为变成令人永远难忘的耻辱，因为，一旦复仇的链条被启动，那就会非常可怕地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甚至会影响多少个世纪。

但是，在复仇这个机体中似乎总有一种令人生厌的宿命论在起作用，这好像是一种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因为当人们突然遇到不幸而又无法规避这种不幸时，人们就会想，那是为什么呢？采取什么办法对付呢？最简单也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对一些人采取报复手段，尽管人们只知道一些人的前辈对自己的前辈曾犯下罪行，但根本不顾及此代人与他们的前辈早已毫无瓜葛。

希罗多德提及的第二条法则，不仅关系到历史，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法则，这就是：人间的幸福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位希腊先人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用描写吕底亚人的

国王——克洛伊索斯和《圣经》中的约伯——很有可能克洛伊索斯就是他的原型——的悲惨命运证明了这一点。

吕底亚曾是介于希腊和波斯帝国之间的一个强大的亚洲国家。而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在位期间，在自己的王宫内狂征暴敛了大量财富，他曾以拥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而享誉全世界。克洛伊索斯曾不厌其烦地向来宾们炫耀他的财富。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也正是希罗多德出生前几十年。

有一次，从吕底亚首都——撒尔迪斯来了一批生活在希腊的圣贤们，他们来自富强无比、如日中天的撒尔迪斯，而其中包括雅典人梭伦[①]。克洛伊索斯亲自出面接待了梭伦，并命令自己的臣仆带着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梭伦看到这一切，感到十分震惊，克洛伊索斯趁机问他：

"我很想请教您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人中，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克洛伊索斯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

梭伦以正直无私、刚直不阿著称，他毫不谄媚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同时还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位就是雅典人公认的英雄泰洛斯。梭伦说：

"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问题，是关乎人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你知道吗，神是有嫉妒之心的，并且神十分乐于干扰人类之事。在人的漫长一生中，人类能看到和体验到十分不喜欢的诸多事情。我看一个人能活到七十岁就算够本儿了。在这漫长的七十年间，若把闰月撇开不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绝对不会有某一天的事情

① 梭伦（公元前640和前635年间—约前559年），古希腊执政官、改革家。

和另外一天的事情完全吻合。以此看来，克洛伊索斯啊，人间的万事万物的确是无法完全预料的啊！我们再来说说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掌管着统治大权的一国之王；然而，就你给我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一生的时候，我才能够给你一个确切的回答。尽管这样，在人临终之前，我姑且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之人。无论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特别注重结局如何。因为神通常使许多人看到幸福的影子之后，便把他们无情地推上了毁灭之路。”

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受到了一次令他寝食不安的来自神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大概就是他自视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缘故吧。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身材魁梧、高大健壮，他叫阿杜斯；另一个儿子是个聋哑人。但不管怎样，克洛伊索斯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但是，在一次狩猎时，阿杜斯被一个叫阿德拉斯托斯的人——克洛伊索斯请来打猎的朋友，不幸用投枪刺中。听到自己的儿子不幸被刺死的消息，克洛伊索斯心如刀绞。在给阿杜斯举行葬礼时，这位刺死阿杜斯的猎人阿德拉斯托斯一直等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们纷纷散去，“等到坟墓四周寂静无人之时，便在墓地旁自杀了。他认为，在他所认识的人中他属于最不幸的人。”

儿子去世后，克洛伊索斯整整两年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与此同时，他的邻国——波斯帝国却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那时(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掌握了王权。克洛伊索斯日益担心居鲁士的帝国在日益强大之时，会对他构成威胁，所以他欲先发制人，决心首先讨伐波斯人。

在当时还曾有这么一个惯例，那就是在每次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首先得把那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神托请来共商大事。

当时希腊的神托占多数。比这更重要的还有,希腊人在位于特尔斐高耸的山顶上还建有一个神托所,这是神托们的基地。为此,克洛伊索斯便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祭神奉献活动,以取悦于特尔斐之神。

“他下令杀掉三千头牲畜。

熔化大量黄金,打制银制物品。

烧掉堆积如山的镶嵌着金银的卧床,黄金杯和褐紫色长袍及内衣。

他还命令所有吕底亚人,要他们根据自己的财力向神进贡。”

我们不难想象,数量庞大而又贫穷的吕底亚人,他们是如何排成长队,把自己身上仅有的贵重金银首饰、一切祭祀用品和家用器皿、褐紫色长袍礼服包括内衣在内的东西抛向那正在熊熊燃烧着的火堆之中。

神托传达给人们的预言特点则是:出言谨慎,语意双关,模棱两可而又晦涩难懂。文本冗长繁杂,神托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神托的话不灵验(这类事情常常发生),神托们就可以顺利金蝉脱壳,同时还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顽固地坚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人们仍然如饥似渴地、情绪激昂虔诚地倾听算命者和占卜者们的声音。人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渴望揭开未来的面纱。这种来自人们渴望揭开未来面纱的力量不但不会被削弱,还会转化成另一种牢不可破的力量。这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甚至连克洛伊索斯也没能摆脱这一力量的束缚。他耐心地等待着那些被派往特尔斐去的使者归来。每个神托都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决定攻打波斯人,他就一定可以灭掉一个强大的帝国。

当然这话没错，波斯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结果是，克洛伊索斯出征了，但他在这场战争中惨败了，正如神托所预言的那样——他毁掉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那是自己的伟大帝国，就连他本人也没摆脱被俘虏的命运。

“于是，波斯人俘虏了克洛伊索斯之后，把他带到了居鲁士那里去。依照居鲁士的命令，波斯人架起了一大堆木柴，把身带枷锁的克洛伊索斯放置在柴堆上面，还让另外被俘的十四名吕底亚少年陪伴他。我猜想，居鲁士这样做也许是打算把这些最初的掳来的货物作为祭品来进贡，借以向神许下什么心愿，也许他早就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一位敬神而又畏神的人，因此，他想试一下，看看在此种情况下，神灵是否能来拯救他，使他不至活活被烧死……但是站在柴堆上的克洛伊索斯却在自己处境悲惨之时，想起了梭伦曾对他说的话，他认为梭伦的话代表神意，即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幸福的。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便一改保持沉默的态度，深深叹了口气，三次大声呼喊梭伦的名字。”

此时，居鲁士正坐在火堆旁，他命令翻译去问克洛伊索斯，他在大声喊叫什么，他在呼叫谁的名字，克洛伊索斯都一一作答了。正当他说话之时，柴堆已被点着，柴堆外部的干柴已经开始燃烧。居鲁士这时突然良心发现，他害怕遭报应，于是改变了主意，急令人们赶快把火焰扑灭，命令他们立即把克洛伊索斯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从火堆上解救下来。尽管人们尽力扑救大火，但此时已经无法制服熊熊燃烧的火焰了。

“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悔恨之意，看到大家拼命扑火但已无效时，便高声呼唤阿波罗神的名字……正当他眼含泪水虔诚求神时，刚才还晴空万里、平静无风的天空上，忽然，乌云集结，暴风骤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熊熊燃烧着的大火被浇灭了。

居鲁士命他走下柴堆,问道:'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带军队来攻打我的国家,你为什么不愿与我为友,而选择与我为敌?'克洛伊索斯这样回答说:噢,国王啊,这完全出于我自己的想法,与你为敌,征战讨伐你,非但没给我带来好运,却给你带来了好运。若说起个中缘由来,那么应该说是希腊人的神给你带来了好运,因为是希腊诸神鼓励我出兵与你作战。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这一步,用战争来取代和平,因为在和平时期,是儿子来挖掘父亲的坟墓,而在战争时期,是父亲挖掘儿子的坟墓。这一切难道不是来自神的旨意吗?”

“居鲁士听了他的话后,给他松了绑,叫他坐到自己身旁,对他照顾备至,而居鲁士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注视着克洛伊索斯。而此时,克洛伊索斯却陷入沉思,一句话也不说。”

此时,当时的两个最强大的政权——亚洲政权——战败的克洛伊索斯和大获全胜的居鲁士,并肩坐在那里,看着那些就在刚才还活生生互相残杀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燃烧在残余火堆上的尸体。我们不难想象,克洛伊索斯就在几小时之前还在恐惧的折磨中等待着死亡,他那时一直处于惊恐之中,当居鲁士问他,他能为他做点什么时,他居然开始咒骂上帝:

“主公,如果你容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敬的希腊人的神那里去的话,那么请你顺便问他一下,他是否惯于欺骗那些经常祭拜他并给他进贡的人,这便是你能帮我做的最令我欣慰的事情了。”

这难道不是在亵渎神灵吗?

“除此之外,当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居鲁士的首肯,他便派一些吕底亚人到特尔斐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在

神殿入口处，并且问神，神激励他向波斯人开战……神是否会为此而感到可耻……此外，还要问问神，希腊的神是不是惯于干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佩提亚神托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希罗多德提及的第三个法则。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宿命论，甚至神也不例外。克洛伊索斯为他在五代以前的祖辈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他的这位祖辈那时只是海拉克列达伊家族的亲随卫兵，后来他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夺取了王位，可这王位原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阿波罗神本来尽力想使这种惩罚落到克洛伊索斯的后代身上，而并非他自己身上，但是阿波罗神也无法改变命运女神的旨意。

这就是佩提亚人的回答……克洛伊索斯听到这话之后，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应怪罪于神。”

# 战役的结束

我想，我可能永远告别了克洛伊索斯。因为，在我看来，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表现出了人性中令人同情的一面。比如说，尽管他拥有令全世界羡慕的金银财宝(他宝库中的金银要以吨来计算)，但他还是流露出了一种幼稚和难以掩饰的空虚；他虔诚地笃信特尔斐神托的预言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他的原因间接地导致了自己儿子的死亡之后，他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他在自己的帝国遭受苦难之后，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度崩溃之情；在柴火堆上殉难之前他的无动于衷；在他批驳神托预言时的反抗精神；此后，他还要为那些不曾相识的祖先犯下的罪孽付出高昂的代价时，他都表现出了人性的真实的一面。因此，我想再说一遍，我以为我已经永远告别了这个无耻可恶的暴君克洛伊索斯，但是他的名字后来重又出现在希罗多德的书页中，而且这次还有波斯军队的统帅——居鲁士国王陪伴，他向中亚深处进军，甚至打到了阿姆河，还攻占了既好战又野蛮的玛撒该塔伊人的地区。

这些事件统统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正日益强

大，向全世界进犯，那时的波斯帝国真是所向披靡，最终征服了全世界。继波斯人多年后，即多少个世纪之后，不断有一个接一个的大国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但是处在当时那个黑暗时代的波斯人的野心最多只不过显示出的是一种勇敢和活力。他们霸占了伊奥尼亚和埃托利亚，攻占了米利都、哈利卡尔那索斯和众多的希腊在西亚的其他殖民地；他们还占领了米提亚和巴比伦，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占领了一切他们能占领的地域，并且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而现在，居鲁士征服了当时世界上一些比较著名的和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边缘氏族部落及国家。他很有可能相信，如果他们能镇压玛撒该塔伊人，并占有他们的土地和畜群，继而得寸进尺，他就可以胜利地大声宣布"世界是我们的！"

但是这种占有一切的欲望过早地断送了克洛伊索斯。现在又轮到居鲁士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了。事情的发生往往事与愿违，正当人认为自己离胜利还有一步之遥时——令人感到非常残酷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放纵无度、巧取豪夺行为的惩罚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降临。伴随着惩罚的同时，全世界都会为此感到大失所望，对这种罪有应得遭到复仇命运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耻辱和失势表现得十分忧郁。

此时，居鲁士决定征讨玛撒该塔伊人。这一决定并没有出乎人们所料：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居鲁士是不会老老实实、善罢甘休的，因为他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手伸向各个民族。加之当时也有许多促使他非这样做不可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他所出生的年代，他认为他所出生的年代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可以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历次战争中遇到的好运气，在经历了那些战争之后，他发现，无论他出征哪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就一

定逃不出他的手心。”

我们所获知的关于玛撒该塔伊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生活在亚洲中部的大平原上，同时我们知道，在阿姆河上有一个岛，夏天他们在那个岛上挖各种树根来食用。他们还把成熟的水果从树上摘下储存起来，留着过冬食用。我们还知道，玛撒该塔伊人食用一种类似大麻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玛撒该塔伊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吸毒者和贩毒者们的鼻祖。

“据说他们还把长在一种特殊树木上，散发着奇特气味的果子砍下来储藏起来。每当他们在一起聚会时，他们便会把这些果实抛进他们所围坐的火堆里，而当他们闻到这种果子燃烧所散发出来的烟雾香气时，便会立即陶醉，就像酒对希腊人所起的作用一样。于是他们就会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里去，之后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如痴如醉，飘飘欲仙，以致到最后竟站起来手舞足蹈，边唱歌边跳舞。”

玛撒该塔伊人的国王是(丈夫去世后即位的)一位女性，她叫托米丽斯。在她与居鲁士之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血腥悲剧，克洛伊索斯在这一悲剧中也扮演了角色。最初是居鲁士假惺惺地向托米丽斯求婚，说要娶她为妻。但是，托米丽斯立即看穿了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居心叵测。她很清楚，这位波斯国王所要的并不是她本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的王国。居鲁士看到自己的诡计未能得逞，便下令对玛撒该塔伊人发动武装进攻，他把自己的大军开到阿拉克塞斯河对岸——即玛撒该塔伊人居住的地方。

从波斯帝国的首都苏撒到阿拉克塞斯河的路途很长，也非常艰难，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路可走。不仅要翻过层峦叠嶂的山谷，还要穿过被大火烧焦了的沙漠和一望无际的平原。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拿破仑向莫斯科发动的疯狂进攻。无论是波斯人还是法国人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即掠夺、征服、控制。但最终这两个国家都战败了，因为他们都逾越了希腊的法则，即做任何事都须有节制：永远不要贪多，永远不要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但是，当他们开始发动的掠夺性进攻处于强势时，他们的眼光往往不会看得很远，他们无法理解急于征服控制一切的欲望和野心会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失去理智。当然，换句话说，如果理智能控制世界的话，那还会有历史吗？

现在还是居鲁士处于进攻时期。到处都是行进中的大队人马和武器装备，一眼望不到边。越来越多的疲惫不堪的战士从山崖上滚落下去，越来越多的战马渴死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还有军队散失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地图，指南针，望远镜，更别提什么路标。他们要侦察所去的地方，只能靠向路过的部落里的人打听，或者雇一个向导，也许会去找算命先生算一卦？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大部队，甚至有时会像波斯人那样，被鞭子抽打驱赶着，但他们仍会始终不渝、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前进。

"只有居鲁士在行军的路上拥有特权。这位大王在出兵作战时，总会有人给他带着或者驮着在国内准备好的充分的粮食和肉类。此外，还有人带着专供这位波斯国王饮用的水，这水是从流经苏撒的科阿斯佩斯河中打来的。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总有一批骡马拉着四轮车跟随着他；上面运载着贮藏在银坛子里面的、煮沸了备用的科阿斯佩斯河的河水，这水与他须臾不离。"

我对他所带的这种备用水产生了兴趣。这水不但是烧开了的，而且还贮藏在银坛子里面（银子会让水变凉）并随车跟着他在大草原上行进；这是专供波斯国王居鲁士饮用的水，波斯国王

是不会饮用别的水的，如果缺水的话，他就会渴死。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还对别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即在这行进的大队人马中，实际上应该有两个国王，一个是掌管统治大权的居鲁士，而另一个则是被罢黜的克洛伊索斯，他昨天刚刚从火堆中死里逃生。前者也为他准备了路上喝的水吗？他们两个人相处得怎样？希罗多德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可是希罗多德本人那时并没有在这个行军队列中，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出生。居鲁士和克洛伊索斯是乘一辆马车并一起用餐吗？他们的马车都会有镀金的车轮，镀金的辕柱和镀金的把手吗？克洛伊索斯看见这些镀金的东西难道没有产生任何欲望吗？这两位男人在一起时会聊天儿吗？如果他们聊天儿那一定得通过翻译，因为他们都不懂得对方的语言。那他们在这日复一日的漫长的行军路上能聊些什么呢？早晚会有穷尽话题的时候。如果他们都沉默不语，那是出于保守秘密还是因为性格内向的缘故呢？

让我感兴趣的事是，一路上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比如说居鲁士想喝水时，他就一定会叫侍从给他拿水来。这些能在他身边为他运水的人一定得是他绝对信任的人。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发过誓，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偷喝这无价之水。那么现在居鲁士是一个人享用水，还是会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给你，你也喝点儿水吧！希罗多德在书中对此只字未提。但谁都知道，在沙漠中，没有水人就不可能存活，人一旦缺水就会加速死亡。

也许他们并不在一起用餐——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产生矛盾。也许克洛伊索斯也有贮藏水的专用坛子，但可能不会是什么特供的好水，肯定不会是科阿斯佩斯河的水吧？当然对此我

们也无从得知，因为我们如果再想看到希罗多德对克洛伊索斯的描写，那要等他描写到波斯大军抵达宽阔而平静的阿姆河时，克洛伊索斯的名字才会再次出现。

居鲁士看到他想娶托米丽斯的诡计未能得逞，便命令自己的大军开抵阿拉克塞斯河，公开表示要向玛撒该塔伊人大举进攻的意图。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在河上架桥，以便迅速渡过河去，同时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正当居鲁士的军队紧锣密鼓地做这一切时，托米丽斯派了一名使者到居鲁士这里来游说：

"请满足你和平治理你自己的王国吧！并希望你能容忍我们自己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当然我知道，你绝不肯听从我的忠告，因为你是一个讨厌安分守己、不愿与别人相安无事的人。如果你一定要与我们玛撒该塔伊人兵戎相见，我劝你，现在就不用费大力气去架桥了：请容许我们从阿拉克塞斯河向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你的军队渡河到我们的国度里来，但是，如果你一意孤行，要在你所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作战的话，那我也请你们退同样路程的道路吧。"

居鲁士听了这个建议之后，便召集了所有波斯领袖人物开会，并把托米丽斯派使者来说的事通告他们，这些人都赞同后退的建议并接受托米丽斯渡河过来，在波斯的土地上与她作战。此时克洛伊索斯对居鲁士说了一句具有哲理的话：

"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转动的，转动的车轮绝不会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

其实，这是克洛伊索斯向居鲁士发出的直接警告：不幸之事也同样会发生在居鲁士身上，待到那时一切就为时太晚了。因此，克洛伊索斯也建议居鲁士退到河岸，因为他听说，玛撒该塔伊人对波斯人使用的很多生活用具都从未见过，也从未尝过人

间的美味佳肴。因此，他建议，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一餐盛宴，用大量的羊肉做一餐美食，在酒杯里斟上醇美的酒，桌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的美味菜肴来诱惑他们。当他们看到如此之多的美酒佳肴，他们定会忘掉一切而尽情欢宴，那时我们就可以趁机把他们统统干掉，等到托米丽斯撤到河边，波斯帝国的军队就可以向玛撒该塔伊人大举进攻。

像每次大的战役开始之前一样，气氛都有些紧张。克洛伊索斯话一说完，波斯的马车队就开始撤退。居鲁士，他此时已经统治波斯有二十九年之久了，他已拥有丰富的经验，十分清楚这种决定对他是多么重要。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傲自负、目中无人了。此时，他在夜晚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白天的时候，他正在照顾儿子们的生活起居时，刚比西斯让他在克洛伊索斯的陪同下去波斯。他觉得这里好像有什么阴谋，对他不利。

军队集结完毕，士兵们士气高涨，大家只等他一声令下，在他的指挥下浴血奋战。此时，居鲁士按照克洛伊索斯的意见实施着自己的每一步计划。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是克洛伊索斯故意要把居鲁士引向歧途吗？是故意给他挖个陷阱，让他败北而以此来羞辱他，便达到报复的目的吗？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希罗多德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缄默。）

居鲁士把军队中最无用的那一部分人留在了营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些侍从马夫、残兵败将和老弱病残、游手好闲之人，都是些行将死亡的人；而自己却带着精锐部队返回到阿拉克塞斯河。玛撒该塔伊人果真先来进攻居鲁士留守的那部分军队中的残兵败将，并将这些人全部斩杀。玛撒该塔伊人在轻易地歼灭了这些敌人之后：

“看见在那里摆放的各种美味佳肴,就在那块营地开始大吃大喝。当他们酒足饭饱后,都倒在原地酣睡。此时,居鲁士按计划率领波斯军队杀回到这里,杀死了大部分玛撒该塔伊人,还俘虏了很多人,其中包括玛撒该塔伊人的统帅斯帕尔伽披赛斯,他是女王托米丽斯的儿子。”

当托米丽斯听到她的儿子和她的军队所遭遇的不幸时,她又派遣了一个使者到居鲁士那里去,对他说:

“把我的儿子送还给我,这样,你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离开我这块国土。三分之一的玛撒该塔伊人的军队已被你蹂躏,你应该知足了。你若不这样做,我将对着玛撒该塔伊人的主神——太阳起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定会叫你把血喝个够,而永不再想喝。”

居鲁士根本没有把托米丽斯的这番话放在心上。他仍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沉浸在他对托米丽斯报了一箭之仇的欢愉之中,就在这时,托米丽斯女王的儿子斯帕尔伽披塞斯酒醉后清醒过来,当他知道自己已身处绝境,无法逃身时,便请求居鲁士给他解开绑绳。绑绳被解开,斯帕尔伽披塞斯的双手刚刚获得自由的时候,他立刻自戕而死。

此后就发生了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

托米丽斯得知她的意见未被居鲁士接受后,便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结起来与居鲁士交战。希罗多德写道:

“这一场战争,根据我的判断,在夷人所曾进行的一切战争当中,确实可以说是最激烈的一次了。战争一开始,他们双方在对峙的情况下相互射箭,很快双方的箭全部射完,两支军队的士兵便展开白刃战,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搏杀。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后来玛撒该塔伊人占了上风。

波斯军队的大部分人都在肉搏中死亡。居鲁士本人也没逃脱战死的命运。”

这个场面完全像希腊悲剧中描写的那样，遍地都是双方惨死的军人尸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时，托米丽斯双手捧着皮囊，走上曾经发生血腥屠杀的战场。从一具具尸体的伤口中抽出血液，装满手中的皮囊。她用那沾着鲜血的双手抹擦着自己的脸颊，血流满面。

“她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寻找着，最终她发现了居鲁士的尸体，于是她把居鲁士的首级割下来放到她手里拿着的盛满鲜血的皮囊里去，在践踏居鲁士尸体时，她说：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在战斗中彻底击败了你，但由于你设奸计俘虏了我亲爱的儿子，那么，战败的则毋宁说是我了。然而我仍然想兑现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现在我把你的头用鲜血浸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

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居鲁士就这样惨死了。

这个舞台上空寂无人，只剩下一个悲痛欲绝、仇恨满腔的作为母亲的女王托米丽斯。

对此希罗多德没加任何评论，他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向希腊人介绍了几个不为希腊人熟知的有关玛撒该塔伊人的习俗：

“如果玛撒该塔伊人里有年迈之人的话，族人们便会全部集结在他的周围，然后把他杀死，并且用他的肉来烹饪美味佳肴，大张宴饮。此外，他的家畜也要和他一同被宰杀。玛撒该塔伊人认为，这乃是死者能享有的最高幸福。如果一个人因病而死，那么没有人会吃他的肉，他会被埋到地里，也就是说，他没能活到被宰杀的年纪，那么，玛撒该塔伊人认为，这才是一件不幸的事。”

# 诸神的由来

我把希罗多德的书暂时放回办公室的抽屉里，也把托米丽斯留在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她在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的同时，又万分绝望和悲痛。托米丽斯是亚洲草原上不屈不挠的和闪烁发光的安提戈涅。我又重新投入到阅读来自路透社、法新社，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发来的最新电传。这些电传说，越南的游击队在笼(Bing Long)又一次击退了 Ngo Dinh Diem 小股军队的进攻(没有报道具体伤亡人数)。毛泽东又宣布要开展一场新的运动，"百花齐放"的方针已经不再提了，他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指的是那些会读书会写文章的人(突然间这些人好像成了一种负担)，要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拿起锄头种地或者去开挖(灌溉农田用的)水渠，以便他们能摒弃自由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无产阶级农民的实际生活之中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是主张实施潘查希拉[①] 新政策的倡导人之一，他下令驱赶荷兰人离开印

① 潘查希拉本是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此处意指当时印尼政府的建国原则，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

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曾是荷兰殖民地。从这些短讯中我们所能获得的知识并不多，因为这里缺少对事情来龙去脉的介绍，我们权且把这种报道称为具有地区特色的报道吧。对我来说更容易想象，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在寒冷的冬天乘着敞篷卡车到某一地方去，尽管到了该到的地方，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具体到了哪里，那是由于天寒地冻，他们的眼镜都被蒙了一层浓浓的哈气。

事实就是如此。亚洲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此时，又有一位我的女同事给我抱来一大堆电传，她把这些新的电传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转身走了。此时，我却发现，我渐渐地将自己注意的焦点逐渐转向另一个大陆——非洲。那时的非洲跟亚洲一样，不十分安定，不断发生骚乱和反叛起义，政变和暴乱频仍。但是由于非洲离欧洲较近些（非洲和欧洲只有一水之隔——地中海），这里更容易直接听到从非洲大陆传来的轰鸣声，常常令人觉得这声音就发自身边不远的地方。

非洲曾在改变世界集权统治的历史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最近三个世纪以来，非洲在为新的世界提供自己的劳动力时，还帮助旧的世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并积累了实力。此后，非洲还把自己一代又一代最优秀、身强力壮和最能吃苦耐劳的人们输入欧洲，那时的欧洲大陆由于战乱人口骤减，而且被战争拖累得疲惫不堪，这一切又促使这块大陆变成了一个肆意掠夺别人财富的殖民统治者的大陆。现在非洲这块大陆从昏睡中觉醒了，他们鼓起勇气，要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

我的注意焦点之所以逐渐转向非洲大陆，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在亚洲的经历令我感到畏惧和惭愧。印度、中国和伟大草原文明对我来说，这块地域实在太广博了。为了解这块地域的皮毛，都将会耗尽我毕生的精力，更何谈要真正深入透彻了解

他们的深奥之处。

非洲对我来说是一个个碎片，容易区别和整理。从非洲的整体面积来看，也相对亚洲小一些，因而，我觉得，非洲似乎更容易了解、更容易去接近。

多少个世纪以来，有一种神秘的光环笼罩着非洲大陆，并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发现它——在非洲一定还会有某个地方，至今尚未被人类发现就已经消失了，那应该是在世界唯一深藏不露、曾经光辉灿烂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如今根本不再有可能去发现它。尽管这样，每个人仍旧雄心勃勃地想跃跃一试，试图去发现什么，试图去揭开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谜团。

希罗多德对这个问题也曾产生过极大的兴趣，他曾这样写道：我从库列涅当地人那里也听到过一些说法，即他们跟阿蒙人的国王埃铁阿尔科斯交谈[①]。埃铁阿尔科斯说：

“过去曾有一些纳撒蒙人到访过他的宫殿，而当他向他们提问，是否能提供一些关于在利比亚无人居住地区的基本情况时，他们就给埃铁阿尔科斯讲了下面一段故事。纳撒蒙人是利比亚的一个部落，他们居住在叙尔提斯和叙尔提斯东部的一块不大的地方。他们说，在他们中间曾有一些粗暴狂傲的少年，他们都是来自那领袖家庭的子弟。这些少年长大成人之后，不仅干了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用抽签的方法，从自己人中间选出五个人，派他们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试图考察一下，他们是否能真正深入到比他们的先人所曾到达过的最遥远的地带还远很多的地方去探查。利比亚北部的海岸，即从埃及一直到利比亚一端的索洛埃司岬的全部地带，在那里居住着许

① 阿蒙人居住在利比亚沙漠的锡瓦绿洲。

许多多来自不同部落的利比亚人；他们占据着这边的全部地带，当然属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某些部分不包括在内。

从利比亚海岸线和海边居民居住的地区一直往上走，便到了利比亚猛兽时常出没的地区了，那里是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地区，是彻头彻尾的荒漠之地。因此这些青年人说，也正是为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他们才被同伴们选派出来。出发前他们准备了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粮；起初他们只是在有人烟的地区旅行，穿过这一地区之后，他们便到了野兽经常出没的地区。最后，从那里他们进入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他们是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在沙漠中行进的。在一片广袤的沙漠地带艰苦跋涉了许多天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平原，在这片大平原上他们发现这里生长着一种树木。他们走到沙漠之树跟前，看到树上长有一种果子，于是便动手采集了这些果子。正当采集果子时，他们注意到，一些比普通人要矮小许多的侏儒向他们走来。这些侏儒把他们采集到的东西统统拿走了。纳撒蒙人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这些侏儒也听不懂纳撒蒙人说的话。于是，纳撒蒙人就跟着这些侏儒走，侏儒们带他们穿过了一大片沼泽地，最后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小城镇，那里的人都跟带他们到这儿来的侏儒一样矮，肤色也是黑黑的。一条大河流经这个城镇，水的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游弋着许多鳄鱼。”

上述这大段文字是我摘自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二卷，这段话足以证明，希罗多德肯定到过埃及。我们可以从本卷中几十页的大段描述中清楚地看到希腊人精湛的工艺技能。

那希罗多德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

可以肯定，希罗多德是一个造诣极高、无与伦比的记者，他出门远行、留心观察、与人聊天、聆听别人讲述故事。之后，他会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认真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认真记在脑子里。

那他是怎样出门远足旅行呢?如果他在陆地上旅行,那他一定得骑马、骑驴或骑骡子,当然,他也很可能经常徒步旅行。如果旅行中他遇到水路,那他必定得坐船。

他是一个人出门远行还是有奴隶随行?我们无从得知。在希罗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如果还算富有,就一定雇得起奴隶。奴隶那时负责背行李,提装水的葫芦、背食物袋和一切跟书写有关的物品袋子,袋子里一定会包括莎草纸卷儿、泥制黑板、笔、雕刻刀、墨水等物品。奴隶在当时就是旅行路途上的一个同伴儿。因为,那个时代环境极其艰苦,奴仆之间的等级不会过于明显。在旅行的路途上,主仆可以互相勉励,相互保护,奴隶还帮着打探路途等。我们也可以来试想一下,希罗多德肯定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追求和探索更多的知识方面,因为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大学者,他会去研究探索对别人来说既不切实际而又无用的那些知识,他肯定无心顾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杂事。因而他需要奴隶,他们在旅途中可以帮他照看那些他日常生活以及旅途中所需的一应俱全的东西。希罗多德与他的奴隶之间的关系,大致类似于堂·吉珂德和桑丘·潘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原型其实都来自于古希腊故事传说,后来才演变成了卡斯蒂利亚文化中的一对人物。

在旅途中除了雇用奴隶以外,他可能还得雇用向导和翻译。因此,可以推论,在希罗多德的旅行队伍中,除了他自己以外,至少还得有三个人陪伴他左右。在旅途中也还会不断有与他同路的人加入到他的旅行行列中来。

埃及的气候酷热难耐,所以出门的最好时光是在早上。因

此，旅行者们肯定凌晨就得起床，吃过早饭（面饼、无花果，羊奶奶酪和稀释了的葡萄酒等，他们会不慌不忙地细嚼慢咽，慢慢品味着好酒，其实伊斯兰人只是在最近的一千年里才戒酒的），然后他们才会上路旅行。

他们旅行的目的大致就是搜集一些与自己国家有关的最新消息，搜集有关民众生活习俗的资料，并且把新搜集来的资料与那些已经搜集来的资料再进行一下整理和对比。希罗多德对从人们那里听来的故事可能还不大满意，所以他还得自己检查一遍，把听来的东西再认真仔细加以归纳，经过一番对比整理以后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敢肯定，他去埃及旅游也是这样做的。他到埃及时，埃及的国王普撒美提科斯已经过一百五十多年了。希罗多德听说（也许他已经在希腊听说过），普撒美提科斯最爱提的问题就是：哪里的人才算是最古老的人？埃及人认为，他们自己要比其他一切民族都要古老许多。尽管普撒美提科斯是埃及人的国王，但他还是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于是他便命令一个牧羊人把两个新生婴儿带到荒无人烟的高山中去抚养，听听他们长到能会说话时，最先说出的是什么话，以此来证明，他们首先说出话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就能证明那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待这两个孩子长到两岁时，当他们饿了的时候，他们就大喊大叫："倍科斯(Bekos)！"而这个"倍科斯"的发音在普里吉亚语中的意思是"面包"。于是普撒美提科斯就宣布，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应该是普里吉亚人，在他们之后才有了埃及人，因此，这件事就这样被历史记录在案了。希罗多德对这个埃及国王普撒美提科斯十分感兴趣，他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是想以此证明，埃及国王才是真正懂得历史规律并不违背这一道理的人，谁要一心

只想抬高自己，那他必定会威信扫地。贪婪狂妄、争抢风头、骄傲自大的人，总有一天会遭到命运的惩罚。那些自命不凡，总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的人终究会被最先斩首。普撒美提科斯为避免发生给埃及人带来不安全的危险事情，就把埃及人的位置摆在了普里吉亚人之后，他曾对埃及人说：普里吉亚人在前，而我们在后。

“我在跟孟菲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们谈话时，还听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为证明这一切，我曾到过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就是想去那边专门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一切是否与孟菲斯的祭司们所讲的一切相吻合。因此，我出门旅行，我要去考证一下，我要试着把这些问题弄得水落石出。”

他认真聆听埃及人给他讲述故事，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整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这样评论道：

“我也认为祭司们所讲述的有关他们国家的事情是有一定道理的。”

希罗多德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很多人都喜欢到他的书中来找有关答案。

希罗多德十分着迷于尼罗河，他认为这条河是一条巨大而又神秘的河。

“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河水来自哪里？河水把给他们国家的土地带来肥料的淤泥冲到何处去？至于尼罗河的水源情况，所有与我谈过话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者希腊人都没有给我讲述过有关事情。”

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我来到了上埃及，也就是到了埃烈旁提涅：

“由于我亲身上行一直到达了埃烈旁提涅区考察，并且对于从那里再向上的地区的资料根据传闻来加以探讨和总结；结果我所了解到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从埃烈旁提涅上行的时候，大地就渐渐升高了。因此，人们就需要在河的这一边，就像人用绳子拉牛一样，在船的两边系上一根绳索，这样就可以溯河而行。如果绳子断了，船就会被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游。在这样的河道上航行需要持续四天，尼罗河的这段地域与迈安德罗司河一样蜿蜒曲折。在这样的河道上航行还需要走上两个月，才能到达尼罗河上游。尼罗河所流经的一座大城市叫美洛埃。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再知道尼罗河流向哪里了，因为那个地方天气炎热，酷暑难当。”

这段讲述之后，希罗多德撇开尼罗河，撇开探寻尼罗河源头之谜，撇开探讨尼罗河水涨水落的话题。希罗多德开始认真研究埃及人，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和习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埃及人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与其他所有民族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

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在埃及，在市场上做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负责在家里纺织……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但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埃及人在露天的大街上吃东西，但却在自己家里大小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凡是不体面之事，但又是不得不做之事，那就应当在隐秘之处做，如果不是什么不体面之事，则应当公开去做。妇女永远不能担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但男子则可以担任。除非是出于自愿，男子不承担抚养双亲的义务，但是女子无论她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她们必须承担起抚养双亲的责任和义务。在别的国家，诸神的祭司都蓄留长发，但在埃及，他们则得剃去长发。根据别地之风俗，对死者表示哀悼时，死者最亲近的人都得剃去长发，但在埃及，人们在别的时候剃发，而当他们的亲人死亡时，他们反而把须发蓄得长长的。其他民族，一生都是和畜类分开居住的，而在埃及人们却总是和畜类一起过活。”

希罗多德还写了许许多多关于埃及人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埃及人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对外来人来说，感到震惊和惊讶。希罗多德说，你们看，埃及人和我们——希腊人之间的差别居然如此迥异。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能和睦相处(因为埃及当时是希腊的殖民地，可当地百姓之间却能友好相处)。是啊！希罗多德从未就我们人类中存在的多样性表示过惊讶，更从未责备过这种人类间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相反，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努力去探寻了解这种多样性，想方设法去理解和书写这种人类间存在的多样性。这些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这种多样性代表的是完整协调的统一性，代表的是生命力和价值。

希罗多德总是充满激情地去思考一切，这几乎使他走火入魔。他的这种激情表现是：常常指责他的同胞爱慕虚荣、高傲自大，指责他们自恃高人一等(其实这个词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barbarian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就是不可思议的、头脑混乱的、什么都不懂得的人，也就是说低下的人，劣等的野蛮人)。后来希腊人在被其他欧洲人同化的同时，又把目中无人的恶习传给了他们，这令希罗多德十分不齿，希罗多德为之付出了极大努力与这些恶习抗争。为此，希罗多德离开了希腊，他去埃及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在那儿继续搜

集资料并为自己所提出的哲学观点：即人要谦虚谨慎、要有健康的理智去寻找有力的证据。

他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超验的问题：

——希腊人从何选择了自己的诸神？诸神又源自何方？

——希腊人反驳说，你问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居然敢问诸神来自何方？——他们亘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神！

——哦，不是吧！希罗多德讽喻道——几乎我们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难道不是吗？！

对希罗多德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因为那时在世界上还没诞生任何大众传媒，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听到或者看到他的有关论点。如果他的论点能广泛传播开来的话，希腊这个国家马上就会被解散或者被烧成灰烬！希罗多德所在的那个世界处在一个还不知媒体为何物的时代，可以大胆地说：

“希腊人举行祭拜集会和组织各类宗教活动的仪式，最初的形式都是从埃及人那儿学来的。关于希腊人的英雄海拉克列斯，这个名字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而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攫取来的。关于这件事我可以给出许许多多论据，而在这些众多的论据中，尤其可以论证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海拉克列斯的双亲，阿姆披特利昂和阿尔克美涅都出身于埃及……海拉克列斯实际上是埃及人的一位古老的神。他们说，在阿玛西斯当政之前一万七千年，便由八个神变成十二个神，而这十二个神当中的一位就是海拉克列斯。况且，为论证这件事，尽管我已从某些方面获得了确切的资料，但我还是亲自去了腓尼基的推罗，为此还专门做了一次海上旅行，因为我听说，在那里有一座深受人们尊崇的神殿，叫海拉克列斯神殿。我专程去拜访了这座神殿，发现那里陈设着许多贵重的奉纳品。在我和

那里的祭司们谈话时，我问他们，这座神殿到底修建了多长时间；从他们的回答中，我发现他们的说法和希腊人的说法有所不同。”

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特点，就是他们各自的世俗主义主张。换句话说——就是排除神圣化和与此相关的庄严隆重的语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神并不是高不可攀、法力无边、超自然的冥冥之中的力量。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实事求是的，究竟是谁创造了神：希腊人还是埃及人？

#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

希罗多德与他同胞们的分歧，并不涉及到神灵的存在与否（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些至高无上的神明的存在，我们的希腊人就不可想象），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到的是，谁先从谁那儿借用了神灵、诸神名字的来历和对神的想象。希腊人认为，希腊人的神是源自他们本土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源于他们的故土，但是希罗多德欲力图证明，所有的众神庙，至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希腊人从埃及那儿借来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希腊神庙的大部分是从埃及传来的这一观点，希罗多德找到了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论点：即时间（顺序、时间、重要程度等）的居前和时代的论点。换句话说，谁的文化更古老？希腊的还是埃及的？然后他马上回答道：

"海尔泰欧斯这位历史学家，曾有一次到过底比斯，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曾有过血统关系。宙斯的祭司们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如出一辙，但我并没有回溯自己的身世。他们把我领到神殿中的一个巨大的内庭里，在那儿他们只给我看了诸神木雕像……总计有三百四十五尊像。"（我要

对这一点做个解释，海尔泰欧斯是希腊人，但是神殿的雕像却都是埃及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处于同时代的人。）

请大家再来看看，希罗多德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我们希腊人的先祖仅仅可以追溯到十五代以前，而埃及人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三百四十五代以前，是谁从谁那儿引进了神，这显然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难道诸神不是我们从远远古老于我们的埃及人那儿借来的吗？与此同时，这也非常清楚地向我的同胞们表明，是历史时间的间隔把我们分成了两个民族。然后他又不厌其烦地详尽解释说：实际上，人类的三百代，就意味着一万年，因为人类的三代人就是一百年。他引用埃及祭司的话说，在这一时代，还未出现任何具有人形的新的神灵形象。为此，希罗多德最后断言说，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是属于我们的诸神，其实在早于我们一万年前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如果我们认为，希罗多德言之有理，即不仅是希腊诸神，而且整个希腊文化（欧洲）都来自埃及（非洲）的话，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文化具有非欧洲根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但至今各方仍各执已见，其中包含了很多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

现在，在我们还没跨越危险的雷池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在希罗多德的世界里，是多种文化和多种文明并存的，而且这些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都十分明显；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些事实，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种文明之间虽互为冲突，但与此同时，在各种文明之间也存在着互为交流、互为借鉴、互为补充的内涵。此外，尽管在有些文明之间曾发生过冲突，而如今他们已经相互融合，当然，谁都不敢说，在这些已经相互融合了的文明之间明天是否还会发生新的冲突。总而言之，

对希罗多德来说，世界文化的多元融合是充满活力的，可以引起一连串的悸动，在这种悸动中，不可能保持恒久不变的特点，还会不断变化、时盛时衰，同时又能创建出一种新型关系和新的环境。

直到1960年我才第一次看见尼罗河。那是在一个夜晚，我所乘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此时从高空中我所见到的尼罗河呈暗黑色，河水反光闪耀，目力所及的地方河水蜿蜿蜒蜒、波光粼粼，夜晚的街灯在尼罗河水的映衬之下，犹如戴上了一个大大的花环。从高空中我还看见有一个莲花座形状的、硕大明亮的、闪烁着强光的大灯照亮了广场和车水马龙的城市。

那时，开罗已经是第三世界国家解放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今后都有可能成为明天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的统帅。这里是来自非洲和亚洲为反抗殖民主义而建立的各种政党的聚集地。开罗同时还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的首都，这个联盟成立于两年前，当时埃及的总统叫纳赛尔，是位上校，年仅四十二岁。外表上一眼即可看出，他是一位身材魁梧、具有大将风度并具有凝聚力的领袖人物。1952年，当纳赛尔只有三十四岁时，他便率领埃及军队推翻了法鲁克一世国王[①]。而他自己在四年之后，成了埃及首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与国内两个强大的反对派进行斡旋和斗争，一边是埃及的共产党与他抗争，一边是穆斯林兄弟组织与他抗争，这个穆斯林兄弟组织是由基地组织中的反对派组织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两部分组成，为与

① 法鲁克一世（1920—1965），1936—1952年为埃及国王。1952年7月，被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政变推翻。

这两股力量抗衡，纳赛尔维持着强大的警察队伍。

到达开罗的第二天，我一大清早就起床，因为我知道从饭店到市区很远。我住的饭店位于开罗的扎马拉克区，相对开罗的其他区域来说这是一个富人居住区。这个区最早是专为外国人建的住宅区，当然现在什么人都可以住在这里。我心里清楚，在我住的那家饭店，我一旦离开房间，就会有人翻看我的行李箱，于是我决定，我得把喝完的捷克别尔森牌啤酒的空瓶子拿出去扔了（当时的纳赛尔，这位狂热的穆斯林，正在组织开展反酗酒运动）。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有一只空啤酒瓶，我把它装进一只灰色的纸袋中，然后带着它走出了饭店。尽管还是清晨，但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闷热了。

我看见了一个垃圾桶，想把空瓶扔进去。可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保安坐在我刚刚走出来的大门口的板凳上，他的眼睛紧盯着我看。哦，不行，有人在盯着我，我想，我不能把这只空啤酒瓶扔进他跟前的那个垃圾桶中。因为，他很可能会去检查那个垃圾桶，然后找到我扔的这只空瓶子，再去报告警察。我又往远处走了几步，发现那儿有一个空纸箱子，于是我就想赶快把这只空瓶子扔到空纸箱里去。忽然，我又看见，在不远处有两个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的人，他们站在那儿聊天，但却用眼睛不时地打量着我。当然，我也不能把瓶子扔到他们身旁的箱子里去，况且，这只是一个纸箱子，也不是垃圾桶。我疾步再往前走，又看到了一个垃圾箱，那时我已经注意到，就在离垃圾桶不远的一座楼前的大门口，坐着一个阿拉伯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噢，不行，不行，我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去冒这个险，他们都用十分警觉的眼光看着我。我只好一直提着那个装着空瓶子的纸袋，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

当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一位警察，手里抡着一根木棒，吹着哨子，站在马路中央。可在路的另一边，我看见那里坐着一个人，他也紧紧地盯着我看。后来我才注意到，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他用那只眼睛紧盯着我看，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我开始有点儿害怕起来，怕他突然命令我掏出袋子中的东西给他看看。于是我只好加快脚步，想尽快摆脱他的视线，在他眼前消失。我快步走着，心中一阵窃喜，因为我又看见前方有一个垃圾桶。遗憾的是，在垃圾桶的不远处，在一棵矮小的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人，他虽然懒散地坐在那里，可目光却紧紧追随着我。

我终于走到了一条街的拐弯处，我发现，跟刚才的情形一样，那儿也有人盯着我。这只空啤酒瓶简直成了我的累赘，无法扔掉。因为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到处都有眼睛盯着我。马路上车来车往，还有载满货物的驴车，我看见一群骆驼，僵硬地、木头似的穿过马路。这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当然除了我之外。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视线的监督范围之内。那些人或站或坐（多数是坐着），或来回走动，或看似聊天，但他们的眼光都不离我左右，盯着我做什么。这样就令我心里越发紧张，心揪得更紧。我越是紧张，手心就越出汗，结果汗水把纸袋的手提把都弄湿了，我十分担心瓶子会从袋子里滑到马路上，这样就更会引起人们对我的警觉。我真觉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只好返回到饭店，把这只空啤酒瓶子暂时藏回行李箱中。

晚上，我又带着这只空啤酒瓶子上街了。夜晚，马路上的人比白天少多了，我终于有机会把瓶子扔进垃圾箱了。做完这件事后，我舒了口气，轻松地回到房间，一上床倒头就睡着了。

后来，我到了开罗城中心，独自闲逛着。我仔细地环视着城

市的大街小巷。我发现到处都有耳目，随处可见盯梢。所到之处，不是这里有一个巡视员，就是那里有一个门卫，或者还有一个一动不动、僵直地躺在座椅上的人，远处还有一个什么人，总之，他们都是那样无所事事地或站或坐在一个地方，可眼睛却在不停地警惕地搜寻着什么。

在这里，大多数人都显得无所事事，人们都站在某一个地方，互相交换着眼神，犹如在大街小巷里布下的天罗地网，没有任何一点事情可以逃脱他们的注意力。一旦有任何动静，他们就可以立即上报。

这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如何忠于职守。对当局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大成本维持庞大的警察队伍和军队。一个发达稳定、合理有序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明确法律规定和明确分工的社会。但是，对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具备话语权。

在整个开罗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开罗的城市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街道和整体建筑都显得比较混乱，令人觉得缺乏方向感，居民点和各种建筑目标都不是很清楚。可一旦马路上发生什么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聚拢观望。此时，每个人都会发表一通自己的观点，各持己见。此外，人们也有充裕的时间，每个人都喜欢在拥挤的人群之间挤来挤去，力求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说一通谁也不会认真听的话。事实上，没有人会对他们所谈论的内容感兴趣，也没有去听众说纷纭之词的必要。

但是所有独裁统治政权都会非常充分地利用这种混乱状况。因为这不需要付出昂贵的维持警察和军队的费用。只是在这些混乱的人中，找出一两个想混饭吃的人，让他们意识到，他

们是可资利用的人才，他们今后可以有依靠有饭吃，只要能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机会能在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和才智。

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双方的。这些整天在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能为政权效力，无形中会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被提高了，他们自视为政权的一部分，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十分重要，为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社会中尽其所能，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一些街头惯偷，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人，或者是江湖骗子。可现在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他们摇身一变，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让独裁当局刮目相看，他们是一批可为之利用的人。为此，独裁政权，不仅可以拥有廉价的、几乎是无任何成本的劳动力，同时，这样一批人还会成为热衷于为政权忠心耿耿效力的人，因此他们的触角无所不在。有时很难说清楚他们伸出触角的目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一丝不苟按照当局意图办事，竭力想成为令人永志难忘、不被别人忽视、忠心耿耿地为当局效力的乌合之众。

有一次，我刚走出饭店大门，来到马路上，这些乌合之众当中的一个人(我猜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他一直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肯定有自己分管的地段)挡住了我的去路，对我说，他想带我去看一个古老的清真寺。我生来就是一个没有疑心的人，因为，我一直坚信，一个整天疑神疑鬼的人，不可能成为明智之人，我也坚持认为，整天怀疑别人的人一定会有严重的人格缺陷。而我此次经历也再次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所认为的这个所谓的密探，他没说要带我去警察局，而是说要带我去看古老的清真寺，这让我对他一开始就不曾戒备，甚至我还暗暗感到庆幸。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他，让他给我带路。

一开始他对我彬彬有礼。他上身穿了一件西装,英语说得还不错。他告诉我,我可以直呼其名,叫他阿赫迈德。我告诉他,我叫雷沙德,他也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因为,对他来说,直呼我的名字更容易些。

我们步行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来又坐了很久的公共汽车,之后,到了一个古老的街区。那里街道十分狭窄,到处是十分拥挤的小巷,随处可见一些低矮窄小简陋的房屋。穿过这些破房子,我们拐进了一条死胡同,眼前只能看到窄小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一堵堵摇摇欲坠的棕灰色的砖墙。他带我勉强钻过了一个又小又窄的过道,那里有一堵泥砌的、棕灰色的墙,在这堵墙后面露出一个镀锡铁皮制的瓦楞板的房顶。如果没有人带着你,即便你进得来,那也一定走不出去。我们每走几步,就能在每堵墙边看见一个个小门,而每道门都是紧闭着的,门上还上着铁锁。在这儿可真是难得见到什么人啊!尽管这样,也能不时看见蒙着头巾的妇女急匆匆走过的身影,有时也能遇见一大群孩子,也不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大叫大喊着"阿赫迈德!"的名字,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厚重的生锈的大铁门前,阿赫迈德轻轻地拍了拍门板,里面传出了拖鞋走路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接着听到的是大门铁锁开启时刺耳的摩擦声。开门的是这里的看门人,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只见他开了门后,就跟阿赫迈德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就带我们走过了一条窄小的、与外面完全隔绝的院子,来到了一个通往清真寺塔尖的门栏前,这个门凹陷低于地面,是敞开着的,他们两个人都推脱让我先进去。里面很暗,灰蒙蒙的。但是沿着墙体还可以朦朦胧胧地看见通向清真寺塔尖的弯弯曲曲的窄小台阶,它让我联想起工厂的大烟

囱。你若抬头一直往上看，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在那远处高高的地方，闪现出一丝亮光。从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一直往上看，似乎可以看见，在那远远的高处好像有一点闪烁着忽隐忽现的淡淡的白色星光，其实那是天空。

“我们上去吧！”阿赫迈德用一种似乎是鼓励又是命令的口吻说。

之前他曾告诉我，从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塔尖上可以看见整个开罗的全貌。

“景色绝顶美！”他向我保证说！

于是我们就开始沿着窄小的阶梯在灰暗朦胧之中向上爬。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比较艰难。因为，台阶不但十分狭窄，而且脚下还时不时打滑，更困难的是，阶梯两边没有任何可抓的栏杆或者扶手、绳索之类的东西。

哎呀，无可奈何，但绝不能后悔！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我们不停地爬呀，爬呀！

此时，最需注意的一点是，眼睛千万别往下看。当然，既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上看，要十分专注地只看自己眼前，也就是脚下。因为，目力所及的地方也只有脚下的台阶。同时，注意力要千万集中，切忌胡思乱想，因为如果此时分心，精力稍有涣散，那么恐惧感就会顷刻袭来。这个时候，要是会某种瑜伽功那该多好啊！比如说会练什么熄灭生命之火或者什么特殊的密宗功之类。总之，让人练就一种功法，在此时此刻生出一种无限的超然本能，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也就感受不到生命的存在。

哎呀，怎么办！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上爬！

不停地爬呀、爬呀，不停地往上爬！

这里的空间既幽暗又狭窄，脚下的台阶陡峭而又弯曲。

如果这个清真寺对外开放的话，那么宣礼员每天就得爬上塔尖五次，在那儿呼唤信徒们来祈祷。

呼唤人们来祈祷的方式是用一种唱腔连续发出声音，有时这种声音十分悦耳，有时这种声音略显高昂但刺耳，总之，宣礼员发出的声音，令人感到十分夸张。

我们越往上爬，我就越觉得这个清真寺非常古老，肯定是许久都没有人爬上来过了。也许，这个清真寺多年来早已被人们遗忘。因为，这里随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尘气味。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因为精疲力竭，还是因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我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疲惫不堪。我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可阿赫迈德却在我身后不停地催我快往上爬。

好，那就快爬，快爬吧！要不是因为他在我后面堵住了我的退路，我早就转身回去了。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无后路可退。因为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人根本无法转身，也没办法闪身让后面的人先上，因为稍有闪失，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上爬。我暗暗鼓励着自己，心中念叨着别停，继续往上爬！

我们爬呀爬，不停地往上爬！

我们已经爬得很高了，再沿着这些没有任何护栏和扶手的窄小台阶继续往上爬已经十分危险了。我们当中哪个人，一旦动作稍有不慎，两个人就会同时滚落下去。我们俩心照不宣地继续往上爬，我们都非常清楚，只要一个人失误，另一个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突然，这种平等的利害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当然是变得对我十分不利。在这些台阶的尽头，也就是当我们爬到了清真寺

塔尖的顶部时，塔尖上是给穆安津[①]留出的一块窄小的顶部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上，四周都会有金属围栏或者木制围杆拦着。在这儿也能依稀分辨出四周曾经有过金属围杆的痕迹，但因年久无人来过，这些铁围栏早已锈烂脱落了。因此在这块十分窄小、只可能勉强站下一个人的高空中，可以说是完全无遮无拦了。阿赫迈德轻轻地向外推了我一下，而他自己却安全地倚靠在我对面的墙边上，厉声对我说：

"快把你的钱掏出来，给我！"

我的钱包就在我的裤兜里，站在这个地方，我早已心惊肉跳，甚至我觉得，只要我动一下，就有可能立刻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阿赫迈德发现我有点犹豫，就又厉声喝道：

"快把你的钱包掏出来，给我！"

我仰望天空，为的是避免往下看。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放进了裤子口袋，十分缓慢地把钱包掏出来，递给他。他二话没说，从我手中抽走钱包，转身就往下跑。

此时，对我来说最艰难的是，我要从这块高高的无遮无拦的窄小平台上，艰难地小心翼翼地一寸一寸地把身子挪向通往台阶的地方，尽管我离台阶只有一米之遥。我好不容易费力地心惊胆战地挪到了台阶旁，但还得饱受往下爬的煎熬。此时我的两腿好像已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了，根本不听使唤，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好像中风患者，软弱无力，重重地牢牢地被钉在了地上。

看门人给我打开了厚重的大门，放我出来。一帮孩子跑到我身边，他们真的比导游还熟悉这里的地形，送我到了出租

---

① 即宣礼员。

车上。

此后，我仍旧在扎马莱克饭店住了几天，每天还是沿老路进城。每天都能见到阿赫迈德，他还是站在以前他站的地方，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每次他看到我，都面无表情，好像从未见过我。每当我看见他时，也学着他的样子，面无表情，装作若无其事，也好像从来没见过他。

# 阿姆斯特朗音乐会

1960 年　喀土穆，阿巴

我一出喀土穆机场，就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对出租司机说，去维多利亚饭店。司机二话没说，就径直飞车把我拉到了一个叫“皇冠”的饭店。

“他们历来就是这样！”一位利比亚人告诉我说。

“如果是白人来到苏丹，他们就认为，肯定是英国人，如果是英国人来了，就给他们送到皇冠饭店去。”不过也还好，这里是人们聚会的地方，所有的人，到了晚上，都来到这个饭店，相聚在一起。

到了地方后，这位出租车司机，一只手从汽车的后备箱拿出我的行李，另一只手给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似乎是告诉我，这里的景色很美，并自豪地说——蓝色的尼罗河！我看了一眼下面涓涓流淌着的河水，河水的颜色是翠绿色的，河面很宽，水流湍急。饭店的大平台又长又背阴，好像要伸进尼罗河。在河的旁边，开出了一条林荫大道，大道两旁生长着古老的、枝叶茂盛

的无花果树。

办好一切手续，饭店的行李员把我送到了一个房间，吊在天花板上的一个大电扇呼呼地响着，可是电扇的叶片却没有转动，这个电扇只是在那儿无用地搅动着宛如蒸腾的开水一样的空气。

这儿好热呀！我在想，于是我决定先进城里去看看。其实我也没想清楚，我进城去做什么。我离开饭店刚走出几百米远，就意识到，我上当了！空气中散发出来的热气，烤得我脚下的柏油路滚烫，我立即感到头昏眼花，喘气都十分困难。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往前走了。与此同时，我感觉，我也已经无力再走回饭店了。我心中开始慌乱起来，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马上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这毒辣的太阳一定会把我灼死烤化的。我惊慌地四下看了看，目力所及的四周根本不见任何人影。在马路上只有一个活的生灵，那就是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死一般的寂静，每幢房子的百叶窗都是紧紧关闭的，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不但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就连一个小小的动物也见不着。

上帝呀，我该怎么办?

狠毒的太阳灼烤得我头痛欲裂，就像铁匠用锤子在拼命地敲击我的脑袋。回饭店吧，太远了！不回去吧，四周又不见建筑物、过道、凉棚，找不到任何可躲避的地方。我突然发现，近处有一棵小芒果树，于是我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钻到了那棵小树的下面。

在这棵小树下面，我静静地躺在地上，把身子藏在了树荫下。此时此刻，这点可怜的树荫，简直就像一种无形资产，躲在这树荫下我的身体，就好像干渴的嘴唇上沾了一滴水，立刻令人感到浑身轻松，犹如久旱逢甘雨，解了渴。

到了下午，影子慢慢变长了些，在一点一点变大，开始重叠，然后逐渐变暗，此时天空也渐渐变成了火红色——夜幕降临了。人们开始活跃起来，愉快地回到了现实之中。人们兴奋地交谈着，好像刚刚躲过了一场灾难，熬过了度日如年的地狱生活。

城里又恢复了往日正常的生活。马路上开始能看见汽车奔跑，商店和酒吧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意。

我在喀土穆要等两位捷克记者，我们相约一起去刚果。那时的刚果正经历着严重的内战。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按计划，这两位记者早该从开罗到这里了，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他们。白天由于天气的原因，我无法进城，可也不能呆在饭店里，因为那里能把人热死。饭店阴凉的平台上也不能久呆，因为，你即便想在那儿呆上一小会儿，也会有人不停地来打扰你，问你是哪国人？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这儿？是做生意吗？是来开垦农场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要去哪儿？是一个人旅行吗？你成家了吗？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在做什么？是否喜欢苏丹？喀土穆怎样？尼罗河呢，漂亮吗？你住哪个饭店？几号房间？

他们的问题没完没了。第一天我都礼貌地一一作答了。这些人是出于好奇心提这些问题，甚或这是当地人的习惯？也许来问话的人都是些警察，总之最好与这些人相安无事，别得罪他们。可是提问题的人，也不总是这几个。第二天来的又是另外一拨人，他们的问题总是千篇一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这些人很像是在体育运动中跑接力赛的人，不厌其烦，不停地传递他们手中的接力棒。

但是，我注意到，其中有两个人，总是一起来一起走，而且到这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们两个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在这

儿，大学生们正在放长假，因为苏丹是军人政府掌权，总统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下令关闭了学校——因为他认为，学校是从事叛乱活动的窝点。

有一天，这两个年轻人，在警惕地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之后，凑到我跟前，劝我买他们手中的大麻，说他们急需钱，还说要带我进城，并带我去看沙漠。

面对这种情况，我该如何是好？

我从未吸过大麻之类的东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他们就不顾忌别人怎么看待他们？如果他们是警察的话，他们是否会以此为借口先把我抓起来，然后敲诈或者干脆把我驱逐出境？难道这将会是我此行要遭遇到的惊人的事吗？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出什么事，所以我只好买下了他们的大麻，付给他们钱。

前一天晚上，他们开来的是一辆破旧的英国制造的类似吉普车的多用途越野车，那辆车只有一个车灯，但车灯却好像防空探照灯一样亮。这灯光的光柱能穿透热带的黑暗，好似也能穿透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黑墙。这堵墙似乎马上就要坍塌，好给这辆车让开一条通道，在车开过去之后，这堵墙还会自动关闭。可是在这里所有道路上那些可怕的坑坑洞洞，给人的印象是，一旦车行走到那里，这些坑洞会让车陷入其中，再无法前行。

我们开车走了近一个小时，柏油路上坑坑洼洼，可现在，连这样的柏油路也没有了，我们走上了一条沙路，车从上边开过，卷起漫天沙尘，路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仿佛表面浇铸有青铜的巨大岩石。

我们的车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猛然拐了一下，又往前开了一会儿，司机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前面是悬崖峭壁，悬崖之下是

月光映照的、泛着银光的尼罗河。这景色美得令人陶醉,此时的沙漠、河流、月光代表了整个世界。

在这里,我看见一位苏丹人,他从包里掏出带着白马商标的一个扁平瓶子,盖子已经被开封,然后他把瓶子递给人们,让每个人都喝上几口,之后又小心翼翼地从包中掏出两块厚厚的好像是肉饼似的东西,一块递给了我的朋友,另一块给了我。在微弱的火柴亮光的映照下,我忽然发现,在黑暗中,他用那两只仿佛镶嵌在幽暗脸庞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光背后好像暗藏着什么。

哦,也许他给我下了什么毒药?就在我这样想的瞬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控制,我怀疑自己是在冥冥中幻想。他给我的是毒药?还是我已经不能自控?总之我忽然觉得,我已经进入了另一种境界。我有一种失重感,浑身轻飘飘的。在我的眼前,一切都飘忽不定,而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是温柔的、松软的,犹如漂浮在波浪起伏的海水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在轻轻地摇曳着,又都静止不动,这里没有猛烈旋转的动作,一切是如此安宁祥和,好像在被轻柔地抚摸,宛如在梦幻中。

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那种失重感。这失重感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宇航员在机舱中那种笨拙的、不灵巧的难以平衡的动作,而是一种灵巧而轻柔,似乎还可控制在意识范围之内的失重感。

我自己也记不得,我是怎样腾空翱翔的。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一点,那就是,我好像遨游在无限的宇宙之中,飘游在看似明亮而又黯淡的天国中,在这个天国中,有很多很多色彩斑斓的圆圈,这些美妙的圆圈不停地填充着整个空间,好像孩子们玩儿的呼啦圈,在身边轻盈地随着我旋转。

在这种感觉之中,最令我兴奋的是,我浑身轻飘飘的,那种

感觉飘忽不定，好像使人离开了地球的引力，完全摆脱了平时那种身体沉重的感觉，摆脱了一切来自身体的阻力，摆脱了地球引力的驾驭。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某些非同寻常的时刻，你的身体不再是你的敌人或者对手，它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我又看见了我眼前这辆破旧的越野敞篷车。我用余光看见了我旁边还有一个被打碎了的汽车侧视镜。我眼前的景色呈现出一种刺眼的粉色。沙漠中的沙砾则是土灰色的。黎明之前，尼罗河水是淡淡的蓝色。我坐在破旧的敞篷车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打战。清晨沙漠中的寒冷与西伯利亚的寒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寒冷让人感觉刺骨透凉。

在我们返城的途中，太阳升起来了，天立即变得暖和起来。我头疼得厉害，那时我只想一件事，就是睡觉、睡觉、睡觉，只想睡觉。我浑身没劲儿，头昏沉沉的，一点也不想动，仿佛失去了生存能力，也失去了生命力。

过了两天，那两位苏丹人又来到了我住的饭店，问我感觉如何？哦，朋友啊，我又能有何感觉呢？对，我们想知道你感觉如何，因为，明天阿姆斯特朗要来这儿，他要在体育场开办个人音乐演唱会。

一听这个消息，我立刻来了精神。

这个体育场离城区很远，尽管不太大，但很平整，大约能容下五千多名观众。但是音乐会开始后，体育场里只坐了一半的观众。体育场中间架出了一个矮矮的舞台，灯光很暗。我们坐的地方离舞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乐队。那晚的天气仍旧又闷又热，阿姆斯特朗上台的时候，浑身已被汗湿透。他上身穿了件西装，打了一个蝴蝶形领结。他双手高举，走上舞台，频频向大家致意，手里还拿着一个金色的小号。他走

近那个廉价的、时不时发出刺耳声音的麦克风，轻轻地调整了一下，然后说，他十分高兴并且十分荣幸能来喀土穆举办个人演唱会，说着，他的脸上绽放出一种充满自信、轻松、颇具感染力的笑容。通常他那具有感染力的微笑能激起全体育场观众的笑声。可是，在这个体育场里的观众却没有笑，他们好像十分冷漠，没有任何互动，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他的微笑吧。此时司鼓和低音号奏响了，阿姆斯特朗唱起了一首非常悦耳的歌——《南方沉睡的时光》，我很难说清楚，阿姆斯特朗的歌声是什么时候响起来的，在他的声音中，有一种令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一放开歌喉，就会令每个人都确信，对，这就是他，Satchimo（他的别名）。

对，这就是他，Satchimo！接着他唱了一首《你好，动人的姑娘，我就是路易斯，我的好姑娘》，他还唱了《世界多美好》、《月亮河》、《当我亲吻你的嘴唇时，我浑身犹如触电一般，这是令我魂牵梦萦的嘴唇》。他唱得十分动情，可是观众们还是默默地坐在那儿，无动于衷，没有掌声。难道他们听不懂他的唱词吗？他所唱的歌词，对于穆斯林来说，是否过于直白、过于色情呢？

他每唱完一首歌，甚至在他唱歌的时候，总是时不时掏出一条雪白的大手绢，不停地擦着额头上淌下的汗水。为了来非洲举办个人演唱会，他专门去买了很多手绢。后来我发现，他带来的手绢至少有几十条。

音乐会后，人们迅速地散去了，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我为今晚观众的表现感到十分震惊。我听说，无论阿姆斯特朗在哪儿举办个人演唱会，人们都热情高涨，他的音乐令人发狂，令人如痴如醉！可在喀土穆体育场举办的这场个人演唱会，根本就没出现这种场面，尽管他充满激情地演唱了一首又一首

来自南美洲、来自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的非洲奴隶的歌，因为他自己就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但是，美国的非洲裔人和这里的非洲人，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所以在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缺乏相互的理解，很难创建一个共同体。听完演唱会，那两个苏丹人把我送回饭店，我们坐在饭店外面的大阳台上喝着柠檬水。不一会儿，有一辆汽车把阿姆斯特朗也送回饭店。他走到我们附近的一个桌子旁，瘫坐在椅子上。他是一个身材矮胖、粗壮、肩膀很宽但是溜肩的男子。这时，饭店的服务员给他端来了一杯橙汁，他一口气喝完，然后接连又要了几杯，大口大口地喝着，他十分疲惫地坐在那儿，低垂着头，沉默不语。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患了严重的心脏病。阿姆斯特朗在演唱会上和演唱会后简直判若两人。在演唱会上的他，欢快陶醉、情绪高昂、激情澎湃。他的声音沙哑中带着洪亮，像他的小号一样响彻整个体育场。而演唱会后的他，满脸皱纹、面容呆滞、身体疲惫、虚弱无力、脸色黯淡。

如果有人想要离开喀土穆这块安全的屏蔽向沙漠进军，那一定要牢记，等待他的是危险的圈套。在沙漠中，风沙时常变化着地貌的景色，变换着风向标，旅行者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反复无常的气候变化中会迷失方向。沙漠就像一个谜，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在沙漠中，人永远都不能独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足够的饮用水跨越沙漠，在沙漠中从每一个水井到另一个水井的距离十分遥远。

希罗多德在埃及旅行之后发现，这个国度的周围都是沙漠地带。尼罗河流域就是撒哈拉大沙漠。荒野的沙漠就像是一片被太阳灼热的火海，而火海犹如是一头脱缰的猛兽，可以吞噬一切。

“在埃及，人们认为，火就是狂野猛兽，他可以吞噬它想吞噬的一切。”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波斯国王刚比西斯占领了埃及之后，就全面大肆讨伐埃及人，然后向南进发，欲占领埃塞俄比亚。他曾派一部分军队去攻打住在沙漠绿洲中的阿蒙人。据说他的军队曾到过底比斯，从那儿，又用了七天的行程，穿过广袤的大沙漠，到达了这个叫欧阿西斯的阿蒙人居住的沙漠绿洲。但是后来就无人知晓他们的踪影。

“其实，除去阿蒙人和那些听过穿越沙漠的人讲述有关故事的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人知道关于刚比西斯军队的任何事情了；因为他的军队既没有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但是阿蒙人自己却说：当波斯人从欧阿西斯穿过沙漠地带向他们进攻，走到欧阿西斯和他们的国土中间大约一半的地方时，正当阿蒙人用早餐之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力极强，速度极快，随风卷来的沙子瞬间把他们埋了起来。于是他们就这样失踪了。”

两位捷克人终于来了，一个叫杜沙，一个叫雅尔达，之后我们一起结伴出发去了刚果。我们在刚果境内的第一站，就是到了一个叫阿巴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被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绿墙环绕着。绿墙的那边是荒无人烟的热带丛林，这个热带丛林就好像是在平原上凸起的一道陡峭的山崖。

在阿巴这个地方有一个加油站和几个小商店。这些商店都是用腐烂的木板建的骑楼，在骑楼下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懒散的乡下人。我们的车在那儿停下时，他们也都刚刚起床。我们向他们打听了刚果国内的情况，顺便问他们，在哪儿我们可以兑换到当地的货币。

这些都是希腊人后裔，是在希罗多德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在

世界上建立了数百个殖民地的希腊人。他们还都保持着典型的希腊人的特色和传统习惯。

希罗多德的书一直伴随着我。在我们临离开他们时，我从包中掏出这本书给他们看。其中一个人看见书封面上希罗多德的名字时，立即露出了笑容。我无从得知，他的这种笑，是在看到了希罗多德名字时，发自内心的自豪的笑，还是因为不知他是谁而露出的一种尴尬的笑。

# 佐披洛司的脸庞

我们的汽车因为耗尽了油，被迫停在保利斯小城的郊外。我们站在路边，企盼能遇到人开车经过这里，帮我们加点儿汽油，于是我们站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这里有一所由比利时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传教士们的负责人是皮尔神甫，他看上去又瘦又小、身体羸弱。那时刚果还处在内战频仍时期，这些教士们管理的学校也被并入军事管理系统。在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个个都肩扛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棍子，一边高唱歌曲，一边呼喊着口号在练习齐步走。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十分严肃，动作机械规整，在这种严酷的军事训练中，孩子们幼小的脸上露出刚毅、勇敢和庄重的神情。

在学校围栏的最尽头，教室都是空空的。在一间教室里还摆放着一张野营用床。这里十分安静，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隐隐约约可以听见在操场上孩子们训练时的呼喊声。学校前边的空地上盛开着一大片天竺牡丹、剑兰和矢车菊等花，还有许多花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根本叫不出名字来。

我嗅出一股浓浓的硝烟战火的气味。但不是来自这里正在

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从时间和地点来说都距这里十分遥远，这是希罗多德给我们描绘的在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与巴比伦之间的战争。我坐在游廊的荫凉下面，一边阅读着希罗多德的书，还得一边用手不停地驱赶围上来的苍蝇和蚊子。

尽管那时大流士还只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但他已经坐上了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王位。在这个多民族的帝国，少数民族为争取自由而发起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当然，毫无疑问，这类争取自由的反抗斗争都被强大的波斯帝国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了下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残酷的镇压而引发了十分危险的，甚至危及到国家命运的战争——巴比伦人的反叛。巴比伦王国是当时世界上除波斯帝国之外的另一个较强大的帝国，巴比伦是巴比伦王国的首都。实际上，巴比伦王国建国要比波斯帝国早十九年，是居鲁士国王在公元 538 年建立的一个国家。

因此，巴比伦人要争取独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巴比伦位于连接世界东西方和南北方的交界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发展最快的城邦，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科学中心。它的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和建筑学在当时都居世界首位。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希腊雅典人才取代了巴比伦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那时，巴比伦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波斯帝国的朝廷内，早已是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混乱一片，古波斯的教士们执掌着统治大权。他们最终推翻了由显贵们统治的波斯朝廷，把大流士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反抗波斯帝国的起义并准备宣布独立。

希罗多德写道：

“巴比伦人要叛变了，但他们的叛变经过了非常缜密的准备。很显然，他们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并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做好了对付围攻的一切准备。”

希罗多德在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巴比伦人的反抗叛变行动最终公开之后，他们决定，除了所有做了母亲的人之外，每个家庭都要任意抽出一名妇女来为他们做面包；然后，其余的妇女都被集中关起来，使她们窒息而死，为的是不让她们再消耗有限的面包。”

我不知道，希罗多德是否意识到了他这样写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他写下这些时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因为那时的巴比伦，即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人口至少在二十到三十万之间。仅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计算，当时被窒息致死的妇女——包括所有的妻子、姐妹、祖母、外甥女、侄女和未婚妻在内，至少有上千人。

对实施此次屠杀的人，我们这位希腊人在书中却只字未提。是谁首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是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决定的吗？是在市政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的吗？难道是巴比伦保护委员会会议做出的决定？就此问题是否曾有过争执？是否有人发表过不同意见？是谁决定用此等残酷的手段屠杀妇女？为什么要采取窒息的办法？难道就没有人建议施用别的方法吗？比如说，采用屠杀？斩首？或焚烧？或者把她们抛到幼发拉底河水中溺死？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无休止地追问下去。这些妇女当时是否都在家中等待自己的男人归来，因为他们都被召去开会了。当男人们在会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回家后，这些妇人们是否能从他们的面部表情觉察出有些异样？能否从他们的举止言行上看出些许迟疑不决、羞愧难当、痛苦不堪、暴跳如雷？当然，小女孩

儿们是绝对不会察觉出任何反常的。可那些上了一点年纪的妇女们，难道在事发前就察觉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吗？难道妇女的本能就没告诉她们什么吗？难道在所有男人之中，就没有一个人良心发现吗？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想到要对自己的女人下手而精神崩溃吗？难道就没有人跑上街头狂喊乱叫，宣泄感情吗？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形？他们抓走了那些妇女，集中关起来想让她们窒息至死，那总该先找个地方吧？至少得先从这些妇女中挑选出要留的吧？之后才会让那些他们认为不再被需要的妇女站出来，可他们又是用什么办法把她们诱骗出来的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雇用卫兵，首先抓走一部分女孩儿和妇女，之后把她们一一掐死。是否还会有什么人威逼那些做父亲和做丈夫的男人们在别人的监督下，在他们的面前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女？

难道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吗？无人呻吟？无人悲叹？无人抱怨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敢于为自己的妻儿老小、手足姐妹们站出来求情吗？这之后他们又是怎样处理死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死尸能够得到体面的处理，那么，这些冤死的鬼魂就不会再来打扰苟活在世上的人，否则，她们时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显身，向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伸出枯瘦如柴、白骨森森的鬼爪。

“杀死妇女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她们再消耗有限的食粮。”

从这点可以看出，巴比伦人是做了长期受煎熬和打仗的思想准备的。众所周知，巴比伦人是具有顽强奋争精神的民族，他们拥有强大的、繁荣的城邦，拥有美丽的空中花园和金色的庙宇。与此同时，巴比伦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大流士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会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赢得胜利。而如果不使用武

力，他们也定会被饿死。

当波斯国王大流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便纠集了自己的全部军队，直接向巴比伦进发了。到达巴比伦之后，他下令把整个城市团团围住。但是，巴比伦人似乎对他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他们在自己城墙的塔楼上，用自己的手势和语言嘲笑、侮辱、讥讽大流士和他的军队。甚至有一个人嘲笑说：波斯人，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离开这里，坐在那儿有何公干？你们等着吧，等到骡子能下仔儿时，你们才会攻下我们的城池哩（骡子是不会产仔的）。”

他们就这样嘲笑、讥讽、痛斥大流士本人和他的军队。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面：大流士和他的军队在巴比伦城下纠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包围了整个城市，而巴比伦的城墙是由非常厚重的砖石砌成的，坚不可摧。城墙高达数米，而且极为宽大，可以同时并行四辆马拉战车。在高大厚实的城墙上，有八座厚重的城门，城墙周围还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护城河。面对这样固若金汤的城墙，大流士束手无策。因为那时，世界上还没发明火药，火药在之后的一千二百年才出现。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大炮重炮等武器，显然，波斯人就算再强大，在没有任何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欲攻下巴比伦城也是十分艰难的。因此，巴比伦人坚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城邦一定会安然无恙，谁也休想撼动和攻克。与此同时，他们也很清楚，只要他们每天都站在高大厚重坚实的城墙上面，这事实本身就会令大流士本人和他的军队感到战栗恐慌，魂飞丧胆。

“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奚落、嘲笑、讥讽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对峙双方相距如此之近，甚至都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

巴比伦人指名道姓地谩骂波斯人。如果大流士本人能离城墙近一点的话,他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这种嘲笑、谩骂、奚落他的声音此起彼伏。巴比伦人用尽心机谩骂嘲讽波斯人,这种时间持续了很久:

“一年又七个月的时光过去了。大流士和他的军队被拖得疲惫不堪,已经苦于无策攻下巴比伦了……”

但是,波斯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

“在围攻巴比伦城邦的第二十个月上,波斯人遇到了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的一个驮载兵粮的骡子生产了。”

年轻的佐披洛司是波斯帝国贵族美伽比佐斯的儿子,同时,他还属于波斯帝国极小部分精英中的一分子。当他听到骡子能产仔这个消息后,感到万分震惊。他觉得这是神意的安排,是一种象征,预示着巴比伦从此会陷落。于是,他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来找大流士,向大流士讲述了这一事情的全过程,并问大流士,攻取巴比伦对他是否至关重要。

“是的!这对我来说事关重大!”大流士回答。但怎样才能攻下巴比伦城呢?

波斯人围攻巴比伦城几近两年,绞尽脑汁,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和措施,一切可施的计谋和诡计,但巴比伦城堡却仍然毫发未损,巍然矗立在那里。大流士灰心丧气、气急败坏,找不到对策:撤退吧,无法咽下这口受尽屈辱之气,更不甘心丧失这块宝地;可是不撤退吧,又明知攻下这一城池希望渺茫,看不到前景。

他情绪低落、犹豫徘徊、气馁颓丧。看到波斯国王一筹莫展,佐披洛司想:

“怎样才能一举攻陷巴比伦并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于是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但希罗多德在书中并没有详细交待，佐披洛司使用了何种方法、何种器具或刀具，忍痛割下了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头发。佐披洛司彻底毁容后，以极其残忍的方法痛笞了他自己。然后他重又来到大流士面前。大流士看到佐披洛司被弄成如此惨样，痛苦万分：

“他大叫一声从自己的宝座上跳了下来，他问佐披洛司，是谁把他糟蹋到如此地步？为什么？”

刚刚割下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头发，毁容后痛苦难忍的佐披洛司，他的整个面部都是红肿的，从眼睛里还往外渗着鲜血。尽管如此，佐披洛司还是强忍疼痛回答道：

“国王！除你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使我落到这个境地。并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因为我不堪忍受波斯人被巴比伦人奚落和侮弄。”

大流士说：

“可怜的人啊！如果你说你把自己弄成如此惨象，为的是攻克巴比伦人的城池，那你仅仅获得了一个美好名声，却干了一件无以复加的最愚蠢的事情。愚蠢的人啊！你以为你毁了自己的容貌，我们的敌人就会为此立刻向我们投降吗？你这样做，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失去理智，疯癫发狂了。”

通过对佐披洛司的描写，希罗多德在这里向我们展现了在数千年以前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所持的一种固有观念，换句话说，人一旦失去了尊严，被贬低到无法忍受的程度，那么，他们就会采取十分极端的手段，不怕蒙受耻辱，不畏自惭形秽——采取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办法。佐披洛司说，我觉得，既然我已经蒙受了伤害，那么如果再雪上加霜，那我就会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宁愿选择自己毁掉容貌，也不愿忍受被别人火烧

面容的耻辱，我宁愿让自己在饱受自残屈辱的感觉中得到自我解脱，也要为波斯人挽回面子。因为，巴比伦人对波斯人的讥讽、嘲笑和羞辱，会令波斯人感到更加震颤畏惧和惶恐不安。

此外，佐披洛司并不是只把波斯人对巴比伦人的无可奈何和束手无策当成个人的耻辱，以及个人判断失误所造成的失败，他并不是说，这一切让我感到耻辱，而是说，这令我们波斯人蒙受耻辱——让所有波斯人蒙羞！佐披洛司认为，摆脱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不能只靠发动战争，每一个波斯人都应该采取自我毁灭(毁容)的行为，只有这样，对他来说，才称得上是一种解脱。

尽管大流士对佐披洛司的这种不负责任和不计后果的行为并不认同，但他还是听从了佐披洛司的建议，作为挽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目的是不让自己的臣民，也不让庄严的波斯帝国及其政权继续受辱。

于是他接受了佐披洛司的计划：佐披洛司佯装被大流士追踪和通缉的逃犯跑到巴比伦。他伤痕累累的样子可以成为最好的佐证！佐披洛司坚信，凭他现在的样子，能让巴比伦人相信，最终从巴比伦人手中接过掌控军队的大权。一旦稳操军权，他就会亲自为波斯人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从而轻而易举地拿下巴比伦城。

有一天，巴比伦城堡上的卫兵忽然看见一个满脸血污、衣衫褴褛的人正往城堡方向慢慢走来，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慌慌张张地向后看，似乎担心后面有什么人追踪他。

“当城堡瞭望塔上的卫兵看到他以后，便跑下来，在城门处打开一条缝，询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告诉士兵们他叫佐披洛司，是从波斯人那边冒险逃过来向巴比伦人投降的。听了此番话，门卫便把他带到了巴比伦首领那里去，在那里

他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伤口，讲述了自己所谓的悲惨遭遇，当然他只字不提他的面容是自己毁的，而是编了一套谎话，说因为大流士看到他们无法攻克巴比伦城池，恼羞成怒，毁了他的容貌，把他糟蹋成这样。所以他逃到这里，要对大流士进行报复。”

巴比伦人相信了佐披洛司编造的谎言，于是把军权交给他，以帮他报仇雪恨。佐披洛司为此暗中窃喜。按照他与大流士的约定，在他佯装逃到巴比伦的第十天，大流士率一千人来围攻巴比伦城堡，巴比伦人纷纷跳下城堡，轻易杀死并赶跑了前来进攻的大流士军队的士兵。这之后七天，大流士又按照与佐披洛司的约定，又派了两千名最弱的士兵来攻打城堡，巴比伦人在佐披洛司的指挥下，又轻而易举地斩杀了来犯的士兵。于是，佐披洛司在巴比伦人中间的威望大大提高，人们把他当成英雄和勇士。同样二十天之后，大流士派来的攻打巴比伦人的四千名士兵，又被不费吹灰之力地斩杀了。于是，巴比伦人为了感激佐披洛司，任命他为巴比伦军队统帅和城墙守备官。

此时佐披洛司已经拿到了巴比伦城墙大门的所有钥匙。这时按照约定，大流士率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巴比伦城堡，佐披洛司敞开了城堡的所有大门迎接波斯军队。巴比伦城堡就这样轻易地沦陷了。

“大流士战胜了巴比伦人之后，便立即下令摧毁巴比伦城堡的城墙和所有城门。之后下令磔死了巴比伦最英勇善战的士兵，大约有三千人。”

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暂且先不去谈论那些烧毁城墙摧毁城门之事，尽管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且去想象一下，他们是怎样磔死了巴比伦人当中最英勇善战的那大约三千军人？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屠

杀任务的？是一次性完成的？还是将他们排列成队，一一斩首？是否每个巴比伦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胞身首异处，惨死在他们的面前？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试图逃走？难道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吗？众所周知，巴比伦当时曾是世界科学、数学以及天文学发展的中心，那么那些科学家们是否也被波斯人斩尽杀绝了呢？试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科学的发展是否已因此而被迫停滞了多少代乃至多少个世纪呢？

毫无疑问，大流士考虑到了城邦今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存。尽管他杀死了巴比伦军队中三千名骁勇善战的军人：

"但他仍允许其他巴比伦人继续住在城邦中（以前我们曾提到，巴比伦人因为担心粮食不够而杀死了众多妇女），容许他们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他的办法是，从每一个居住在巴比伦附近的民族中挑选出一些妇女，将她们送到巴比伦去。后来巴比伦这样的外来妇女达到了五万人之多，今天的巴比伦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大流士为了嘉奖佐披洛司，把整个巴比伦交给他统治，直到他去世：

"大流士不止一次强调说，我宁可放弃二十座巴比伦城，也不愿看见佐披洛司这样残害自己。"

# 野　兔

激烈的枪声和火光
　在空中飞曳
马蹄声声坚硬如磬
车轮滚滚犹如狂风暴雨

——艾赛亚

波斯国王刚刚打完一场战争，又马不停蹄地向别的地方大举进发了。

“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大流士便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斯奇提亚人。”

哪里有巴比伦人，哪里就有斯奇提亚人！希罗多德的足迹至少遍及那些地方的一半以上。他徒步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至少需要数月的时光。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行走五六百公里，都需要月余时间。而这里我们所提及的距离远比这个数字多上好多倍。

大流士的军队穿越这么远的距离，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定是

困难重重。尽管大流士个人乘坐的是为他专门准备的王室座驾，但在那个没有道路的时代，不难想象，他会经历怎样的颠簸。所以说，在那个距我们很遥远的时代，人类在根本不具备什么车轮、双轮马车，更别提什么橡胶车轮的情况下，而且在基本上没有任何道路的情况下，行军走路会是何等困难。

尽管大流士雄心勃勃，但他也会面临众多艰难险阻，包括克服疲劳和忍受周身疼痛之苦。对大流士来说，在不断扩大自己帝国版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和巩固自己对世界的统治。我的兴趣是，在那样的时代，人们眼中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那时，根本没有地球仪，也没有任何地图、地形图、地貌图，托勒密[①] 是在四世纪才出生的，而墨卡托[②] 是在这之后两千年才出生的。在那个年代，从空中鸟瞰我们这个地球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有过这种概念吗？在那个年代，人们其实都是通过邻里之间的口口相传来获得知识、认知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吉里伽玛伊人。我们的邻居是阿司布司塔伊人。而你们阿司布司塔伊与谁交界？你问我们吗？那我们就告诉你，我们跟阿乌斯奇撒伊接壤。那么，阿乌斯奇撒伊是跟纳撒摩涅司相邻吧。那你们——纳撒摩涅司人呢？我们的南边是伽拉曼铁司人，西部是玛卡伊人。而那些玛卡伊人与谁相邻？他们与金达涅司人相邻。而你们呢？与谁相邻？我们跟吃藕的人相邻。那，他们呢？他们跟欧塞埃司人相邻。那时有谁比我们住得还远，他们真的就住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吗？真的有那么遥远吗？那可能是阿蒙人。比阿蒙人离我们更远的还有什么人？是

---

① 托勒密，古希腊天文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学说，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

② 墨卡托(1512—1594)，佛拉芒地图学家，著有《地图集》。

阿特兰提斯人。那比阿特兰提斯人住得更远的又是什么人呢？这就可能根本无人知晓了，甚至也不会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

仅仅瞥一眼地图（其实那时根本没有地图）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证明现在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其实那时也没有这类知识）知识，仅就俄罗斯是否与中国接壤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如果为了确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必须要到数十个相邻的不同部落（往东边方向去的）去打听，甚至要走到那些真的与中国接壤的部落才能知道。但是，大流士在向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进发时，他已经拥有一些关于斯奇提亚的知识和资料了——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进发。

每当一个伟大的君主征服世界之后，他就会像一个狂热的收藏家那样，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手中现有的藏品。他会不断扪心自问：我如今拥有了伊奥尼亚人、卡里亚人和吕底亚人。下一步我去征服谁呢？现如今不但特拉奇尼亚人、盖塔伊人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就连斯奇提亚人也没在我的手心。想到这些，伟大的君主心中便会燃烧起一种强烈的欲火，这就是要把所有的民族都掌握在手中，任我统治。可是，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独立中的民族，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已经被伟大的君主盯住了，并被判处死刑，执行这种判决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这种判决是来自于狂热轻率而不顾后果的占有欲的冲动。一般来说，王中之王就像潜伏在暗处的食肉动物一样，尽管他已经看到要捕获的猎物进入了自己的视线，但是它还会耐心地等待最佳捕获时机。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急需为自己找一个托辞。那就是，以承担对人类负责的光荣使命或者说以履行对人类的神圣职责为借口，为自己找到一个必要的平台。可是这种选择的余

地往往并不大，要么，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捍卫自己；要么我们有义务去帮助别人，或者说执行天命。那么最佳办法就是把这三种选择都融为一体。那就是赋予这种职责以神圣的荣誉感，借上帝的名义充分发挥。

大流士的托辞是这样的：

一个世纪之前，斯奇提亚人占领过美地亚人的土地（波斯人的邻居或者波斯人），他们统治美地亚人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现在大流士要出面为这件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多少年的事报仇雪耻，为此，他得向斯奇提亚人发动进攻。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希罗多德曾经描述过的一种被人类历来奉行的行为准则：谁首先做了于我不利之事，那么我必定要对他实施报复，不管此事过去了多少年、多少代。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给它下定义。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尽管他们可能在一千余年之后就消亡了，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后来人们在挖掘出的斯奇提亚人墓葬中发现，斯奇提亚人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金属制品和手工艺制品。斯奇提亚人曾经建立过一种组织，在历史的进化中，他们组成了农业部落联盟，并演化成现在居住在东欧地区或者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土著斯奇提亚人正是这些民族的精英和先驱——他们就是那些骑马纵横驰骋在黑海以北、多瑙河以及伏尔加河之间广袤大地上的骁勇善战的勇士们。

提起斯奇提亚人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有关的神话传说。他们被一些人认为是另类和神奇的人，曾有人描述说，他们野性十足，十分残酷暴戾，说他们神出鬼没，经常突袭掠夺、杀戮或者绑架其他民族。

我们很难近距离看到斯奇提亚大地，当然更难于看到他们的居住地和畜群，因为它是一片白色雪帘遮盖的地方。

"在这个国家的上部，即北部地区，按照斯奇提亚人的说法，到处都是被羽毛似的白雪覆盖着的山峦，一眼望去，什么也看不到，根本无法穿越。这里的大地和空气好像都被这白色的羽毛严密地遮盖着。"

希罗多德这样评论道：

"根据斯奇提亚人的说法，羽毛似的白雪遍布空中，既看不到远处大地的轮廓，更无法穿越这块土地，这就是我的看法。在那个地方以北的地域，常常大雪纷飞，当然夏天下雪会比冬天少。凡是在此亲眼见过大雪飘飞的人，他才能真正理解这话的含义，因为雪和羽毛是十分相像的。就像我说的，正是由于这样严寒的冬天，才会造成大陆北方荒无人烟的景象。"

在二十四个世纪过去之后，拿破仑循着大流士的足迹也向这块土地进发了。他们曾这样劝告拿破仑：

"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劝大流士，万万不可出征讨伐斯奇提亚人，他告诉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

但是大流士根本听不进他的劝告，他认为自己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就率大部队出发了。

"他的军队是由他统治下的各个民族组成的。"

但是希罗多德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天文数字：

"大流士军队的总数加上骑兵总共是七十万人，仅集结起来的战舰就有六百艘。"

在博斯波鲁斯，大流士下令修建了第一座桥，他坐在高高的王位上，检阅着他的军队跨过这座桥。他把第二座舟桥建于多

瑙河之上。当他的军队跨过这座桥后，他命令把它毁掉，此时，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埃尔克桑德罗司（米提列涅人）的儿子，一个叫科埃斯的人，哀求他千万不要这样做：

“哦，国王大人！既然你所要进攻的这片国土是一个既无耕地，又无人居住的城邑，那么，就恳请你把这座桥留在原来的地方吧……让那些曾修造这座桥的人们来看守它吧。这样一旦我们遇到斯奇提亚人，并且实现了我们的一切愿望，我们仍有一条退路留给自己；如果我们遇不到他们，那么我们给自己留出的这条退路，对我们来说就更安全。因为，我个人一直放心不下的，绝不是怕斯奇提亚人会打败我们，而是担心，万一我们遇不到他们，我们会在彷徨迷路之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位科埃斯后来成了先知先觉的圣人。

于是大流士命令暂且留下这座桥，继续向前进发。

此时，斯奇提亚人获悉，大流士正率兵向他们逼近，于是他们也调集大部队，并且召开了会议，邀请各邻邦国王前来参加，共商对策。其中就有一个叫布迪诺伊的民族：

“在当时，布迪诺伊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他们吃枞果（冷杉树果），布迪诺伊人的眼睛是淡青色的，头发是火红色的。”

但是布迪诺伊人的国王却是阿伽杜尔索伊人：

“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男人可以共同享用一个女子，为此相互之间很容易结为兄弟，没有嫉妒，互不为敌，犹如一家。”

另外还有一个国王是陶利卡人：

“陶利卡人对付前来征服他们的人的办法是，如果他们能俘获敌人，他们就把被俘虏的头砍下来带回自己家，插到一个长长的杆子上，高高地竖立在房屋顶上，甚至比烟囱还要高。他们说，这些晃来晃去，高高竖在房屋顶上的人头，可以镇守全宅。”

现在，斯奇提亚人的代表告诉所有前来开会的人，此刻大兵压境，波斯人正在向我们大举进攻。他们呼吁所有人：

“无论如何，希望你们任何人，都不要在兵临城下之时，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波斯人毁灭掉，而是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

斯奇提亚人为了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他们说，波斯人不只是为了打败我们斯奇提亚人，他们的目的是想征服我们所有人，波斯人自从踏上我们的大陆那天起，就会长驱直入，所到之处，都要逼迫所有的民族臣服于他们……

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国国王们，正像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听了斯奇提亚人的呼吁之后，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在斯奇提亚人需要帮助之时，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暂时先不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波斯人只是想征服斯奇提亚人；而还有一些人则保持沉默。

面对各方意见分歧、无法统一的局面，斯奇提亚人决定，由于对手过于强大，暂不对来敌公开宣战：

“暗中撤退，并带走自己的全部牲畜，在撤退道路上填死所有水井和泉水眼，并连根拔掉所有的草和植物。”

斯奇提亚人把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比前来进犯的波斯军队提早到达两军交战的必经之路，并早一天在那里屯营扎寨，而且一直与波斯人保持着距离，奋力赶在波斯军队到达前撤退，就这样，斯奇提亚人一直牵着波斯军队的鼻子走，他们想把波斯人引向国内纵深的地方，然后再一举消灭他们。

斯奇提亚人正在实施着自己最初的计划。

“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当成运输工具，拉着全部牲畜……马不停蹄地朝着北方前进。”

在北方，波斯人将遭遇到的是冰天雪地的严冬天气，而斯奇提亚炎热的南方天气则可以保护他们。

大流士的军队在踏上斯奇提亚的土地之后，从未遇到公开的狙击。他们所到之处一无所有，长驱直入随心所欲，因为斯奇提亚人总是早早地跑在他们之前，跟波斯人玩儿着捉迷藏。斯奇提亚人究竟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在草原上一会儿神秘地突然出现，一会儿又迅速消失得踪影全无。

大流士的军队，看见斯奇提亚人的马匹和车队在地平线上忽而出现又忽而消失。当有人向他报告，说看见斯奇提亚人的马匹和车队往北跑了，他便立即指挥军队向北方追赶，可当波斯军队抵达那里的时候，却发现，那里荒无人烟，寸草不生。

“这里是广袤的毫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它位于布迪诺伊之北，而要跨过这片地区，至少需要七日的行程。”

希罗多德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场面。斯奇提亚人为了拖垮难以对付的大流士的军队，引着他们，疲于追赶，斯奇提亚人赶在大流士军队前面逃到拒绝与他们联盟的部落去，以此迫使大流士的军队在追赶时，顺便袭击这些部落，导致这些先前拒绝与斯奇提亚人合作的部落与他们联合起来，并肩与大流士作战。

波斯国王在追击斯奇提亚人的过程中，无可奈何，心力交瘁。他只好派一名使者去请求斯奇提亚国王，要求他们放弃无休止的撤退。他说：如果你们自认为有足够的力量，那么就请前来与我决一雌雄，否则就承认我的霸主地位。可斯奇提亚国王却说，我们从不曾因为惧怕谁而逃跑，因为我们斯奇提亚人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耕地，故此，谈何畏惧呢？我们只是觉得没有任何与你们作战的理由。可是，如果你想让我们屈服，承认你是我们的霸主，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当斯奇提亚国王听说要他承认大流士的霸主地位时，怒火中烧。”

斯奇提亚人是热爱自由、热爱草原的民族，他们热爱自己这片无边无际的广袤大地。他们无法忍受大流士在他们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蛮横逞凶、狂傲无礼、轻蔑凌辱的态度，为此，他们要采取自己的对策。他们不仅要继续撤退，继续与大流士的军队迂回周旋，引着他们各处乱跑，而且还要让他们继续跟在自己后面疲于奔命，上他们的圈套。在波斯军队四处为人和马寻觅食粮和饲料之时，斯奇提亚人就趁机发动对波斯军队的反击。

大流士军队的处境日益艰难。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作风和作战结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僵化严密而又极其完整统一的大规模正规军的作战方式，另一种则是松散敏捷、机动灵活的小部队出击的作战方式。尽管后者自己的作战部队人数不多，但来去无踪、灵活多变，令人捉摸不定，速战速决，占尽了优势。

“你们倒是快露面呀！”大流士空虚地大声喊叫。

但这片广袤无垠、一望无际的大地却用异样的沉默回应着他。他的大队人马正站在这块空旷无声的土地上，难以施展自己的力量，此时这支大军显得那么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用武之地。唯一的办法是让对手显现，而对手偏偏不愿现身。

斯奇提亚人很清楚，现在大流士的军队举步维艰，已经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于是，斯奇提亚国王便派使者前往大流士处，给大流士送去了礼物：两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只箭。

在当今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识别和解释现实的独特方法，但往往对自己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却只能凭直觉来判断，缺乏深入思考。每当遇到一种现实环境与我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时，

往往只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那时就会误判现实，继而产生对现实的曲解。因此，人一旦处于这种情况，就会陷入虚假之中，被打上错误烙印并被引入歧途。

以下事实就说明这一点。

“大流士收到斯奇提亚人的礼物之后，便召集波斯人来开会，讨论斯奇提亚人送礼的含义。大流士认为，这是斯奇提亚人自己带着土和水来向他投降，他的理由是：老鼠是在土里打洞的动物，它和人吃一样的东西；青蛙则是水栖动物；而鸟让人们联想到马，可以说它们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接着大流士还说，斯奇提亚人送箭，表明他们要向他献出自己的武力。大流士就这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戈布里亚斯的想法却与大流士的大相径庭。根据他的理解，这些礼物的实际含义应该是：波斯人！除非你们能变成鸟高高地飞上蓝天，除非你们能变成老鼠打洞钻进泥土，除非你们能变成青蛙跳进湖水，否则，你们将会被我们乱箭射死，永远别想再回到你们的家园。

在把礼物送给波斯人后，斯奇提亚人集结了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准备与波斯人对阵。”

当时的场面应该非常壮观，令人震撼。从所有考古墓穴中挖掘出来的斯奇提亚人的墓葬品来看，他们死的时候都身穿战袍，带着他们的战马、武器、工具、首饰和各种铜制品。他们的战袍上都镶着黄金和黄铜，他们的战马都披着甲胄，上面还镶嵌着金属装饰钉。在他们的墓葬品中，当然还有他们使用过的、刻着字的刀剑和斧头，以及带有精心雕刻的精美装饰的弓箭和箭袋。

两支军队在对峙着！一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波斯军队，另一支是短小精悍的斯奇提亚军队，他们都挺立在以攻为守的阵地上，一大片银白色的雪像幕布一样挡住了大流士的视线，让他

看不清对方。

我在想，那一定是一个令人紧张心跳的剑拔弩张的场面，正当我凝神想象着这一场面时，突然又一位小伙子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先生，请你去院子那边的芒果树下用餐，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稍等一下，我就来！"我对他说。

因为紧张和激动，我大汗淋漓，下意识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往下读：

"当斯奇提亚人列好队形后，从队列中突然跑出了一只野兔，斯奇提亚人看见了，都急忙去追赶。因此，在斯奇提亚阵营中发生了混乱，喊叫声一片。大流士问，敌方军队大喊大叫是在干什么，他得到的回应是，他们都在追赶一只野兔。于是，大流士对身边的人说，斯奇提亚人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我现在认为，戈布里亚斯所说的关于斯奇提亚人赠送礼物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我现在认可了他的说法，那我们就必须赶紧想对策，以便能安全返回自己的国土。"

野兔？居然能在历史上起这么大的作用？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是斯奇提亚人阻止了大流士向欧洲进军之路。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那世界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其实，与事实相反，大流士做出的最后决定是，他认为，斯奇提亚的军队，在强大的波斯军队面前竟然去追赶一只野兔，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蔑视和鄙弃。这对波斯国王的打击要比他在一次战役中的失败更可怕。

夜幕降临了。

大流士命令——他历来喜欢这样——在午夜时分点起营

火，把那些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即老弱伤残士兵留在营地。同时他还命令把所有的驴子也留下，让它们大叫，给斯奇提亚人一个错觉，使他们感觉，波斯人的营地一切如常。而大流士自己，却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地率大队人马撤退。

# 在已死亡和被遗忘的国王之间

我还想跟大流士再多呆一段时间，结果这一想法被新的旅行计划打断。我突然从 1966 年的刚果，跃到了 1979 年的伊朗。那时伊朗这个国家仍处在伊斯兰革命时期，当时还是那位年高德勋、面部表情严肃、永不屈服的长者霍梅尼掌权时期。

作为时代发展的奴隶和牺牲品，人们发现，这种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跳跃一直诱惑着人们，人们时常梦想成为时代的主人和世界的主宰，哪怕只是一瞬间，甚至仅在虚幻的感觉中。他们企盼能站在时代之上，任意变换它的阶段、组合，甚至改换时空，随意把各个时期黏合在一起，或者拆散开来。

那为什么正好选择了大流士呢？那也正是因为在希罗多德描写这位东方君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所有的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具有十分残暴的特点，但是不难发现，在他们当中仍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有时还会做一些益事或善事。大流士也不例外，他属于他们中的一分子。一方面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君王，特别是在他率兵向斯奇提亚人发动进攻时，他的这一特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那时有一个波斯人，叫欧约巴佐斯，他恳请大流士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讨伐斯奇提亚人的战斗。大流士听后对他说，既然欧约巴佐斯是自己的朋友，他认为他的请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大流士对他说，他一定会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给他留下。欧约巴佐斯听后异常高兴，感激涕零，他真的以为，他的三个儿子已经被免除了军役。可他万万没想到，大流士却指派专人把欧约巴佐斯的儿子统统杀了。就这样，他们被永远地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可另一方面，大流士却是一个善于管理国家的君主，他提倡修筑道路、邮局、制作钞票，同时还支持开展贸易。当然，他在无时无刻地关注如何不断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统治的同时，下令建筑美丽的城市——波斯波利斯[1]。这座城市的魅力和辉煌毫不逊色于当时的麦加和耶路撒冷。

在德黑兰，当我正在追踪和报导伟大的伊朗国王在最后一个星期的统治时，我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犹如建立在一片散沙之上，原本混乱无序的城市此时完全失去了管理，到处一片混乱。每天无休止的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在这里每位男子都有一头令人羡慕的浓密黑发，妇女们面部都蒙着黑纱。他们每天行进在数公里长的游行队伍中，高唱着歌曲，呼喊着口号，有节奏地挥舞着拳头。装甲车开上了街头，占领了广场，军队向游行示威的人们开枪扫射。枪声一响，大片人应声倒下，死伤数众。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人驱赶着赤手空拳、慌乱恐惧的民众向四处逃散，还有人就近跑到建筑物的门洞中藏身。

枪手们站在楼顶上向下射击。中弹的人踉踉跄跄，捂着伤

① 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其废墟在今伊朗西南部设拉子附近。

口欲往前跑，但是，马上就被那些走过他们身边的人拖到马路边，为的是不影响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游行队伍中的人们群情激昂，不停地挥舞着拳头呼喊着口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往往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他们穿着白色衣服，头上扎着白色头带，看上去就像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英勇的殉难者。在他们白色头带上还写着口号。有时，我趁机钻进他们的队伍，试图从他们的面部读懂什么。但是他们个个都面无表情。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当然我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一切。

下午，游行队伍散去了，商人们纷纷打开自己商店的门。这里还有很多做二手书买卖的生意人，他们把各类书拿出来摊摆在马路上。我从他们手里买了两本关于波斯波利斯的画册。当时的伊朗国王大流士，颇以自己城市的辉煌为自豪。他经常举行各种盛大宴会和庆祝活动，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国宾客参加他的盛大宴会。而对于我来说呢，既然大流士在那里建立过一座美丽的城市，那我当然想去看看。

斋月到了，德黑兰这座城市终于平静下来。我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设拉子① 的车票，从那儿到波斯波利斯就很近了。我没费吹灰之力就买到了去设拉子的车票，尽管后来车上也坐满了人。这是一辆豪华带空调的奔驰大轿车，坐在里面很舒服，没有任何噪声，汽车飞驰在公路上，公路的质量很好。我们的汽车穿过一大片深灰色岩石地带，那里荒无人烟，时不时能看到远处贫穷的、黄土漫天、毫无绿意也无生气的村庄，那里有一大群孩子在玩耍，还有成群的山羊和绵羊。

---

① 伊朗西南部城市，法尔斯省省会，古波斯文化中心，其东北 60 公里处有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遗迹。

在固定的停车休息点，能买到热米粥，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羊肉串，还能喝上一杯水，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到一杯红茶水。我无法跟周围的人交流，因为我不懂波斯语，但是这里的氛围非常好，男人们都友好地对着我微笑。妇女们则都侧着头面朝别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在示意我，打量她们是不礼貌的。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周围只有伊朗妇女时，我也会借机偷看她们的眼睛，她们都有一样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炯炯有神。每个妇女都有纤长浓密的睫毛。

在公共汽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几个小时之后，我发现外面的景色单一乏味。于是我掏出希罗多德的书，读着他关于斯奇提亚人的描述。

“斯奇提亚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会饮用在战场上被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会把战争中被他们杀死的所有人的头颅带给国王。只要他们能给国王带去这些人的首级，便可以分到一份虏获物，否则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还会沿着死者的两耳边割一个圆，然后揪着头皮把头割下来。再用牛骨刀把死者头上的肉割掉，并用手一点点把头皮搓软，揭下来用它当做手巾。斯奇提亚人把用死者头皮做的手巾吊在自己乘骑的马勒上，以此来炫耀自己。凡是在乘骑的马勒上，用头皮制成的手巾挂得越多，这样的人便被大家公认为是最勇武的英雄。许多斯奇提亚人还用这些死者头皮缝制成皮衣，像牧羊人那样当做外衣穿。许多人还从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等，用来蒙覆他们的箭筒。人皮的特点是既厚又有光泽。可以说，在一切皮革里，人皮应该是最白皙最有光泽的皮子。”

当窗外露出棕榈树林和大片郁郁葱葱的绿地时，我暂时放下了手里的书，望着窗外的楼房、远处的街道和灯塔。从车窗还

可以看到远处楼房上边露出的清真寺的塔尖。这时我们抵达了设拉子,这真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以手工制作地毯而闻名于世。

在饭店前台,人们告诉我,到波斯波利斯只能坐出租车去,而且最好是在黎明时分出发,因为那时可以看到日出。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照耀在帝国废墟上的第一缕火红的光芒。

等我出了饭店门,早已有出租车等在门口。我上了车,就风驰电掣地上路了。那天正好赶上圆月。所以,我能非常清晰地看见,我们的车行驶在由于湖泊干涸而形成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我们在空空荡荡的路上开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那个叫加法尔的司机停下了车,从后备箱中拿出一瓶水递给我。这水冰凉扎牙,因为这个时间天还很凉,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不断打寒战,司机见状,连忙给我披上了一条毯子。

我们之间的交流只能靠打手势。他指指我,做了一个洗脸的动作。我按他说的做了,洗完脸,我正准备用毛巾擦脸,他又做了一个手势阻止我,意思是不能擦脸,应该等太阳出来,让太阳的光晒干脸上的水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猜想,这应该是一种惯常的仪规,于是我静静地站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日出。

在沙漠地带看到的日出景象,总是千篇一律,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光耀四方之初,让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时刻即将到来。每当这个世界某一地方的长夜将要离人们而去之时,黑夜即将消逝在晨雾之中,而每当黑夜在悄然消失的瞬间,天空会渐渐显出光亮,大地和人都会随之苏醒。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在这种反反复复之中回归,让人们总是能再次看到,我们曾经见到过的一切。如果显现出一片绿洲——那我们就能看到绿洲,如果显现出水井,我们就能看到水井。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穆斯林人

就会双膝跪在地上，虔诚地开始念当天第一遍经——salat - as - subh。他们的这种痴迷和虔诚也影响着周围那些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此时不论宗教信仰，所有的人都会同样尽情享受着太阳回归到这个世界的喜悦，这也许就是彰显世界大同时仅存的真实的瞬间。

天亮了，这时的波斯波利斯完整地露出了那崇高伟大光荣帝国的轮廓。这是一座宏伟的、用石头筑成的城市，寺庙和宫殿坐落在巨大的、广阔无垠的火山灰岩顶上，就好像是被牢牢地镶嵌在山坡上一样，突兀陡峭地耸立在那块高地之上，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此时我们站在沙漠的另一头。太阳光吸走了我脸上的水滴，我体会着，这一刻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太阳，跟我们一样，欲想生存，就需要水。如果太阳在一大清早醒来，能从人们的脸上舔走几滴水珠，在下午之前，在变得残酷之前的那段时光，这对它来说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而太阳对我们的回报则是，在它变得令人难忍之时，它会给我们提供影子。当然，太阳是不会直接给我们提供影子的，它是通过不同的介质——比如，树、房顶、洞穴来给我们提供影子。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太阳，就不会有我们，更何谈影子。因此，太阳以这种方式，一方面照耀、烘晒得我们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又在给我们提供用以防御它的盾牌。

两个世纪之前，也正是在一样的黎明时分，大流士下令开始建造波斯波利斯，那是在公元前三百三十年的一月末，亚历山大大帝率领自己的军队向这座城市进发了。在他还没有亲眼看到这里的建筑时，他就已经知道这里的建筑壮丽辉煌。他更清楚，这里还蕴藏着世界上无数的宝藏。正是在这片沙漠之上，也就是我和加法尔现在脚踏的这片土地，亚历山大遇到了一群稀奇

古怪的人:“他刚一过河,就遇到了这样一批人。这些人衣衫褴褛,与先前打过交道的机会主义者和勾结者们完全不同。他们大声呼叫,欢迎他的到来,但是他们每个人手中还举着讨饭棍,这证明他们是一批来自希腊的人: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很可能是曾经参加过雇佣军,曾经站在错误的一方与凶残的阿塔泽克西兹二世作战。他们用非常直白的方式,表示出令人同情和可怜的一面。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受过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折磨。那是典型的波斯人惯用的手段:他们的鼻子和耳朵都被割掉了。其中还有一些人失去了双手,另一些人失去了双脚。每个人额头上都打着一个被戳伤的不规则的印记。”他们都是这样一些人——迪奥多尔(Diodor)说,他们是一些心灵手巧的工匠和多才多艺的手工艺品制造者,而且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于是波斯人就把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割掉砍掉,只留下工作需要使用的部分。

这些惨遭不幸的人们恳请亚历山大,不要命他们回希腊,他们宁愿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是他们亲手建造了这座城市——波斯波利斯。如果回到希腊,像他们这样肢残不齐的人,“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将会被孤立隔绝,沦为被别人可怜、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们到了波斯波利斯。

这里有一条宽阔的长长的阶梯通向城堡。在城堡的一个侧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浮雕,这座浮雕是用灰白色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大理石的表面打磨得很光滑,这座浮雕上边雕刻的是诸侯的代表们正在朝国王坐的方向走去,为的是向国王宣誓,表示忠诚,效忠国王。在每一个台阶上都有一个诸侯代表,而一共有数十个台阶。你每登上一个台阶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诸侯代表陪

伴，再往上爬一个台阶，就会有一个诸侯代表给你指路，把你引向另一个诸侯代表，而他还留在自己的地方，在那儿忠实地守卫着自己的岗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诸侯的形象好像都出自一人之手，他们的外表、身高和形状都完全一样，令人难以区别。他们每个人都身穿昂贵的拖地长袍，头上戴着帽子，手持长矛的双手放在身前，肩上挎着带有精美绣饰的箭袋。尽管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严肃，但还是表现出一种奴颜婢膝的姿态，所有的人都挺直脊背往前走，保持着尊严。

在我们攀登这些台阶时看到那些如出一辙的诸侯形象，留给人的是一种动静相宜的印象。因为当我们沿着台阶往上走时，看到的总是那些如出一辙的诸侯，同时，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似乎总是站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不曾移动，好像我们被一个无形的能变戏法的魔术镜子照着。最后我们爬到了山顶，终于可以回头看看一路走过的风景。这里的景致真是美不胜收：在我们的下面，即在山下面，此时此刻已经是阳光普照，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横跨在它上面的只有一条路——通向波斯波利斯的路。

这一景致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场面：

从国王的角度看，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面朝着一望无际的平原。国王极目远望，在平原的另一头，也就是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能看到飘着一缕尘烟，影影绰绰似乎可以看见一粒种子大小的东西，这东西是那么渺小，很难猜出那是什么。他琢磨，那能是什么东西呢？过了很长时间，那粒微尘似的小种子在慢慢变大，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这肯定是我的诸侯臣属们，国王心里在想。但是，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深刻的，令人铭记难忘。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微尘和种子。于是国王就把他的臣属们比喻成

这种象征着忠实于他的微粒和种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能看到人的轮廓外形。哦，不，我没想到，国王对围在他身边的君臣们说，他们是我的那些诸侯臣属们，在他们来到这儿之前，我得赶快回到大殿去，坐在国王的宝座上等待他们的到来（因为国王如果不在宝座上坐着，是不能跟臣属们说话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面，也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包括诸侯臣属们在内：这些属于国王的人，他们来到波斯波利斯城，站在国王对面的高台上。他们能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建筑和金光闪耀的屋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立即跪在地上（尽管他们跪在地上，但是他们并不是穆斯林，穆斯林人是在千年之后才来到了这个地方的）。待他们完全恢复镇定下来以后，他们才会站起来，拍打自己身上沾满的灰尘。而国王所看到的似乎像尘土的东西在慢慢飘移游动。过一会儿，他看见的这些微尘正慢慢接近波斯波利斯。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狂喜，但是随着他们心中狂喜的增长，他们的自卑感，由于自己地位的卑贱、身份的无足轻重而带来的苦恼也随之增长。是啊，我们这些人无足轻重，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甚至如果他想处我们以死刑，我们也得毫无怨言地接受。但是，如果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地位，那就得在自己人当中攫取高一级的职位，这样才可以安宁地生活。

一旦那个人，在国王那儿得宠，他们说，那么他的儿子也必然会得宠，接下来就是孙子、曾孙子。也就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祖祖辈辈就会永远受到保护。

在波斯波利斯你可以不停地走啊走啊，这里空寂无人，安静异常。没有任何导游、保安、小商小贩在身后追赶骚扰。司机加法尔没跟我一起上来，只有我一个人独自走在巨大的被遗弃的

石头废墟之间。这些巨大的石柱多数是圆柱形,也有其他形状的,上面雕刻有浮雕人面像和头像。在这里你找不到一块自然形状的石头,找不到一块我们能见的那种自然形状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经过了精雕细刻,打磨抛光。这里倾注了多少年人们的辛勤劳动和多少人的血汗呀。又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多少人永远倒在这里,再也没爬起来,又有多少人因为饥渴疲劳死在这里?

每当我参观那些寺庙、宫殿和城市的废墟时,我都会对这些曾经参加建设的劳动者们的命运提出自己的疑问。他们生过什么样的疾病?脊椎是否折断过?眼睛是否被碎片石子刺穿过?是否忍受过风湿病痛的折磨?我想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所受的苦难。所以我时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如果未经受大苦大难,是否还会创造出这些奇迹?没有奴隶承受皮鞭的抽打,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统治者的高傲自大,是否还会创造出这些古代奇迹?换句话说,这些伟大的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是否产生过消极的和邪恶的影响?人们是否想过,凡是那些消极的和弱小的,终究都可以被所谓的美、仅仅是通过苦力去创造这种美的意志所战胜?也就是说,永恒的就一定是美的吗?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永恒的美?我再次饱览了这些由大流士、克谢尔克谢斯所建造的卫城神殿的大门和百柱大厅,重游这些伟大的历史古迹。此时正午已到,太阳照得我酷热难当,已经没有气力再去看阿尔铁斯克斯的宫殿和议会大厅,再也没有精力去观赏那些已经逝去的和被遗忘的诸神留在那里的雄伟建筑和废墟。我从那些宫殿废墟的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下走,再次路过那些雕有虔诚地向国王致敬的诸侯们的各种圆柱。

我跟司机加法尔回到了设拉子。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波斯波利斯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渐渐地消失在汽车扬起的沙尘之中。当我们回到设拉子城时，当我们拐进第一条街时，波斯波利斯古城就在我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重又回到了德黑兰。

回到了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回到了高唱着歌曲和呼喊着口号的人群中，回到了枪声不绝于耳和散发着瓦斯臭气的城市，回到了那些殉难者和二手书贩子中间。

我仍旧随身带着希罗多德的书，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个叫美伽比佐斯的人，他是一位遵照大流士的命令留在欧洲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打败了色雷斯军队。在色雷斯人中有这样一个民族，希罗多德写道：

“妥劳索伊人的很多风俗习惯都与色雷斯人极相同。下面我要说的是，这两个民族在人出生和死亡时所必须做的事情。每当妇女生孩子之后，亲族便团团围坐在这个孩子的四周，历数着人世间的一切悲伤与苦恼，并为这孩子出生之后所必然要经历的一切不幸表示悲哀和怜悯之情。但是在埋葬死者的时候，他们反而是欢欣快乐的，因为他们认为，死者终于从许多灾难中解脱并彻底脱离了苦海，进入了圆满的幸福境地。”

# 希司提埃伊奥斯的荣誉

我离开了波斯波利斯，也再次离开了德黑兰，我要再度回溯到二十年前曾到过的非洲。但是在重归非洲之路时，我得让自己的思绪再停留一下，让自己的思绪在希罗多德描写的希腊和波斯的世界中暂时再停留一下。首先我得把一些头绪再好好滤一遍。

大流士在未能战胜斯奇提亚人，也未能战胜亚洲人之后，只好撤回欧洲。

他看到难于征服斯奇提亚人，知道如果现在不能战胜斯奇提亚人，那就预示着今后再想战胜他们会难上加难。于是，他心中突然萌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哀、惊恐与震颤。他预感到，斯奇提亚人会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反攻，并且会以极快的速度摧毁波斯军队。所以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迅速撤退，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迅速撤离斯奇提亚大地，尽快回到波斯。正当他迅速撤退之时，斯奇提亚人已经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火速追击。

此时，大流士的退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要迅速到达并通过进

犯斯奇提亚人时，在多瑙河上建造的那座桥。当时正是伊奥尼亚人（住在希腊的亚洲少数民族，在希罗多德时代他们一直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守卫着这座桥。

世界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变：斯奇提亚人的追兵知道抵达那座桥的捷径，而他们又都是骑兵，行军速度快，所以，他们早于波斯人到达了那座桥，他们决定截断波斯人的退路。于是他们呼吁伊奥尼亚人，尽快毁掉这座桥，好让斯奇提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灭大流士，与此同时也让伊奥尼亚人获得解放。

他们的这一建议，对伊奥尼亚人来说，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伊奥尼亚人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即召开了会议共商未来大事。首先是米尔提亚戴斯人发言：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毁掉那座桥！”

所有的人都坚决支持他们要采取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没有伊奥尼亚人，但是那些暴君，事实上，大流士雇用的那些军人早已超过了伊奥尼亚人的人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米尔提亚戴斯人发言之后，希司提埃伊奥斯也发了言：

“这位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奥斯，对他们的做法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时至今日，他们之所以能各自成为自己城邦僭主，正是借助于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摧毁，他们便也会随之消亡，失去统治权，无论是在米利都还是在他们现在统治的地方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将实施和选择民主政治统治，而不会选择僭主统治了。希司提埃伊奥斯这个意见一发表，他们就立刻转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一致赞同希司提埃伊奥斯提出的这个意见，尽管他们曾在最初同意了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

就他们改变立场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这些统治者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大流士失去了王位（就意味着会掉脑袋），那么随之他们也会很快失去自己的宝座（也意味着要掉脑袋）。但是，斯奇提亚人自己也十分清楚，即使他们毁掉这座桥，实际上，他们也会保护大流士，让他安全回到波斯。

大流士十分赞赏希司提埃伊奥斯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所以他要嘉奖他，立即许愿说，他将尽力满足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但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即不容许他再回去做米利都总督，大流士只是想把他带回波斯的首都——苏撒，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做自己的顾问。实际上，希司提埃伊奥斯这个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对这样的人就得把他控制在眼皮底下，反之，一旦他的地位上升，其野心就会随着他对帝国做出的贡献而逐渐膨胀。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多瑙河桥边发表过对波斯人有利的建议，那么他今天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希司提埃伊奥斯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在米利都总督的位置由他的女婿阿里斯塔格拉斯接任，这位女婿对他是忠贞不二的。此人也极具野心，权欲心极强。此时，伊奥尼亚人反对波斯人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在伊奥尼亚人和波斯人之间各类冲突也持续不断。这位岳父大人和爱婿都本能地感到，他们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刻到来了。

但是如何做到他和爱婿统一思想，并且安全地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呢？从苏撒（即希司提埃伊奥斯所在地）到米利都（即女婿阿里斯塔格拉斯统治地）至少也得三个月的急行军才能到达，更别说这一路上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崎岖陡峭的山路，而且根本无法找到可绕行的近路。希司提埃伊奥斯只好想别的对策：

“正好在那个时候，希司提埃伊奥斯以前派到米利都去的使者回到苏撒，这人头上被刺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表示，阿里斯塔格拉斯此时应该准备好反叛国王了。因为，希司提埃伊奥斯一直处心积虑地想送给阿里斯塔格拉斯一个记号，以便促使他们一起采取谋反行动。但因一时未能找到其他安全的送信方式便作罢了。因为他知道，在这条漫长艰难的道路上，到处都设有监督的哨卡。于是，他就把他最信任的这个奴隶的头发剃光，并在这个奴隶的头上刺了一个记号，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派他作为使者到米利都去，他没给这个奴隶带任何信件，只是叮嘱这个奴隶，告诉阿里斯塔格拉斯，在剃光他的头发之后认真查看他的头部。就是让他看到，刺在奴隶头上的记号是表示他要谋反，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希司提埃伊奥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被强制拘留在苏撒无法离开……”

阿里斯塔格拉斯向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们转达了希司提埃伊奥斯发出的呼吁。听了他的话，所有的人都积极赞同发起反叛进攻，并且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取得海上霸权，因为波斯人的军队要比伊奥尼亚人的军队强大得多。后来，他们首先乘船到了斯巴达。这里执掌王权的是僭主克列欧美涅斯，正如希罗多德记述的那样，他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整天疯疯癫癫，但是他似乎时常能表现出很有睿智和理智。当他听说整个亚细亚人将要发起反叛僭主的事情之后，便非常清醒地问，去苏撒的路是否很远，因为他知道亚细亚的首都位于苏撒。

“阿里斯塔格拉斯向来十分狡猾，他以为可以用计谋巧妙地欺骗过这个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但是这次他却失算了。

如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诱到亚细亚去作战的话，那他永远不该把实话说出来。然而，这一次他不但讲了实话，而且还告诉克列欧美涅斯，从海上向内陆走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克列欧美涅斯一听这话，立刻制止阿里斯塔格拉斯继续说下去，阿里斯塔格拉斯本想向他详尽介绍有关路程的一些事情。克列欧美涅斯对他说：'米利都的客人啊，请你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吧。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你要把属于克列欧美涅斯的斯巴达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要走三个月路程，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安排的。'克列欧美涅斯说完，便转身回家去了。"

于是，阿里斯塔格拉斯只好自己亲往雅典——希腊最强大的城市。在这里他改变了自己惯用的策略，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独跟某一个首领谈话，而是开始直接面对大众讲话，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

"在民众中找到支持者比在统治者中找更容易些。"

于是阿里斯塔格拉斯强烈呼吁雅典民众，恳请他们帮助伊奥尼亚人。雅典人被说服了：

"他们决定派遣二十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这些派出去的船只就成了后来雅典人和异邦人发生纠纷的开端（也就是说希—波战争的开始）。"

在希—波战争开始之前，他们还只限于小规模的作战。最早是因为伊奥尼亚人发起反抗波斯人的战争，这斗争持续了数年，但每次都被波斯人血腥地镇压下去了。战争的场面是这样的：

场面一：雅典人支持的伊奥尼亚人火烧了撒尔迪斯（在波斯仅次于苏撒的第二大城市）。

场面二：（这是史上一场非常著名的战争）——战争过后两

三个月，上述消息传到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耳中。

“大流士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当回事儿。因为他确信，所有这些人都会因为反叛行为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他只是敷衍地问了问，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让人们把弓箭拿给他看。拿到弓箭后，他把一支箭放在弓弦上，拉开弓把箭射到了上空，这时，他突然祈求说，哦，宙斯啊，请容许我去讨伐雅典人吧！我要报仇！说完，他命令一位侍者，只要走到他身边，不管多少次，他必须重复提醒：国王呀，千万别忘了雅典人！”

场面三：大流士把希司提埃伊奥斯召到自己跟前，此时他已经开始怀疑希司提埃伊奥斯了，因为阿里斯塔格拉斯是他的女婿，正是他率先呼吁伊奥尼亚人起义反对大流士的。希司提埃伊奥斯听了大流士的话，矢口否认有这回事，他睁着眼说瞎话：

“主公！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怎么可能给别人出坏主意，来损害你的利益呢！”

然后，他又抱怨大流士，这都是他自己铸成的错，因为是他把希司提埃伊奥斯带到了苏撒，留在了自己身边。如果大流士能把希司提埃伊奥斯留在伊奥尼亚，又怎么会有人敢起来反抗大流士。希司提埃伊奥斯请求大流士：

“现在，就请你尽快把我派到伊奥尼亚去吧，我保证，我能让那个地方尽快恢复原有的安定，同时，我还会想方设法把那个策划反叛你的米利都的代理官引渡到你手中。”

他的请求得到了大流士的允许，同时大流士要求他，在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之后，立即回到苏撒——他的身边。

场面四：此时伊奥尼亚人与波斯人进行的反抗斗争均有胜负。但是，因为波斯人与伊奥尼亚人相比，人数众多，军力更强

大一些，所以，伊奥尼亚人因寡不敌众，逐渐显现出溃败之势。阿里斯塔格拉斯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停止斗争，甚至，想离开伊奥尼亚。希罗多德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写道：

“从米利都人阿里斯塔格拉斯的行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气魄和胆量的人物。因为，是他扰乱了伊奥尼亚的秩序，并且在伊奥尼亚人中引起了巨大动乱，当看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不利于自己之后，就想逃之夭夭。当然，与此同时，他也预感到，欲想在今后战胜大流士也是不太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召来那些与他共同谋反的人们商议，他说，一旦今后他们被逐出米利都，那最好是在这之前就先给自己找到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与会的人都问，那如今该如何是好？阿里斯塔格拉斯说，他将带着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一起乘船去武力攻占色雷斯。于是他们出兵攻打了色雷斯人，阿里斯塔格拉斯万万没想到，此举不但没成功，自己还惨死在色雷斯人的手中。”

场面五：大流士允许希司提埃伊奥斯回到了撒尔迪斯。当他从苏撒抵达那里时，撒尔迪斯的太守、大流士的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问他，伊奥尼亚人为什么会叛变？希司提埃伊奥斯推说他不知道。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早已看出他在撒谎，于是他说：

“希司提埃伊奥斯，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吧。鞋子是你自己缝制的，阿里斯塔格拉斯只不过是穿上了你亲手缝制的鞋子罢了。”

场面六：希司提埃伊奥斯注意到，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用异样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他心中暗暗思忖：若现在再去祈求大流士的帮助，可能希望渺茫了。可是，如果差人去苏撒送信，需用三个月的时间，再从大流士那里安全返回，还得三个月的时间，加

起来就是六个月，而这期间，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很可能早就把他的头砍掉了。

于是，在夜幕笼罩下他从撒尔迪斯逃走，径直往西朝海边方向跑。可是就算跑到海边也需要好几天的工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希司提埃伊奥斯在逃跑的路上，是怎样提心吊胆、慌慌张张。他不停地回头，恐怕阿尔塔普列涅斯派兵来追上他，将他杀死。他能住哪儿呢？他用什么充饥呢？我们无从知晓。只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竭力想让自己成为伊奥尼亚人的领袖，并率领伊奥尼亚人与他一起反抗大流士。于是，希司提埃伊奥斯又一次采取了欺骗的办法。第一次，他为了救大流士欺骗了伊奥尼亚人，而这一次，他为了当伊奥尼亚人的领袖去反对大流士，而欺骗了大流士。

场面七：希司提埃伊奥斯后来跑到了属于伊奥尼亚人的岐奥斯岛。（这个岛的风光美不胜收，我可以长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岛上的港湾，远看那边一片静静的棕色山脉。没想到，这个悲剧竟然发生在这种令人遐想的美景之中。）但是，还没等他上岸，伊奥尼亚人就发现了他，并把他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人们怀疑他是大流士派来的。他向伊奥尼亚人发誓，永远不会背叛他们，最终，伊奥尼亚人相信了他，把他放了出来。但没有人愿意响应他的号召。他觉得孤独无助，感到他心中长久以来孕育的发动反抗大流士战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尽管如此，他的野心却丝毫未减。无论如何，他都不想抛弃掌握政权的野心，但他意识到，他的掌权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他请求当地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让他回到米利都，他告诉他们，他曾是那里的僭主。

“让他没料到的是，米利都人在好不容易摆脱了阿里斯塔格拉斯的统治之后，都大喜过望，当然不愿意再接受任何僭主回到

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后来，当希司提埃伊奥斯试图在夜里借助武力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他被刺伤了大腿。既然这样被逐出了自己曾经掌管的城市，他只好再次返回了岐奥斯岛。在那里，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岐奥斯人，岐奥斯人坚决拒绝给他船，无奈之下，他便渡海到米提列奈(列斯波司岛)去，尽力想说服列斯波司人送给他船。”

这位伟大的希司提埃伊奥斯，曾经是世界著名城市米利都的僭主，曾经是坐在大流士国王身边显赫一时的人物，如今却只能从一个岛屿流浪到另一个岛屿，苦苦地为自己寻找位置，寻找同情和支持。但是，他的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不是迫使他没完没了地出逃，就是让他不断地遭遇人身危险，或者被推出高大的城门，或者被痛打一顿，或者弄得遍体鳞伤。

场面八：希司提埃伊奥斯仍旧不屈不挠，坚持不让自己倒下去。也许他心中仍在念念不忘掌握统治权。连做梦他都在想，如何坐上王权宝座。但最终，列斯波司人给他提供了八只桡船，这件事让他永世难忘。希司提埃伊奥斯得到船只后：

“立即率领船队驶往拜占庭。他们在那里驻扎下来，缉捕和扣留了所有驶出黑海的船只，而且他要求船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表示要效忠于他。”

他落魄的生活就这样延续着，跟海盗的生活相差无几。

场面九：希司提埃伊奥斯后来得到消息说，波斯人彻底打败了米利都的伊奥尼亚人：

“波斯人在海上彻底击溃了伊奥尼亚人之后，便从海陆两个方向包围了米利都。他们在城墙的下面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在阿里斯塔格拉斯叛变谋反的第六个年头，

米利都人被彻底奴役……”

（米利都的失陷对雅典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悲剧作家普律尼克司为此写了一个题为《米利都之陷落》的剧本，后来这个剧本被搬上舞台演出，剧演完之后全体观众都哭了。他们借口说普律尼克司编写的剧本迫使自己的同胞们想起了这令人心痛的灾祸，惩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今后再公演这出戏。其实在我看来，这出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舞振奋人们的精神，而不只是为了揭伤疤。）

听到米利都完全失陷的消息后，希司提埃伊奥斯的反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撇下缴获来的船只，自己和列斯波司人乘船去了岐奥斯。这是为什么？是为了更接近米利都人吗？还是为了继续逃跑？他究竟想跑到哪儿去？他在岐奥斯实施了大屠杀。

“当岐奥斯军人不放他们进去时，他就命令强攻，许多军人被他们杀死，很多居民也惨死在他们的手下……”

但是这种大屠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激起更大的悲伤、憎恨、仇视和失魂落魄。因此，他离开了这块死寂的土地，乘船去了塔索斯——那里离色雷斯并不远，还有一个淘金的小岛。他到塔索斯后也并不受欢迎，那里的人无意归降于他。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那座小岛上的金矿，于是他乘船去了列斯波司——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的列斯波司正在闹饥荒，由于无法为自己的军队补充足够的军饷和食粮，希司提埃伊奥斯只好跑回亚细亚。在这里，曾有一个叫美西亚的国家。他命令砍掉这里的一切谷物和一切可食用的东西以补充军饷和食粮。结果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此时他已无处可逃了。他陷入了窘境，犹如跌入无底深渊。人的渺小是无止境的，越是陷

于渺小，越会纠缠于渺小之中，无法自拔，直至消亡。

场面十：希司提埃伊奥斯所到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波斯人叫哈尔帕哥斯，他率领一支大部队驻扎在那里，当希司提埃伊奥斯在那儿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哥斯就与他的部队作战，最终生擒了他，并且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

希司提埃伊奥斯尽管被俘，但他仍试图逃跑：

“当一位波斯人追上他，正想用剑刺死他时，他急中生智，用波斯文大喊一声，我是来自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奥斯！”

场面十一：他们把希司提埃伊奥斯押到了撒尔迪斯。在这里，阿尔塔普列涅斯和哈尔帕哥斯决定在全城人面前就地磔杀(这种把身体分裂的酷刑十分残忍)他，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制成木乃伊送到苏撒国王大流士那里去。(送到苏撒去！这需要三个月的行程，三个月后即使制成了木乃伊，他这首级也会令人不堪入目的。)

场面十二：当大流士得知这件事时，他对阿尔塔普列涅斯和哈尔帕哥斯两个人的做法十分不满，抱怨他们没有把希司提埃伊奥斯活着带到他的面前。他下令，清洗希司提埃伊奥斯的首级，一切收拾干净后，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葬礼。

大流士至少想以这种方法表达他对希司提埃伊奥斯的尊敬，因为就在几年之前，他在多瑙河桥畔曾经拯救了波斯人和亚细亚，同时也拯救了他大流士——波斯王国以及他的生命。

# 兰克医生的诊所

那时我还在刚果，希罗多德描写的这段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血腥战争史，超过了我作为记者在刚果所看到的鲜活的战争现实。当然，这个古铜色国家的战争也深深震撼着我。无论是这边的枪声还是那边的炮声，无论是满城的抓捕、枪战、死亡，还是到处笼罩着的令人疲惫得无法预见的、不明朗的气氛永远令人心神不定。最糟糕的是，这里的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这里没有任何政权，没有任何维持秩序的力量。殖民地制度彻底崩溃了。比利时统治者跑回了欧洲，而在这个地方却出现了一些手握大权的人物，这些危险的人，就是那些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无天的宪兵们。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刚刚推翻了统治政权，一切还尚无秩序的情况下自由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自由会引发缺乏道德标准的无政府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极具进攻性的激进的恶势力会马上或者从一开始就占上风，这时一切卑劣可耻的行为、人的兽性和野蛮行径都会发挥到极致。刚果那时就是这样，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宪兵把持的国

家。一旦遇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会使你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我在某座小城市中的一条叫里萨利的街道上走着。

街上阳光明媚，空空荡荡，十分宁静。

我看见对面有两个宪兵朝我走过来。我想，此时逃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也来不及了，更何况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加之天气酷热难当，就连呼吸和走路都十分困难。可是这几位宪兵却穿得严严实实，全副武装，头上戴着大钢盔，深得能遮盖住他们的半张脸。他们个个都武装到牙齿，每个人身上都挎着一支自动步枪和若干手榴弹、刀子、手枪、棍子及各种金属工具，如小铁锨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身上几乎就是一个便携式的流动弹药库。真的有必要带这么多武器装备吗？我在想，他们高大的身躯上，还负担着腰带和各种可随意拆卸的衬袋，用来放各种金属制品工具、销子钉子钩子以及绳子手铐等。

如果他们穿着和正常人一样的裤子、衬衣，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常见到的那些可爱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可能会给我敬个礼，回答我的提问，然后礼貌地给我指指路。但是，他们现在穿的是军服，身上带着武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本性、特点和形象。与此同时，他们这样全副武装，还肩负着另一个职责，那就是距离感，这一切使他们更难与常人接近。现在朝我走过来的这两个人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人了，我要对他们保持特别的警惕。此刻对我来说，他们就像丧失了人性的庞然大物，站在我面前，好像来自别的星球，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物种。

他们慢慢走近了我，此时，我已经浑身冒冷汗，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越来越沉重。此刻，他们和我一样清楚：他们一旦随便做出任何一种判决都将是无可逆转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我

们所说的高级法院和法庭。如果他们要打死我,那我就会白白被打死;如果他们想出手打我,那我也就只能白白挨打。突然在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无助:我面对的是一个无人能对他们进行制约的强暴。这个世界忽然变得极为空虚,令人发怵,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一点人气,最终变得十分模糊。

今天,在刚果这个小城的街道上出现的这幅仅仅只有两位宪兵和我一位记者的画面,让我们联想起世界历史上另一阶段的另一幅画面。那是在很久以前,在数个世纪之前,人类的历史就出现了相互敌对和仇视。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不同时代的奴隶和商人,他们是利奥波德国王二世忠实的追随者,而正是这些人曾经砍掉了我面前这些宪兵祖辈们的手和耳朵,他们用鞭子严厉抽打、逼迫着这些宪兵的祖辈们在棉田和甘蔗地里为他们卖苦力,辛勤劳作。多少年来,来自不同部落的每个人,都是听着前辈们给他们讲述这一痛苦的经历成长起来的。这些故事告诉他们,他们要永远铭记这些痛苦。今天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人,正是这些站在街道上的宪兵们。他们苦难的历史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他们要把过去对前辈的承诺变成报仇雪恨的实际行动。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就是他们和我都面对的现实。

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不能再近了。

最终他们停住了脚步。

我也驻足在那儿。从他们的枪膛和头盔下面突然发出一种声音,它令我终身难忘。这种声调听上去尽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语气中似乎还带着一点恳求的话意:

"先生,有烟吗?可以给我一支烟抽吗?"

那时,我突然觉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甚至礼貌中都带着明显的殷勤和谄媚,不过这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快拿去吧!我

亲爱的，你们都拿去吧！赶紧安静地坐一会儿吧，整包烟都给你们抽吧！别停，一根接一根地抽吧！！！

兰克医生对我给他讲的故事结局感到非常满意。发生这种场面的结局往往都非常糟糕，宪兵们会不顾一切地把人立即捆绑起来，然后就是拳脚相加，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踢死。他们究竟打死过多少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只要来到这里就都有可能被残酷屠杀。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种族，就连自己人他们也大开杀戒，甚至超过杀死欧洲人的数目。这就是自己统治自己国家的人，他们缺乏任何限度和控制。如果他们没有想杀死我，兰克大夫说，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很需要我。每当他们喝得烂醉时，他们就把所谓的文明抛至脑后，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他们会在自己人当中进行格斗厮杀，甚至会杀红了眼毫不留情，一直打到血流成河你死我活的地步。兰克大夫此时突然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详细描述过这种惨景。这些宪兵们，他说，他们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写的人物一样，他们杀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就算有理由那也许很简单，他们只想施暴和宣泄自己的情感。

兰克大夫是澳大利亚人。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就住在里萨利。他人又瘦又小，已年近八旬，但他很健谈、思维活跃，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他说，他能活到今天，还得归功于他每天早上坚持不懈做的事：每天一大清早，太阳刚刚露头，他就到长满绿草和鲜花盛开的小院子里去，坐在一把椅子上，让佣人用海绵给他擦洗身子，然后用刷子给他刷背。尽管他有时会疼得发出呻吟声，但是他总是很开心。因为他的这种呻吟、嬉笑能逗周围的孩子们开心。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四邻的孩子就都聚到他

正在接受按摩的地方来，在兰克医生住的房间窗户根下露出小脑袋。

兰克大夫在这里开了一间私人诊所，用白漆粉刷的围栏围着，旁边就是他住的别墅。他之所以没有跟比利时人一起逃走，按他的话说，他觉得自己老了，长年居无定所，无亲无故也就无处投身。而在这个地方他早已很出名，他坚信，在这里他能得到当地人的保护。他把我带到他的家，他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作为记者，当时正好也无事可做，跟国内无法取得联系。当地没有任何报纸，没有任何广播电台，当然也没有政府。我想尽快离开这里，可这极为困难，我都不知道是否还有回国的可能。因为，离我最近的飞机场在斯坦利维尔①，通往飞机场的道路早已封闭。事实上，因为正值雨季，即使不封路，那道路也泥泞难行。而刚果河里的船只也因战争早已停运。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听天由命，还得依靠当地人的保护，同时天天期盼着局势尽快好转。其实这都等于白日做梦。但心存希望总比消极绝望要好得多吧。不管怎样，我还是感到非常彷徨无助，焦急不安。我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完全安定下来，因为从事我们这个行当，常常都是把时间空耗在这种与国内、与外界联系不上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之中。

如果说在这座小城市里没有宪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到热带丛林里去探险。热带丛林就在我们跟前。茂密的森林遮盖了一切，令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通向密林深处只有一条红色土路可走，别无他路可行，这似乎是在警示我们世人，密林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刚刚踏入密林，就被参天大树的树干和茂密

---

① 扎伊尔东北部城市基桑加尼的旧称。

的枝叶挡住了去路，每迈一步都非常艰难，腿时常会陷入散发着臭气的黏糊糊的泥塘之中。而在头顶上，时不时会飘落下各种蜘蛛、甲虫、蠕虫之类的昆虫。如果是一个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会十分畏惧向这个热带丛林中未开发的处女地深处走。有时，甚至当地的人都会认为到热带丛林中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热带丛林就像浩瀚的大海，崇山峻岭中的断壁悬崖，是禁区、是极具独特辐射力的实体。

当然，这一切也令我感到恐怖。

我战战兢兢地在丛林中行走，十分害怕，担心会有毒蛇和猛兽突然闪电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同时，更加令人惧怕的是从耳边呼啸而过的枪声。

每次我走到绿草茵茵的地方时，总会有一大帮孩子聚到我身边来，愿意陪伴我。别看孩子们在户外高兴地嬉闹逗笑，可一旦到了密林深处，他们也都会收起笑容，变得很严肃，不敢说笑。也许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感触到密林深处可能潜伏着什么神秘的、令人恐惧而又会施魔法的幽灵，他们会把不听话、爱打闹的孩子拐骗绑架走。因此他们可能会自觉地保持沉默，随时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热带丛林路边停留一下。在丛林附近阳光时常是朦胧的，丛林边常散发出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在热带丛林路边尽管看不到任何动物，但能清晰地听到小鸟的歌唱，能听到雨水打在树叶上清脆的水滴声，还能听到神秘的瑟瑟声。孩子们喜欢来这里嬉耍，他们对这里的一切，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哪片叶子可以摘，哪片叶子可以吃，哪片叶子绝对不能碰。哪种水果可食，哪种水果吃了会要人命。他们知道蜘蛛有毒，但是蜥蜴没有毒。他们还知道，应该随

时注意树梢上的动静，因为，那里可能潜伏着毒蛇。女孩子比男孩子显得更加小心谨慎。我注意观察她们的表现；同时提醒男孩子要听女孩子们的劝告。我们大家，一路人马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好像都是在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在高大的教堂中，我们每个人都显得十分渺小，这令人愈发觉得，世上的万事万物似乎都显得比我们人类强大很多。

兰克大夫的别墅建在一条宽广的大路旁，这条路正好位于刚果北部和通向赤道附近的交叉道上。这条路还可以直通班吉，可以直达坐落于几内亚湾的(喀麦隆港口城市)杜阿拉，尽管这里的海拔跟 Fernando Po 差不多，但离那儿还很遥远，大约有两千多公里。这条路曾经有一部分早已铺成了沥青路，但现如今，这条路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毫无形状，是一条难于形容的破损之路。当我不得不在漆黑的夜晚赶路时(热带地区的夜晚是浑浊多雾、很难辨清方向的)，我只能在这样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用脚探索着慢慢前行，别无选择。

夜间，只能听见我的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拖着脚在路面上蹭着走，因为路上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凹凸不平的大坑和洼地。夜里，当我在路上遇到成批成批的逃亡难民时，常常会突然听到，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那时不用问，肯定是有人掉到了深坑里，摔伤了腿脚。

怎么会有这么多逃亡难民呢？

一夜之间大家都突然变成了逃亡的难民。自从 1960 年夏天刚果获得独立以来，国内混战不断，部落间残杀频频，后来竟然爆发了难以收拾的内战。自此，各条大路就挤满了逃亡的难民。哪里发生了冲突，哪里就有宪兵去阻击，哪里就会建立军队

和特设临时部落警察，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此时只能选择逃难。实际上，一旦成为逃亡难民就等于走上了不归之路。这些逃亡难民的初衷，只是想暂时远离炮火纷飞的战场，尽管他们没走出多远，但终因迷失了方向，无法重归故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逃难者在逃亡路上，还要艰难地寻找充饥的食物。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极度贫困的人，而出逃的妇女们只有身上穿的棉布袍，男人们也只有身上穿的裤子和衬衫，他们随身可能还带有一些夜晚睡觉时遮盖身体的破布、煮饭锅、杯子、塑料盘子和能盛杂物的大盆等，除此以外，可以说一无所有。

在选择走哪条道路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弄清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你选择的道路是否通向友好部落，上帝保佑，千万不要走向仇者部落一方。因为，这些居住在路边村庄和热带丛林中的人们，他们都从属于不同的氏族和部落，而要想了解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件非常艰难而又十分错综复杂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孩提时代起，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从属概念。因此，他们可以相对平安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数十个部落杂居的地区。

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协会和同盟。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法在头脑中对这一切马上理出头绪，更无法立即诠释这一现象，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弄懂这里面含有的深奥的学问。我怎么可能弄清楚，在姆瓦卡和潘德部落之间，或者在班扎和芭雅部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但是这些部落的人却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天天生活在其中。

他们甚至知道，哪条路上有人放了带毒的荆棘，什么地方挖了墓坑。

从哪儿冒出了这么多的部落？

其实仅在一百五十年前，非洲还存在着数十万个部落，甚至一路之隔就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部落：那边的第一村叫图马拉部落，而与之相邻的则叫阿鲁西部落。在河的这边，有个部落叫穆尔勒，而在河的那边，部落名则叫托博塔。在山顶住的是一个部落，在山脚下住的是另一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有自己崇拜和敬仰的不同的神灵。

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之间怎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样的差异和多样性又是如何发展到了令今人不可想象的丰富程度？这一切是从何地起源，从何时开始的呢？具体是从哪块地方开始的呢？编年史家们称，起初，部落都是由一个很小的群体的人组成，或许是由几个小群体组成的。每个部落至少由三十至五十人组成。如果小于这个数目，这个部落可能就无法进行自卫，如果大于这个数目，很可能就供给不足。我自己在东非就遇到过两个类似的部落，每个部落都不超过一百人。

那好，我们就先来说说三十至五十人的部落吧。把这个作为一个部落的起始基数。但是以这个数目为起始基数的部落又是怎么发明他们自己最初的语言的呢？

人类的思维是怎样发明了这样令人惊异的语言排列组合？

是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语法和音调变化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是拥有数百万人口以上的各大民族共同努力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但是，在非洲丛林中，这里都是些小小的部落，他们生活在世界的边缘，人人赤脚走路，并且永远缺吃少食，但是他们却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能力，靠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语言音调的敏感以及高强的记忆发明了自己的

语言——他们的语言特点是清晰、独特，只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我们不只是在语言方面能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在发明语言的同时，从一开始就创造了自己敬奉的神灵。每个部落都有自己信奉的不能被别的部落取代的神灵。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不同的神灵，要去信奉不同的神，而不是同时信仰同一个神？

为什么人类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反而却欲把人类信仰缩小到只准信奉一个神呢？

是不是从人之初就得树立这样一种概念？

这是科学引导的结果吗？科学认为一开始只有一个部落群体，无论如何不会是多个群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部落群体在不断扩大增加、繁衍生息，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多。令人好奇的是，这种不断扩大、增加、膨胀的新群体，竟然没有先去考察别的地方，也不先去调查了解当地的形势，没有去认真聆听人们是在用什么语言互相交流。不，他们不这样做。他们首先是用自己的语言思维，去信奉自己的众神，沿用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习惯。这样的人才会首先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数百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群体还在不断增加扩大，繁衍生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口还在不断膨胀，语言种类和众神也随之在增多。

希罗多德，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认真记录下每个部落的名字，记下他们所处的位置和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等。他会记下，谁住在什么地方，与谁为邻。因为在那时，他所获得的关于利比亚和斯奇提亚的知识，就像今天我们在刚果的北部所能获取知识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是横向获取知识，而不是纵向，是通过鸟瞰式的、综合的方式方法获取知识的。我很了解我的近

邻，知道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又了解其他人，其他人又了解另外一些人，就这样我们可以一直了解到世界另一端的其他人的事。而又有谁能把这一切信息都存储下来，并且有序排列好呢？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也不可能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当人们在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时，当我们翻看他的书、阅读着他大段大段详尽描写每一个部落和他们的风土人情时，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喜欢选择与他们在各方面不尽相同的邻里。因此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敌对，战争频繁发生。在兰克医生的小诊所里也同样会发生此类事情。因为，病患者的亲友们，再加上他们各部落和氏族的人们，整天都会在患者的床前转来转去。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在家的感觉，以便让每个人都能轮班工作。

首先还是让我小心翼翼地试着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吧。我在兰克医生的小诊所里走来走去，东张张西望望地看着这里的每个房间，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在这种闷热潮湿的气候里，为了通风，几乎每扇门都是大敞四开的。来这里的每个人，在我看来，他们长相都差不多，他们个个是穷苦人，每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但只要你去认真听听他们讲话，你就能立刻分辨出，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同。如果你对他们微笑，他们也会给你投来一笑。这时你才会发觉，哪些人的笑容会在脸上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哪些人的笑容只在脸上停留瞬间，如昙花一现。

# 希腊人的技巧

机会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离开里萨利了。我们被困在这里，离开这里的机会终于到了！突然，有一辆汽车出现在终日空旷的大路上，望着从远处开过来的汽车，我们的心激动得都快要跳出来了。我们挥舞着手臂，拦住了汽车。

“先生，你好！”(我们用法语说。)

“车上还有空位吗？”

我们非常殷勤地问司机。真心盼着司机说还有空位。当然，车上不可能有空位。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汽车上挤满了人。汽车里的人都已经被挤得快喘不上气来了。但此时，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鼓足全身的勇气和力量再次拼命往一起挤，也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拧着身子挤上了车，车发动了。只有当车开动以后，我们才敢问挤坐在周围的人，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车是往什么地方开。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没有人弄得清楚，我们的汽车是往哪儿开。我们只能跟着车走，车能开到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很快发现，车上所有人的想法都跟我们差不多，就是希

望走得越远越好。战争让全体刚果人民——这个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到震惊和惊心动魄。此时那些背井离乡，无论是出外打工的还是探亲访友的人们，都是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有家不能归。其实回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到自己渴望的地方去，那里可能有我们的家园，就像现在这样，乘着车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们在路上时常碰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长途跋涉，远离家乡有数星期或者数月了。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地图，即使真能看到什么地图的话，我也敢肯定，在那上面，谁也不可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小村庄和小城市的名字。地图对他们来说无任何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都是文盲。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迷失方向的流浪者们却都能默默地、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一旦有机遇，他们就拼命挤上车，跟着车走，能走则走，走哪儿算哪儿。如果碰不到机会，他们就会坐在马路牙子上苦苦地耐心等待。我最关心的是，那些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的流浪者们，如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也不知道，他们所走的方向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家乡，越走越远。今后他们是否还能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无人听说过他们家乡那些大小村庄的名字。

在这种完全迷失方向、背井离乡的情形下，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不要散开，尽量保持跟自己部落的人在一起。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能只寄希望于等到有汽车来以后跟车走。他们还必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簇在一起徒步行走。我们常常能在路上碰见，一个部落的人群同另一个氏族的人群一起行走的队伍。有时他们的队伍长得像一条望不到边的长龙。他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自己所有的家当，有的是大捆包、有的是大盆或者大

桶。他们的两手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样一来能保持身体平衡，二来，在必要时，双手还可以驱赶围上来的蚊蝇或者擦去脸上的汗水。

每当车停在路边休息时，我就过去与他们随意攀谈。他们都很愿意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当然如果他们知道的话。我问他们，你们去哪儿？他们很干脆地回答说，去金都，去刚果鲁，去路萨姆波。可当我问他们，这些地方在哪儿？他们就显得很尴尬，回答不上来。他们怎么可能给一个陌生人解释清楚金都在哪儿呢？但有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给我指指，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南边。我问他们，那个地方离这儿远不远？他们就显得更加尴尬，因为，说老实话，他们真的不知道。我问他们从哪儿来？一个回答说，从耶科来，一个说从塔布瓦来，一个说从仑达来。

我问他们，像他们这样四处流浪的人多不多？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如果我问了年轻人，他们会说你去问问那些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吧。如果我去问那些老年人，他们就会互相推诿。

从我手头有的一张地图（非洲地图，是由柏林的一家叫 Kummerly & Frey 公司出版的，但没有出版年代）看，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大约是在 Stanleyville 和 Irunu 之间的一个地方，我那时正在想方设法转到相对比较平静的乌干达去，到甘巴去，因为在那儿我可以与伦敦取得联系，或者通过伦敦把消息和报道转发到波兰首都华沙。有很多人羡慕我们从事记者工作，认为我们可以到处愉快地去旅游，见多识广。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因为，作为记者，旅游不是首要目的，首先得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就是要注意随时保持跟国内的联系，把自己了解到的第一手消息和重要消息迅速发给国内。

这正是国家派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的目的，我们没有任何理

由和托辞耽误工作。如果我能很快到达甘巴的话，我可以按自己原先的计划，下一站赶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去，然后去达累斯萨拉姆和卢萨卡，从那儿转道去布拉柴维尔、去班吉和恩贾梅纳。有一天，我正好有一点儿空，就去了一位比利时人在布干维尔岛建的大别墅，我们坐在他别墅的露天阳台上，那里长满了鼠尾草、天竺葵。这位比利时人曾是已经关闭了的木柴厂的老板。交谈中，他给我摊开一张地图，我在上面给他指指画画，讲我未来的憧憬、计划和梦想。我们交谈间，有一大帮孩子围在他这幢别墅边，默默地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们这两个白人。他们可能在琢磨，这世界上怎么什么怪事儿都有，不久前听老人们说，白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家园，而在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两位白人坐在这儿不走？

我的非洲之行一直在继续着、延续着。过了一段时间，我都快把一些经历的时间和地点弄混了。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这块大陆还在不断膨胀，每天都有各类事件发生，我不停地走啊、写啊，我觉得，周围发生的每一事件都很重要，非常独特，值得我去亲历，去见证，去报道，哪怕能报道其中的一部分也好。

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还有一点精力，我都会挤时间阅读各种书籍。那时，我手中有一本叫《西非学》的书，作者是一位英国女性，她叫玛丽·金斯雷，此书于 1901 年出版。在她的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自己在非洲的旅游，尖锐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非洲问题的看法。后来我又通阅了一本叫《班图人的哲学》的书，这本书出版于 1945 年，作者是一位神父，叫普拉希德·特姆佩尔萨。我还阅读了另一本非常著名的、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书，名叫《非洲歧义》，1957 年出版于法国巴黎，作者是法国的人类学

家乔治·巴兰迪尔。当然,也少不了时不时拿出希罗多德的书阅读。

这期间,我暂时放弃了关注希罗多德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有关战争的描写,我开始关注他描写的手法和技巧。更加关注他是怎样写作的?他的写作兴趣在什么地方?他是如何与人打交道的?他都提了哪些问题?他是怎样聆听人们给他讲故事?我认为我需要了解这些,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运用怎样的手法和技巧写好我的新闻通讯报道。希罗多德给了我无限的帮助,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希罗多德常与什么样的人邂逅,这应该是问题的实质。因为我们每天写的报道都少不了写人,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和他、我和他们的关系。能否把这些关系的特性写清楚,并且能否掌握适度,这都会影响到我们今后所写报道的价值。我们依赖人,因为我们的报道更可能是一种依赖于集体创作的写作方式。

在阅读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未曾有人去特别关注过这位希腊人在写作过程中用词的精确和事实的可靠性。同时也未曾有人特别留意,他是怎么搜集原始资料,而他后来又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资料非常好地织在一块质地极好的布毯上。而我觉得,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的一个地方。

在他的写作风格方面,其实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想重新反复提及《历史》这本书的作用。随着对《历史》一书的反复阅读,我开始觉得,我越来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希罗多德的热情,甚至友善。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好像不是越来越离不开这本《历史》书,而是越来越离不开作

者本人。此刻，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描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总之一句话，我觉得我和他越来越亲近，可我与他本人未曾相识，他与别人融洽相处的人格魅力、处事方法令我着迷。因为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极具凝聚力，能把人们立即聚集到一起、结合到一块儿，形成一股共同的力量。

希罗多德是希腊文化的继承人，是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继承人。希腊文化历史悠久，人们热情开朗，豪爽奔放。夜晚人们常常围聚在一起，享受美味可口的奶酪和橄榄果，畅饮冰凉的葡萄酒，纵情交谈。在没有围墙的广阔天地中，在宽广的高山大海边，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地畅想。每次大家相聚在一起欢宴畅饮，都给每位前来参加这类活动的闲谈者们提供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自发的竞赛机会，使那些有口才、善于雄辩之人，在讲述动人的故事和叙述引人关注的事件时能崭露头角。当然，有时人们也可能会把某些事实和幻想混淆，有时也可能会把时间和地点弄错，因此而产生了传奇故事和虚构的神话故事。

在阅读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热衷于参加这种宴会聚会，并且在宴会聚会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而我们这些现代人，都被现代技术成果宠坏了。应该说我们的记忆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我们一旦离开书本或者电脑，就会陷入恐慌状态。尽管这样，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具有惊人记忆力的群体。希罗多德就生活在那些具有惊人记忆力的群体世界中。在他那个年代，书籍是稀缺物，刻在石头和墙上的文字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时，人们主要靠的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人为了生存，必须时刻意识到身边还有别人的存在，必须能时常见到他，听到他

的声音，那就必须交流。在那个年代，别的交流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可以说，也就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这种靠口头交流的文化，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懂得，其他人不仅仅是一些能帮助自己找到食物的人，也不仅仅是在敌人面前可以保护自己的人，他们还是那些能向他们描述世界或者指导他们人生的人，他们是一些特殊的人，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人。

这种人与人直接交流的语言亦是苏格拉底所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原始而又古老，而且丰富多彩！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可以用面部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来互相交流。希罗多德很清楚这一点，他像每一位人类学学者和记者那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可能，与自己的对话者进行直接交流，目的在于，不仅认真聆听他们说什么，同时还要观察他们是怎样讲述故事，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表现自己的。

希罗多德是从两方面来阐述自己观点的。一方面，他十分清楚，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他首先得记住与他对话的每一个人，这几乎是他积累资料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人类的记忆是非常脆弱的、不稳定而又短暂的，记忆是可以消失的。他之所以比较急切地想方设法记下一切他的所见所闻，那正是因为，人们有可能会忘记或者离开自己的家乡，或者人们会由于年老体衰而逝去。那时，他就不可能再找到他们，因此，他就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在人们中间搜集可靠的资料。

他清楚地知道记忆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所以他在自己的文摘中常常非常小心地、时常不断地提醒并且强调对自己所记载的资料有所保留。

那时的巨吉斯，据我们所知，他非常残暴，他是第一个非希腊人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贡品之人……

“人们都说他十分渴望到伊萨卡岛① 去……

“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他们所做出的推论是从知情者那里得知了不知情者的情况……

“我所获悉的，都是他们所说的……

“这只是我自己从人们口中听到的关于那些遥远国家的记载……

“这些资料的真实度如何，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是记载了人们对我所说的话……

“我不敢确定，伊奥尼亚人当中是谁在这次战役中临阵脱逃，哪些人是英勇奋战之人，因为他们自己都互相指责抱怨……”

希罗多德非常清楚，他周围的世界万事万物是变化无常的，人们的认知也是不完整的。因此，他时常不断地为资料的欠缺而深表歉意，他也为自己解释并且证实说：

“我不可能去跟某个人辩论关于欧凯阿诺斯河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是基于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否有所谓的欧凯阿诺斯河。我觉得也许是荷马或者是某位先祖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而后把它写到了自己的诗作里面去。

“这块陆地后面究竟有什么……我看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我也没办法从别人那里获得确切的说法，有谁亲眼见过……

“我无法确切地打听到在斯奇提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我所得到的数字都是相互矛盾的……”

---

① 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为希腊神话中尤利塞斯的故乡。

在希罗多德生活的那个年代，为了去考察和考证及寻找资料来源，确定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属不易，应该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还是没能找到任何一个见证人能告诉我，在欧洲的北部是否有海……

"根据我的观察并且得知，这个神殿是坐落在这里的最老的一座神殿，它叫阿普洛迪铁……

"我想从人们那里了解并获悉一些确切的资料，为此，我甚至专门乘船到了腓尼基的推罗，因为我听说，那里有一座叫海拉克列斯的神殿……我与那里的祭司交谈时，我问他……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说法跟希腊人说的不一致……

"我自己就亲自到过一个阿拉伯的地方，目的是去打听一下是否真得有人见过带翼的蛇。当我到达那里时，我只看到了数不清的蛇骨和蛇的脊椎骨……

"(关于凯姆米司岛)……据埃及人说，这个岛是一个流动的岛。但我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和感觉到，此岛是流动的或者说是活动的岛，但是……

"我个人觉得这种传说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我自己亲眼所见……"

如果希罗多德说，他知道或者了解什么，他是怎么获知这些的呢？那他就会说，我不仅听说过，也亲眼见过：

"我只是记述了我从利比亚人那里听来的……

"据特拉奇尼亚人说，伊斯特河左岸是被蜜蜂占领的地方……

"迄今我所能解释的，都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判断和调查得出来的结果：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打算说说我所听说的

关于埃及人的历史，这里也有我自己不止一次亲眼所见和亲历的……

“不管什么人，他只要觉得埃及人所说的历史可信，那他就能接受这些事实。我的责任是，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我应该把我所听到的全部细节尽可能地都讲述出来……

“当我问那些祭司时，希腊人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否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他们的回答是，关于这些，他们只是在跟美涅拉欧司交谈中得知的……

“（关于科尔启斯人）科尔启斯人实际上就是埃及人。他们非常肯定地说。在我听别人谈起这件事以前，我自己也已经注意到此了……同时，我也发现，科尔启斯人的肤色比较黑，毛发是卷曲的……而更特别的事情是，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是从远古以来就实行割礼的民族……

“让我也来向大家转述一下，我从波斯人那里听来的一些故事，他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美化居鲁士的历史，而是想要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相……”

希罗多德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好奇心，他会赞美这一切或者为之感到恐惧。他对许多事情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人们极容易把幻想变成事实：

“那些祭司们自己就曾说，当连我都觉得此事不可相信时，上帝自己就会亲临教堂……

“（关于拉姆普西尼托司国王）做了下列一些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去卖淫，还命令她不论任何男人，一律接待……

“秃头者们这样说，但我自己却不大敢相信，住在山里的这些人们，是一些长着山羊腿的人，这些人离开这里之后，那就会

来另一个民族，他们在一年当中要用六个月的时间睡眠，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绝对不可信的。

“（关于涅乌里司人，他们是会变成狼的人）我本人是不相信这个传说的。但他们一直坚持这样说，并且发誓说这是真的……

“（关于雕像，据说雕像曾经摔落在人们的腿前）我本人也是不大相信这个故事的，也许有人会相信——是的……”

希罗多德作为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全球主义者，他嘲笑并且讥讽与自己处于同时代人的愚昧无知。

“令我觉得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是，每每我看见，有许多人试图绘制全世界地图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提供任何理论依据。因为，他们把世界画得像圆规画出的那样圆，而欧凯阿诺斯的河流的水围绕其四周流淌。同时，他们把亚细亚和欧罗巴画成一样大小。至于我本人，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广袤以及它们的轮廓如何。”

当他介绍完亚洲、欧洲和非洲以后，他用一句话概述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弄不明白，我们这块完整的大地要用三个不同的名字命名，而且还都是用妇女的名字来称呼……”

# 在他被狗和鸟撕得粉碎之前

我绕道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才辗转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常跟着我跑路的司机叫奈古斯。他长得又瘦又小。在他瘦瘦的、爆着青筋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与他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大脑袋。他的眼睛非常引人注目——大得出奇，黑黑的眸子闪着亮光，看上去很像梦中见到的某位漂亮姑娘玲珑的大眼睛。奈古斯酷爱干净，几乎接近洁癖的程度。每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停车时，他都得用随身带的掸子认真地掸掉衣服上的灰尘。在这个国家，每当旱季，总是漫天尘土飞扬，黄沙一片。

我和奈古斯一起旅行，我们一起闯过了最艰难、最危险的数千公里的道路，再次使我感受到，人类发明的手势和暗号真是无比丰富多彩。你只要努力体会，就会感受和理解其中蕴含的意思。现在人们早已习惯了，与其他人的交流或者通过口语或者通过书面语。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只是人类互相沟通时所用的多种方式方法中的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人类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方法远远不止如此。因为，人的肢体所做出的各种

姿势都可以传达某一种意思——比如说，面部表情、眼神、手势和动作，肢体的波动都能传情，甚至，人的衣服及穿衣服的方法亦是如此；当然还有多种我们用来表达意思和传情的介质，比如说，扩音器、消音器，这一切都各有各的用处，但是这都会对人产生化学反应，“化学反应”这一词是英国人喜欢挂在口头上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减少并改变了人们之间传达感情信息的功能，使这种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变得越来越弱，变得越来越贫乏。我们每天在一起，不断地进行交流，甚至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外，这种无声的语言、面部表情、小小的手势，比起我们每天所说的口语或者书面语显得更加真挚和诚恳。因为，这种表达方法很难作假瞒骗、掩盖虚伪。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为了真能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认为，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妙计，那就是面无表情或者表情僵硬。只有这样，在这种令人难以解读的面具之下，在一种茫然的眼神掩饰下面，才能把自己真正很好地伪装起来。

奈古斯只懂两个英文单词：有问题和没问题。

在这两个单词的辅助下，我们甚至可以在最危险的情形下，都能立即心领神会。此外，再加上那些每个人都特有的无言的手势和肢体语言，如果注意，认真看后能意会，这就足够了。为此，人和人之间就不会产生心灵的鸿沟，不会互相感到陌生，那就可以一起出门旅行。

当我们的汽车开到谷巴山时，被那里的巡逻兵拦住了。这里的军人是一帮被宠坏了的兵痞，他们烧杀掠抢、肆意横行、贪得无厌、无法无天，整天浑浑噩噩，酒醉熏天。这里四周是悬崖峭壁，崎岖陡峭的高山深处，空空荡荡，荒无人烟。奈古斯跟他

们交涉。只见他把手贴在胸脯上，向他们解释着什么。而他们也在嘟囔着什么，不停地搬弄着自动步枪的枪栓，他们把头盔压得很低，我无法看见他们的面部表情，这令人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

“奈古斯，”我问他，“有问题吗?”我可能会得到双关回答。如果他用轻柔的口气回答“没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欣喜地继续前行。但他也有可能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回答说“有问题”，那可能就意味着，我得从口袋里立即掏出十美元，贿赂这些兵痞，之后他们才会放我们走。

突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四周路上没有任何异常，只是周围照旧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可是奈古斯却开始不停地蠕动着身体，看上去他内心焦躁不安，他不停地东张西望。于是我问他：

“奈古斯，有问题吗?”

“没问题。”他回答说。

但他还是东张张西望望的，此时，我能觉出，他内心特别紧张焦虑。我们汽车里的气氛立即变得异常凝重，是他的恐惧感染了我。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熬过了一个钟头。后来，到了一个拐弯儿处，奈古斯突然松了口气，双手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用阿姆哈拉语哼着小调。我又问：

“奈古斯，没问题吧?”

他高兴地回答：

“没问题!”

后来，等我们到了附近一个小城镇时，奈古斯才告诉我，我们刚才穿越了一段众人皆知的盗匪时常出没的危险之路，在那条路上盗匪们不但抢劫掠夺，而且还杀人。

这里的人们不但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非洲，甚至也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十分了解自己这片小小的领地上和自己部落所在之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土地上，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秘密，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甚至习惯了在漆黑的夜晚行走，他们用手触摸过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和生长在路边树丛的每一片枝叶，他们甚至在漆黑的夜晚赤脚走路时，都能辨别出常人用眼都看不见的小路通向何方。

我跟奈古斯一起去过阿姆哈拉，那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我才同意与他一起去的。他这个人虽然很穷，可是，在他心中却有一个小小地方，令他为之自豪，那就是深藏在他心中的对自己家乡这块土地的眷恋，尽管他只能模糊地描绘出这块地方的大概轮廓。

每当我说渴了，想喝水的时候，奈古斯就会把车停在一条小溪旁，劝我去尝尝这里冰凉清澈的溪水。

“没问题，喝吧！”

他冲我喊着！

看见我还犹豫，他觉出，我可能怀疑这水是否干净，便立即把自己的大脑袋扎进水里，证明给我看这水是纯净的。

当他看见我走向高大岩石旁，想在那上边坐一会儿时，奈古斯就会立即拦住我，对我说：

“有问题！”

然后，他又打着各种手势，比划着，意在警告我那里可能有蛇出没。

每一次远征到埃塞俄比亚纵深地带，我都会觉得非常值得。一般来说，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搜集信息、撰写电报、去邮局发电报和电传，通过邮局的值班人，我可以把这些电报电传发到波兰

通讯社驻伦敦代表处（这样做比直接把电报发到华沙更便宜些）。大家知道，搜集信息是一件非常耗时而又极难做好的事，有时还需要要点儿小手腕，用点儿小计谋。在这里，能打探到的情况少之又少，更别提迅速捕捉到什么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了。在这里每天只发行一种报纸，而且只有四版，报纸名叫《埃塞俄比亚先驱报》。（我好像有几次在某个省看见过这个报纸。每次有公共汽车从亚的斯亚贝巴开来的时候，车上除了有运载来的乘客，同时也会捎带一份报纸，每当在市区广场聚集很多人时，市长或者当地的老师就会用阿姆哈拉语高声给大家读报，不过这家报社也出英文缩印版。那时，每个人都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到处充满了喜庆的节日般的气氛，因为，大家为能听到从首都带来的报纸的信息而感到欢欣鼓舞！）

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是帝制国家，不存在什么政党、工会，更没有什么所谓的议会或者反对派。但在埃塞俄比亚的北方，那里有厄立特里亚游击队，他们大都驻扎在无人敢去的深山老林里。还有索马里的抵抗运动，但他们也都是驻扎在荒无人烟的欧加登[①] 的大沙漠里。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想去那里也无法去，因为交通十分不便，得舍得花大约数月的时间才行。我自己十分清楚，我是波兰通讯社唯一派驻整个非洲的记者，我不可能突然销声匿迹在杳无人迹的荒芜的土地上。

作为记者怎样才能迅速搜集到信息呢？我的来自富有国家的同行们，比如说：路透社、美联社或者法新社的同行们，他们有经费雇用翻译，可我没有这笔经费。此外，在这些国际大通讯社驻当地记者办事处的办公室里，都配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大收音

① 又译奥加登，埃塞俄比亚东南部一地区。

机:美国产的 Zenith,Trans－Oceanic,通过这些收音机能收听到全世界的广播。这些设备非常昂贵,我只能看着他们望洋兴叹。因为没有这些先进设备,我只能靠土办法搜集信息,那就是靠步行,走到哪里打听到哪里,认真聆听人们给我讲故事,有时还得用一些甜言蜜语,甚至哄骗手段去挖掘自己所需的信息。之后把这些信息、评论和故事串联在一起加以总结归纳。我这样做无怨无悔,因为,我在工作中结识了许多人,并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在报纸和收音机里没有的东西。

每当这里的局势暂时平息一会儿时,我就和奈古斯约好去其他地方走走看看。但我们也不能走得太远,因为,在这块广漠的土地上,一旦走出去,就会几天,甚至几周都回不来。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二百公里的路程,但因为这里到处是蜿蜒崎岖的山路,加上圣诞节临近了,整个非洲,尽管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但非洲的局势也明显平静了许多,更别提埃塞俄比亚了,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从 16 世纪就接受了基督教。

你去 Arba Minch 吧！那里也有秘密组织活动。他们用十分坚定的口气对我说,甚至让我感到,一听这个地名,就令我与它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共鸣。

一点也不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同寻常。在平坦空旷、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在 Abaya 与 Chamo 湖之间有一片低矮狭窄的低地,竖着一块刷着白漆的木牌,上面写着:Berkele Mole 饭店。那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开放式的长廊,一直伸向湖边。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跳入碧绿的湖水中,湖水的颜色完全取决于阳光照射的角度,有时湖水会是湛蓝湛蓝的,有时会变成翠绿色,有时几乎可以说是变成了紫色,到了夜晚,湖水就会变成深蓝色或者黑色。

阿尔塔巴诺斯最初还规劝安慰克谢尔克谢斯，让他不要理会这种梦，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有梦，都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阿尔塔巴诺斯还说，他认为梦不一定代表天意！

他的安慰不但没能说服这位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而且梦中幻影也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位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梦中幻影反而更变本加厉、令人生厌、不可思议地来恐吓他。最终，就连这位明智而又慎虑的阿尔塔巴诺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竟然也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从一个怀疑者变成了狂热的信徒，变成了幻影天意命令的执行者。去讨伐希腊吗？那我们就出征吧！而且要立刻出征！从此可以看出，人无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会受到束缚。因此可以说，精神的力量远远大于物质的力量。

对一个普通的波斯人或者希腊人来说，从克谢尔克谢斯噩梦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啊，上帝呀！如若一个伟大的人物，王中之王，统治世界的人，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弄，更何况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一粒小小的无足轻重的微尘！在人们的这种想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蕴含着人对生活的一种满足感，以此得到一种心灵的自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当然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尽管他曾一度统治了世界（几乎是统治了全世界，除了两个城市——雅典和斯巴达，这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但我们并不太了解他。只知道他三十二岁时登基。他殚精竭虑，要掌握绝对权力——他欲统治一切，让每一个人都臣服于他。（此时，我想起了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妈妈，我们何时能拥有一切?》，可惜我已经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了。）这恰好活生生地展示出了克谢尔克

谢斯这个人物的内心。因为他想把世界上的一切据为己有。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反对他的代价就是掉头。但在大家都保持沉默的气氛中，只要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那就会让他感到焦虑不安、犹豫不决。阿尔塔巴诺斯这件事就证实了这一点。克谢尔克谢斯在听了阿尔塔巴诺斯的劝告后，顿时丧失了勇气，变得心神不宁。他听从了叔叔的规劝，收回了征战希腊的命令。但这种自相矛盾、左右为难、不知何去何从的精神状态一般都只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而现在，这事竟然会发生在这个最高统帅和最高决策人身上，这把他推向了世间的舞台亮相。从此他得遵照天意行事。天命不可违：你既不能改变也不能回避，甚至明知有掉进地狱的危险，也只能服从天命。

为此，克谢尔克谢斯遵循了天意的指令，奔赴了战场。他知道，他的强势在于，他具有东方的威力，亚细亚的强势——即人的力量，他有数不胜数的众人力量，他确信，有了这一切，他就拥有了作战的砝码和动力，就一定能够征服和战胜敌人。（这个画面让我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场面：在波兰的马祖尔地区，俄国将军们率领手持卡宾枪和赤手空拳的战士歼灭了德国一个团的兵力。）

最初，他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创建和整编部队——这是一支具有世界强势的大军，大军中有来自波斯帝国的所有不同氏族、不同部落、不同血统的人。在希罗多德的书中，他为了解释清楚这些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些描写竟占了他好几页的篇幅。他历数了这些军队的构成：步兵、骑兵、舰队，总共有五百万人。当然，这可能有些太过于夸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支数量极为庞大的军队。怎么来维系这么庞大的军队？怎样保证军队人和牲畜的粮食及饮水供应？这些人和牲畜在他们所经过的路

上饮干了各条河的水，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干涸的河床。有人注意到，幸亏克谢尔克谢斯一天只吃一顿饭。如果波斯国王和他庞大的队伍每天要吃两顿饭的话，那么，整个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早就变成了一片荒漠，当地的人们也早就被活活饿死。

希罗多德对这支令人眩晕的人山人海的庞大军队、畜群和各种装备感到万分震撼。此外，这支队伍中的军人，穿的都是来自自己部落、自己民族的服装，因此，很难用语言描述出这是怎样一支服装色彩华美丰富多样的军队。在行军队伍中，行进着两辆二轮战车：

"宙斯神的神圣战车，是由八匹白马拉着，战车夫牵着马缰绳徒步跟在马的后面走。因为，世间的任何人都是不允许坐在这个战车上面的。这辆战车后面跟的是克谢尔克谢斯乘坐的涅赛欧伊马拉着的战车……后面跟着的是波斯最高贵的一千名手持长矛的枪兵，枪兵后面又是一千名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则是一万名从波斯人当中选拔出来的精锐部队中的敢死队步兵……这些步兵的枪柄上镶嵌着的黄金闪闪发光……他们也跟着战车走。而坐在战车上的随行人员，都身穿非常华美漂亮的服装。"

行进在队伍最后的这些人则是不按民族区分，而是由各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杂牌军。

我们可千万不要误解这些行进在前往战场的路上的军人所穿的色彩斑斓的服装。他们不是去参加喜庆节宴。恰恰相反。希罗多德记载：

"这些在沉默中艰难行进的大军，需要不断地被人用鞭子抽打，赶着他们往前走。"

希罗多德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波斯国王的表现。克谢尔克谢

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精神似乎有些错乱、令人无法预知；他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自相矛盾的人，这让人想起 Stawrogin。

他就这样跟随着自己的大队人马向撒尔迪斯（古吕底亚王国）挺进。在挺进的路上他曾看到一棵树，便命令在这棵树边停了下来：

“因为他觉得这树太美了，于是，就命令用金子把它装饰起来，还指派一个人作为这棵树的永远看护者。”

这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一路上对他遇到的那棵树赞不绝口，感叹那棵树如此美丽迷人。正在他感叹之时，有人来向他报告说，海列斯彭特海峡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摧毁了他们刚刚架起的桥梁。架这座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波斯军队顺利挺进希腊，同时它也将成为波斯军队从亚洲进军到欧洲的重要桥梁。听到这个坏消息，克谢尔克谢斯立刻大为震怒。

“命令他的部下：笞打海列斯彭特海三百下，并把一副脚铐投到大海中去。我听说，他还把烙印师专门派到那里去，让他们给海列斯彭特海峡打上烙印。他命令他们对海列斯彭特海峡说：‘你这毒辣的海水！你一定会得到我们主公的惩罚！因为你深深地伤害了他，尽管他从未伤害过你。无论你愿意否，我们的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也要从你的水面上横渡过去，不让任何人向你供奉，因为你是一条险恶而又苦咸的河流。’就这样他惩罚了大海，并下令把监督海列斯彭特海峡造桥的人们枭首了。”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人头落地。我们也无从知晓，这些桥梁的建设者们是否那么温顺地毫无反抗地把头伸向刀口，也不知他们是否曾双膝下跪恳请饶命。执行砍杀桥梁建设者们的刽子手一定是非常残暴冷血的人，因为参加建造桥梁的人成千上万。不管怎么说，克谢尔克谢斯下了这道命令后，自己平静

了下来,他为此获得了心理平衡。后来,波斯人还是在海列斯彭特海峡重新架了桥梁,神托们却声称,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幸运的预兆。

桥重新架好后,国王克谢尔克谢斯异常高兴,决定继续向前进发,他的吕底亚朋友披提欧斯走到他跟前请求恩赐,说:

"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必须得跟你去参加讨伐希腊人的战争。国王啊!请你垂怜我这个年老体迈之人吧,免除我五个儿子中的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长子——去服兵役,好让他来照料我和我的家产!就让我的其他四个儿子随你去征战吧,祝你在实现你的全部计划以后,胜利归来。"

听了他这番话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大发雷霆,说:

"你这个卑鄙小人,竟敢以年老体迈为由,在此时此刻向我提出免去你儿子服兵役之事?你是我的奴隶,你本应当带着你全家和你的妻子一同随我出征。克谢尔克谢斯暴怒之后,立即命令那些执行他命令的刽子手们,将披提欧斯的长子抓来分尸两段。然后,把尸体扔在道路左右两旁,以便让波斯军队的士兵从分放在路两边尸体的中间走过去。"

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

一眼望不到边的庞大的行军队伍还在继续进发,时不时还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催促人们快速行走的鞭打声和吆喝声,而这些行军的士兵们都亲眼目睹了扔在路两边的披提欧斯长子的鲜血淋漓的头颅和尸体。此时披提欧斯在哪儿?他在守护儿子的尸体吗?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站在儿子尸体的哪一边?看着坐在战车上孤傲不可一世的克谢尔克谢斯,他在想什么?表情如何?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因为,奴隶们那时都得脸伏地面跪倒在地。

尽管这样，克谢尔克谢斯心中总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这种感觉折磨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把这一切都隐藏在他傲慢不逊、高傲自负的兽皮下。为了表现自己的强大，展示自己勇猛无敌，表明自己对掌控在手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充满信心，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陆海军阅兵仪式。而这一群人数众多的军队士兵必须在阅兵仪式上个个表现得勇猛顽强，他们屏住呼吸，拉开弓，把无数支箭在同一时刻射向太阳。他的海上舰队十分庞大，占据了整个海湾，竟令人看不到海湾里的水：

“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他想检阅一下他的全部兵力。他之所以能在这里检阅全军，是因为，很久以前，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特别为他设了一个白色大理石宝座……他坐在那里可以俯视海滨，从而把他的陆、海两军尽收眼底。而当他遥望着这一切的时候，这位波斯国王对此次阅兵以及对他庞大军队和舰队的表现深感满意。当他看到他的战舰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海峡，他的庞大军队覆盖了整个阿比多斯平原时，克谢尔克谢斯说，他此时此刻感到无比幸福，随后还掉下了眼泪。”

国王还会掉眼泪？

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哭泣的克谢尔克谢斯，对他说：

“国王啊！你刚才还说你感到无比幸福，怎么转眼之间你又哭起来了呢？你刚才和现在的所作所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而克谢尔克谢斯却说：是啊！因为，想到人生是如此短暂，所以，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悲悯之情。尽管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无数人，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活到百岁。”

叔侄俩的这段关于生死的对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克谢尔克谢斯派人护送自己年迈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回苏撒了。他自己却在这里一直等到天明，组织安排横渡海列斯彭特海峡，

他决心打到欧洲去：

“当太阳刚刚升起之时，克谢尔克谢斯就用黄金盏向海中行灌奠之礼，并面向太阳祷告说，希望在他抵达欧罗巴最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发生任何意外，不要影响他完成征服欧罗巴的宏伟事业。”

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喝干了各条河里的水，狂食了他们所到之处所能吃的一切东西，后来就在爱琴海的北边驻扎下来，那是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亚和通向铁尔摩批莱的交界处。

在波兰学校课堂教学里都设置了有关铁尔摩批莱的历史课程，通常需要用一个课时讲完，学生们都要知道铁尔摩批莱位于什么地方，并且学会勾画出它的地形来，有时还要做这方面的课堂测验，在高中毕业考试试卷上，时常还会有相关的考试内容。

铁尔摩批莱处于一个狭长的地带，位于今天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海域和高山之间。如果谁能抢先攻占这个地方，就等于打通了直达雅典的通道。当然，无论波斯人还是希腊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里常常会爆发激烈的争夺战。在此次战役中，尽管希腊人全军覆没，但是，波斯人也损失惨重。

最初，克谢尔克谢斯认为，参加保卫铁尔摩批莱的希腊人是小股军队，一旦他们看到来势凶猛的波斯大军，立即会闻风丧胆，溃散而逃。所以，他异常平静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希腊人在列欧尼达斯的指挥下勇猛地击退了波斯军队。克谢尔克谢斯为此心急火燎，暴跳如雷。于是，他派了一名骑马的探卒去希腊人营地打探情况：

“这个探卒策马驰近希腊人的营地。他看见了什么？他看到，一些人在那里做体操，还有一些人在梳头发。看到这些情况，他感到很吃惊，于是数了数他们的人数，便平安无事地骑马

返回了驻地，他离开时不但没有人在后面追击他，也根本没有人理会他。回来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向克谢尔克谢斯报告。克谢尔克谢斯听了他的报告之后，简直不敢相信，难道希腊人准备俯首待命吗？”

战役持续了数天。此时，希腊人中出了一个叛徒，他告诉波斯人有一条通往山上的密径，于是，波斯人迅速包围了希腊人，致使希腊人全军覆没。战役结束之后，克谢尔克谢斯走到战场上，在尸横遍野间，他想找到列欧尼达斯的尸体。

“克谢尔克谢斯走到死尸中间，命令砍下列欧尼达斯的头颅，并悬挂在杆子上。”

可在这之后的与希腊人的历次交战中，克谢尔克谢斯却屡战屡败：

“当克谢尔克谢斯获悉，他的军队遭受惨败之后，他十分担心希腊人会采纳伊奥尼亚人的建议，或者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赶到海列斯彭特海峡去毁掉他在那里修建的桥梁，断掉他的退路而使他无法离开欧罗巴。想到此，他打算尽快离开此地逃走。”

他果真迅速逃走了，其实，他在战役结束前就已经逃离了战场。他重又回到了苏撒。当时他大约三十几岁。作为波斯国王，他又继续统治了十五年。关于这些年间发生的事我们就知之甚少了。只知道他扩建了自己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也许那时他已经觉得心力交瘁？或许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不管怎么说，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要称霸全世界和统治全人类的梦幻彻底破灭了。据说，后来他只对玩弄女人感兴趣：他为她们建造了巨大的、宏伟壮丽的后宫，而如今已经变成了我在参观时所见到的废墟。

公元前 465 年,克谢尔克谢斯时值五十六岁,他被他的卫队首领阿尔塔巴诺斯谋杀。后来,这位杀害他的卫队首领阿尔塔巴诺斯把克谢尔克谢斯的弟弟——阿尔塔克谢尔克谢斯扶上了国王的宝座。后来,这位年轻的国王阿尔塔克谢尔克谢斯在一次宫廷发生的角斗中杀死了阿尔塔巴诺斯。再后来,阿尔塔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二世又被他的哥哥索格迪亚努斯在公元前 425 年杀害,但后来索格迪亚努斯又被大流士二世杀害,等等,等等。

# 雅典的誓言

在克谢尔克谢斯撤出欧洲之前，他的整个部队早已溃不成军，他带着那些体弱多病、饥肠辘辘的残兵败将一起回到了苏撒。（在行军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遇到哪个民族，他们都会把那里的谷物一抢而光，作为自己的粮食。而当他们在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上的草，甚至剥树皮、摘果树的叶子充饥，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植物，无一例外。因为饥饿，他们才干出此等事来。此外，在行军途中，还暴发了瘟疫和赤痢，很多人死在了路上。克谢尔克谢斯便把一些病人抛在了后面……）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还曾发生过许许多多屡见不鲜的血腥事件。

波斯人征服希腊人的战争还在延续，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亚洲欲占领欧洲、专制政体要摧毁民主制度、奴隶制度要战胜自由体制的异常严峻的血腥斗争。

从一开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这一切都会很快变成现实，波斯人会如愿以偿。因为，波斯的军队在进军希腊时没有遇到任何反击，他们长驱直入欧洲数百公里。更有甚者，几个希腊

附属小国，害怕去跟这样一支庞大、人数众多而又难于对付的军队作战，自愿地、毫不反抗地投诚到了波斯军队的行列。也正因为此，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在行进途中还在不断地扩大和增编，致使其力量更加强大，军队人数陡增。克谢尔克谢斯的波斯军队最终在攻克了铁尔摩批莱这个堡垒之后，长驱直入雅典，占领了雅典，火烧了这座城市。尽管雅典已经变成了废墟，但希腊还存在，是铁米司托克列斯这位天才拯救了希腊。

铁米司托克列斯那时被推举为雅典的统帅。他受命之时，正值雅典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战争形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因为雅典人都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克谢尔克谢斯正在积极准备对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正是在这一危难时刻，雅典的拉乌利昂银矿给雅典注入了一大笔资金。雅典民粹派及其煽动者们立即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打出了他们的口号：一切要平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分得应得的东西，让每个人觉得自己有力量并感到安全。

铁米司托克列斯表现得既非常理智又十分果敢："雅典人！"他喊道，"你们切记，现在大敌当前，我们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让我们把这笔资金集中起来，建设我们强大的海上舰队，以抵抗波斯军队的入侵！"

希罗多德此时用了对比的手法，描写了这场古代历史宏大的战争场面：一方面，来自东方，这是一种庞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盲目的被专制暴虐的思想支配着的力量——国王即主子，国王即神。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慵懒分散、内乱纷争的希腊世界，那是一个内部争端不休和互为敌对的世界，是一个各种部落并存、没有一个共同国家的独立城市。这里有两个互不相融、各为一体的庞大中心城市，一个是斯巴达，一个是雅典，这两

大中心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构成了古代希腊历史的轴心。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种人势不两立。一个是年轻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克谢尔克谢斯;另一个是比克谢尔克谢斯年长些的铁米司托克列斯,他坚信自己绝对正确,想法大胆而又实际。他们两人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克谢尔克谢斯当时具有绝对统治权,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下达任何指令;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呢,在他下达任何指令之前,必须首先征得受他所直接领导的、人们信赖的但只是在名义上的具有军事指挥权指挥官的同意,并且还得获得广大平民百姓的赞同。他们两个人所能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一个统率着千军万马,率领他们快速进攻并最终取得胜利;而另一个则只能首先是平等地通过内部讨论,几乎把全部时间花在说服、争辩各类事情上,同时还要说服那些喜欢没完没了地争辩和讨论一切问题的希腊人身上。

在波斯人那里,不存在什么面子问题,人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尽量让他们的国王满意。他们很像亚当·密茨凯维奇《奥尔东多棱堡》长诗中描写的俄国士兵一样:

军队大批拥来了,沙皇就是上帝和信仰。
以我们的灭亡换来威严沙皇的欢心吧!

因此,希腊人的性格也有两种鲜明的比照:一方面,他们非常依附自己小小的祖国,依附自己具有国家性质的城市。因为,在自己的城邦中每个人都能做个人感兴趣的事并有自己独立的志向;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统一的语言和共同信奉的神灵,同时还有一种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还时常萦绕在心中的、一种强

烈的伟大的希腊人的爱国主义共鸣。

希—波战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陆地和海上。在陆地上,波斯人在攻克了铁尔摩批莱之后,很久没再遇到任何抵抗。为此,他们的舰队也承受着时间对他们的考验。首先,由于海上强烈的暴风雨,他们的船只损失惨重。巨大的舰只在凶猛的飓风推动下,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一样猛地被撞向海岸的礁石,立即粉身碎骨。

起初,希腊舰队对波斯舰队的威胁甚至抵不上暴风雨的威胁。波斯的战舰比希腊的战舰要大好几倍,波斯人的这一优势,让希腊人感到灰心丧气,感到恐慌,甚至他们丧失了与波斯人战斗的信心,曾经想到逃跑。希腊人不是天生的杀手。他们从未经历过当兵的训练。如果能有机会避免冲突,他们就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有时候,希腊人为了避免冲突,他们会想方设法离开这里,宁愿浪迹天涯。但如果对手是希腊自己人,那他们就会留下来与他们决一死战。

现在也是这样。在波斯战舰的逼迫下,希腊舰队节节撤退、不停地撤退。铁米司托克列斯,希腊人的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阻止这种现象。他只能劝告舰队上的人群,恳请他们坚守战斗岗位!有时候他们会听从他,但也不总是这样。逃跑的人数还在增多,直到希腊的船只在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湾找到港口停泊,他们才停止继续逃跑。希腊的船长们觉得这里才是他们的安全避风港。因为进入萨拉米斯湾的入口非常窄,波斯人的大船到这里之前一定会再三考虑的。

现在克谢尔克谢斯和铁米司托克列斯都在思量着他们目前的处境。克谢尔克谢斯在琢磨,如何进入萨拉米斯湾?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在苦心思索,如何引诱克谢尔克谢斯进到这个窄小

的港湾来。萨拉米斯湾人口窄小，波斯人不可能动用大批兵力来攻打此地，一旦波斯人进入此地，就一定会战胜他们。克谢尔克谢斯在殚精竭虑地想，一旦在那里获胜了，我就会统治那片辽阔的海域。波斯军队的士兵知道，克谢尔克谢斯国王寄希望于他们，在他的率领和指挥下，他们一定会像猛兽一样投入战斗。铁米司托克列斯还不知道，目前克谢尔克谢斯究竟有什么打算，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得想办法把波斯战舰引诱到这片港湾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派了一个人坐船到波斯人的营地去，告诉他要这样说：

"这个人叫西琴诺斯，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奴隶，是他一手把铁米司托克列斯的儿子们抚养大。他到了波斯人的营地时，对敌军将领说：我是雅典统领派来的密使，我们的统领对克谢尔克谢斯做的一切表示钦佩。他说，我们的统领希望你们波斯人，而不是希腊人获胜。没有一个希腊人知道他派我来这里。我的主公让我对你们说，目前，在希腊人当中，已经有很多人被你们的进攻吓得手足失措，许多人正在准备逃跑。如果你们能阻止他们逃窜的话，那你们就会立下举世无双的战功。正如你们所知，希腊人之间常常意见不统一，因此，他们无力战胜你们。你们将会看到，在那些支持你们和反对你们的人之间发生战斗。西琴诺斯说完这话就离开了那里。"

铁米司托克列斯不愧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他知道，克谢尔克谢斯与每一位统治者一样，是一个内心空虚之人，人若内心空虚就会盲目，因而理性思维能力较差。这次也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位密使带来的希腊人之间时常发生内部分歧的假情报后，本应十分清楚，这肯定是一个陷阱，而且他也分明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大型舰队是很难进人那个窄

小的港湾的。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下令向萨拉米斯湾进发，截断希腊人的逃路。就这样，波斯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行动了。

当夜，波斯人十分隐秘而又悄无声息地接近这个港湾时，希腊人毫无察觉，还在进行着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萨拉米斯的将领们之间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那时还不知道，波斯的舰船已经包围了他们，他们仍然认为，波斯的舰船还停泊在他们白天看到的那个地方。"

当他们听说波斯人已经接近他们时，一开始，还怀疑这条消息是否真实，但是，希腊人最终相信了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话，于是开始准备迎战。

凌晨时分，双方的舰队开始交火。克谢尔克谢斯坐在萨拉米斯对面的阿伽列欧斯的山脚下督战。

"每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自己的军人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善战时，他总会问立功的人是谁，此时他的史官就会把该船的统帅，连他父亲和他所属城邦的名字都一一记录下来。"

克谢尔克谢斯确信，此次自己一定会大获全胜，仗打完之后他一定要大力奖赏这些英雄。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这些战役的宏大场面的描述。而且这些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把这些战役刻画得那么混乱无序、荒诞离奇，尤其是描写得十分离谱，甚至把那些精心策划的正面进攻也写成血腥嗜杀、血肉模糊、尸横遍地、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战场。在战场上，有的人急于杀死对方，还有的人落荒而逃，或躲避风头，其间到处充满了尖声嚎叫、悲叹呻吟和大声呼喊，到处是一片混乱和烟尘滚滚。

萨拉米斯战役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在双方个人的格斗

中，总会有一方动作快、反应敏捷，甚至可以说表现得体面些；那么在由数千人划着桨推进的两艘巨大木制战舰发生相撞时，就会令人想象出这样的场景：木制战舰犹如巨大的水桶，有人向里面投去了成百上千只迟钝笨拙、四处乱撞、缓慢爬行的螃蟹。一只船在与另一只船相撞时，必定有一只船先翻进水中，而另一只船上的人也全部被掀翻到海底；远处有的船只正试图后撤，还有的船只互相碰撞在一起，谁也动不了；有的船只正在试图返回战场，还有的船只正在迅速逃离港湾。在这样的混战中，没人能辨清对方，于是希腊人和希腊人会互相厮打起来，波斯人和波斯人会互相残杀，直到战役的最后，这场犹如地狱里的海上搏斗持续了数小时，波斯人战败投降了，其余幸存下来的人——那些幸免掉入水中或者幸免被杀的人，都尽一切努力迅速逃离了这个可怖的地方。

首先，克谢尔克谢斯对这次惨败感到惊恐万分。

“他被吓得失魂落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在一路上陪伴着自己的孩子们送回波斯。”

他命令让来自佩达索斯的人海尔摩提莫斯作为他们的卫兵护送他们一起走。这位海尔摩提莫斯是波斯国王的太监，曾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位。

希罗多德十分关心这个人的命运，他这样详述道：

“在我所知道的人中，没有谁能比海尔摩提莫斯更残忍，这个人对人类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同时也得到了更加残酷的无以复加的报复。他曾被敌人俘虏并拐卖。买他的人是歧奥斯人，叫帕尼欧纽斯。这是一个极端卑鄙龌龊的人物，他总是设法诱骗那些容貌秀丽的男童，将他们诱骗到手之后就阉割他们，然后带他们到撒尔迪斯和以弗所去，以高昂的价格将他们卖出。

对外族蛮人来说，这些被阉割的人比正常的人更值钱，因为，他们比其他正常人更易效忠主人。而海尔摩提莫斯就是被帕尼欧纽斯为了赚大钱而阉割的众多男童中的一个。尽管这样，海尔摩提莫斯还算是那些人当中一个幸运之人。因为，当他伴随给国王的贡品一起从撒尔迪斯到了国王那里时，很快就成了在克谢尔克谢斯国王身边太监中最受宠的一个人。

"当波斯国王抵达撒尔迪斯、率领波斯人向希腊人发动进攻之时，海尔摩提莫斯为了一件事到了美西亚首都，当时有很多歧奥斯人居住在那里。真是冤家路窄，他恰好在那里遇见了帕尼欧纽斯。当他认出帕尼欧纽斯后，他对他极尽奉承，并保证说，如果帕尼欧纽斯能把自己的家眷带到撒尔迪斯来住，他会尽全力报答帕尼欧纽斯的。帕尼欧纽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自己的妻儿带到了这里。但是，当他的妻儿抵达这里之后，海尔摩提莫斯却对他说：你这个在世界上用最卑鄙龌龊的手段谋生的狗东西，我个人，或是我的先人从未对你或者你家人做任何缺德事，可你却把我一个好端端的男人弄到这般下场！你以为，你所干的勾当，能躲过神灵的眼睛？诸神天理昭彰，由于你所作的罪恶之事，现在神让你落到了我的手中。现在该是你接受我对你惩罚的时候了！说完，他下令把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带到自己跟前，强迫帕尼欧纽斯阉割自己的四个儿子，帕尼欧纽斯被迫这样做了之后，海尔摩提莫斯又强迫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阉割他们自己的父亲。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海尔摩提莫斯完成了他对帕尼欧纽斯的报复。"

罪与罚、羞辱与报复，早晚都会发生的。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希罗多德确信，谁最先发动战争，谁就最先犯下了罪行。最终，要么马上，要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遭到报

复、惩罚。这种反应表现了命运本身深刻而又冷酷无情的因果本质，实质就是天意的不可逆转。

帕尼欧纽斯遭到了报应。那我们现在再去看看克谢尔克谢斯。考虑到他是王中之王，那么围绕他的问题就会更加错综复杂一些，因为，他曾被认为是民族和帝国的象征。在苏撒的波斯人得知，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波斯军队全军覆没，他们不但没有哭天喊地捶胸顿足，反而为国王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企望他平安无事。因此，当克谢尔克谢斯回到波斯后，国王回归故土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既隆重而又伟大的事情。波斯平民百姓对他的到来而欢欣鼓舞，感到轻松宽慰，此刻人们早已把数千人丧命沉于海底、把舰毁船亡的事实抛掷脑后，此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波斯的国王还活着，他又能和我们在一起了。

克谢尔克谢斯虽然逃离了希腊，但是他的部分部队还留在那里。他任命大流士的女婿、他的侄子玛尔多纽斯为军队统领。

玛尔多纽斯行事十分谨慎。首先，他不急于和其他波斯军队汇合。而是安心地在帖撒利亚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派了一个特使四处传播神谕，告知天下。他是这样做的：

他派了一名特使到雅典去，这个特使是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叫亚历山大。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把雅典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因为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英勇善战的民族。同时他也明白，正是由于这些雅典人，才使波斯军队在海战中惨遭失败。他估算，如果能把雅典人争取到手，那他掌控海上霸权就大有希望。至于在陆地，他认为，他自己的军队要比对方强大得多。因此，他坚信，采取此种办法，定会征服希腊人。

亚历山大到了雅典后，竭尽一切努力说服雅典民众，希望他

们不要与波斯人作对，并且要和波斯国王讲和，不然的话，他们会有丧失性命的危险。

“要知道，国王的威力是超人的，而他的手臂也是极长的！”

但是雅典人却回答说：

“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波斯人的军力要比我们强好多倍。因此你没有必要再专门对我们反复强调这些。尽管如此，我们都是渴望自由的人，我们定会竭尽全力保卫我们自己……请你把雅典人的这个回答带回给你的玛尔多纽斯吧！告诉他，只要太阳一直按照它自己的轨道继续运行，我们就决不会与克谢尔克谢斯和解。相反，我们还要继续与他作战。我们坚信，诸神和天上的英雄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曾烧毁过我们的神殿和神像……”

但是希腊人却对从斯巴达派来到雅典的特使说，他们担心，斯巴达人会和波斯人讲和，他们说：

“是啊！你们很了解雅典人的想法，因为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黄金，也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大片美丽肥沃的土地，让我们动心去跟波斯人站到一边，并与他们一起来奴役希腊人……你们等着瞧吧……只要还有一个希腊人活在世上，我们就永远不会跟克谢尔克谢斯讲和……”

听到这些话后，亚历山大和斯巴达特使都离开了雅典。

# 时间的消逝

我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到了达累斯萨拉姆。这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一个港湾之处，这地方像是被完美雕刻成型的半圆，看上去像是从数百个希腊温和平静的港湾中特意挑选出一个搬到了这里，搬到了非洲东海岸这块地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风平浪静，海浪总是缓缓地、静静地、平和地、有节奏地拍打着，悄无声息地潜入海边温暖的沙滩中。

这座城市，尽管人口不足二十万人，但让人好像觉得，似乎世界上一半的混血人都居住在这里。仅仅这个城市的名字——达累斯萨拉姆就能说明一切。"达累斯萨拉姆"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和平之家"，说明它曾和中东有过什么关联(很可能是一种不值得在这里夸赞的联系，因为那时，阿拉伯人从这里抓走过很多非洲奴隶)。但是，在这座城市中心居住的大多数人则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这里的社会中曾经更迭交替着所有的语言和信仰：印度锡克教、阿迦汗①、伊斯兰和果阿② 的天主教信仰。

① 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领袖的称号。

② 印度果阿邦，位于西海岸。曾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商人于 16 世纪抵达果阿，不久即占据该地，打压印度教，导致该地多数人归信天主教。

来自塞舌尔和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这些印度洋岛国的移民在这里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群体。这些极具魅力，甚至美丽动人的人种，都是由于与南部各不同人种混血和结合的结晶。后来还不断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是一些参加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建设者。

对一个初次来这里的欧洲人来说（1960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这座城市里，一下子遇到这么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十分震惊。令人更震惊的是，在欧洲大陆之外，还存在着与之有着天壤之别的另一个世界；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头脑中突然充盈了如此之多的知识，居然能有这么多不同民族的人聚集在这里，互相交往、共同生活。他们之间似乎不需要任何调解，欧洲人对此并不知情，当然也不需要欧洲人首肯。多少个世纪以来，无论从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来说，欧洲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但是现在，让欧洲人难于马上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没有欧洲或者在欧洲之外，各个民族和社会都能找到自己享受生活的方法，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当然各种问题也交叉存在。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这里的现实，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现实。

其实，希罗多德是第一个提出世界是多样性的这一实质问题的人。他说，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希腊人这样说。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理论，他一直不辞劳苦地走到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边缘。我们有很多邻国，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相邻的国家，而我们所有人都住在同一个星球上。

对一个生活在自己小国的人来说，他很容易用脚步丈量自己的活动范围。但由于他进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世界性调查，打开了他的眼界，改变了他至今未知的世界范围，这让他耳目一

新，因为他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比例。

希罗多德在旅行的同时，深入到不同的部落，与不同氏族的人们进行交谈，并把他们所讲述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但巧合的是，它们大都发生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就似乎发生在一个放了各种各样不同调料的大锅里，乍一看上去，好像在火上煨的菜汤表面，漂浮着无数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在按照自己的轨道游弋，在数不清的各种轨线上互相碰撞、相互交叉。

希罗多德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即时间的多样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计算时间方法的多种多样。因为早前普通农民是按一年四季来计算时间的。城市居民，是按一代代人来计算时间，一些文明古国的编年史家是按照各个统治王朝更迭的频率来计算时间的。如何将这一切加以比较呢？如何能找到一种统一的计算方式或者是一种共同的归纳法呢？希罗多德一生都在为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不懈努力。我们这些习惯于机械量度的人，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度量对于人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其中蕴藏着多少困难、多少玄机和奥秘。

当我能有一个空闲的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我就会骑上我那辆破旧的绿色山地车去海景饭店。在那儿，可以坐在栈桥上要一杯啤酒或者茶，倾听傍晚的海涛声，倾听蝉的鸣叫。这个饭店，在达累斯萨拉姆很著名，大家都喜欢来这里聚会。我和来自其他通讯社和编辑部的同行们就常常来这里碰面。为了能搞到一些信息，我们这些人白天在市区里转悠了一整天。在这个遥远偏僻的城市里，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弄到一些信息，我们同行之间并不尔虞我诈，互相竞争，而是相互合作。

在我们这些记者当中，这个人可能耳朵比别人灵一些，那个人可能眼尖一些，其他人可能算是比较幸运的记者。总之，大家都互相议论着，在市区的马路上、在海景饭店或是在装有空调的意大利人开的咖啡馆儿里经常不断地会发生抢劫事件。有的人打听到莫桑比克的爱德华·蒙德拉纳① 可能要来访问，还有人听说，罗得角的恩克摩可能要来进行访问，也有的人不知从哪里获悉，可能发生了反对蒙博托的政变，有的人听后相信，有的不信，认为这可能是谣传，直到最后，谁能找到办法来验证这一切？我们也只能从这些传闻、小道消息中，尽量筛选出靠谱一点的事实，向全世界发布我们的报道。

每当人们离开栈桥，这里安静下来之后，我就掏出希罗多德的书，随手翻到哪一页看看。《历史》这部巨著其实就是一部小说，这里充满了各种故事，有虚构，有作家的观察，也有作家记载下来的各种传说。

“色雷斯人是继印度人之后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如果他们只有一个统治者，他们定会团结一心。如若是这样，他们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和战无不胜的民族。但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历史，因此他们历来比较弱……他们曾把他们的孩子卖到异域去。他们既约束年轻妇女的行为，还允许她们与任何男人交合。然而，他们却十分严格地限制自己妻子的行为。他们用高价从这些妇女的父母那里把她们买来，作为自己的妻子。如果谁身上有文身，那就会被视为出身高贵，反之则表示出身低贱。他们认为，最好不要从事任何工

① 蒙德拉纳(1920—1969)，担任成立于 1962 年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解阵”)主席。1969 年被暗杀。

作，特别是不能下田劳作，因为，他们认为，下田劳作是最不光彩最不体面的工作。按照他们的理解，如果谁想生存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战争中获利得到丰厚的战利品。这就是色雷斯人最显著的特点。”

我的眼光暂时离开书，抬头看见在彩灯闪烁的花园里，有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印度服务员，他叫阿尼尔，他正用香蕉喂着一只倒挂在芒果树上的猴子。这只小动物给他做着可笑的表情，逗得阿尼尔大笑不止，眼泪直往外流。看着这个服务员，在这样的夜晚，在这种大热天里，听着这里的蝉鸣，吃着香蕉喝着茶，令我触景生情，再次勾起了我对印度的回忆，让我回想起，我在印度度过的那段迷人的时光和迷惘的日日夜夜。如今，我身处此地，所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强烈感觉到，这里和印度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甚至令我觉得，能闻到来自印度的气味，但这其实是来自阿尼尔身上的一种香味，是他衣服上带着的那种特殊的植物——麒麟草和薄荷草发出的幽幽的香味。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来自印度的各种物品，还有印度寺庙、印度餐馆、印度剑麻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

我又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希罗多德的书中。

我越是经常翻开希罗多德的书，就越觉得我与他更加亲近。希罗多德那种特有的嗜好习惯、写作和思维方式，都对我产生了一种令我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不可思议的影响。他能把我带入一种境界，让我感觉不到这位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人所描写的事件，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存在着时间上的障碍和鸿沟。这许多年以来，我们经历了罗马帝国时代、中世纪、伟大宗教的诞生和发展、发现美洲新大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等等各个时代；经历了人类发明蒸汽机、电、电报和飞机等工业发展的时代；

经历了人类间发生的数百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在这期间人类发明了抗生素，经历了人口激增等一系列成千上万的难以数清的事件。当我倾心阅读希罗多德的书时，上述这一切事件似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未存在或从未发生过似的，这一切事件好像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都从有亮光的地方转移到了阴影下面。

难道是希罗多德一生下来，就与我们生活不同？难道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建立起了分隔我们的时间鸿沟？难道这就是他穷尽毕生精力所要得到的结论吗？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他的生活非常充实，他耗费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去了解整个世界，结识众多的人，聆听人们讲述数百个不同的故事；他是一个有生活激情、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他不断探索，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他渴望学到很多东西，发现问题，揭开奥秘，求解人类众多的不解之谜，回答一连串的问题。然而，时间、精力，对他来说都少之又少。换句话说，就是他无法完成自己所有的夙愿，他跟我们一样，时常感叹人生如此短暂！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快速铁路也没有飞机，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这一切对他造成影响了吗？当然你有权对此提出自己的质疑。可是我们也可以运用反向思维，如果我能自由支配火车或者飞机，就可能尽全力搜集信息，给人类留下更多的信息吗？当然我们也有权对此提出质疑。

希罗多德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他与上述问题完全不相干。可以推断，他极有可能是在自己暮年之时，才决定写一本书，因为他可能意识到，在他搜集了足够的历史资料和信息之后，如果他不能把这些用笔书写下来的话，那么，这些在他记忆中积聚下来的东西就会丢失。还是那句老生常谈，人类一直在

和时间搏斗，与脆弱的记忆力搏斗。我们当然希望，人类能具有稳定持久的记忆力，希望人类的记忆永远不会被抹掉和丢失。为满足人类的这个需求，才产生了今天书写各类书籍的想法。因为，用笔记录下来的东西，才能保证记忆具有持久性。换句话说，就是保证记忆的永久性。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会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短暂，如果不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历的诸事，用一种固定的形式记录下来，那么就会很快失去这一切。这也正是很多人喜欢写书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歌唱家还是足球运动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百万富翁都是如此。如果他们自己不会写书或者没有时间去写，他们就会委托别人来帮他们做这件事。这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时，更是如此。有些人想，托马斯·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作家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写作比起别人来更加困难。"

希罗多德渴望尽可能多地给后人留下自己所了解到的和所经历过的一切。所以这位希腊人的著作不是简单地给我们叙述各个朝代的历史、国王以及宫廷间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尽管在他的书中，他用了很多篇幅描述了政权和权力之争，但是，他也给我们描述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农耕劳作，叙述了人类经历的疾病和自然灾害，描写了山川河流、动物和植物。例如：

"每当着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猫身上发生非常奇妙的现象。那时，埃及人不去顾及扑灭熊熊燃烧的大火，而是人人都站在距火场不远的地方，围立在火场的四周保护着猫。但是猫却不顾人们对它的保护，会从人们中间穿过去或者逃脱重围，直向大火奔去投身火海，埃及人会为此感到悲痛欲绝。如果在一

个普通埃及人家庭中，有一只猫自然死亡，则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把眉毛剃去，但如果是谁家的狗死了，那么他们都要剃头并把全身的汗毛刮去。”

希罗多德还描写过鳄鱼：

“鳄鱼的特性是：在冬季的四个月里，什么都不吃；它属于水陆两栖动物的四足兽。它在水里的时候……在我们所知道的动物类中，它是唯一可以从最小的动物长到最大体积的那类动物。鳄鱼蛋并不大，而初生的小鳄鱼却和鹅蛋不相上下，可一旦它长大以后，就能长到 17 寸长或者更长。鳄鱼的眼睛长得跟猪眼差不多大，它巨大的、尖尖的牙齿露在外面……所有的鸟兽看见它都会退避三舍，但是却有一种鸟能同它和平相处……每当鳄鱼从水里爬到岸上来的时候，它就会张开巨大的嘴打哈欠，那时，小鸟们便会飞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小鸟们对它的恩惠，因此，它不会去伤害这些爬到嘴中的小鸟。”

我在开始阅读希罗多德的书时，也未曾注意到他对猫和鳄鱼的这些描写。只是到了后来，在某一次阅读中，突然注意到了书中关于猫发疯似的猛然跳进火海的描写，我被这样的描写吓了一跳，那时我正坐在尼罗河的岸边。我当时仿佛看见小鸟飞到打着哈欠的鳄鱼巨大的嘴里去啄食水蛭的景象。所以，阅读希罗多德的书，就像阅读每一部杰出的著作那样，必须认真地读很多遍。只有这样，在每次阅读之后，你才会产生新的和不同的体会，发现以前阅读时所没有注意到的描写内容、画面和意思。因为每一部巨著都会分好几册，所以要认真阅读，才能真正走近它、发现它、深入它、理解它。

希罗多德生活得非常充实，那时没有电话、飞机，甚至没有自行车，这都不会影响他，他不会为此感到发愁。这些设备都是

在他身后千余年之后才发明的，这又能怎样？希罗多德那时也不可能想到人类今后会有这些发明，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需求。尽管他生活的时代缺少所有这些现代设备，但他仍生活得十分自在充实。他那个时代和他的生活有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有着无可估量的和充分的力量。他能感到这种能量，这种能量能给他插上双翼。因此说，他是一个开朗、放松、友善的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人面前，陌生人才会向他吐露心中的秘密。人是不会对一个抑郁沉闷、封闭悲观的人敞开心扉的。那些天生自闭的人只会在别人的请求之下振作一点儿，他们需要跟别人保持距离，甚至可能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恐惧。如果希罗多德是具有此种性格的人，那他就会一事无成，我们今天也不可能看到他留给我们的伟大作品了。

我常常想，与此同时也感觉到，当我沉浸于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时，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震惊，或者令我生气的事了。无论从情绪上还是在感知上我都更加认同他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反省。雅典的毁坏比最近军队突袭苏丹更令我痛心，波斯舰队的沉没比刚果军队的政变更具悲剧色彩。如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千世界里，作为通讯社的记者，非洲不仅需要我去书写，而且也需要这位已经离我们久远的、在数百年前已经逝去的人去书写。

在热带闷热难当的夜晚，我独坐在达累斯萨拉姆海景饭店的栈桥上，不由得想起了玛尔多纽斯军队中冻得发僵的士兵们，在特萨利寒冷的晚上，那时正值欧洲的冬天，正试着围坐在篝火旁温暖自己已经被冻得僵硬麻木的双手。

# 沙漠与海洋

我得暂时把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问题放一下，异族军队为讨伐希腊还在无休止地长途跋涉，希腊人之间还在为他们中谁最重要、应该由谁来统领军队而争论不休。正在这时，阿尔及利亚大使尤迪打来电话，说“我们值得花时间见一面”。这话中的潜台词包含着一种约定，包含着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事值得产生兴趣和密切关注，就好像有什么人说：“到我这儿来，我们见一面吧，我有什么东西给你，不会让你遗憾的。”

尤迪大使的官邸富丽堂皇，是一座白色的通风良好的别墅，是古代毛里塔尼亚式的豪华建筑风格。它每处都有阴凉，甚至是在那些本应有阳光直射的地方也有阴凉。我们坐在花园里，从高高的围墙后面传来了海浪拍岸的声音。此时正是涨潮时分，从海的某个深处、从遥远的地平线外，一排高楼般的巨浪朝我们扑来，接着四溅在我们附近，这幢别墅就建在海滨低处的水面上。

我们拉拉杂杂谈了很多，但都没涉及什么重要问题，我心里正在琢磨，他把我召到这儿来目的何在，正在这时就听他说：

“我觉得，你值得去一下阿尔及利亚。那儿可能会发生一些令你感兴趣的事。如果你想去，我给你发签证。”

听了他说的话，我大吃一惊。那是1965年，没听说在阿尔及尔发生什么特殊事件。这个国家此时已经独立三年了。领导人是一位有头脑、颇受欢迎的年轻人，他叫阿赫迈德·本·贝拉。

尤迪不想对我再多说什么，因为，对他来说，穆斯林的晚祷告时间临近了，他拿出一个做祷告时使用的粉红色垫子，开始用手把它展开。我知道，我该离开了。可是突然，我感到自己有些进退两难。如果现在我去请示国内，请国内批准我去阿尔及利亚出差，那么首先他们会问我，你去那儿目的何在、去那儿做什么、理由是什么等等。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那儿究竟要干什么。此外，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理由，我得经过半个非洲辗转到那儿去，也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更别说还要支出一大笔经费。在我所供职的新闻社，会计们把钱抠得很紧，为支出一点费用，都需要解释清楚，然后过很长时间才能报销。

但是尤迪采用这种方法建议我去阿尔及利亚，他口气十分坚定，甚至有点像是在说：你得去。所以，我决定冒一次风险，去那里看个究竟。我从达累斯萨拉姆乘飞机经过班吉、恩贾梅纳和阿加德兹去阿尔及利亚。在这条线路上航行的都是小飞机，不仅飞行速度很慢，而且飞得很低，因此在飞经撒哈拉大沙漠时，所看到的景色美丽迷人，无论景致色彩欢快还是单调萧瑟，在荒凉的沙漠中，在阴冷的月光下，这里时常会突然出现一片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郁郁葱葱的绿洲。

阿尔及尔的飞机场空空荡荡，实际上那时飞机场已经关闭。我们乘坐的飞机，因为属于国内航线，所以才允许落地。飞机刚一落地，就有一大群穿着灰绿色军服，军服上还带着各种伪装的

士兵把飞机团团围住。然后，把我们这几个乘客带到了一个玻璃建筑物中去，对我们进行检查，但是查得并不十分严格。这些战士非常礼貌，尽管他们很少开口说话。他们只是说，夜里发生了政变，“暴君被拉下了台”，现在由军事司令部掌权。暴君？我想问，谁是暴君？我两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见过本·贝拉本人。他给我的印象是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可以说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这座城市很大，阳光明媚，整个城市延伸在宽广的海湾之中，就像一座巨大的露天竞技场。我们的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城市道路建设都是仿现代法国式的，马路上熙熙攘攘，像是在阿拉伯国家。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人们的服饰和风俗习惯都明显夹杂着地中海特点。到处闪着晶亮的光，城市中弥漫着的香气令人陶醉，却又令人疲倦。一切都让人感到好奇、着迷，但也让人产生一种担忧。人们若是累了，可以在众多的阿拉伯式或法国式的咖啡馆中随意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者在无数的餐吧中找个地方用餐。这里离海很近，菜单上各种鱼、海鲜海味的菜肴应有尽有，你可以随意点上一两个尽情品尝，菜单上还有一些根本叫不上名来的各种海鲜，例如：各种甲壳类动物、蛤、头足动物、章鱼还有蚝等烹制的佳肴。

在这里我注意到，阿尔及利亚人，首先是当地人，他们能在基督教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和睦相处。这两种文化共存的历史构成了这座城的历史（当然这座城市还有自己悠久古老的历史——腓尼基、希腊和罗马历史）。在这个城市中行走，你不可避免地一会儿路过教堂，一会儿走过清真寺，这似乎使人感觉，你在不停地跨越两条国界线，在国界线上绕来绕去。

然后我们到市中心去看看。阿拉伯人居住区叫卡兹巴。到那个地方得往上坡走，还要爬过几十节宽大的台阶。爬台阶并不成问题，难的是，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似乎觉得是在冒险闯入卡兹巴最隐秘的深处，越是往上走，就越让人产生一种明显的异样感。我们真的有意去探寻一个什么隐秘之处吗？还是我们只想快速通过这里，尽快逃离这个令人感到心神不定、局促不安的地方。我们觉得，好像有数十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们，他们在时刻注视着我们走向何方？也许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觉？我们是否太过于敏感？为什么我们会在卡兹巴这样的地方如此神经过敏？可在那条法国式建筑区的道路上行走时，也许别人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盯着我们看，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无所谓、心安理得呢？而在卡兹巴这块地方我们只被别人盯着看上几眼，就会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其实，这里人们的眼神应该说都差不多，但在我们心里却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念头。

我们终于走过了卡兹巴街区，来到了与之相邻的法国街区，虽然没有觉得可以大松一口气的必要，但是，我敢肯定，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儿让我们感觉更安逸、更自在一些。为什么我们无法抑制藏在我们潜意识中的这种心态？难道数千年后的今天和整个世界还是一点没变吗？

当天跟我一起乘飞机来到阿尔及尔的那些外国人，懵懵懂懂，根本搞不清楚昨天晚上是怎样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事态如此严重，世人皆知的一国领导人本·贝拉就这样轻易被推翻，而上台的人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后来我们才得知，上台的这个无名小卒，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军事将领，他是军队的司令官，叫侯阿里·布迈迪安。一切都在夜里悄悄地发生了，而且发生在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发生政变的地点是在一

个叫黑德拉的别墅区,被政府和军队将领们占领的这块地方属于军事区,一般人很难接近它。

在市区根本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听到任何爆炸声,没有坦克装甲车上街,也没听到急行军的脚步声。早上人们还是照常去上班,店主们照常开业,小贩们照常摆摊,酒吧侍者按惯例还被别人邀请去享用早咖啡。马路清扫工在马路上照旧撒了很多水,为的是在下午的热浪袭来之前,让街道暂时潮湿凉爽一些。公共汽车在往上坡爬行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

我筋疲力尽地在街上走啊走,心中暗暗埋怨尤迪。他为什么劝我来这儿?我来这儿究竟要干什么?有什么可值得报道的?我回去后如何申请报销我此行的费用?我既沮丧又气馁。突然,我看见人们在向穆罕默德五世大道聚拢。遗憾的是,等我跑到那儿,却发现这只是一帮围观看热闹的人,因为当时有两个司机在十字路口撞车后大吵了起来。忽然,我又看见一群人在向这条大街的另一头集聚,我又马上急奔过去。但这些人只是为等着邮局早上开门而在那儿排起了长龙。我的记录本上什么也没记,空空的。

就是在这里,在阿尔及利亚,在做了几年记者工作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是一条追寻宏大景象的道路,一条充满错觉的道路。我原以为单凭场面报导,就可摆脱试图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的困境。世界在发生大动乱灾变之时,展现出的是这样的景象:它被枪炮和爆炸震撼,被烈焰和硝烟吞没,在烟尘和燃烧的恶臭中窒息,一切都化成了瓦砾,人们坐在废墟上,俯身在至爱亲朋的遗体面前,悲痛欲绝,我原以为,只要通过这些便能解释这个世界,殊不知这是一种谬误。

但是,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种破坏,到处是喊叫声和

充满了血腥屠杀的场面都说明了什么？是那些隐秘的、看不见的、强大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制造的这一切吗？这是这一进程的结束还是开端，还会产生新的紧张局势，或者新的冲突吗？谁去追踪这一切？我们——通讯员、记者吗？不是！死者尸体将被慢慢掩埋，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将被清除干净，散落在街上的玻璃碎片也将会被清扫干净。而那时，我们又该收起行装，奔赴到那些汽车被烧毁的地方，商店玻璃被砸碎和掩埋死尸的战场。

这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吗？能突破吗？在这些成像的后面还能揭示出更深层的东西吗？不能总是一味地报导坦克装甲车上街、到处是被烧毁的汽车和被砸碎玻璃的商店。因为在这儿，我没见到这种场面，但我又想证明，尽管我这次的旅行未经授权，但是值得一来的。于是我开始着手调查这次政变的背景和根源，试图找出这次政变背后隐藏的问题，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所以我就需要找人跟我聊聊，去实地考察一下，同时也要翻看一些有关书籍，一言以蔽之，我要搞明白点儿什么。

我所看到的阿尔及尔是世界上最迷人也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之一。在这个美丽而又拥挤的城市中，交叉着现代世界的两种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一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这一冲突表现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和阿尔及利亚反殖民化的斗争方面）；另外一个是：在法国人撤离阿尔及利亚之后，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其国内冲突却日益加剧，那是穆斯林人自己内部之间的冲突，是在开放的和辩证的两派之间形成的冲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伊斯兰和地中海派的冲突。在所谓的地中海派中，又分为两派：一派比较封闭，他们对现代社会中的一切，感到惶恐和失落；另一个是基要主义派，一方面他们承认现代技术和组织原则，但同时又强调，要保持信仰，同

时要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作斗争。他们把这些作为他们生存的条件,这也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最基本的标志。

阿尔及尔,最初,也就是在希罗多德时代,只是一个小渔村,后来成了腓尼基和希腊舰队的停泊港口,港口面对着大海,而大海的另一边则是城市。城市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沙漠省份,被人称为“勒索”,这块地方按古法来说属于那些效忠虔诚的人们的居住区,因为,那里只有伊斯兰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阿尔及尔有两种不同的穆斯林人:一种被称为沙漠穆斯林人,而另一种被称为河流(或者海洋)穆斯林人。第一种人是尚武的游牧部落,他们生存的最大敌人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他们要为自己能继续生存下去不断地奋争;而第二种——河流(或者海洋)穆斯林人,他们崇尚商人、沿街叫卖的买卖人、马路上摆地摊的人,他们对上述这些人很开放,能与他们和睦共处,他们之间的交易不仅仅是在买卖中要互相有利可图,而且也是他们生活的需要。

在殖民地时期,这两个派别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是后来却发生了冲突。

本·贝拉曾属地中海人,受的是法国文化教育。他头脑开放,天生和蔼可亲,当地法国人称他是河流(海洋)穆斯林式的社交人物。布迈迪安与他恰恰相反,他是军队将领,多年来一直在沙漠中迂回作战,在那里有他建立的基地和军营,他从那里招募新兵,利用游牧民族、绿洲和沙漠地区的居民和山民对他的支持,篡夺了政权。

当然,仅从表面就能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本·贝拉衣着讲究,风度翩翩,儒雅谦恭、笑容可掬。在政变几天后,当布迈迪安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一眼能看出,他就是个坦克手,那时,他也正好坐在布满来自撒哈拉沙漠沙尘的坦克

里。他试图挤出笑容，但看上去却显得十分虚假，一看便知，这不是他的风格。

在阿尔及尔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地中海。我能这么近距离地去瞭望地中海宽阔的海面，我想立即把手伸进海水，让咸咸的海水抚摸我。在这里我不需要问路，一看就知道，只要再顺着坡路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去，就能到大海边。终于，我来到了大海边。其实，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大海宽阔的海面，在这里你会觉得大海无所不在，它延伸到每一座房子的后面，海水时隐时现地闪烁着波光，最终大海落在弯弯曲曲的一个大的急速转弯的马路底部。

港口区就坐落在这个最底部的地方，那里有一排排整齐的木建筑的各种餐吧、酒吧、咖啡吧，从那里散发出烤鱼、葡萄酒和咖啡的诱人香味。

我从未见过人与自然如此和谐美妙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人们可以享受的一切：阳光、凉爽的风、阳光照耀着的宽广空间和波光粼粼的银色大海。也许是因为我阅读过许多有关阿尔及尔的书，我觉得我熟悉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这里的海面风平浪静，气候宜人，环境幽雅宁静，我悠然感到，此时我仿佛是来这里度假或旅游的赋闲之人。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跳上了两个刚刚离岸的渔船。

我重又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再没有遇到尤迪。有人告诉我说，他被召回阿尔及利亚，我猜测，他可能是参与政变活动的一分子，为此，他获胜了，回国高升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地方。从此，我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因为是他劝我去了阿尔及尔，可我想当面向他致谢的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阿尔及利亚的这次军事政变，仅仅是牵动后来一系列政变的一个开端，

成了连接在后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年轻的非洲大陆后殖民时代国家的青年人发动一系列类似谋反、叛乱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些新型国家从独立那天起，政权就很不稳固，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此外，也正是由于我去了阿尔及利亚，才使我平生有机会第一次站到了地中海边。我觉得，从那时起，我更加理解希罗多德，更加了解他的思想、他对新事物的探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了！

# 铁　锚

我们一直没有离开地中海，这是希罗多德的海。只不过现在我们来到了地中海的东岸，就是来到了欧洲与亚洲交界之地，来到了连接这两块大陆的地方。地中海海面上微波荡漾，各个群岛阳光明媚，风景迷人。这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每天都吸引着众多的船员来到这里，他们的船停泊在这里，这里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参观旅游条件。

波斯人的统帅玛尔多纽斯告别了他的冬营地萨拉米斯，正在向南挺进：

“他正率领军队快速向雅典进军。”

当他抵达这座城市时，城中已经空无一人。雅典此时早已被烧毁，变成一片凄凉的废墟。雅典人也早已逃离了这里，到萨拉米斯去避难。于是，玛尔多纽斯选了一名特使，名叫穆里奇戴斯，命他专程去萨拉米斯，此人肩负的使命是再次劝说雅典人放弃抵抗波斯人，服从克谢尔克谢斯的统治。

穆里奇戴斯向雅典最高权威机构——五百人议会转达了玛尔多纽斯的这个建议，当时雅典民众也聚集在这次议会集会的

地方。他们都听到了议会成员之一，一个名叫吕奇达斯的人在这个集会上所发表的个人观点。吕奇达斯说，他认为，希腊人最好接受玛尔多纽斯的这一调和建议并与波斯人保持和好的关系。听了他的话，雅典人群情激昂，人群震怒了，他们立即把吕奇达斯包围起来，投掷乱石打死了他。

我们需要在这一场面前暂时停一下。

我们此时是在一个民主的希腊。希腊人历来崇尚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以此为自豪。但当有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出个人的真实想法时，这里发生了什么？请看，吕奇达斯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爆发出怒喊声！吕奇达斯忘了，那时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战争一天不结束，那么，一切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也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句空话。战争有它自己的法规可循，战争把一系列筹码组合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强制执行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获胜。

因此，当吕奇达斯发表完自己的看法时，他的话音刚落，民众就把他置于了死地。我们可以想象，当雅典民众听完他的讲话之后，那场面会是怎样的人声鼎沸、群情激昂、躁动不安，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们是在被波斯人铁蹄践踏之下失去了自己半壁江山、痛失了自己城市的民众。在这个聚集了众多人旁听集会的地方，找到几块石头并非难事。更何况，希腊本来就是一个多岩石的国家，岩石遍地都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这些石头上行走。他们只需弯腰就够了。事情也就是这样才发生得如此迅速。每一个人只要弯腰在自己的脚下捡起一块石头投向吕奇达斯就足够把他立即打死。一开始石头向他砸来时，吕奇达斯可能还大喊冤枉，而后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身体蜷缩、苟延残喘、拼命求饶。此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人群处

于怒不可遏、群情激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时，他们是什么人的话也不会听，只会不计后果，任意行事，结果肯定是一发不可收拾。只有当吕奇达斯被乱石砍死之后，当他被砸成了肉饼、永远沉默时，人们才会住手。

到此这幕剧还没演完！

希罗多德写道：

"围绕吕奇达斯这一事件，在萨拉米斯引起了不小的喧骚，当雅典的妇女们得知萨拉米斯事件发生的经过之后，她们个个都兴奋不已并互相鼓励。于是她们联合上自己的左邻右舍，自觉自愿地跑到吕奇达斯家，用乱石打死了他的妻儿。"

他可怜的妻儿啊！但是，雅典人的后代们，可曾为自己父辈寻求向波斯人妥协而曾有过任何负疚感吗？他们认识这些波斯人吗？或者说，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位先人，仅仅只因为听了波斯人的建议而发表了个人的想法，就遭受被乱石砍死的惩罚吗？他们之中年纪最轻的人，能否想象到，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有多么可怕？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那些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口的祖母、姨妈姑妈们手里拿的不是送给他们的糖块和葡萄，而只是石头，而且她们马上会用这些石块砸烂他们的头？

吕奇达斯的命运表明，希腊人对与前来入侵的异军的和解这个愿望深感痛苦和恐惧。怎么办？到底怎么做？何去何从？是合作还是斗争？对话还是抵制？选择共商生存大计还是选择英勇奋战，名留青史？这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困难，可以不停地追问下去，希腊人会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在所有这些选择之中，希腊人历来意见不能统一。对种种分歧他们不仅只限于论争和打嘴仗，同时他们也会为此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互相残杀。于是希腊人和底比斯人交战，波奇司人

和帖撒利亚人交战。他们用互相割喉、挖眼睛、砍头的办法来互相残杀。在来自不同敌对部落的两个希腊人之间的互相憎恨程度要比他们憎恨波斯人的程度大得多。也许这是某种情感、过错、矛盾心理和背叛的表现？是对上帝的诅咒潜藏的畏惧和恐怖？

不管怎么说，不久之后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在普拉塔伊阿和米美伽拉列进行了两场最后的决战。

先说说普拉塔伊阿之战。玛尔多纽斯曾经说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向波斯人妥协的。于是他把雅典彻底摧毁之后，就把部队撤向北边，那是与波斯人协同作战的普拉塔伊阿人的领地。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可以说是最适合波斯重骑兵重新整编驻扎的好地方。此时，雅典人和斯巴达的追兵也赶到了普拉塔伊阿平原的附近。这两支军队面对面形成了对峙的阵容，他们都耐心等待着。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会是一个决定胜负和你死我活的激战时刻。一天一天过去了，双方的军队都在焦急无奈地对峙着，他们双方都在请示神灵，此刻适合作战吗？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

就在这几天僵持的过程中，有一位底比斯人，名叫阿塔吉诺斯，协同希腊人一起，以他的名义，邀请玛尔多纽斯和五十位最显赫的波斯人和同样数量的底比斯人前来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阿塔吉诺斯安排波斯人和底比斯人、希腊人和底比斯人一对一对分坐在长椅上。在一个叫铁尔桑德洛斯的希腊人身旁坐着一位波斯人，但希罗多德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我们这个人的名字。他们两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忽然，那位波斯人，看上去他显然很放松，他问：

"'铁尔桑德洛斯，你看见来这儿赴宴的这些波斯人和驻屯

在河边的我们那些军队了吗?'这位波斯人此时可能又联想起什么令人伤心的事,他接着对希腊人说:'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能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罢了。'波斯人说完这话后,就痛哭流涕。"

铁尔桑德洛斯竭力想安抚这位醉酒后极度伤心的波斯人,当时他自己还十分清醒,就非常聪明地对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说给玛尔多纽斯和他周围的那些尊贵的波斯人呢?"

此时,这位波斯人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但却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话:

"我的朋友!凡是上天注定要发生的事,都是不能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都不会有人敢去相信那些说真话的人。我们许多波斯人都非常清楚,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一切只能受制于必然,我们只能服从天命。在人类的一切悲哀当中,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一个人知道得太多,却又无回天之力。"

在普拉塔伊阿发生了希腊人和波斯人有史以来的最大战役,这将以波斯人的惨败而告终。从此决定了欧洲人将建立长期称霸亚洲的局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波斯骑兵与希腊人发生的一次小规模冲突之中。他们当中的一方将领将会被打死,实际上,就是波斯骑兵的副统帅玛西司提欧斯被打死。

"正在波斯骑兵列成方阵向希腊人进攻之时,跑在骑兵队伍最前面的是玛西司提欧斯的乘骑,当时他的战马肋部中了一箭,马疼得用后腿站立起来,这时,玛西司提欧斯就从马上摔了下来;就在他掉下马的那一刹那,希腊人乘机扑向他。他的马当场让雅典人捉住,他本人也在奋力抵抗时被刺死。其实在一开始时,雅典人还无法将他刺死,因为他身上穿着铠甲,全副武装。

在他身穿的紫袍下面，有一件鳞状似的用黄金做的铠甲，雅典人多次刺向黄金铠甲，但无济于事。一直到后来，才有一个人忽然觉出这种刺法是徒劳的，杀不死他。于是就去刺了他的眼睛，这样才致使他倒地死亡。”

这之后，就发生了抢夺玛西司提欧斯尸体的激烈角逐。溃散而逃的波斯骑兵想竭尽全力夺回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但无济于事，只好收兵回营。

“骑兵惨败返回营地后，玛尔多纽斯和全军将士对玛西司提欧斯的死表示了极大的哀悼，他们不但剃光了自己的头发，还剃掉了他们所有马匹和驮畜的毛发，长时间地痛哭不停。他们的哀号声，响彻整个贝奥提亚上空。因为，对全体波斯人和波斯国王来说，在这次阵亡的人中，玛西司提欧斯是威望仅次于最受尊重的玛尔多纽斯的人物。”

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最大的，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次战役的前几天。在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人们一直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波斯人这边的占卜师是海该希斯特拉托司，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他十分仇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

“斯巴达人曾把他擒拿入狱，并企图处死他。因为，他曾对斯巴达人做过许多伤天害理之事。当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知道自己还可能会遭受许多酷刑，于是海该希斯特拉托司就做了一件使任何人都难以置信的事。尽管他被牢牢扣在了带铁索的木枷内，但不知怎的，他却弄到了不知被何人何时带进监狱里的一把铁制武器，于是他对自己采取了一个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极其大胆的举动。他思量着，怎样才能让他的脚尽可能地摆脱枷锁的束缚。于是，他从自己脚背的上方下手割掉了自己的半只

脚。此后，因为有狱守严密的监视，他只能在监狱的墙上挖出了一个洞，然后逃了出来，径直往该铁亚方向逃，逃出来后，他只能在夜里赶路，白天则藏在密林里，直到第三天夜里他才终于逃到了该铁亚。自他逃跑以后，斯巴达人就到处搜寻，直到他们发现了被切断的半只残脚，但仍无法找到他本人，他们对他的胆量和采取的举动惊讶无比。"

他是怎样完成这一切的呢？

这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因为他不只是需要切开肌肉，而且还要切断自己的筋骨。当然，这种自残的事情在我们当今社会也时有发生。曾有见证人说，在（俄国的）古拉格里（集中营）人们有时会切断自己的手，或者用刀子捅进自己的腹部。甚至还有人这样描述说，在监狱里甚至有人会把自己的生殖器钉在木板上。事实上，他们那是为了摆脱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宁愿自残之后去医院躺着。但是，海该希斯特拉托司割掉的却是自己的脚，而且还得马上出逃？

怎么逃跑？

急速地跑吗？

这怎么可能？他是否双手和剩下的那只脚并用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跑？但是那只失去了脚的腿会疼痛难忍并流血不止呀！他用什么方法止血？在逃跑的路上他没有因为出血过多而视觉模糊晕厥昏倒过吗？难道他就没有口渴过吗？难道他不觉得疼吗？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边缘？难道他从未遇见鬼魂？从未发高烧打摆子吗？没有遇到幽灵？吸血鬼吗？他的残肢拖在地上，在尘土和污垢淤泥中爬行，难道伤口没发炎吗？此外，他还采取过何种办法逃跑？难道他的腿没有浮肿吗？没有化脓吗？没有青紫吗？

他居然能在这种情况下，奇迹般地从斯巴达人那里轻易逃走，伤口痊愈，还给自己做了只木拐，甚至竟然在后来成了波斯国王玛尔多纽斯的占卜人。

此时，在普拉塔伊阿的局势日益剑拔弩张。双方在普拉塔伊阿对峙的十几天当中，无论是祭神拜天还是占卜都无济于事，于是玛尔多纽斯决定先向希腊人开战。人类的弱点通常都是这样的：总是想尽快击败对手，以便尽快地坐上统治雅典和整个希腊总督的宝座。玛尔多纽斯命令他的：

“骑兵弓箭手先行向希腊军队射箭和投枪……然后，整个军队向希腊人发起猛攻。”

当他们箭袋的弓箭都放空了之后，双方的军队展开了肉搏战。成百上千的人冲向战场，展开了一场混乱的肉搏，只见一个人死死地抓住另一个人，拼命厮杀搏斗，每个人都企图双手紧紧地钳住对方的喉咙，使其窒息。每个人都采取类似的办法，就近顺手抄起什么东西，抡起来向对方的头上砸去，或者用尽全力把刀刺进对方的肋骨，或者用脚踢对方的颈骨。你能听到所有人的粗声喘气、哼哼叽叽，呻吟咒骂和痛哭失声。

在这血腥的骚乱之中，最英勇善战的勇士，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就是斯巴达人，他叫阿里斯托戴莫斯。他曾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那时，他是列欧尼达斯军队的三百勇士中唯一一个从铁尔摩批莱安全返回驻地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位阿里斯托戴莫斯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但仅仅因为他的幸存逃生，反而遭到人们的责难和侮辱。根据斯巴达法律规定，在铁尔摩批莱的战斗中是不容许有幸存者的，只要去过那里的人，都要以生命保卫祖国，直到战死疆场。因此，在列欧尼达斯军团战士的一个集体墓碑上刻着的碑铭是：“一切经过此地的人，请告诉斯巴达，我们这些战

死沙场的人永远忠实于斯巴达的法律。”

显然，斯巴达严厉的法律没有设立一条军团失败后该如何做的规定。只要上了战场，要么作为胜利者凯旋，要么作为失败者，魂归战场。而此刻，在列欧尼达斯的部队，只有阿里斯托戴莫斯一个人幸存，这让他陷进了声名狼藉的境地。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所有人都鄙视他。他奇迹般地生还了，但却遭到怨恨、鄙视，这使他感到十分压抑，犹如负重，无法喘息。他整天觉得无颜见人，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想找到一种解脱办法，以彻底解除这沉重的心理负担。终于，他等到了洗刷自己耻辱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在等到光荣献身的机会来临时，他会毅然决然地结束自己被打上了耻辱烙印的生命。普拉塔伊阿的战役就要开始了。阿里斯托戴莫斯在战场上充分显示出了他英勇善战的气概：

“显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甩掉自己受到种种责难的包袱。在战斗中，他离开了自己所在队伍中的位置，奋力拼命向前厮杀，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过人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结果还是于事无补。斯巴达的法律是铁定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仁慈怜悯和同情。只要你犯了一次错误，那它就会随你进棺材；只要你被打上耻辱的烙印，那就永远不会被抹掉。因此，在这次战役中，受到希腊人光荣表扬的阵亡人的名单上仍然没有阿里斯托戴莫斯的名字：

“由于阿里斯托戴莫斯受到上述责难时竟想寻死，所以他不能得到任何光荣的表扬。”

波斯国王玛尔多纽斯的死决定了普拉塔伊阿战役的最终结果。在那个年代，军事指挥官们并不是把自己掩藏在暗堡中，而是率领军队驰骋沙场，冲锋陷阵。因此，每当将领阵亡，军队就

群龙无首，溃散而逃。所以，在任何战役中，从远处就必须能看得见将领的身躯(通常他们都是骑在马上)，因为士兵们的表现完全取决于他们将领的指挥，看着将领们冲锋在什么位置。

“玛尔多纽斯骑着一匹白马，当他阵亡时，跟随他的卫队，也就是军队中最强的那一部分人马也都已战死在疆场上，其他的士兵见状四散而逃，随后向希腊人投降。”

希罗多德认为，在希腊一方参加战斗的英勇善战的楷模当属希腊人梭帕涅斯。

“他把一只铁锚用一条青铜制的锁链紧紧地系在他铠甲的带子上，每当他向前进攻并逼近敌手时，他就把铁锚抛出去，以保证他自己不至于离开队伍，每当敌手被击溃时，他就拉起铁锚追击他们。”

这里暗含着多么强的隐喻啊！我们不需要一条救生索，把我们驯服地拉到表面上，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锚，拉拽着我们努力劳作！

# 黑是美丽的

从达喀尔码头乘轮渡到格里岛只需不到半小时时间。我站在船尾远远看到一个城市，它刚才好像还跳跃在船尾螺旋式波浪的水面上，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变成了一条岩石般闪闪发光的长长的堤岸，延伸在漫长的地平线上。此时，这条船正在掉转船头靠岸，船的发动机隆隆的叫嚣和铁的碰撞刮出了刺耳的响声，然后船一下子撞上了用混凝土建的码头岸边。

我先过了一座用木头建的栈桥，走过了沙滩，后来拐进一条十分狭窄的街道，从这儿我要走到家庭小旅馆。在那儿有个男的叫阿布都，女的叫玛利亚。她走路脚步很轻，是一个闲不住的女房东，她和阿布都在那里等着我，他们是夫妇。从玛利亚的身材来看，她已身怀六甲，家里不久就要添新人了。尽管他们都还很年轻，可这将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阿布都高兴地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这说明他家一切都好。如果妇女的肚子总是扁平的，阿布都说，如果玛利亚总耷拉着脸沉默不语，那就说明，家里有问题，一定出了有违自然规律的事。那时全家人便都会愁

眉苦脸，亲朋好友们也都会来问候，大家一起祈求上天，每个人心里都会惶惶不安，甚至有时还会有人散布恶毒谣言。一切都得与世界自然规律和谐发展，换句话说，那就是，每个已婚妇女每年都得用怀孕来证明自己是有很强生育能力的人。

他们夫妇俩都属于塞内加尔的派乌尔族，这是塞内加尔最大的民族。他们说沃尔夫语，肤色比西非人略浅一些，所以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因为埃及尼罗河人曾移民到此的缘故。很久以前，当撒哈拉大沙漠还是一片绿洲的时候，有可能埃及人可以比较安全地跨过如今已是一片荒漠的那块地方到达这里。

20世纪50年代，塞内加尔的一位语言历史学家彻伊克哈·安塔·迪奥帕在这一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将它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一理论至今已被普遍接受。他认为，希腊文化最早起源于埃及，即起源于非洲文化，也就是说欧洲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也间接来自于非洲文化。换句话说，就好像一个人实际上生于非洲，就像欧洲的文化也可以在非洲这块大地上有自己的根。彻伊克哈·安塔·迪奥帕曾经编写了一本工程浩大的埃及—沃尔夫语比较学词典，他认为，希罗多德是这本词典的最有权威的编撰者。因为，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在很多地方论证了希腊文化来源于埃及和利比亚文化的观点，换句话说，他用事实证明了非洲文化是欧洲文化，特别是地中海文化的祖先。

彻伊克哈·安塔·迪奥帕的这一论点与20世纪30年代末在巴黎流行的“黑人气质”理论非常契合。“黑人气质”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当时的两位年轻诗人，塞内加尔人列昂尼多·桑格霍尔和一位出生于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的非洲奴隶的后裔艾默·采萨伊尔。他们都在自己的诗作里和宣言中宣告了这种精神。宣言的精神，表达了他们自己以黑人为自豪的观点，表达了他们以

自己的种族为自豪的情感。他们认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遭受白人的羞辱,现在他们要大力颂扬黑人为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和所带来的价值。

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中叶,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以外的人不断觉醒的时代,是非洲人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探寻他们身份的时代,尤其是非洲居民,迫切希望摆脱他们奴隶身份的时代。无论是彻伊克哈·安塔·迪奥帕的论点,还是“黑人气质”和塞萨尔的观点,甚至在萨特还有戴维森的著作中也都提醒欧洲人注意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多少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时代,欧洲大陆以外的社会和文化在人类大家庭中,将会享有自己的尊严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具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处理好与其他人关系的问题。迄今我们一直关注的是:我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现在还要来关注的是:我与跟我具有同一文化背景的其他人的关系问题。因此,现在又产生了我与其他人关系的问题,即后者都是来自具有外国文化背景的人,他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教育,他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价值观。

塞内加尔于1960年获得独立。总统是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诗人,他是巴黎拉丁人居住区俱乐部和咖啡馆的常客,他叫列昂尼多·桑格霍尔。多年来,他与他的两个来自非洲、加勒比和两个美洲的朋友一起,致力于用他们的理论学说、计划、幻想回到他们象征性的根,回到失去的园田,回到他们的世界之初。他们祖祖辈辈都被那些做走私奴隶买卖的野蛮商人贩卖,多少代以来他们被当成异己,没有尊严地活着,无端地被囚禁。

今天,他们终于第一次可以让他们的愿望付诸正在崩溃的敌对的、陌生的现实,让他们的梦想转化为雄心勃勃的大胆而又远大的实践。

列昂尼多·桑格霍尔从自己当选总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筹备第一届世界黑人艺术节。确切地说,这里包含的是整个黑人世界的艺术,又不仅仅只是非洲黑人的艺术。举办这样的艺术节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非洲艺术涉及面极为广泛,向世人展示非洲艺术的伟大、普遍、多样性和它所具有的很强的生命力。非洲性是它的根本源泉,世界性是指这一艺术范围的跨度。

列昂尼多·桑格霍尔于1963年在达喀尔举办了这一艺术节的开幕式,该艺术节持续了数月。我没能赶上参加开幕式。那时所有的饭店都客满为患。我好不容易在玛利亚和阿布都夫妇开办的家庭小旅馆找到了一个房间。塞内加尔的派乌尔族,他们的祖辈有可能是埃及农夫,当然谁也没考证过,也许他们的祖辈是埃及哪一代法老的后裔。

早上,玛利亚在我坐的小桌上摆放了一块新鲜的木瓜,还放了一杯加了很多糖的甜咖啡、半个法式面包和一小罐腌肉。尽管她不大爱说话,但是每天早上在给我送早餐时,她都例行公事地问我:

“昨晚睡好了吗? 夜里热不热? 没被蚊子咬吧? 都做了些什么梦?”

“那如果我没做什么梦呢?”我问她。

“这不可能。”她说。

她告诉我,她常常做梦,经常梦见自己的孩子们,梦见他们个个都过上了好日子。还常梦见一家人去乡下探望自己的父母。每当回忆起这些梦她总是感到很宽慰,很高兴。

我谢过她之后，就去港口乘船到达喀尔。这座城市到处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满城都是各种各样的展览、演讲、音乐会、歌舞演出等。这里汇合了来自东非、西非、南非、中非、巴西、哥伦比亚、整个加勒比海国家、牙买加和波多黎各等国家的人，同时还有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大西洋各岛国和印度洋各岛国的人们。

在街道上上演着各种戏剧小品。非洲剧的表现形式不像欧洲剧那样循规蹈矩。人们不需要事先排练，可以随时随地由几个人临时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表演一出自编自演的戏。没有固定的台词，一切都靠即兴发挥，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气氛和人们的想象。一切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表演题目：警察抓获盗窃团伙，商贩们奋力争取保住自己在城区内的摊位，妇女们聚在一起谈论男人们，哪个男人又爱上了哪个女人等等。当然内容必须简单，语言必须通俗易懂。

如果谁有什么好主意，就可以毛遂自荐当导演。导演分配完角色后，大家就可以即兴表演了。在大街小巷里，广场或庭院里到处都聚集了很多人。表演间，人们可以大声说笑，评头论足，鼓掌助兴。如果剧情发展得非常有意思，引人入胜，那么人们就都会头顶烈日，站在那里继续认真地看下去。如果剧情没意思，没有任何感染力，或者在这个临时组成的剧组中发生意见分歧，这个剧组就会很快解散，演员和观众们也就很快散开，把这块地方腾出来留给后来的人，也许后来的人们有好运，获得成功。

有时我看到，演员们如何中断对白，开始表演某种仪式的舞蹈。而所有观众立刻便与他们应和。有时这种舞蹈是开朗的和愉快的，但有时恰恰相反，众多的舞者都表情严肃庄重、注意力

很集中，似乎表明，参与这种集体仪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但后来舞蹈结束，演员们又开始对白，而片刻之前还沉浸在宗教神秘舞蹈之中的观众，又发出了笑声，高高兴兴，玩儿得非常开心。

在街头戏剧小品演出中，不仅会插进舞蹈演出，其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环节是还要加上各种面具。有时候，演员们要戴上面具演出，他们每个人随身都带着面具，有的拿在手里，有的夹在腋下，甚至挂在背上。因为，在这种酷热难耐的天气中，很难有谁能真正戴着面具演出。面具只是一种象征，为了表达一种充满感情的东西，向世人展示：除我们的世界，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这时面具就是他们的符号、明显标记或者命令。面具给我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警示着我们，表面上看来面具是死的、毫无生气，但每副面具的外观，可以激励我们的情感，唤起我们的热情，使我们臣服于它，对它顶礼膜拜。

列昂尼多·桑格霍尔收集了从各个博物馆借来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面具。从这些面具的大聚合之中，我们体会到，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种独特的神秘的世界。走进这个面具大聚合的世界之中，才真真切切感到这是一种人生难得的奇特经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慢慢体会到，为什么这些面具会对人产生如此大的作用，令人神魂颠倒、不知所措，或者心醉神迷。此时才弄清楚，人为什么需要面具，为什么整个社会都相信面具是有巨大魔力的。因为，它能使整个社会跨越大陆和大洋进行交流，让整个社会感触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并都具有同一身份，它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集体的传统和记忆的形式。

我从一个街头戏剧表演地，走到另一个街头小品表演地，看完了这个面具展览，又去看另一个雕刻展。我切身感到，我此刻

已经成为这一崇高伟大的文化复兴、文化多样化觉醒的目击者，我是这一崇高伟大的文化恢复了其重要地位和自豪感的见证者，我也是这一崇高伟大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觉醒的见证人。因为，这里聚集了不仅有来自莫桑比克和刚果的各种面具，还有来自里约热内卢巴西黑人马库姆巴人的一种宗教仪式用的灯具和海地伏都教神殿保护神手里持有的、饰着花纹的盾以及埃及法老石棺的复制品等。

当然，伴随着我为世界共同体复兴而喜悦的同时，我也感到有些失望和沮丧。比如说：我在达喀尔阅读了一本不久前刚在美国出版的非常感人的一本书，书名是《黑色的力量》。此书的作者叫理查德·瑞特。理查德·瑞特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地区哈莱姆的非洲裔美国人，于上世纪50年代初自愿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土地（被称为回归妈妈的怀抱——非洲），他去加纳旅行。加纳当时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战。那里每天都组织各种集会、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理查德·瑞特也参加了这些集会，通过参加这些集会，他了解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参观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和加纳西南部港口城市塔科拉迪的市场，并与当地的商人和种植场的工人们进行交谈，但是他感觉到，尽管他们和他有着同样的黑皮肤，但是，这些非洲人和他这个美国黑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他们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也许对他来说则是次要的、无所谓的。通过非洲之旅，理查德·瑞特产生了一种与现实世界脱离的感觉。这位作家开始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一切，他好像正在遭到诅咒，这是一场噩梦。

"黑人气质"这一哲学正在试图排除外来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障碍，正是这些障碍把黑人分在两种不同的世界，应该促使他们建立共同语言，并恢复他们之间的共性。

我住在这个家庭小旅馆的二层，房子非常大！这个大大的房间完全用石头砌成，有两扇敞开的大窗，还有一扇门，大得就像是一扇宽大的院门。在我的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又大又宽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可以看到远处依稀可见的大海。海，就是大海！那是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微风阵阵吹进我的房间，让我感觉到好像是住在船上。海岛是静止不动的。在某种意义上，让人觉得好像海洋也是静止不动的，只是它在不停地变换着颜色，海水在变换着颜色，天空在变换着颜色，白日和夜晚都在变换着颜色。实际上，这里的一切都在变换着颜色，围墙和邻村的屋顶、渔船、沙滩、棕榈树和芒果树，盘旋在海边的海鸥和鱼鹰的翅膀都在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即使处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死气沉沉的地方，但这里所有物体的颜色也都会搅得那些对色彩敏感的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有视觉麻木、疲劳的感觉。

在离我住的小旅馆不远的地方，在广袤的海滩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覆盖的那些地带，你可以看见被时间和海盐毁坏的已经风化了的断壁残垣。这块断壁残垣和整个格里岛曾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两百多年以来，或者是更久以前，这座岛曾是一座浩大的监狱，曾是一个集中营，是一个向世界另一半球——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输送运载贩卖非洲奴隶的一个岛。各种说法不一，有人统计，在此期间，从这座格里岛贩卖出去的非洲青年男女，有人说是几百万，有人说是一千二百万，也有人说是两千万。在那个年代里，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成批的诱拐绑架和往境外贩卖非洲奴隶，致使非洲大陆人口骤减。

这造成了非洲大陆荒无人烟，灌木杂草丛生。

那些没有被诱拐绑架走的人，成年累月地、成群地从非洲内

陆流浪到今天的达喀尔所在地，又从那儿划船来到了这个岛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等待船只来把他们运到大西洋的那边时，由于饥渴、瘟疫疾病而永远地长眠在那里。一旦他们死去，他们的尸体就会被立即抛入大海的波涛之中。于是鲨鱼就可来此美餐一顿。因此，格里岛周围便成了史上最大的鲨鱼喂养场。想逃出这座岛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因为，鱼儿们在这里等待着铤而走险的人们，它们与那些白人看守者们一样，警惕地注视着那些跃跃欲试想要逃跑的人。在那些被贩卖运走的黑奴当中，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统计，其中有一半人死在半路上。从格里岛到纽约海运的路程长达六千多公里。这样远的距离，再加上旅途中恶劣的条件，只有最强壮的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我们是否想过，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这些奴隶给我们这个世界创造了财富？从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雅典的卫城的建设，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场和美国的路易斯安那以及阿肯色州的棉花农场的大量种植，从科累马河① 到德国高速公路的建设，还有历次战争，哪一个事件能脱离开奴隶？有史以来人类就千方百计地从奴隶身上获利。抓捕他们，给他们钉上枷锁，鞭打他们，掠夺他们，人类为能把别人掠为己有而欣喜若狂。在那时，谁能获得奴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了争夺奴隶，甚至曾是频繁引起战争的唯一原因，也是人类最大的，甚至是最无需伪装的公开的动机。

那些在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能苟活下来的人们（有人说，船上载的是黑色货物）同时也把自己的非洲文化，即埃及文化（这一文化一直强烈地吸引着希罗多德），带到了世界的西半球。关

---

① 科累马河，俄罗斯东北部河流，长 2129 公里，流域面积 64.3 万平方公里。

于这一点，这位永远不知疲倦的希腊人——希罗多德早已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了。

希罗多德有过什么样的奴隶？有过多少？他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我认为，希罗多德肯定是一个非常善良慈祥的人，奴隶们肯定不会抱怨他们的这位主人。他们与他惺惺相惜，伴随着他走遍了半个世界，也许他们一直陪伴着他甚至走到了推罗，直至他完成撰写这本《历史》巨著。他们可能帮助他记忆了很多东西，他们可能曾是他的活百科全书，给他提供一些人的姓名、一些地名和故事细节，也许在他写书的过程中，他正好忘记了这些，因此，奴隶们为丰富他的书中内容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是，在希罗多德去世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曾被贩卖吗？也许当时他们也早已年迈体衰，不久之后也随希罗多德去了另一个世界？

# 热烈和审慎的现场

最令我感到惬意的事，就是晚上坐在平台上的小桌旁，挑灯夜读希罗多德的书，一边还可以聆听海水的沉吟低语。但这很难做到。因为，一点上灯，周围漆黑一片，这时就会有一群群的飞虫立刻蜂拥而上，聚到我的灯下。最令人感到刺激、好奇的场面是，有些飞虫明明看见眼前闪着光亮，还是要盲目地砰砰地把头撞向烫手的灯泡，然后掉在地上死去。还有一些半清醒的飞虫，小心翼翼地慢慢盘旋，不间断地不厌其烦地转圈，似乎灯光能给它们注入用之不尽的能量。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一种非常小的苍蝇，它们不但无所畏惧，还十分凶猛，根本不在乎你对它们的驱赶，也不怕被活活打死，一旦有一个被打死了，就有一群在那儿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同类苍蝇，蜂拥上前，向你发动进攻。有些甲虫，甚至还有一大群我根本叫不上名来的十分讨厌又极其恶毒的虫子们，此时会一齐闯到闪着亮光的灯下来。这些我还能忍受，对我这个阅读者来说，最头疼的是那些各种各样的飞蛾。不知何因，它们喜欢不间断地胡乱地在人的眼前飞，让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十分刺眼。它们成群成群地扑向你，

试图用它们那暗灰色的、软绵绵的翅膀挡住人的眼睛，试图粘住人眼睛。

阿布都时不时地会来帮帮我。他会拿来一个小小的破旧的烘干炉，烘干炉底下燃烧着的碳，还蹦着火星，然后，他从一个小袋子中掏出一点儿用松香屑、树皮屑和捣碎的浆果混在一起的粉末，用力吹到炉篦子里去。空气中立即就散发出一种呛人的、刺鼻的，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气味。此时，昆虫、苍蝇、飞蛾等就好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大都仓皇而逃，剩下的那些糊里糊涂地留在这儿，在我桌子周围转悠儿圈，然后就突然动不了了，瘫痪了，接着便一头扎到了地上。

这时，我就会看见，阿布都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呢，也有了片刻安宁的时间来阅读。希罗多德已经临近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他以四幕剧的形式结束了《历史》这本书：

第一幕：战场（最后一次战役——米卡列战役）

当天，在希腊人包围了普拉塔伊阿的波斯军队之后，波斯的部分军队正在急速后撤回国，而在另一条战线上，即在爱琴海东岸的战场上，希腊的舰队在米卡列摧毁了波斯的另一股部队。在这场希腊人（欧洲）和波斯人（亚洲）激烈搏斗的战役中，希腊人最终获胜。米卡列战役持续的时间很短，双方军队对峙着。

“希腊人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全线向异军出击了。”

正当他们向前进军之际，突然获得了一个消息说，在普拉塔伊阿战役中，他们的部队打败了波斯人。

他们是怎么获得此消息的，希罗多德没写。这件事很蹊跷，因为，普拉塔伊阿离米卡列相当遥远，乘船也需要至少几天的时间。今天，有些人分析认为，有可能是胜利的希腊一方，用点营火的方式，把消息从一个岛传到另一个岛，只要有人从远处看见

点燃的营火，下一个人就接着点着火，这样用火光传递消息。

“但是，当希腊人得知自己获胜的消息以后，‘他们加强了进攻的强度和速度。’战斗异常激烈，当然波斯人也一直浴血奋战，奋勇抵抗。最终还是希腊人获胜了。‘当希腊人在战斗中或是在追赶溃散而逃的敌军时，他们已经消灭了波斯的大部队，放火烧了异军的船只和整个壁垒，’烧完之后，他们便乘船离开了……”

第二幕：爱情（嫉妒是爱情故事的地狱）

与此同时，当波斯军人在普拉塔伊阿和米卡列战场流血牺牲、战死疆场之时，而那些幸存的波斯人“也正在遭到希腊军队的追捕和杀戮”。

他们试图跑到波斯的城市——撒尔迪斯。而当时躲藏在撒尔迪斯的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早已把战争抛到了脑后，早已忘记了他从雅典溃逃出来时的耻辱，或者根本不想再去理会他的帝国是否彻底崩溃。他沉迷陶醉于危险的、邪恶痴情的越轨的爱情之中。心理学中对这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有一个解释：如果一个人曾有过一次十分痛苦的经历，后来每每当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会感到万分痛苦。那时，人就会竭力回避现实，想从头脑中把这种痛苦经历一笔勾销，借此来获取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平衡。显然，发生在克谢尔克谢斯身上的这事，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想当年，他曾胸怀大志，急不可待地率领世界上最强的波斯军队去攻打希腊。可如今，在他经历了彻底惨败之后，就把这一切抛置在脑后了。从此，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玩弄女人。

他逃离了希腊，隐身在撒尔迪斯。

“那时，克谢尔克谢斯爱上了自己兄弟玛西司铁斯的妻子，

她当时也在撒尔迪斯。他派人去向她传递信息,但她并没有顺从他……克谢尔克谢斯最后让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她和玛西司铁斯所生的女儿为妻。他觉得,这样他就很容易把这位亲家母——弟妹勾引到手。”

其实一开始,这位国王追求的并不是这位年轻女子(她叫阿塔尔翁铁),而是她的妈妈——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在撒尔迪斯他认为,妈妈比她的女儿更有魅力。

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从撒尔迪斯回到了帝国的首都之后,在他回到了自己在苏撒的王宫之后,他的审美趣味却变了。

“当他把大流士的新婚妻子弄到自己的宫殿里之后,就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忘到了九霄云外,他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追求,爱上了自己的儿媳妇——玛西司铁斯的女儿,并且娶她为妻。

但是久而久之,事情的真相就败露了。他们的事被败露的经过是这样的:克谢尔克谢斯妻子阿美斯妥利斯给自己的丈夫织了一件色彩绚丽、非常漂亮的长长的拖地外袍。克谢尔克谢斯看了异常高兴。于是就穿着它去看阿塔尔翁铁。因为,她能给他带来愉悦和欢心,于是他告诉她,只要是她愿意要的任何东西,他都会毫不吝啬地赐给她,以此来报答她……”

这位儿媳,连想也没想,脱口就说要穿这件长外袍。此时,克谢尔克谢斯吓坏了,想尽一切办法婉拒她的请求。原因当然很简单,他是担心妻子阿美斯妥利斯会为此来证实她曾对他的猜疑。所以,他向她许愿:

他要把城池赐给她,还要赐给她大量黄金,甚至要让她统帅军队。

但是这头早已被宠坏了的倔强的小驴,却一口回绝说,她只喜欢这件长袍,也只想要长袍,别的什么都不要。

这位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帝王，掌握着数百万人生杀大权的统帅，却不得不在她面前让步。

“他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她，只好把袍子赐给了她。阿塔尔翁铁得到袍子后大喜过望，穿着袍子到处向人炫耀。

“后来，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斯妥利斯听说了儿媳妇得到袍子的事。刚听到这一消息时，她并没有生儿媳的气，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亲家母——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干的事。因此滋生了报复的心理。终于，她等到了丈夫克谢尔克谢斯国王要设御宴的那一天。每年在国王诞辰的日子，按惯例都要举行一次大型御宴。在举行御宴的当天，国王要在头上涂抹橄榄油，并把它作为礼物遍赐波斯群臣。阿美斯妥利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请求丈夫克谢尔克谢斯把自己的亲家母、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克谢尔克谢斯明白，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觉得，他如果把自己兄弟玛西司铁斯的妻子、自己的弟妹交给自己的妻子，那将会发生非常可怕而残暴不仁的事情，况且她完全是无辜的。可是，在妻子阿美斯妥利斯执拗的请求下，而他自己又不得不服从法律，因为，按传统习惯和做法，在举行御宴的当天，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人的请求的。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了妻子的请求。当他把自己兄弟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时，他对她说，她想怎样处置她就怎样处置吧。但与此同时，他又派了一个人把他的兄弟玛西司铁斯找来，对他说：玛西司铁斯……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劝你，你不能再跟你的妻子在一起了，你必须放弃她。为此，我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让她来代替你的妻子。但你必须答应我，你一定要放弃你的妻子，因为我不喜欢你们再在一起。”

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他说：“你命令我这样对待

我的妻子，未免太残忍了吧！你真心想让我放弃我的妻子，而娶你的女儿为妻吗？可我和我的妻子现已有成年儿女……此外，我们也非常恩爱……主公，请允许我，让我继续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吧！”

克谢尔克谢斯听了兄弟的请求后勃然大怒。

“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什么结果吗？我告诉你，现在，我不但收回把我女儿嫁给你的承诺，同时，也不允许你再和你的妻子在一起生活，这样会让你学会该怎么做事！玛西司铁斯回答说：主公啊，你还没杀死我呢！

“然后就愤然离开了。”

“就在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兄弟玛西司铁斯谈话的空当儿，阿美斯妥利斯派人把克谢尔克谢斯的卫兵召来，在他们的协助下，对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下了毒手。她割掉了玛西司铁斯妻子的乳房，并抛给狗吃，同时还割掉了她的鼻子和耳朵、嘴唇和舌头。在残酷地蹂躏完她后，就把她送回家去了。”

当玛西司铁斯的妻子落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斯妥利斯的手中时，阿美斯妥利斯没对她说什么吗？当她一块一块慢慢地切割她的乳房时（那时还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利器），玛西司铁斯的妻子难道没有对她进行谩骂吗？当她手里紧握着沾满鲜血的刀子时，她没有拼命挥拳反抗吗？她没有由于憎恨和厌恶，咬牙切齿地大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吗？那些卫兵表现如何？是否需要用力紧紧按压住她的身体？因为，在他们施暴时，她会疼得尖叫、挣扎、反抗。他们在看到女性乳房时，是否互相做媚眼？还是惊恐万状、沉默不语？他们暗中窃笑吗？也许在阿美斯妥利斯割她的脸时，她早已经晕厥过去，不省人事，他们是否还得不停地用凉水把她浇醒？阿美斯妥利斯是否挖出

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怎么样？这位国王的妻子是否会去挖她的眼睛？对此，希罗多德都没有交代，难道是他忘了？还是阿美斯妥利斯忘了，没做这件事？

“玛西司铁斯此刻还不知道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由于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赶忙跑回家里。当他看到爱妻受到如此残忍的折磨（没有舌头，说不了话，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她是否已经不省人事），立刻召集儿子们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大家先逃到波斯最大一个省巴克妥利亚，规劝巴克妥利亚省人起义，共同来对抗克谢尔克谢斯，以使他遭受最大的损失。在我看来，如果他能按自己计划的时间到达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伊人地区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但是克谢尔克谢斯早已猜到了他的意图，还派了一支军队去追击他，在半路上，克谢尔克谢斯的追兵杀害了他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与他们一起出走的所有亲兵。这就是克谢尔克谢斯的爱情故事和玛西司铁斯死亡的经过。”

这一切都发生在帝国权力的上层。在权力的最高层，其实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那里也常常会有流血冲突。国王与儿媳同居，而愤怒的王后却错杀了无辜的弟妹。这位替罪羔羊被残忍地割去舌头，连起码的说话能力都丧失了。善行受到惩罚，受到重创，而好人玛西司铁斯在兄长的命令下又被追杀，甚至连他的儿子们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爱妻竟然还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当然过了多少年之后，克谢尔克谢斯本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下场。那王后后来怎么样了？会被玛西司铁斯的女儿为报家仇而杀害吗？因为，罪与罚的车轮一直在继续转动着。希罗多德是否读过莎士比亚的书？我们这位希腊人，他给我们描述的世界上最恐怖的情杀和王室谋杀的故事，要比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和《亨利三世》早两千多年。

第三幕:复仇(十字架上的酷刑)

在赛司托斯,那时有一个由克谢尔克谢斯亲自任命的太守镇守,此人叫阿尔塔乌克铁斯。

“阿尔塔乌克铁斯是个十分阴险狡诈而又作恶多端的人。甚至在国王向雅典进攻的途中,他竟然敢欺骗国王。”希罗多德认为,此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偷盗金银财宝,贪欲心极强,不会放过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还敢在圣堂中与妇人交配”。

而希腊人,在追捕波斯军队的残余逃兵时,欲摧毁海列斯彭特桥,这曾是克谢尔克谢斯在讨伐希腊时建造和使用过的桥梁。当希腊军队抵达了由波斯人防守的最强大的城市——赛司托斯时,便立即把它包围了。战斗开始好长时间之后,一直都无法攻下这座城市。甚至,希腊士兵们都开始想打道回府了,可是:

“希腊将领们却坚决不准他们逃回家。也正是在此时,在赛司托斯城寨内部的将士们已经到了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不得不煮食床上的革纽来充饥。后来,他们把这些也都吃光了。在这种山穷水尽的境况下,波斯人和阿尔塔乌克铁斯却在漆黑的夜晚,从要塞的后面,也就是希腊军队兵力最少的地方逃走了。

“希腊人发现后迅速追击,阿尔塔乌克铁斯与他的随行人员……被希腊军人追上后,他们又顽强抵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果,一些人被杀死,剩余的人被活活生擒。于是,希腊人把他们押送到了赛司托斯,阿尔塔乌克铁斯与他的儿子也在被羁押的人中。之后,希腊人又把他们押送到了一个海峡地带,也就是克谢尔克谢斯曾在那儿架过桥梁的那个地岬地带。还有人说,希腊人是把他们押送到了玛杜托司市的一座山里。在那儿,希

腊军人在厚厚的木板上钉上大钉子，把他高高地吊在上面，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子活活用石头砸死。”

希罗多德没有告诉我们，当他们把他的儿子活活用石头砸死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父亲是否还活着。这句话“当着他的面”，仅仅是字面意思，还是另有一种隐喻？也许，希罗多德忘了问目击者，有关这些令人心悸的毛骨悚然的细节。或许他问了他们，但这些目击者无法回答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第四幕：归途（或者说去寻找更好的国家）

希罗多德回忆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阿尔塔乌克铁斯的祖父是一个名叫阿尔铁姆巴列司的人。他生前曾向当时的波斯国王献策，波斯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把他的建议献给了伟大的国王居鲁士，他那次献策的大体意思是：

“既然宙斯把霸权赋予了波斯人，特别是赋予了你——居鲁士，那我们就迁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既窄小而又岩石林立的地方，去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当我们能够统治如此众多的人以及全亚洲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

“居鲁士听了他这番话，对他献出的计策并不是特别赞赏。但他说，你们可以这样做，不过你们必须有思想准备，不能再做统治者，而只做被我们统治的臣民。因为，温和的土地会产生温和的人。他说，一个国家既盛产极其优良的作物，而又同时造就英勇善战的武士，这是不可能的。波斯人对居鲁士的话心悦诚服，改变了自己的意图。他们宁可居住在艰苦的国家做统治者，也不愿在肥沃的土地上做奴隶。”

当我读完希罗多德这本巨著的最后一句话，我合上了书，把它放到了桌子上。此时，阿布都自制的芳香剂也早已失去了作

用。这些恼人的苍蝇、蚊子以及飞蛾又开始到处乱飞。甚至，它们现在比刚才更让人感到不安、更令人讨厌。无奈之下，我只好逃离了平台。

早上，我去邮局给国内发电报。窗口放着一封给我的电报。米歇尔·霍夫曼是这个邮局的头儿，他对我很好，也非常照顾。他对我说，如果非洲不再发生什么特殊事件的话，他希望今后能去华沙见到我。我在达喀尔又继续多呆了几天，后来就告别了玛利亚和阿布都两口子，穿过格里岛窄小而又弯弯曲曲的街道，飞回了家。

# 希罗多德的发现

有一天晚上，也就是在我去格里岛之前，我的捷克同行，叫雅尔达——我是很久以前在开罗认识他的，来到我的住处。他也是来达喀尔参加黑人艺术节的。我们两个人一同去看了展览，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们都想方设法弄明白西非班巴拉族、玛空戴族和伊菲族人所用的面具，以及他们的雕刻中所蕴含的意思和终极目的。对我们来说，所有的面具乍看上去都十分恐怖，如果是在晚上，或者是在昏暗摇曳的烛光或者火光下，看到这些面具和雕刻，你一定会被吓得头皮发麻、毛发耸立。

当时，我们俩在聊天儿中聊到了一个话题，怎么才能在一篇很短的报道中，用几句话说明白什么是非洲艺术。我们俩互相对视很久，谁都没说什么。因为作为外国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简直太陌生了。在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概念和词汇里，居然我们都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些东西。一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俩都感到很无奈。

如果我们出生在希罗多德时代，雅尔达和我很可能就是斯奇提亚人。因为那时，斯奇提亚人就居住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欧

洲这部分地区。那我们就可能骑着马，像我们这位希腊人形容的那样，驰骋于茫茫的森林之中，驰骋于广阔的大地上，拉弓射箭、喝着酸马奶酒。那时，希罗多德也许会对我们产生兴趣，上前来询问我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询问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然后，他就会给我们详细地解释，如何给波斯人设圈套，引诱他们到这块在严寒的冬天冰雪覆盖的地方，然后一举消灭他们的军队。或许他会给我们讲，斯奇提亚人是怎么追捕那位不可一世的险些丧命的大流士国王。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雅尔达看见我桌子上放着的这本希罗多德的书。他问我，我是怎么搞到这本书的。我给他讲述了我得到这本书的经历，还告诉他，在我阅读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过程中，我仿佛经历了两次旅游。一次，是我在完成作为记者的任务时，另外就是在追寻《历史》一书作者的足迹时。我强调说，根据我的看法，把这本书的题目，翻译成"历史"，不能完全说明本书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源于希腊文的这个词"History"，实际上，它的原意是"研究"、"探索"的意思。如果用希腊语原本的意思，那可能更符合作者的意图和目的。因为，希罗多德不是靠翻阅档案来撰写学术著作的。这种写作方法，是在他身后的数个世纪以后学者们才开始的，希罗多德撰写《历史》一书的目的是为了努力寻找、学习、描写历史是怎么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人是怎么创造历史的。可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却常常与他们的努力和期待相反。但是，众神真的能决定这一切吗？或者说，人由于本身受制于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性，而不能很好地根据理性塑造（支配）自己的命运？

我对雅尔达说，我开始阅读希罗多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曾问过自己，希罗多德是如何搜集材料的。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图

书馆，没有今天庞大的档案馆、剪报和无数的资料。但是他在《历史》的第一页就写道：

“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或者腓尼基人说……那时波斯人还这样说，这就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哪一种更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证。下面我想说的是关于是谁最初向希腊人发起挑衅这件事，然后，再做出我个人的评论。无论人间的城邦大小与否那里都有很多人，因为，先前，曾经很强大的城邦，现在衰弱了，而那些，在我这个时代很强大的城邦，过去曾经是很弱小的。知道了这一点，那我就相信，人间的幸福是绝对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所以波斯人和腓尼基人也是同样。”

但是，希罗多德，作为一个希腊人，他是从哪儿得知，与希腊相距遥远的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说了些什么？埃及和利比亚人都说了些什么？我想，这是因为，他到过那些我们提及的地方，不断向人们提问题，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并把他所见所闻和别人给他讲述的事情一一努力记录下来。所以说，他首先得迈出脚步走出家门去旅行，那这不就是我们所有记者本应做的事吗？每每遇到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就是立即打起行装出门旅行吗？旅行就是我们原始资料的来源，就是我们储存财富的宝库，就是我们的财富。记者只有通过旅行，才能像在自己家一样，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随着深入阅读希罗多德的书，我逐渐地体悟到，我与他已经建立了兄弟般的情感。是什么促使他出门远足？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一次一次地做出决定，冒险做这种苦行僧式的艰苦旅行？我觉得，是出于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所以他渴望去天涯海角，不惜一切代价去观察，去亲身经历。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很少有人能具备的炽热情感。人其实有一种天生的惰性。从人们开始农耕的那天起，人们就放弃了具有危险性的和到处游荡的打猎生活，或者群居生活。人们会愉快地享受定居生活，在自己那块小天地中靠天吃饭，用修筑围墙或者挖沟渠圈住自己那块小天地，时刻准备着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流血牺牲，甚至献出生命。如果人一定要离开故土，那一定是处于被迫无奈，也许是因为遇到了饥荒灾难、瘟疫疾病或者战争，或者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比如说，当上了水手、游商、商队的首领等等。但是，像希罗多德这样，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人的强迫，长年累月漂泊在外，周游世界，为的只是去认知世界、探究和了解世界，此后还要把所见所闻写出来，像他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简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希罗多德这种激情来自哪儿呢？也许是来自孩提时代的提问：比如说，船是怎么来的？因为孩子们很喜欢在海滨的沙滩上玩儿，在海天连成一片的遥远的地平线上，突然露出一条船，渐渐地向他们驶来，然后这只船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但是，船来自哪里？我肯定，大多数孩子是不会提此类问题的。但他们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看到船的出现后，顾不上拍去身上沾满的沙子，急忙跑回家，问大人：这条船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在海天连成一片的那个地方，看上去很遥远、很遥远，是不是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难道，在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真的还有别的世界？那是怎样的世界？然后，这个孩子从此就开始寻找答案。后来，当他长大成人后，他为此寻找答案的愿望与日俱增，而且这种寻求答案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下定决心，准备自己去寻找答案。

旅行本身就给希罗多德找到部分答案提供了机遇。因为人

是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希罗多德的书本身最早就是起源于他的旅行。他的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报告文学。本书作者具有记者的直觉,具有新闻从业者的眼光和耳朵。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越过海洋,跨过荒原,冒险深入到荒无人烟的沙漠,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对他来说,那时有多么艰难。我们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感到震撼。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从不气馁,他具有坚定的意志,从未说过惧怕什么。

是什么促使他坚持不懈、毫不畏惧、不知疲倦、不屈不挠地去探险?我认为,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乐观的信念,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早已丧失了这一信念,即相信世界的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

我从一开始阅读希罗多德,就被他的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时常打开他的书,回到他书中的时代,回到他所刻画的人物之中,回到他所描写的场景之中,回到他所讲述的众多真实的故事和无数虚构的故事之中。

其实,从希罗多德所描写的他所见到的人和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应该是一个善解人意、温和善良、待人忠诚、为人忠厚的人。我们可以把他当成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因为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他不会生气,也没有仇人。他总是设法理解一切人和事,从中发现问题。他总是不断思考,为什么此人的表现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他从不抱怨人不好,而是指责制度不良。他认为,每个个体都不是与生俱来就腐化堕落、邪恶有罪。而是他所处的制度使他变坏。因此,他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热情拥护者,他视独裁、专制、暴政为仇敌。他相信,人只有在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中,才能有尊严、自在地像人

一样地活着。大家来看一下，希罗多德看上去，正如他说的那样，一个像希腊这样巴掌大的小国，能抵御来自东方强国的入侵，正是因为希腊人懂得自己拥有自由，所以，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捍卫自由而奋斗。

但是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同胞的那种优越感，希罗多德也并不是从未加以批评的。他说，这种公开讨论、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值得赞赏的，但也很容易扯偏方向，如不得要领还会引起自己人之间毁灭性的斗争。他指出，希腊人甚至可以在战争爆发时还争论不休，当敌军已经有准备向他们大举进攻之前，他们也还会争吵。但当他们看到，克谢尔克谢斯的将士接近他们时，他们亦可以立即拿起弓箭和刀剑进行猛烈反击。当波斯人欲先向他们发起进攻时，希腊人才开始论争，波斯人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进攻？他们这种爱争辩的习性，是不是源自希腊人从来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的原因之一？

早前只是我一个人被这些昆虫大军围攻围剿，现在又多了一个雅尔达，它们兵分两路嗡嗡叫着向我们袭来。我们斗不过它们，被它们一刻不停的讨厌的叫声和进攻搞得筋疲力尽，只好去求救阿布都。他像一个古代僧侣那样，拿出馥郁的熏香来帮我们驱赶这一邪恶的力量，那就是这些嗜血成瘾的蚊子以及它们的同类。

我们一直在谈论希罗多德，暂时把对非洲目前局势（这是我们每天要报道的主题）的讨论放在一边。很久以前，雅尔达说，他曾读过这位希腊人的书。他说，他现如今已经不大记得这本书的内容了。现在他问我，这本书里的哪些内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我回答说，是他书里所描写的故事的悲剧性。希罗多德是

与他同时代的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他们很可能是朋友）、欧里庇得斯齐名的悲剧作家。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希腊戏剧表演艺术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舞台艺术主要受神秘宗教、民间宗教仪式、民间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和酒神节狂欢仪式的影响。这对所有的希腊作家和希罗多德的写作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希罗多德是通过描写个人命运来阐释世界历史的。他书中的每一页都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他总是能给出具体部落、具体人、具体人名，举出有人强大或者弱小，有人仁慈和蔼或者粗暴凶残、得意洋洋或者垂头丧气的各种详细例子。用不同人名以及常常变换的环境和形势，映射出了安提戈涅和美狄亚、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佣人的影子、映射出大流士的幻影和手举长矛的希腊诸神埃葵斯托斯骑士的形象。

神话与现实交叉，传说与事实交融。希罗多德试图把它们彼此分开，同时又保持从不偏移哪一方，但也从不冒昧地把它们分成不同等级。他知道，人的思维方式和人所做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心灵、梦想、焦虑和预感。他清楚，如果国王在睡梦中看见幻影，可能会做出关乎国家及其数百万臣民命运的决定。他也十分了解，人在自己的幻觉面前感到恐惧时又是多么脆弱和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希罗多德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书写世界历史。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是第一个想到书写世界历史的人。他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著作搜集资料、询问目击者、吟游诗人和僧侣，他跟他们见面聊天，发现他们每个人记的事情都有出入，有差异和不同。此外，在我们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他发现了人类记忆中有一个非常不可靠和非

常复杂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人们记住的是他们想记住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中发生的东西。每个人都在这些事件过去之后，加上个人的色彩，每个人在回忆的时候都会添加些自己的佐料。所以，想要真正了解清楚过去事件发展的实际情况，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我们来说，能做到的就只能是，找到那些形形色色的、或多或少可信程度高的，无论如何，更能符合我们今天的版本。过去不存在。有的只是对历史无穷无尽的描写。

希罗多德清醒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复杂性，但他仍不屈不挠，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引证对各种事件的不同意见或者淘汰那些荒谬的不合情理的有悖常识的说法。他不想当一个被动的聆听者和编年史记录者。他渴望积极加入到这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创作之中，这个艺术就是历史——今天的、昨天的和离我们更久远的历史。

当然，在他给我们构筑这幅世界画面的时候，他不仅仅借助了这些往日事件目击者的讲述。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了他同时代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作家本人与读者保持着非常紧密和直接的联系。大家知道，那时没有书，著作人要向公众介绍，他在写什么，公众听了之后，当场作出反应并且给予评价。公众当时的表现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晴雨表或者方向盘，看出他的写作方法和内容能否被他们接受，是否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赞同。

如果当时没有一个领事机构——游客朋友——的话，希罗多德是不可能独自完成他的旅行的。领事——游客朋友，其实就是一个领事，他们自愿或者免费照顾那些来自本人祖籍的旅行者，给他们以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帮助他们适应初来乍到的新城邦的生活。给这些人以国民待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为他们获取信息提供必要的条件，并为他们与别人取得联系提供方便。在当时那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中，神托是住在人间的。有时，很难把他们与常人区分开，所以，领事更具有特殊作用。对初来乍到的人，他们要表现出热情好客，以诚相待。因为，你怎么可能知道，在这些旅行者当中，谁会是神托派来的装扮成流浪汉、乞讨要饭、流离失所的人。

对希罗多德来说，当时那些能记录下各种各样事件的人、自己探索研究的人和四处游走的人向他提供的资料也弥足珍贵，不可或缺。迄今，在西非还可以碰到、听到 Griot 这个词，其意就是游走于乡下和市场集市给人讲述传奇故事、神话、民间历史，演唱部落史、氏族历史的人。只需给他一点小钱，甚至给他吃一顿便饭、喝一杯凉水。这位老 Griot 是一个极具智慧、想象力丰富的人，他会给你讲述你国家的历史，那时都发生过什么事，甚至意外事故、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事。但他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谁也说不清楚，甚至搞不清楚似乎更好些。

希罗多德还在继续旅行，为了解答孩提时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远处开来的船源自何方？它是怎么出现的？怎么到来的？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吗？还有别的世界存在吗？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等我长大了，我想走出去看看。但是，最好也别长得过于成熟，最好保持一点童真。只有孩子才可以提出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真心想知道。

希罗多德带着他儿时的火热情感，不断地探索着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他最大的发现，就是还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又都是重要的。

应该走出去探索，因为别的世界、别的文化就是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照见我们文化的一面镜子。由于这面镜子，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因为，我们在别人面前，在与别人比照时，总是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

这也正是为什么希罗多德发现了这个奥秘之后，也就是说，是他首先发现，别的文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自己，为的是使我们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每天早上，他一次次振作精神，又一次次踏上旅行的征程。

# 我们站在四周闪光的暗处

希罗多德也并不总是陪伴着我。我经常会突然出差，匆忙之中，也没顾上这位希腊人。即便有时随身携带着这本书，但也时常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热带酷热难熬的天气折磨得我精疲力竭，也就没有精力再去读书了。

尽管在没有打开书的情况下，我也很容易能想起以前读过多少遍的那段在希腊人和阿马松人之间的对话：

“当希腊人在铁尔莫东的战役中大获全胜之后，便把所有的阿马松装进了三只船出发了，她们实际上是被抓走的替罪羊。当船抵达海上的时候，这些阿马松们便向所有的男人发起进攻，并杀死了他们。但是，她们根本不懂船上的一切事物，当然，更不知道怎样使用舵、帆和桨，可是船上的水手们早被她们抛到海里去了。此时，海面上起了风浪，一直到她们抵达迈奥提斯湖岸的克列姆诺伊时风浪还没停。克列姆诺伊位于酷爱自由的斯奇提亚人国境内。她们在这儿下了船上了岸，一直步行走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在路上，阿马松们最初遇到了一群马，于是她们便骑上马，抢掠了斯奇提亚人的财宝。斯奇提亚人被搞懵了，因

为，他们听不懂这些妇女说的话，从她们的穿着上，也无法辨别她们是来自哪一个民族，他们都十分纳闷，这些人来自何方。他们开始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帮来挑衅的好斗的年轻人。后来他们从尸体中才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些妇女。

现在，他们决定不能再杀戮妇女了，决定派与阿马松人同样数量的斯奇提亚年轻人去。

“到阿马松人居住地附近安营扎寨。斯奇提亚人希望能靠这些妇女给他们传宗接代。

“于是，从斯奇提亚派去的年轻人都不再做任何伤害妇女的事。当阿马松们发现这些异族年轻人对她们无敌意时，她们也就松心了。这样两处营地的人就一天天地接近……有一天，在临近下午之时，阿马松们渐渐分散开来，一个人或者成对地分别离开了自己的营地，去其他地方寻欢作乐。斯奇提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后，也步她们的后尘；当斯奇提亚男子们看到这些妇女独自漫游时，年轻的男人便去与她们纠缠。对此阿马松妇女不加任何抵抗，很快便与年轻男子发生了关系。但由于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她无法对他说什么，只能靠打手势示意，这儿应该有两个人，意思是，他第二天应再带一个人来到同一地点，她也会带同伴再来这儿。年轻男子明白了她的意思，回去告诉了他的同伴。第二天，他自己带了一个男子到了昨天来过的地方，他们看到阿马松人也同样带了另一个妇女到了同一个地方，而且在那儿等他们。后来其他年轻男子纷纷都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们也都效法跟这些妇女发生了关系。”

尽管我多年没翻看《历史》这本书了，但我从没忘记过该书作者的名字。他曾经是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人，后来，他被遗忘了两千余年。这么多世纪过去以后的今天，至少对我来说，他又

复苏了。我希望他继续保持他的面容和特征。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希罗多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他是我最亲密的人，我们有共同语言，只需说半句话我们就能互相理解。

我想象着，当我坐在海滩边，他缓缓向我走来，放下手中的拐杖，抖落掉鞋里的沙子，之后我们就攀谈起来。他肯定属于那种十分健谈的人，逮住谁都不会放过。像他这样的人必须有听众，没有听众他们就难以生活。他们天生就是那种不知疲倦和坚持不懈的媒介人物。无论走到哪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得立即传递给别人，甚至不会为自己保留片刻。他们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使命，他们酷爱这样做。出行、远行、获得信息，立即向全世界传播。

但是，在世界上，像他们这样充满激情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普通人对世界并不十分好奇。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不得不面对现实，但也希望最好不要在这方面消耗自己太多的精力。因为，要了解世界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于是，大多数人练就了与他们的那种热情相反的本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所以，当出现了一位像希罗多德这样的人的时候，他求知欲旺盛、醉心于探索发现、不断进取、勇于献身知识，再加上他才智超群，具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因此这样出色的人自然就能够名垂青史。

同类人拥有的同样特点，他们从不满足于现状，就像吸水的海绵很容易吸收一切那样，但也极易失去一切。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都不能久留，他们天生不能忍受空虚，他们总得需要吸收新的东西，总要去不断填补空白，总要去补充、提升和扩展。希罗多德的思维就不可能停留在一个事件上或者停留在一个国家。总好像有什么东西推着他向前走，让他不能驻足。实际上，今天他发现了什么、确定了什么，明天又让他觉得不合适，他还

得继续前行，往更远的地方走。

这些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总的来说，他们也是很不幸的人。因为他们得自己承受凄凉孤独和寂寞。所以，他们也需要去寻找别的人，他们甚至认为，在某个国家或者城市，他们找到了能与之亲近的人和伙伴，并与之相识，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许有一天，当他们一觉醒来，可能会突然觉得，没有什么能把他们连在一起，应该立刻打起行装出发，因为，他们看到，还有别的国家和别的人召唤着他们、吸引着他们。而他们昨天刚结识的那些人和事，今天却黯然失色、变得毫无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从不依附于任何事，也从不在某个地方深深扎根。他们心灵纯真，表面看上去他们移情别恋，实际上他们是真诚的。如果你问他们，在他们到过的国家他们最喜欢哪一个？这个问题让他们感到很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哪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国家。这样说会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他们还会再想回那个曾经去过的国家看看吗？

再去一次？会使自己感到尴尬。因为他们从未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还会重新上路，踏上征程。重新上路、踏上征程，这就是他们期望。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这么吸引人去周游世界。难道只是出于猎奇吗？难道是为了自讨苦吃，去体会饥荒吗？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吗？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好奇心，那就是一个空虚的人，等于心被焚毁了。如果一个人认为，什么都见识过了，缺乏激情，那就丧失了最宝贵的东西——生活的快乐。希罗多德与这种生活态度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兴致勃勃、兴趣广泛、充满活力、喜欢浪迹天涯的人。他头脑中装满了计划、充

满了理想和理论学说。他不停地忙碌，要么刚刚远足回到家（但是他的家在哪儿?），要么正在准备下一次出行。他把旅行当做是他对生活、对世界和自我的探索。

他在自己的脑子里绘制着一幅世界地图，这是他自己绘制，并不断修正和不断补充的一幅地图。这是一幅逼真的图像，是可旋转的万花筒，是闪动着的大屏幕。在这上面每天都发生着成百上千件不同的事。埃及人正在建造金字塔，斯奇提亚人正在猎捕猛兽，腓尼基人正在追逐妇女。

在希罗多德的这幅地图上，有希腊和克里特岛（地中海）、波斯和高加索、阿拉伯和黑海。但没有中国，也没有美国和太平洋。他也不太敢确定欧洲的形状，他对欧洲这个名字源自何处也考虑了很久。

“至于欧罗巴，的确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东部和北部是否是被大海环绕。人们只知道，它很长，是另外两部分大地的总和……从那些确定了这个边界的人那儿，我也打听不到它的名字的来历。”

希罗多德不太关心未来。因为，明天，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继续。他对昨天很感兴趣，因为，昨天是已经消逝的过去。他担心，昨天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如果那样我们会失去它。可我们是人，我们会叙述历史和神话，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天壤之别。分享共同的历史和传奇故事就能加强我们的共同体，而人们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中，为此，我们要感谢昨天。

在希罗多德时代还没有产生什么个人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等现代概念。这些概念产生于他身后的两千余年。现在，人们晚上时常也会围坐在长桌边、篝火旁，坐在古老的参天大树之下，当然离海边近最好，人们在一起聚餐，喝着醇

美的葡萄酒一起聊天。之后把人们聊天的话题编到小说和形形色色的冗长的历史书中。如果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和旅行者，我们也会把他们请到桌边来。希罗多德也会加入其中，坐在那儿聆听。第二天早上，他又会踏上旅途。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接受别人的邀请，这种夜晚聚会的场面不断重复出现。如果旅行者的记性好，希罗多德肯定有超常的记忆力，那他周围就会积聚许多历史故事。这也是我们这位希腊人搜集资料的途径之一。有的可能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故事也可能是他想出来的。

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探索过去比我现在当记者和新闻工作者探索当下更让我着迷。特别是每每我对当今的事情感到厌倦之时更是如此。一切都在重演：政治——永远是背信弃义、肮脏的交易和谎言；平民百姓的生活——永远是贫穷和绝望；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所谓的永恒的二元性。就像我曾经着迷想跨越一下国境那样，现在最让我焦虑的是按时跨越国境。

我十分担心，自己会陷入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们通常把地方主义这个概念与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地方主义的概念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思维限制在一定范围的物质空间，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别不恰当地使这种概念普及化。但是，艾略特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地方主义，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在我们这个年代，"他在1944年撰写的关于论述维吉尔的文章中写道，"当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混淆智慧和知识的时候，知识和信息就设法从工程技术角度解决生活问题。一种新的地方主义就会逐渐出现，或许还需要给它重新命名。这种地方主义与空间无关，却与时间有关。而对这种新地方主义来说，历史只是人类发明的唯一记录。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它来说，世界仅仅是生者的财产，而

死者根本无缘分享这一切。这种地方主义的威胁在于，我们所有的人，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会陷入地方主义，而那些不喜欢这样做的人，则只能去当隐士。”

所以要把地方主义分成空间地方主义和时间地方主义两种。每个地球仪和每张地图都只展示出前者，他们非常盲目地陷于自己的地方主义，并从此迷失方向。同样，每部历史，其中包括希罗多德书中的每一页都展示了后者，即当下的历史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历史只是现在的不断的前行，而那些最古老的历史，对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眼前的现实。

为了避免陷于这种时间地方主义，我又出发走进了希罗多德的世界。我以这位经验丰富、智慧的希腊人作为我的向导，多年来，我们一起漂泊。当然独自旅行有时会更好。我认为，尽管我和希罗多德相隔两千五百年，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并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这种距离感仅仅是出于我对他的仰慕和敬仰。尽管希罗多德一向为人率真坦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我仍然时刻感觉到，我一直是在与一位巨人并肩游历。

因此，我的旅行就兼有两种维度：两种旅行在同时进行——在时间上（去了古希腊、波斯和斯奇提亚）；在空间上（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工作）。过去时与现在时相互交叉，两种时间交叠在一起，使历史的薪火不断传承。

我试图躲进历史的这种做法对吗？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在历史中面对的事情，也正是我们以为能在现实中逃避的事情。

希罗多德也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一方面，他穷尽毕生精力要保存历史的真实：

“以便人类历史不会从人类的记忆中抹掉。”

另一方面，他资料的主要来源也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其他人根据自己的看法口述的历史。因此说，这是被人有选择的记忆和加上个人见解的历史。用另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只能是口述历史的人所希冀的那种历史。这种分歧至今尚无人能解决。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减少并缓和这种分歧，但永远也不会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这种主观因素，即我们所认为的所谓被曲解了的历史事实永远不会被滤掉。我们这位希腊人当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总是不断限定自己笔录下来的东西：

“他们对我说”、“他们坚持说”、“他们的说法也不尽相同”等等。

因此从完美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过完全真实的历史，因为，无论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身处历史，而只能是靠听别人讲述、听别人介绍来呈现历史，这历史就成了他或她认为的那样。这项事业的自然发展也是如此，那种认为能够抗拒这种自然规律的想法是荒唐的。

这个真相或许就是希罗多德最伟大的发现。

我乘船从希腊科斯岛抵达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尔那索斯。船航行到半路时，我看见有一位上了年纪、沉默寡言的船员从桅杆上降下了希腊国旗，换上了土耳其国旗。这两面旗同样都皱皱巴巴、早已褪了色并且破损得很厉害。

这座小城市坐落在碧蓝色港湾的深处。在这深秋时节，所有的游艇都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我向一位值勤警察打听去哈利卡尔那索斯的路，他更正我说，那个地方现在叫“波德汝姆”。这儿现在属于土耳其，已经改成土耳其的地名了。不管怎么说，

这位警察还算很和善也很礼貌。我到了一个建在海滨附近的价格便宜的小旅馆，接待台前站着一个小伙子，他接待了我。我看见，他的脸骨膜发炎，肿得非常厉害，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担心，他脸上流淌下来的脓汁会马上把他的脸分离成两半。为防万一，我跟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我站在他的另一边。

我的房间在二楼，这是一间低矮破旧、四面漏风的小房间，没有门，没有窗户，也没有衣橱。这让我有一种似乎回到家的感觉，当然那是我很久很久以前住过的家。早餐是一杯香气扑鼻的土耳其咖啡、一块阿拉伯饼、一小块羊奶酪，还有一点洋葱头和橄榄。

我走在通往市中心的一条主路上，城市的马路周围到处是棕榈树、无花果树和盛开着的杜鹃花。在海边的某一个地方，渔民们叫卖着他们清早刚刚打捞上来的各种鲜货，在一个湿漉漉的长桌前，他们抓住在桌子上活蹦乱跳的鱼，手抄钝刀迅速剁掉了鱼头，神速地清理着鱼的内脏，然后他们把这些鱼的内脏扔进海水里。在这片水域，聚集着很多很多鱼，此时它们都扑上前来，捕食这些扔进水中带血的杂碎。第二天早上，渔民们再来投网，网住这些昨天来这里抢食的鱼，把它们扔在滑溜溜的桌子上，剁掉它们的头。鱼儿们就是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虔诚地饲养了自己也喂养了人类。

在半路上，在伸向海边的一处海角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十字军曾修建的圣彼得城堡。这座城堡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水下考古博物馆。这里展出的都是潜水员在爱琴海海底打捞上来的各种物品。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些巨大的双耳罐。双耳罐已经存在五千年了。它有纤细的、天鹅般的瓶颈，外形优雅，硕大的瓶肚能装进很多物品。双耳罐实际上是用黏土烧制而成的，在

古代是用来装橄榄油和葡萄酒、蜂蜜和奶酪、谷物和水果的，它游遍了整个古代世界——从科尔切斯特到印度。爱琴海海底到处都是双耳罐的陶瓷碎片，但也能看见完整的双耳罐，那里面也许还装着满满的橄榄油和蜂蜜，它们长眠在水下的礁石和悬崖峭壁之中或者沙石中，像一头躲藏在水下的懒洋洋的猛兽。

然而，这些被潜水员们打捞上来的东西，只是被淹没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也许就像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样，在那片深不见底的海底世界里，还有一块拥有许许多多蕴藏着丰富的色彩斑驳的物品的领域。在那里有很多被海水淹没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有被淹没的城市和乡村，港口和码头，圣坛和雕像。有沉没的商船以及数不清的渔船。在它的海底长眠着腓尼基人的战舰，在萨拉米斯水底长眠着克谢尔克谢斯曾为之骄傲的波斯舰船。有数不清的马队、成群的山羊、森林和耕地、葡萄园和橄榄林。

这是希罗多德熟知的世界。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博物馆的馆内，幽暗而又神秘，像是一个黑暗阴沉的洞穴，在那里边的桌子上、陈列柜里和陈列架上静静地躺着那些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物品。在射灯的照射下，你能看到陈列在那儿的物品都是些玻璃制品，其中有各种形状的杯子、碗、大罐子、细颈瓶、酒杯等。但是，当博物馆内厅的门一旦被敞开，白天刺眼的阳光从外面射到里面时，这些展品就显得朦胧，无法清晰地看到它们；里面很暗，只有当博物馆的门关严之后，博物馆员打开那些小小的射灯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易碎的、表面粗糙的玻璃制品，那时它们就会变得栩栩如生、色彩斑斓，散发出光和亮，向我们展示出生命的悸动。

我们站在四周闪光的暗处。

我重回到了那家小旅馆。在接待台前，在刚才那位痛苦不堪的小伙子站过的地方，现在换上了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姑娘，她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当她看见我进门时，微笑着面对着我，她那非常专业的笑容，意在向我表达对旅游者到来的欢迎，也意在她打破了那种传统禁令，一改以前一见陌生男人就得保持冷漠、毫无表情的呆板面孔的做法。

# 译者后记

与卡普钦斯基先生结缘要追溯到2006年，在我为波兰使馆翻译一本介绍波兰的小册子的时候，看见了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名字。在网上查找资料后，惭愧于自己忙于工作，同时进行波兰文学翻译，竟然疏于了解这位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已鼎鼎大名的波兰战地记者、诗人、摄影家，也是文学家。他曾以知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游记作家、诗人身份，六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进入最后评奖阶段。这位伟大的作家最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使世人无法透过这个奖项来了解并接触他更多的作品。

1932年3月4日，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出生于波兰东部小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39年9月，希特勒的军队攻占了波兰，当时卡普钦斯基只有七岁，战争让年幼的卡普钦斯基过早地经历了苦难，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战后的饥荒。1950年，他十七岁，高中毕业。那时他就显示出写作的才华。他开始写诗，当时一家叫《今天与明天》的杂志，第一次发表了他的诗和文章。由于诗文的发表，波兰《青年旗帜报》文化版的总编相中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留他在报社做通讯员，并派他去采访作家，因

此他结识了当时波兰著名作家玛丽雅·董布罗夫斯卡、佐菲亚·娜乌科夫斯卡、莱欧波塔尔·斯塔夫和尤利安·图维玛。

1951年他考上了华沙大学语言文学系，后转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他被分配到波兰《青年旗帜报》社做见习记者，同年，他就获得了波兰“卓越贡献金质奖章”，表彰他作为年轻记者撰写的一篇优秀文章，题为《这也是新钢厂的真实情况》的报道。

同年，卡普钦斯基被报社派往印度短期工作，其间他还去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1957年他从日本转道来到北京，作为波兰《青年旗帜报》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去过上海，后因波兰《青年旗帜报》社编辑部撤销，编辑部请他自行考虑去留问题。他决定回国，为此，他只能自己支付回国路费，买了火车票，乘火车九天，从北京经西伯利亚回到波兰。三十五年后，他在自己的《帝国》一书中提及了这次旅行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1958年初他回到波兰，在波兰通讯社工作了十个月，后被推荐到波兰《政治》周刊编辑部工作。1960年初，第三世界国家的刚果宣布独立，不久，国内就发生了政变。卡普钦斯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原始森林辗转进入刚果。十八年之后，于1978年他在自己的《足球战争》一书中，详述了这段艰苦的经历和刚果内战。

自1962年起至1974年，他重回波兰通讯社工作，并作为波兰通讯社常驻记者被派往非洲国家工作。他是20世纪60年代，波兰通讯社驻整个非洲唯一的波兰记者。作为战地记者，他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报道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政变和各种突发事件，给读者带来生动而真实的报道，并把珍贵的新闻故事传回波兰国内，很快成为波兰家喻户晓的记者，被祖国人民誉为“世纪记者”。

1967年初，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他患了肺结核，并因疟疾

感染引发了脑膜炎，回国治疗。病愈后，他前往苏联的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七个共和国，当年年底他又被波通社派往驻拉丁美洲做常驻记者，他曾驻智利、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他曾四次因被怀疑从事反对当地政府的敌对活动而被判死刑。其中有一次，因当时执行枪决的士兵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掏枪射击，他才幸免于难。

他曾十二次深入战火的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往国内发回新闻报道。1974 年至 1981 年他调入波兰《文化周刊》工作，又被派到非洲，首先到了已经获得独立的安哥拉，那里国内战乱频发，他一次又一次在战乱中、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向国内发回了真实的新闻报道。

1976 年他出版了《生命中的另一天》，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观察，描写了葡萄牙在安哥拉殖民统治垮台和后来引起的安哥拉内战；他描绘了安哥拉独立战争结束后，葡萄牙殖民者在离开安哥拉时的种种景象。

1978 年他又写了一本书《足球战争》，描写了安哥拉独立战争，其中包括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因世界杯预选赛引起的一场历时一百小时的著名战争，数百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1978 年他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皇帝》，记录了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个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统治的衰落史以及皇帝被推翻后的生活。这本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这使他在世界上一举成名。1987 年英国伦敦皇家剧院把他的作品《皇帝》改编成话剧，搬上英国舞台，受到欢迎。1989 年该剧被搬上波兰话剧舞台，在波兰上演多次。1982 年他出版了《伊朗王中王》，记录了 1979 年推翻伊朗巴列维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本书出版后，

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好评如潮。当时在伦敦和纽约的各大报纸和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都对这两本书的成功翻译和出版进行了报道。1983年《皇帝》被评为当年最佳图书。而在这之后的四年中，他没有出版任何书。1993年他出版的《帝国》见证了前苏联衰落时期的人民生活和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以及邻国的旅行经历。1998年他出版了《太阳的阴影》一书，全面介绍非洲的情况，200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展出了他的《来自非洲》的画册。

2004年他出版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7年他去世之后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

在人们刚刚踏入21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之初，2007年1月23日，正当波兰“标识”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与卡普钦斯基一起旅行》的书时，书中搜集了来自十三个国家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的翻译家们回忆他的文章，为庆祝卡普钦斯基七十五岁诞辰，卡普钦斯基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和摄影家却没能走下手术台，在还有不到两个月迎来他七十五周岁生日的时候，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看到这本翻译家们回忆他的集子，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雷·卡普钦斯基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是一本鲜活、生动、凝炼，具有亲历性、故事性的历史纪实报告文学，集纳了他作为记者四十多年来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和回顾。这本书内容丰富精彩，充满文学气息。有的段落惊险刺激，有的语言优美动人，使人爱不释手。

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他与希罗多德两个相互交错的旅行，回忆了早年的旅行采访和对旅行采访的认识过程，记述了他把希罗

多德的书当做自己人生指南的经历。1956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作为初出茅庐的记者，多次出差旅行采访，几次到了临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空旷边境地区，他突发奇想，想到边境那边看个究竟。于是，在一次与总编谈话的时候，他提出想出国采访的请求。但出乎意料的是，报社决定派他去遥远的、他一无所知的印度去工作。临行前，总编送了他一本书做礼物，这是一本厚厚的黄色缎面的精装书，书名是《历史》。这本书被公认为欧洲第一本历史书，作者是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此，这本书一直陪伴着他走遍千山万水，度过了寂寞、危险的艰难时光，让他见识了令他眼花缭乱、神秘而又难以一下子读懂的两个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这本书伴随着他走遍非洲，陪伴他见证了刚果和安哥拉、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独立战争和各种政治事件。

在这本书中，雷·卡普钦斯基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希罗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记者和第一位全球主义者。同时他还认为，希罗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虚构史学家，他的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报告文学。希罗多德是通过描写个人命运来阐释世界历史的。他书中的每一页都记录了人类的历史。雷·卡普钦斯基认为，把希罗多德这本书的题目译成"历史"，不能完全说明本书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源于希腊文的这个词"History"，实际上，它的原意是"研究"、"探索"的意思。如果用希腊语原本的意思，那可能更符合作者的意图和目的。因为，希罗多德不是靠翻阅档案来撰写学术著作的。这种写作方法，是在他身后的数个世纪以后，学者们才开始从事这件事的，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努力寻找、学习，描写历史是怎么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人是怎么创造历史的。因此，卡普钦斯基在书中想象希罗多德的采访常常是在篝

火旁进行的；“后来那些被称做神话和传说的故事，其实希罗多德在那儿倾听的时候，无论讲述者还是聆听者，当时都认为是绝对真实的。篝火在燃烧，有人添加了更多的柴火，那升腾着的火苗所传输给人们的融融暖意，激发了人的大脑，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

卡普钦斯基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希望还能有机会再来中国看看，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希望写一本报道中华之崛起的报告文学，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华语读者阅读和认知。但因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尚未有中译本，致使他不为华人读者认识，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而我由于工作繁忙，深入了解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愿望被暂时搁置。2007 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市参加我女儿王晓波的大学毕业典礼。女儿怕我在家寂寞，就带我去书店买书。

我在书店的引擎系统搜索后，惊喜地发现，很多卡普钦斯基先生的著作在 70 年代就被翻译成了英文版本。而《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刚刚被译成英文版本上市。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这本书仔细阅读。

我深深地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深邃的思维所吸引和感动，萌生了一种想要尽快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的想法。

2007 年 9 月，我陪同我的恩师易丽君教授到波兰参加波兰外交部长为其在世界推广波兰文学做出特殊贡献颁奖仪式，刚下飞机我就急不可待地到书店寻找《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波兰文版本，立即买下来，兴奋不已，想要翻译此书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幸运的是，在参加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波兰作协成员——波兰著名作家、诗人萨多夫斯基，在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曾经为他做过翻译。当时我向他询问如何能购买到卡普钦斯基先生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版权，如何联系他的家人或者他的代理人。他说他

自己和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关系很好，也认识他的夫人。他给了我卡普钦斯基夫人的电话。我立即从招待会赶回到住处，打电话给他的夫人阿丽茨娅·卡普钦斯卡。巧合的是，她也刚刚从柏林参加一个纪念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活动回来，第二天还要飞往其他国家，而我转天下午也要飞回北京。我们两个人只有中午十点到十一点有共同的空闲时间。于是我们约好了时间，我去拜访这位作家的亲人。

卡普钦斯基的夫人和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同时与版权代理商议，欣然同意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一书的中文版权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十分兴奋，带着这种喜悦与翻译此书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回到了北京。

一直到2008年的5月，我的翻译工作仍然进展缓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作家本人的崇拜导致诚惶诚恐，语言上斟字酌句。断断续续的翻译工作进行中，我收到了作者版权代理柴斯瓦夫·阿皮耶奇奥奈克发来的邮件，建议我申请一项为波兰文学翻译提供的奖学金，以便去波兰完成翻译工作。在各种材料报批之后，我顺利到达波兰，完成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初校。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很多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因为这些动力，我才能顺利将本书翻译完成。

首先要感谢波兰驻华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先生和文化参赞保罗·米莱夫斯基先生，感谢他们的全力支持。因为卡普钦斯基先生在波兰享有极高的声望，自从他们得知我要翻译这本书，便为我提供很多网络和文字资料，借阅以及赠送了我关于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很多书籍，一直非常支持把这样一位波兰国宝级的人物推向中国和世界。

感谢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夫人和他的女儿，以及他的版权代理

和照片代理，还有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档案助理博热娜·杜德科。他们的全力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感谢我的恩师易丽君教授，虽然她没有时间亲自帮我校对书稿和进行修改，但每当我遇到难题打电话求教时，她都仔细查阅字典，力求最精准地为我解答。

感谢我的同事胡凝及外交人员服务局与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领导和同事在多方面给予的理解、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的好朋友姚莉介绍我非常喜欢的央视著名记者王志先生，感谢王志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此书作序。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先生王慧全，我的女儿王晓波，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感谢我已进耄耋之年的父母，及我的妹妹苏丽娜、我的侄女津格尔娃帮助我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校对。

虽然在诚惶诚恐的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虽然疲惫劳累，但依然没有放弃。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从有翻译此书的愿望到获得版权，直到今天完稿，都得到了各方对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没有这些亲朋好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顺利地完成翻译工作。凭着对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崇拜和景仰，谨以《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这本中译本的完成，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我希望像波兰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先生在前言中说的那样，我要坚持不懈，努力翻译出更多的卡普钦斯基先生的著作，使我国的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位波兰最出色的战地记者、作家、诗人及摄影家。

乌　兰

2009 年 2 月 16 日